

# 法国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 法国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 内部读物 ·

**法国共产党反华言论**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 1.40元**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0\frac{5}{8}$  · 字数 249,000

1965年4月第一版 1965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63

##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14 日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屈从苏共领导的指揮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統計，到 1964 年 7 月，已經知道有六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決議、声明和公报，主要領導人的报告、講話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論等等。这些言論，象苏共领导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一样，信口开河，造謠誣蔑，內容荒謬絕伦，言詞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級。

为了使我們的黨員，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领导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現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論》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論輯为专集，陸續分册出版，以供讀者閱讀利用。

本书包括法国共产党自 1963 年 7 月 15 日至 1964 年 3 月的材料，共計三十八篇。书中的小标题、异体字和着重記号等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 目 录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 1963 年 7 月 19 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声明.....	1
列昂·費克斯接見《人道报》記者热罗姆·法瓦尔时的談話： 法国共产党对中国党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間的分歧的立場.....	5
弗朗索瓦·皮佑： 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	11
乔治·馬歇： 关于战争与和平問題.....	15
瓦德克·罗歇： 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20
列昂·費克斯： 和平共处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25
雷蒙·居約： 維護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是目前的一項首要任务.....	30
雅克·杜克洛答苏联記者阿·巴图林和姆·沙罗諾夫問： 各国人民譴責的立場.....	35
乔治·塞吉： 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高級形式.....	39

伊夫·摩罗：	
北京与个人迷信·····	43
让納特·維美徐：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路綫而斗争·····	45
弗洛里蒙·邦特：	
裁軍·····	51
——恩格斯的教导和中国领导人的政策	
瓦德克·罗歇：	
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作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	
团结·····	59
莫里斯·多列士 1963 年 9 月 22 日在山勒諾布勒的演說	
(节譯)·····	68
伊夫·摩罗：	
共产主义就是和平·····	71
让納特·維美徐：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个人迷信·····	73
雅克·杜克洛：	
苏联及其共产党的历史作用(节譯)·····	78
雷蒙·居約：	
莫斯科条約签订以后·····	85
罗歇·加罗迪：	
中国领导人的論点会把我們引到哪儿去？·····	96
貝諾瓦·弗拉商：	
为爭取和平共处而行动和阶级斗争·····	107
让-埃米尔·維达尔：	
中国领导人組織分裂活动·····	112
——他們建立分裂主义的国际組織	

雷蒙·居約在 1963 年 10 月 5 日法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节譯).....	116
瓦德克·罗歇在 1963 年 10 月 6 日法共中央全会上的报 告.....	118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10 月 6 日关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形势的決議.....	145
莫里斯·多列士在 1963 年 10 月 6 日法共中央全会上的 发言.....	158
让-埃米尔·維达尔： 中国和核軍备.....	173
雅克·杜克洛在新大学的讲话： 生活中的馬克思主义.....	175
雅克·杜克洛： 爭取和平的斗爭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	183
伊夫·摩罗： 中国领导人咒罵法国共产党人和吹捧戴高乐.....	192
法共《人道报》： 中国领导人的虛构和捏造.....	195
让-埃米尔·維达尔： 陈毅同戴高乐一样.....	197
雅克·阿尔諾等： 为什么，怎样.....	200
列昂·費克斯： 关于中国报纸上一篇誹謗性文章.....	246
馬賽尔·杜弗里希： 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	252

維克多·約納：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种道路.....	268
法共《共产主义手册》社論：	
法国共产党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277
法共《人道报》：	
法国議員們报道的毛泽东的談話.....	323
雷蒙·居約在 1964 年 3 月 25—26 日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摘要).....	325



##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1963年7月19日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声明

政治局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局势最近的发展。

中央委员会在它5月10日的决议中(这个决议仍然是从事研究和采取行动的基础),清楚地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忠实于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国际会议一致通过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在最近一段时期中,特别是在6月14日的信件中,中共领导人公开地对包括他们自己的党在内的所有的党所赞同的论点提出了非难,同时,他们又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在国际民主组织内展开了分裂活动。

日常的现实、艰巨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在1957年和1960年的文件中所包含的思想的基础上取得的成就,都表明了中国同志们的说法是多么错误。

他们攻击和平共处这一基本论点。他们硬说我们不仅要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实行共处,而且也要在帝国主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在同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实行共处。

和平共处丝毫不使政治和思想斗争结束。它不是阶级斗争中的休战。它在各方面都有利于这一斗争,并导致取得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进展,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普遍高涨(古巴、阿尔及利亚等),以及在法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和平、民主和实现社会权利要求的斗争的开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争取全面裁军与和平的斗争的正确性提出非难。事实上，他们否认，由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由于工人和民主力量的发展，决定了世界上的新的力量对比，因而使防止战争成为可能。他们似乎无视由于热核武器的存在和积累而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们不得不就1960年声明所提出的情况作选择：“要么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要么是毁灭性战争。”一场世界战争将在几天之内招致数亿人的死亡；象我们这样的国家将变成放射能弥漫的荒蕪土地。人们是不会在这样的廢墟上建立“真正美好的未来”、建立充滿进步和富裕的具有深刻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和平的事业是同社会主义的事业分不开的。

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是力求强使实行和平并确保人民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已经呈现了同反对军备竞赛和戴高乐—阿登纳条约的社会党同志联合、同受教皇“世界和平通諭”启示的天主教徒们联合，以及如象世界裁军大会所表明的那样，在更普遍的范围內同一切和平力量联合的新的可能性。总而言之，人类的命运首先取决于人们在一场新的原子战争发动以前出来干预。

中共领导人要使人相信这样一种主张：反对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是同人民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对立的。过去四十年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駁斥了这种說法。法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助于各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法国共产党从建立时起，就积极支持这些国家人民的所有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在摩洛哥、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

中国同志利用“革命”的詞藻，竟然把依据1957年和1960年決議而奉行的政策，說成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这里指的是：在我们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利用一切可能的广泛的反垄断联盟，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的具体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和平过渡

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不经过内战，是劳动者所希望的，它符合他们的利益，正如它符合民族经济利益一样。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求动员决心改造社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全部力量，采取空前的一致行动。中共领导人要我们放弃这种努力。放弃这种努力，就意味着放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同时使社会主义力量不能成功地抗击敌人可能采取的暴力。

中国领导人指责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千百万劳动者和非共产党民主人士表示不信任，而这种政策却是确有成效的。在我们看来，这条统一战线，不仅对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建立真正的民主、民族独立和平是必要的，而且在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也是必要的。

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所奉行的政策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表现出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世界革命运动统一事业的贡献的无知和蔑视。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做法中更普遍地看到这种态度，即宣扬被列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驳倒的“不断革命”和进行少数人的武装这种陈旧的理论，武装少数人是有害于必须进行群众斗争的理论的。

我们重申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强调的话：“社会主义的建设和进展、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三个潮流。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并且殊途同归走向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压迫。”

中国同志给他们的论点披上一系列一般的提法和列宁的引语，但是并没有考虑我们时代的性质。

他们甚至使用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格格不入的观点，抱这种观点的结果是：不把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建立在阶级原则的基础之上，而是把这种斗争建立在属于世界哪一部分和属于哪

种肤色的原則之上。

他們集中火力向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久經考驗的队伍和国际主义态度的典范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发动进攻。实际上，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当代一系列的重大問題提出了有普遍意义的新論点。它坚决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來說，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它最近致苏联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是在思想和政治上有特殊价值的一个文件。

中共领导人指責保卫和奉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共同通过的路綫的兄弟党服从苏联的“指揮棒”。这种反动派所慣用的陈旧誹謗只能使階級敌人感到高兴。他們不惜求助于破坏活动。

法国共产党重申它現在和今后都将在两条战綫上——在思想和实践方面——进行不調和的斗争：既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宗派主义。它現在和今后，都将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为反对有害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态度而斗争。

在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伟大斗争中，法国共产党是站在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这一边的。它将不遺余力地爭取扩大和加强这种团结。它将不遺余力地爭取和平、民主、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

1963年7月19日于巴黎

(譯自1963年7月20日法共《人道报》)

# 法国共产党对中国党同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之間的分歧的立場

列昂·費克斯接見《人道报》記者

热罗姆·法瓦尔时的談話

《人道报星期刊》的讀者，对于苏联共产党給苏联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詞句并不感到惊奇。事实上，本报曾經多次談到这封信所提出的問題，就是在上星期，还由伊夫·摩罗署名談过这些問題。尽管如此，这些問題依然是复杂的，往往被官方宣传和资产阶级报纸弄混乱和加以歪曲。

因此，我們要求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員列昂·費克斯就局势中使共产党员和全体法国劳动者特別感到兴趣的某些方面談談他的看法。我們向他提的第一个問題是：

——如何估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信发表之后的局勢？

——答：毫无疑问，这封信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文件，法国共产党政治局最近曾指出它的重要意义。

看过中国文件的大多数法国共产党员，在閱讀中国文件时首先产生一种不愉快的印象。然而，由于这个文件的过火和恶意；由于它恣意詆毀苏联共产党和包括我党在内的其他党；由于它违背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1957年和1960年會議作出的決議，从而表示了它的蔑視态度，所以它很快地就显出是危险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場突出地表明，要是这种立場相当广

泛地占优势，国际工人运动便要冒严重的危险。事实上，分歧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这是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分歧。更确切地说，它关系到各国的工人阶级、各国的人民，因为现代时代的一切根本问题都由于中国的立场而成了问题。首先是和平共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怀疑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者和战争势力接受裁军与和平。他们低估核战争的危险，尽管他们从切身经验中知道，可惜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是一只“纸老虎”。他们竟然接受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的这样一种战争的观点。

苏联共产党公开信正确地强调指出，这样一种观念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根本对立的。

毫无疑问，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否认中国同志有权任意支配在发生热核战争的情况下注定要毁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时，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不仅有法国共产党员，而且有全体法国人民。无论如何，我们法国人要遭到这种毁灭下场，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多外国军事基地，而且它的政府还热衷于建立打击力量，按照它的元首的说法，这种力量能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牺牲。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听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出下面的话时怎么能不赞同呢？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要问这些‘革命者’：谁给了你们这种决定我们生存的权利？我们赞成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愿意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通过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

在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这一段里，人们可以找到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次阐述的，特别是1963年5月10日阐述的观点：

“和平共处不是暂时的休战，而是互相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国

与国之间的糾紛。必須迫使帝国主义放弃使用武力。和平共处要以加強政治斗争和意識形态斗争为前提。在我們时代，和平共处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的高级形式。”

中国同志不愿意去仔細考虑这种由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而确定的立場是有根有据的。据我們所知，他們从未重視过我們党中央委员会5月10日所作的決議的下述这一段：

“这一点(指“从社会生活中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原編者注)并没有使馬克思主义者忘記：帝国主义并没有改变它的侵略本性……

“因此，虽然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人們不能因此认为和平就是注定了的。所以，我們党意識到資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責任，不断地号召法国人表現极大的警惕和采取行动来反对这一危险。”

——究竟怎样解释中国领导人譴責法国共产党滑到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立場等問題呢？

——答：他們的这种评价不是严肃的。这无疑是因为我們一貫指責了中国领导人視为至宝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陈旧論点。但是，我們再說一遍，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评价不是严肃的。

中国同志丑化和平共处，以便能够更好地誹謗它。比如，他們硬說和平共处同时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在每个資本主义国家里，还指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总之，他們指責我們变成了阶级合作的支持者……硬这样說，就是否认当前法国的整个社会现实，因为权利要求的运动过去很少有現在这样多，这些运动(这也是正常的)都是得到共产党人支持的。

我們的政策的另一面——我們再說一遍，它是忠于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的決議的——似乎也引起了中国同志对法国共产党的攻击，这是指的我們对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

义的可能性的立场。

这个立场并不是新的。

必须提醒，莫里斯·多列士同志早在1946年11月就对英国《泰晤士报》说过：“世界上民主的进展……使人们可以考虑通过与俄国共产党人所走过的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每一个国家的道路必然是不同的。我们始终认为并且宣布，富有光荣传统的法国人民自己能够找到通往更民主、更进步和社会正义的道路。然而历史证明，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

1946年以来，法国共产党从未放弃过这种态度。

同中国领导人所说的相反，我们党从来也没有把和平道路定为唯一可行的道路。例如，1956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指出：“关于以和平手段还是以暴力手段来打倒资本专政和缔造美好世界的抉择问题，法国工人阶级将视资产阶级抗拒的形式来解决。”

法国共产党甚至在工人分裂的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坚持不懈地主张建立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联合行动以及从民主力量的团结开始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以准备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使这个“美好世界”到来。

今天已经实现广泛团结的情况还不能证明我们政策的正确性吗？同时这种情况还不能使人认识到新的巨大的可能性吗？

——另一问题：应当怎样理解中国同志所说的争取和平的一般斗争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之间的所谓矛盾？

——答：这种矛盾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想使人相信这一点，那就是削弱理应共同反对各国人民和劳动者的唯一敌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

可以说，获得了独立的人民——甚至包括进行了武装斗争的



人民——今天没有一个不承认他们赢得解放的决定性因素，是首先由于存在着以苏联为主要力量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的变化。此外，非洲和亚洲新兴国家的大部分政治家有理由把保卫和平看作是维护他们的民族独立以及他们的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

1963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的非洲国家首脑宣布支持裁军，支持在非洲土地上取消外国军事基地，支持非洲的无核化，这不是偶然的。三个月以前，在莫希（坦噶尼喀）举行会议的六十个亚非国家的代表表示他们支持和平共处的原则，并决心为反对核武器和争取裁军而斗争。

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前不久去苏联访问，消除了许多猜测。现在已经清楚，由于苏联共产党的坚定和明智的政策，才保住了世界和平、古巴的独立和它的社会主义成果。世界所有革命力量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同时，帝国主义者今后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共产党人反对输出革命，但他们也不承认任何人有权输出反革命。

中国领导人企图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团结运动同世界反帝力量——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洪流分割开来，从而损害了这三大洲人民的事业。

让我们谈一个具体情况。越南人、非洲人、马尔加什人、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摩洛哥人都了解法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共产党对他们的解放斗争曾给予经常不断的支持。他们知道，这种支持今天继续有效地表现在反对新殖民主义者的企图和拥护新近获得解放的国家能以取得真正的独立所必须的援助上面。象中国领导人做的那样，试图离间这种天然的团结，这势必有利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殖民主义勾当中如此惨重地遭到厄运的帝国主义。

——最后一个問題：在发表北京的复信和苏联共产党的去信之后，是否也向法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些問題？

——答：这些信件具体地說明了极其严重的局势，局势所以极其严重，是因为它包含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明显危险。它提起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因而也提起法国共产党人的注意。

确实，很难說中国同志的态度使我們感到突然，因为他們的某些基本立場已在1961年11月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上受到过我們的批評。一年半以前，共产党干部已經可以看到我們党的总書記有关这方面的講話的小册子了。

此外，近几年来，法国共产党党内就中国同志提出的一些問題也會展开过重要的討論。我們的代表大会、我們的每次中央委员会會議、党的所有組織都对此进行过辯論。这就是說，法国共产党人已武装起来，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数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办。

毫無疑問，还应当对共产党人、同情者和所有劳动者加强思想工作。《新法兰西》周刊下一期将发表中国領導人的信的全文和苏联共产党給苏联共产党員的信的全文，因此每个人都將能够判断：法国共产党的意見是无可怀疑的。另外，《人道报》將繼續刊載所有有用的消息，并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問題的主要方面发表研究性文章。

最后，无須重申法国共产党將尽一切努力，在尊重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加强它始終热忱致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

（譯自1963年7月21日法共《人道报星期日》）

# 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弗朗索瓦·皮佐

法共政治局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新近的发展后，在7月19日的声明中不得不特别指出两点：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最近时期、特别在他们6月14日的信件中，公然使1957年和1960年会议上被大家——包括他们自己的党在内——所通过的论点成了问题。

2. 与此同时，这些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组织内展开了分裂活动。

近来发生的事情不具有能使人这样认为的任何因素：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考虑，并且回到了较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态度上来。

分歧是由于1960年4月中国共产党用各种文字发行《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才第一次公开化的。

1960年7月14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它指出，我们党忠于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和平宣言中的原则，赞同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通过的声明，对中国共产党同志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所采用的企图使人接受他们的立场的手段感到遗憾。

在这封信中我们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现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和平共处问题。和平共处并不象中国同志硬说的那样，是一种新策略，而是一项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在现阶段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之一。坚持认为这一論点使帝国主义的性质成了問題是錯誤的。和平共处是以力量对比发生的不利于帝国主义陣营的巨大变化为依据的。

这封信还說，中国同志在裁軍問題上采取消极态度，是沒有考虑到裁軍是动員群众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一个因素，看待現阶段面临的包括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問題在內的一切問題时，都应考虑到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

大部分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向中国同志指出了同一意見，但中国同志照旧闡述他們的教条主义的錯誤論点。

他們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同志一起，表示不同意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本結論和 1957 年 11 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的決議。

在 1960 年 11 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會議的时候，中国同志坚持他們的論点，这使莫里斯·多列士同志不得不代表法国代表团做如下声明，他指出：

“中国代表团的再次发言絲毫无助于我們會議原来期望取得的結果：通过一个有关我們时代的性质和由此而得出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任务的声明。”

虽然中国同志最后在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上签了字，但他們很快就用自己的态度表明，他們是不同意这些条文的内容的。他們相反变本加厉地攻击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攻击苏联共产党、它的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攻击 1957 年和 1960 年會議的決議。

今年年初，为了进行一次有成效的討論，赫魯曉夫同志在德国統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曾建議停止公开論战，这得到包括我們党在內的其他党的贊同。

中国同志同意他們的党同苏联共产党进行会談，这本来使人

可以希望討論將具有另一方向。遺憾的是，中國同志却繼續堅持他們的攻擊，這使莫里斯·多列士同志在今年5月中央全會上不得不做如下聲明：

“在政治上我們同那些以政治為基礎來討論的人進行討論，而我們不答复那些誹謗、侮辱和謾罵。我們覺得這種做法同我們以及同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都是不相稱的。我們對中國人民懷有極大的敬意。我們將不在这方面仿效我們的中國同志。”

中國同志在他們同蘇共會談前夕——6月14日——發表了一封信，以他們的錯誤論點重新對蘇聯共產黨和其他黨進行誹謗和侮辱。

中國同志這樣做大大損害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他們不但不是為這一運動取得新勝利而作出貢獻，反而是使這些勝利變得更加困難。

近幾年的經驗已經表明，他們的說法是多麼缺乏根據。我們希望事實將使他們看清楚現實。

法國共產黨在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偉大鬥爭中，同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站在一起。

我們每天都收到來自一些支部、區委會和省委會的決議，表示不同意中國同志的分裂主義的政治態度……

中央委員會已為法共黨員和他們的組織提供一份重要的材料，我們希望每個人去閱讀和研究它。

同志們可以參考我們歷次代表大會和蘇共歷次代表大會的文件以及1957年和1960年會議的文件。

他們將在1963年1月出版的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的小冊子中看到下述文件：1960年7月法國共產黨致中國共產黨的信件和決議；法國代表團在1960年11月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的文件；1962年1月24日法國共產黨致中國共產黨

的信件；1960年12月、1961年11月和1962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莫里斯·多列士、瓦德克·罗歇和雷蒙·居約的报告和发言以及所通过的若干決議。

《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小册子包括1963年5月10日中央全会的決議，全体黨員应该人手一册。他們将在这本小册子中讀到对下述問題的闡述：关于我們时代的特点；关于資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关于战争或和平共处；关于法国共产党进行广泛的反垄断联盟的政策；关于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关于两条战綫的斗争，即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的教条主义。

最后，《新法兰西》最近发表了一份材料，包括中国共产党6月14日的信件；7月14日苏联共产党致各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7月19日法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

我們热烈要求所有不了解这些文件的黨員去閱讀这些文件，它們指出中国同志的論断是多么錯誤。这样，他們将能更好地武装起来，以創造性的精神从各方面来維護和貫徹党爭取实现工人民主力量的联合、爭取社会进步和爭取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政策。

（譯自1963年7月29日法共《人道报》）

#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乔治·马歇

在中国共产党同志和几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存在分歧的问题中，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正是由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认为维护和巩固和平的问题是当代的首要问题，它们才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一致确定，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为争取和平、反对世界核灾难危险而进行斗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歧是深刻的，根本性的。当然，他们在文件中——6月14日的信就是如此——也重复了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1960年声明中所包含的某些估计和建议。他们也谈到“必须防止新的世界战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并声称“支持全面裁军”。事实上，这是一个屏风，目的在于掩盖他们接着提出的、与开展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相违背的错误和虚假的论点。

中国同志之所以不得不求助于这种方法，那是因为他们害怕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人民的裁判。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人民深深希望和平，只能拒绝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观点会导致：无视一场热核战争的后果，怀疑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有可能消除战争，宣布和平共处政策为幻想，把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同革命斗争对立起来。

在我们时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要么实行和平共处，要么进行热核战争，别无其他选择。在今天，一场世界战争只能是热

核战争。

然而，正如我們党中央委员会上次会议通过的声明所着重指出的，“由于大规模杀伤武器和技术手段发生的质的变化，以及核武器的积累，使人类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将有数以亿计的人死亡。象我国这样的人口高度集中的一些国家，都将变成放射性尘埃染污的荒野，使无数的工业财富化为乌有。

一旦帝国主义引起这样一场灾难，即使资本主义真的被人民消灭和清除，人们仍然不能无视威胁着人民的危险。否则，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因此，我們党完全同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各项文件，认为再没有比制止发动一场新的世界战争更急迫的任务、更崇高的义务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愿考虑这种新形势，无视使用核武器将产生的可怕后果，因为他们硬说“原子弹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它并不可怕”。

可是，中国同志在他们的推理方面走得更远了。他们从重要的是消灭帝国主义、“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思想出发，甚至可以說他们不无轻松地考虑着他们认为将在世界热核战争后出现的那种前景。实际上，他们在发行的《列宁主义万岁》中写道：“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帝国主义废墟”，这也将是被毁灭的国家的成堆的死尸。人们只能拒绝这种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

不错，我們要消灭资本主义，要建立社会主义，即要建立将給我国人民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真正幸福的新社会，但不是通过一场



热核战争将造成的大屠杀来建立。我们要通过阶级斗争，通过工人阶级及其所有同盟者的斗争来建立。因此，我们努力使工人阶级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及其必要性，并努力创造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必要条件，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可以考虑这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是符合劳动者的利益的。

照中国同志说，提醒人民注意一场热核战争的危险，那就是向帝国主义的讹诈让步，就是瓦解群众。

首先，恰恰是倒过来才对。各国人民对于威胁他们的危险的规模认识得越清楚，就越能有效地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

其次，我们要告诉人民：危险是巨大的，但可以防止，因为今天实际存在着阻止战争、强令实行和平共处和全面裁军的相当强大的力量。

可是，中国同志否认排除战争危险、强令实行和平共处和裁军是可能的。他们在6月14日的信中就是这么说的：“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样推理就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是重复一些公式而不考虑生活。

正如1957年和1960年会议指出的，世界变了。它不再是五十年前列宁所看到的世界了。

诚然，世界的一部分仍然依附于本性没有改变的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不再是半个世纪之前那样的决定性力量了。它不再是独自统治世界的力量了。它面前有了一个成为世界政治决定性因素的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障地日益巩固，而帝国主义的障地则日益动摇。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国家大部分都反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仍然处在殖民主义枷鎖下的国家正在开展斗争。

国际工人运动在数量上、在理智上和力量上，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一个强大的世界和平运动正团结和引导着世界上数以亿計的人。

正是考虑到这种新形势，我們才說，今天实际上存在着防止战争、强令实现和平、和平共处和全面裁軍的相当强大的力量。

当然，要以各国人民展开争取和平的斗争为条件。但是，我們在这里还要指出中国同志在指責我們“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和“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时所表现的恶意。歪曲事实者莫过于此。事实上，我們一直說，尽管战争不再是注定的，但和平也不是注定的，一切都要取决于人民的斗争。因此，我們正是首先依靠世界上現存的一切和平力量的坚决斗争，才說有可能阻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战争的企图并把裁軍与和平共处強加于他們。

此外，我們中央委员会5月10日的決議說：“和平共处不是暫时的休战，而是互相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国与国之間的糾紛。必須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使用武力。和平共处要以加强政治斗争和意識形态斗争为前提。在我們时代，和平共处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的高级形式。”

生活的經驗证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于战争与和平問題的立場是正确的。

事实上，当美帝国主义以侵略威胁古巴从而使原子灾难危险籠罩世界的时候，正是苏联的既坚定又明智的政策、古巴人民的勇敢和世界輿論給予他們的支持，才击退了危险和拯救了和平，同时保住了古巴人民的独立和社会主义成果。

新近在莫斯科簽訂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和水下进行核爆炸的

协定，使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除戴高乐政权和中国领导人之外——感到极大满意，它证实了苏联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的斗争的效力。

各国人民将从这一为其他有利于裁军的措施开辟了道路的协定中，吸取一种加强他们的团结和加强争取和平的行动的愈来愈大的毅力。

因此，人们只能拒绝中共领导人阐述的错误、虚假和危险的论点，中共领导人实质上是不相信工人阶级、民主与和平力量能够在争取和平、裁军与和平共处的崇高事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译自 1963 年 7 月 31 日法共《人道报》)

## 关于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瓦德克·罗歇

在1957年和1960年的宣言和声明中所包含的和被中共领导人所非难的那些论点里，包括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和平的道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一论点。

在被1960年声明所证实的1957年的宣言中，这样一个论点指出：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如果能实现，对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对于全民族，都是有利的。在目前条件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以自己的先进部队为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工人阵线和人民阵线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党派和社会团体达成各种可能形式的协议和建立各种可能形式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上，把大多数的人民团结起来，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从而保证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

宣言同时指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而且还取决于大资产阶级仍可能进行的抵制。如果大资产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那末，工人阶级将被迫通过非和平的手段来确保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今年6月14日致“苏联共产党”的信中，他们首先捏造了苏共和其他党（譬如我们党）的立场，硬说这些党只承认和平道路是唯一可能的。

其次，特別是他們實際上否認當代存在着採用和平的鬥爭形式以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

中國領導人為了支持他們的觀點，提到列寧認為和平道路是“極其罕見”的可能性。可是他們沒有說，列寧認為這種可能性是“極其寶貴”的，以便人們設法利用這種可能性。

但是，他們尤其不願意看到的是，我們現在的世界不再是列寧所看到的那個世界。當時，資本主義還在世界上為所欲為。它擁有到處進行干涉的力量和手段，以扼殺正在萌芽的革命。因此，一般說來，革命只能通過暴力方式才能取得勝利。而後來，世界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主義的世界體系已經成了國際政治的決定性因素。社會主義的思想深入世界各國廣大群眾的心中。這種局勢無疑有利於尚未實現社會主義的各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 \* \*

因此，在當代，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可能而且應該是多樣的，而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越來越顯示出來。

而且，這是我們黨從1946年就肯定說過的，當時黨的總書記曾對英國《泰晤士報》這樣說：“世界上民主的進展使人們可以考慮通過與俄國共產黨人所走過的不同道路走向社會主義。”

不管情況如何，社會主義革命始終是一個飛躍，因為向社會主義過渡要求工人階級及其盟友奪取政權，並把主要的生產手段社會主義化。

社會主義革命還以必須實行暫時的無產階級專政為前提，不管專政形式如何，它的使命在於：

——一方面，保證和確保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同反壟斷組織的、關心建立社會主義的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最廣泛的聯盟；

——另一方面，保證和確保全體勞動者的民主、保衛新的社會

主义民主制度，以反对前剥削者进行的活动，教育广大群众，使之越来越多地参加公共事务的指导和社会的管理工作。

这样做是为了走向消灭无产阶级专政以利实现“全民国家”，然后实现共产主义，那时，国家将由社会自治机构来代替。

但是，既然如此，对工人阶级来说十分重要的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可以通过和平道路来实现的，因为不可否认的是，这样做符合广大劳动群众的愿望，同时也符合国家的利益。

但是，中国领导人却拒绝关于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点，为此，他们提出了历史上没有先例这一论据。

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真谛，恰恰就是要走在行动之前，并在考虑到新的条件的情况下引导行动。

而且，中国领导人还说那些“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人，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实际上，是他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精神，因为他们拒绝考虑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仍然死抓住半世纪以前所下的定义，当时资本主义还是决定世界的力量，而今天的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了。

中国领导人认为可以否认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喋喋不休地重复人人都承认的统治阶级不会自愿放弃政权的说法。

但是，关于通过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点，丝毫不是以资本家将接受自动让位的思想为依据的，因而也绝不是以削弱阶级斗争为依据的。

正如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当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力量占优势，以至于大资产阶级不再能够诉诸内战的时候，就会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平进行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求空前地动员群众，要求决心改造社会的一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力量联合行动。

为了促使一切民主和反垄断力量聚集在工人阶级的周围，我们党制订了一个包括进行深刻民主改革的纲领，其目的在于通过建立新民主来限制垄断组织的势力，鼓励群众的首创精神。

在和平和民族独立政策范围内实行越来越深入的民主改革，事实上将使工人阶级及其盟友能够孤立大垄断资产阶级，并在国家生活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同时，也将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使全国人民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及其必要性。

我们党正是在这个前景中，完全同意 1960 年的声明，并且认为，争取发展民主的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叫我们放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坚持认为，武装斗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同样，他们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团结和广泛联合非垄断力量的政策。

但是，假如我们遵循这一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方针，那末对我们国家产生的后果将是绝对灾难性的。

由于这样的方针丝毫不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所以这一方针只会使我们同群众孤立开来，并使工人阶级丧失其盟友而只有利于垄断组织政权。

以“革命的名义”，将会由于我们放弃用来实现这一革命的手段而使社会主义革命被推迟和成为不可能。

中国领导人不相信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能够挫败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计划，他们更不相信在某一个特定国家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群众斗争确保向社会主义和平

过渡。

实际上，在他們的“革命的”和“左傾的”詞句背后，主要是对工人階級的力量和它的革命能力缺乏信任，对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无产階級在階級斗争中的胜利缺乏信心。

相反，我們法国共产党人相信，随着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共同努力团结一切工人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个人专权政权、争取社会經济权利、争取和平与争取建立真正民主制的斗争，我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包括利用一个真正民主的議會——的可能性便将不断增加。

正是为了促进通过和平道路——通过动员一切民主的和反垄断的力量——成功地走向社会主义，我們党才在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論点：即同其他民主政党的合作——包括同社会党合作——不仅目前是必要的，而且在明天为争取共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也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党，党的各級組織和党员将热情倍增地来实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間的統一行动以及所有民主民族力量的团结。

他們知道，这样做，正是为争取社会主义和和平而成功地进行着斗争，社会主义与和平愈来愈是不可分割的。

（譯自 1963 年 8 月 2 日法共《人道报》）



## 和平共处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列昂·费克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展他们的分裂主义宣传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或刚解放的各国人民的斗争问题。

中国领导人6月14日的信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便就这个问题大肆谴责苏联共产党和始终忠实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其他共产党，并对它们进行诽谤性的影射。

这些党不仅被谴责为低估，而且被谴责为“鄙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力图压制这个斗争”。他们硬说，“有些人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他们谴责“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他们硬说，“有些人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谁都了解，“有些人”是指谁，“别人”又是指谁！）

中国同志根据什么作出这些评价的呢？如果证明这些评价是确实的，那末这些评价就是严重的错误。

他们避而不引证任何事实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这是有原因的。

他们“忘记”提到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中央给苏共党员的信中所包含的下面一段话：

“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只要存在着殖民主义，就会有解放战争。这是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不可避

免的，因为殖民主义者不会自愿地给各国人民以独立。因此，各国人民只有用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苏联共产党的这个文件又说：“苏联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最广泛的支援。我国曾经向越南、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古巴和其他国家人民提供的实际援助是众所周知的。”

中国同志完全知道这一切。他们根据切身的经验，是清楚地知道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对于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它们获得解放之前和以后所采取的模范的列宁主义的态度。他们更不是不知道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为了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多年逆着广大群众的感情进行的。他们知道法国共产党始终在努力执行它的总书记早在1932年发表的声明：

“法国的全体劳动者应当了解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起义斗争的意义……我们的印度支那或阿尔及利亚的兄弟们给予法国资产阶级的每一个打击，都是对我们运动的直接帮助。反过来讲，我们对我国资产阶级的每一个打击，也是对在‘它的’殖民地受它压迫的奴隶们的直接帮助。

“法国本土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应当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因为这是他们双方的利益。”

中国领导人对于我们的这种态度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呢？他们为什么看不出法国共产党的行动始终是由这个立场所明确表示的国际主义决定的呢？此外，正如我们不断指出的，国际主义也是同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分不开的。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力图讨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他们竭力表现为这些大陆的各国人民的独一无二的保护者和“老大哥”。他们试图把民族解放斗争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

对立起来。

他們滿不在乎地否认他們在 1960 年所承认的一个事实，即当代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之間的矛盾。他們滿不在乎地敢于破坏旨在团結全世界反帝力量的联系，从而为削弱和甚至分裂这个运动开辟道路。他們滿不在乎地陷入庸俗的家长主义和把不发达国家推向一种民族主义。

所有这一切都是极端严重的。

幸而，刚刚摆脱帝国主义枷鎖的人民和正在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并不比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更容易受騙。

他們深信必須团結一切反帝力量来制服可惜并不是一只“紙老虎”的帝国主义。

同資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完全一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都知道苏联在总的反帝运动中的巨大作用。而且是一向如此。1949 年 7 月，毛泽东同志曾正确地指出：“1917 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苏联始終是各国人民的伟大的灯塔和鼓舞者。苏联在粉碎希特勒主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后来它的威力的不断增长，大大促进了民族运动的发展，并使几十个国家能够摆脱殖民主义奴役而获得解放。

今天，社会主义体系，首先是强大的、和平的和警觉的苏联的存在，是各国人民独立的保证。在古巴事件获得解决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最近訪問苏联之后，誰也不能怀疑这一点了。

一切冒有如下危险的事情：即削弱社会主义国家、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之間的斗争中的团結，都是純粹的毒素，必須予以摒弃。

特別有害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者认为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是违反民族解放斗争的。

当然，古巴的例子完全否定了这样的論断。当 1956 年帝国主义侵略埃及时，埃及的例子也是如此。但是，中国同志不愿意从这些事实中吸取教訓。他们不愿意承认，国际上的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已为尚被压迫的国家的解放創造了新条件。

殖民主义的旧形式已經变成无法维护的不合时代的东西了。例如，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安哥拉的葡萄牙統治者的政策受到了几乎一致的譴責。戴高乐政府在馬提尼克、瓜德罗普、留尼汪的政策也将很快受到同样的譴責，假如他们不迅速給予这些地区的人民以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的話。

緩和国际局势的政策孤立了殖民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在那些力图过和平生活的国家的国际大家庭中制造叛乱。他们不能再用至今使用的手段来保持他們的統治了。他们不得不使用不那么粗暴的、比較“巧妙”的方法。

但是，已經摆脱了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愈来愈清楚地判断出新殖民主义的确切含意。他们了解帝国主义国家送来的“礼物”掩藏着一种新的統治；戴高乐政府的“合作”所掩盖着的真实东西。

苏联的兄弟般的无私援助和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和平竞赛，只能促进这种理解，因而可以帮助昨天还受压迫的国家走向真正的独立。

似乎无需強調指出全面裁軍政策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一政策可使迄今用于軍事开支的大量資源省下来。那时，生活的力量的团結一致便可以代替对热核战争的劳民伤财的准备。同时，在緩和局势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被昨天还是殖民地的国家的大部分执政者視为胜利来加以欢迎。例如，本·貝拉总理最近就肯定說，莫斯科条約是“重大的事件……它开辟了完全令人安心的前景……而且便利了象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些面临着核問題的国家的工作”。

因此，一考察这些問題的某个方面，就可以了解中国领导人在被压迫人民或新近解放的人民的斗争的这个如此明显和重要的方面采取的立场是多么危险。唯一正确的立场是：不是分裂反对帝国主义的全体力量，而是团结和联合这些力量。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年5月10日表示的立场正是这种立场：

“社会主义的建设和进展，劳动群众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三大潮流。它们远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支持的，并都致力于消除一切剥削和一切压迫。”

广泛宣传法国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利益，也就是表明我们不辜负千百万法国人对我们党的信任。

（译自1963年8月5日法共《人道报》）

## 維護和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 團結是目前的一項首要任務

雷蒙·居約

世界各國人民都熱烈地歡迎蘇聯、美國和英國代表在莫斯科簽訂的決定停止在大气層、宇宙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他們正確地把這個條約看作是和平事業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和平共處的一個勝利。

已經達成的協議，為它所打開的全面裁軍的前景帶來了巨大的希望，而且直接為大西洋公約國家同華沙條約簽字國簽訂一項互不侵犯條約和解決德國與西柏林問題帶來了巨大的希望。

為了鞏固既得的成就，一切和平力量必須進行長期而頑強的鬥爭。美國的最反動最好戰的一伙人激動不安了。波恩的軍國主義復仇分子也是一樣，那里一團混亂。巴黎政府反對這項條約。人們深深感覺到戴高樂將軍的戰爭政策使法國遭到的孤立，我國人民要求法國必須在莫斯科條約上簽字。

可是——這也引起我們的遺憾和憤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莫斯科條約所採取的立場，事實上同我們所反對的力量所採取的立場是一樣的。我們的同志應當嚴肅考慮這個問題，因為正如他們喜歡一再說的那樣，事實總歸是事實。我們坦率地告訴他們：你們不該採取那種立場。

對莫斯科條約的這種態度，不可爭辯地強調表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試圖強加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那種政策的根本錯誤性質。

这一点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就已經明显地表現出来，当时中国报纸无耻地指責苏联共产党和赫魯曉夫同志犯了“投降主义”和搞“慕尼黑阴谋”。对此已經有了答复，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說得对：“要是沒有当代世界新的力量对比，美帝国主义会毫不迟疑地把古巴革命溺死在血泊中。于是，我們現在就不是在我們国家里建設社会主义，而是在山上、在田野、在地下同占領者进行战斗。”

中国同志在将近五年前开始強調某些意識形态的分歧，現在他們把这些分歧扩大到了具体政策和日常政策方面。他們在强使人接受这些分歧的同时，还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內部組織派別和集团、进行破坏活动的不能容許的企图。因此，他們便造成了使各国共产党人和劳动者感到不安的严重分裂的威胁。

从1959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消极行动就日益增多起来。

1960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行了一本叫做《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譯成了各种文字，并煞費苦心地散发到許多党的內部。这本小册子闡述了一条宗派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綫，这一路綫反对我們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反对各国共产党1957年會議的宣言，反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下述論点：从現在起有可能防止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前景，必須同社会党人团结，反对个人迷信，維護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1960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利用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會議，对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进行了无理的攻击，并且組織了一次派別性的會議。我們党在1960年7月7日的一封信<sup>①</sup>中，曾提請我們的同志注意他們的这一方面活动。

---

<sup>①</sup> 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問題》小册子。

在1960年11月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中國代表團試圖強使人接受它的錯誤路線而沒有得逞之後，便反對在聲明中明確譴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派別和集團。現在，每一個人都可以理解這種反對的原因了。

莫里斯·多列士同志代表我們黨代表團呼喚維護我們的運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團結時明確指出：“一個共產黨特有的活動能力，正是來自它不容許自己內部存在任何形式的派別。同樣，如果可以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建立集團或形成派系，那就不再有統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了。認為這一運動可以同意它的內部經常存在有組織的少數派，並承認這一少數派有權進行違背大多數通過的文件所確定的路線的活動，這是有害於運動團結的觀點。”<sup>①</sup>

中國代表團最後同所有的黨一道投票通過了聲明和告世界人民書。但是，像我們隨後所必然看到的那樣，他們的這種投票並不是真誠的。

事實上，在八十一個黨會議後的第二天，中國同志就加緊進行他們反對共同決定的方針的鬥爭了。此外，他們還把分歧帶進了國際民主組織中。1961年12月在斯德哥爾摩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中國代表團反對召開爭取和平與裁軍世界大會。大家知道，後來這個大會開得很成功。

我們黨曾於1962年1月24日就在斯德哥爾摩引起的事件致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我們強調指出裁軍口號對各國人民的重要意義之後指出：

“你們的代表在斯德哥爾摩、即在一个非黨的群眾運動中的政治立場和行動，如果不遭到拒絕，便可能導致縮小運動的基礎本身和使運動分裂。由於你們代表的這種行動不僅表現在世界和平運

---

<sup>①</sup> 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小冊子。



动組織內，而且也表現在許多国际群众組織內，这就势必增加这些組織的困难。我們向你們提出自己的意見，是因为我們不仅关心世界和平运动的团結，而且也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sup>①</sup>

我們根据自己的一貫政策和出于对国际运动团結的关心，曾在1963年1月表示同意苏联同志关于停止論战和为举行一次各党會議創造有利条件的建議。我們曾对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宣布7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談的消息感到高兴，然而这次会談却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建議而又不得不中途停止。

中国同志通过繼續公开論战的同时，大肆辱罵和誹謗那些坚决站在列宁主义立場上的党及其领导人，資产階級報紙、戴高乐政府的电台和电视台給予这种辱罵与誹謗以最突出的位置。我們已經說过，在这方面我們不想学我們的这些同志，这是同我們不相称的，也是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相称的。

派別和集团活动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受到的分裂威胁，最近一个时期进一步加剧了。

中国领导人把社会主义陣营的紧密团結置于危险的境地。他們企图挑起各大洲的人民和党互相反对。在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的共产党內，他們組織和支持各种反党叛徒集团来反对党。在法国，他們只找到了一小撮托洛茨基分子为他們散发文件，这些文件正在包括我們党在內的各兄弟党中传播資产階級的老一套誹謗：“跟着苏联的指揮棒轉”。

对各国共产党內部事务的这种干預，日益破坏各国党的独立。这种干預如果不是要制造分裂，那么它的目的又何在呢？他們自以为——这是以什么原則为名义呢？——有权独自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另一个綱領来与共同制定的綱領对抗。这是一种不可

---

<sup>①</sup> 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問題》小冊子。

容忍的自負，是目中無人，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在加勒比海危機時，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領導人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公開提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10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機關報《人民之聲報》在談到赫魯曉夫同志時寫了如下一段話：“廣大的共產黨員和勞動者越來越了解清楚，人們已背着他們進行了一次大背叛。人們完全知道，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在看到糾正孟什維克的一切希望都已破滅，而同這些人仍然留在一個統一的黨內已經有害和不可能的時候是怎樣行動的……”。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刊《紅旗》也表明了同樣的立場。最近，阿爾巴尼亞報紙一直鼓吹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心召開各國黨的會議。

我們認為，每個黨都是獨立的。沒有統治黨和附屬黨，也沒有大黨和小黨，每個黨都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負責，都是世界革命大家庭的一員。

全世界共產黨人有共同的敵人。和平、民主、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的新勝利的主要條件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下的堅強團結和一致，社會主義國家互助和友好，各國勞動者的團結一致，以及正在為爭取政治主權和經濟獨立而進行反帝鬥爭的各國人民的團結。反對這些力量的各種企圖都將有利於帝國主義。

維護和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團結是目前的一項首要任務。

我們黨對幾乎所有兄弟黨在这一切原則問題上所表現的觀點一致表示祝賀。它將不惜一切力量為擴大和加強這種一致而努力，為保證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努力。

（譯自1963年8月12日法共《人道報》）

## 各国人民譴責的立場

雅克·杜克洛答苏联記者阿·巴图林  
和姆·沙罗諾夫問

“新聞社”記者阿·巴图林和姆·沙罗諾夫訪問了正在我国休假的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書記雅克·杜克洛同志，請他就在莫斯科簽訂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間和 underwater 进行核試驗条約有关的一系列問題发表意見。雅克·杜克洛同志在回答这些問題时說：

法国广大公众和劳动群众，对在莫斯科簽訂的停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間和 underwater 进行核試驗的条約十分滿意。至于戴高乐將軍的政府，則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場。戴高乐拒絕莫斯科条約。他不仅反对莫斯科条約，而且反对这一条約将来可能产生的一切良好后果，首先是反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国和华沙条約締約国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条約。当然，戴高乐政府向公众解释这个立場是相当困难的。从戴高乐反对这项条約的論据中可以了解到的唯一东西，就是莫斯科条約妨碍着戴高乐制造自己的原子彈。順便提一下，这个論据是同中国領導人的观点相吻合的。

事实上，“欧洲共同体”的六个成員国，只有法国一国至今拒絕在莫斯科条約上簽字。甚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統治集团也不在这項条約上簽字，不錯，他們对条約提出了各种保留条件。采取这种方針的結果就是戴高乐政府今天的孤立处境。法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广大公众都認識到，簽訂关于禁止試驗核武器条約是走向全面彻底裁軍道路上的第一步。法国的全体进步力量都譴責

戴高乐政府的这种立场。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向戴高乐请愿，要求法国政府加入莫斯科条约、参加日内瓦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和一切旨在巩固和平的会谈，这并不是偶然的。法国的各进步团体在谴责戴高乐的政策方面表现的积极性，说明拥护莫斯科条约的全民运动将得到人民的广泛响应。法国政府显然预感到自己的立场软弱无力，而竭力做出尽可能多的各式各样“解释”。但是，所有这些“解释”，总起来说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法国劳动人民把戴高乐将军对条约的否定态度同国内经济计划的要求联系起来。不久以前，法国煤矿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戴高乐政府解释说，它似乎不能满足矿工的要求。但是，工人们却知道这样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工人们看到，大量的国家资金被用于建立戴高乐的“核打击力量”。这项开支将会增加到什么程度，这是谁也不知道的。整个问题在于：戴高乐将军想必不能无止境地撒哈拉进行核爆炸，因为阿尔及利亚政府一再抗议。但是，大家可要知道，戴高乐在太平洋找到了一个小岛，想把它变为试验场。不过，戴高乐的这种主意将要用去数千亿旧法郎。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法国人民的严重不安。戴高乐建立原子力量不仅是徒劳无益和劳民伤财的举动，而且也是危险的举动。戴高乐追求的原子军备，有可能被波恩的复仇主义者用来发动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子军备是在欧洲的一个危险的雷管。

戴高乐将军的政府不愿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缔约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戴高乐的论调是，法国用不着签订这个条约，因为“它不想进攻任何人”。当然，这样的论断，除了戴高乐本人以外，任何人都说服不了，虽然他大概认为自己的声明与条约具有同等效力。

莫斯科条约，这是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文件。条约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宣传的虚伪性，这种宣传说共产党人似

乎想要通过武装的道路来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如果考虑到，世界上絕大多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拥护莫斯科条約，那末勿庸置疑，在莫斯科达成的協議加强着各国共产党的立場。中国領導人的立場是例外的，可惜这个立場給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蒙上了一层大的阴影。中国領導人否定莫斯科条約，反对和平共处，即反对列宁的政策。中共領導人实际上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不考虑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实际分布情况。中国領導人千方百计地低估热核战争会給人类带来的巨大危险。显然，他們不但对地球上的亿万人的未来漠不关心，而且对他們自己人民的命运也漠不关心。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們所持的是启示录<sup>①</sup>的观点。当然，可以設想，这种立場是决定于某种内部的經濟因素的。

这一切引起了我們的莫大遺憾和不安。他們对莫斯科条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对苏联的政策攻击，都是沒有根据的。这种行动在客观上是与战争挑撥者的立場，与“狂人”的立場相吻合的。中国領導人针对条約提出的反对意見，与波恩的复仇主义者、美国的“极端分子”和戴高乐將軍的反对意見很相象。我不无痛心地听到了北京电台的法語广播，其中把戴高乐对在莫斯科簽訂的条約和他对建立自己的“打击力量”的計劃的立場說得很好。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結問題，是头等重要的問題。首先应当关心的是，不使三种因素彼此分离，这三种因素是：社会主义国家，資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領導下进行的階級斗争，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然而，中国領導人表现出对头两种因素估計不足的趋向。他們过分強調和竭力

---

<sup>①</sup> 启示录是新約的最末一篇，其中預言世界的末日。——譯者

宣传民族解放斗争。

但是，这种民族解放斗争的涵义，现在与以前完全不同了，因为大多数前附属国已经获得了政治自由，现在的问题只是使这些国家摆脱自己的前宗主国的经济束缚。因此，中共领导人以歪曲的形式把民族解放斗争提到首位，是打算使亚洲、非洲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共同的反帝战线、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外。中国领导人暴露出在亚洲、非洲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建立一种孤立的反帝战线的趋向。显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决不能容许这样做。像中国领导人那样做，就可能滑到乖戾立场，滑到种族主义立场上去。这种立场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脱绝对矛盾的。对每个共产党人来说，肤色不是也不可能是政治标准。

北京人士不仅在亚洲和非洲，而且在某些西欧国家采取分裂行动。例如在比利时，他们借助于被开除出党的分子建立了一个什么“出版局”。我们知道此事，是因为这个出版局出版和散发攻击苏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法文材料，并力图把这种材料散发到法国。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宣传中利用所有的叛徒，从事不能容许的派别活动。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他们正在利用托洛茨基分子。这些小小的托洛茨基集团现在得到北京人士的极端狂热的支持。这种分裂主义政策是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和1960年声明背道而驰的。我坚信，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指出的正确路线，决不会因为中共领导人的无端攻击而受到怀疑。

（译自1963年8月24日《苏维埃立陶宛报》）

## 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高级形式

乔治·塞吉

我们党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为争取和平和裁军、为争取和平共处的胜利进行着一贯的斗争。

法国共产党早在十四年前就通过它的总书记的讲话摈弃了战争是注定的观点，并把它的政策建筑在对世界力量对比的仔细分析之上，所以它认为在今天没有再比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更重要和更急迫的任务了。

我们这样做，是意识到要坚决执行 1957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提出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象人们知道的那样，我们的这种态度招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方面的种种侮辱性批评和指责。

他们在二十五点的文件中影射地说，而在某些其他文件中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持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观点。

他们没有提出一个具体事实的影子来支持他们的说法，而主要是指责我们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之间的关系方面。

我们顺便指出，不顾一切事实地宣布某人有罪以便接着对他进行指控的方法，并不大能够提高使用这一方法的人的威信。

中共领导同志们始终是了解我们最近几次代表大会或我们中央委员会关于我们党的政策的文件和决定的。

凡是愿意客观评价我们的政治路线的人，显然知道我们的政

治路綫是从来不容許向修正主义让步的，而且也同样不容許向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让步。我們在这“两条战綫”上进行的反对这两种危險的一貫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众所周知的。

在和平共处問題上，我們党始終毅然决然地反对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这种共处可以引伸到各階級之間或意識形态方面的修正主义思想。

既然如此，人們就不禁要自問：这一切爭論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在这个問題上同在其他一些問題上一样，千方百計地坚持一种使自己同苏联共产党和几乎所有其他兄弟党对立起来的立場。

他們主要认为，以使和平共处获胜为目的的果敢政策是同我們的階級原則不能相容的，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而执行这种政策的无产階級政党必然走向引起階級合作的思想与实践的机会主义歧途。

如果这种論点是正确的話，我們在法国就会看到我們党的影响縮小，或者工人階級的斗争迷失方向而減弱。然而，不論前一种現象或后一种現象都不存在，恰恰相反，我們党的威信提高了，上次选举的結果就是证明，且不說别的例子。

至于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階层的斗争，众所周知，在我国是以斗争的高涨和团結的进展为特征的。

不錯，許多这种斗争是从要求經濟权利开始的，但是，它們有助于提高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的政治觉悟。此外，在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时期，常常发生人們在矿工罢工时所看到的那种情况：这些群众正面反对垄断政权，因而他們的斗争就具有一种有利于整个运动发展的政治意义。

在这些斗争中积累的經驗，以及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努力，



使劳动者就越来越清楚地明白了他們的困难的深刻原因，認識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因此，群众为爭取民主、和平和裁軍而进行的团结行动有了进展，而像最近的和平和裁軍大会这样的强大示威活动也成为可能的了。

那些认为爭取和平和裁軍的行动口号既不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願望，又不符合他們的阶级利益的人，不知道或者严重地无視了除现代化武器的积累給人类带来可怕威胁以外，进行軍备竞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还强迫劳动者付出巨額的費用。

我們凭經驗也知道，阶级敌人是怎样利用冷战和国际紧张局势来打击工人政党、工会和压制民主自由的。

因此，为迫使帝国主义接受和平共处而采取的爭取和平和裁軍的行动，是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深切願望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原子打击力量的声势在法国有了这样大的規模，以及拒絕签署莫斯科禁止核試驗条約受到了如此强烈的反对。

如果(这当然是不合理的假設)法国共产党人对莫斯科条約采取中国党领导人的那种与法国垄断資本家的立場相同的立場，那么，他們就会堕落到最有害的阶级合作之中，从而不可挽回地遭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譴責。

共产党人深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知道他們的意識形态的斗争越是以具体事实为根据，其意义也就越广泛。

因此，在繼續存在人剝削人的国家里，社会、科学和文化方面的这种优越性的每一个新证据都在劳动人民中間引起强烈的兴趣，并有助于把人們爭取到社会主义事业中来。

如果和平力量能够通过坚决的行动强令实现和平共处，那么，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势就会不断加强，直至变成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倒优势，而使全世界人民受到欢欣鼓舞。

除非是不相信社会主义有力量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否则，共产党人对于这种和平竞赛是丝毫不应害怕的，相反地，他们应当尽一切努力促成这种局面。

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主义者有权利说：

和平共处是当代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高级形式，它正在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创造最有利的形势。

（译自 1963 年 8 月 31 日法共《人道报》）

## 北京与个人迷信

伊夫·摩罗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通过的各个论点，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中国领导人的修改，然而这些论点在1957年和1960年的国际会议上是他们赞同过的。

我们看到，他们相继否认了避免战争的可能性、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发展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现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为个人迷信恢复名誉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对赫鲁晓夫同志进行诽谤攻击，指责他揭发了斯大林时代个人迷信导致的实际结果。（然而，《人民日报》却不顾自相矛盾，又同时指责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的“同谋者”<sup>1)</sup>）

因此，中国领导人采取这种立场，其后果是严重的。

人们知道个人迷信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知道斯大林的性格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是怎样助长了个人迷信的。人们也知道它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害，不过它并没有使苏联社会离开它走向共产主义的方向。

国际工人运动应当避免重犯这样不幸的错误。因此，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通过——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同意——的声明提醒，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认为“严格遵守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是自己活动的确定不移的法则”。同一声明强调指出：“必须严格遵守党内民主的原则……不允许有束缚共产党员发挥创造性思想和主动性的个人迷信，大力发扬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在自己

队伍中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中国领导人显然只是嘴上承认这些原則，因为他们今天硬說，揭露个人迷信沒有別的目的，不外是“为背弃馬克思列宁主义准备地盘”！

相反地，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其他国家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決議，特别是提醒人們遵守列宁关于群众、政党和領袖之間关系的准則的決議<sup>①</sup>产生了多么有益的效果。共产主义建設、爭取和平的斗争，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有了新的飞跃。中国领导人否认导致这些成果的原則，这——首先是对中国——該有多么令人遺憾啊！

事实上，他們今天的行为，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反动资产阶级试图做过的一样。但是，他們不会比这个阶级更能动摇劳动人民对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信任。

他們进行的分裂主义論战漸次下降到越来越低的水平，即人身辱罵和誹謗的水平<sup>②</sup>。我們极尊重自己的党，也极尊重他們的党，所以在这方面不能学他們的样子。但是，我們將繼續为尊重那些作为我們所为之斗争的事业获得胜利的最好保证的原則而斗争。

（譯自 1963 年 9 月 14 日法共《人道报》）

---

① 赫魯曉夫的功績之一，仍然是他为克服个人迷信和消除其后果所采取的行动。此外，认为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赫魯曉夫对这一問題默不作声，那是錯誤的。阿拉貢在他的《平行的历史》一书中提到赫魯曉夫很早以前的几項倡議，譬如赫魯曉夫在 1937 年 3 月 17 日，使莫斯科的两千名黨員干部通过了一項決議，反对把各种會議变成“对党的领导人作无止无休的夸耀和毫无裨益的歌功頌德的讲坛”（《平行的历史》第 1 卷，第 356 頁）。

② 其中，《人民日报》的恶意便是一个例子；它无中生有地硬說，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評中，人們“不分好坏”。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来沒有人否认斯大林的这一功績，即在列宁逝世后，他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右傾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等等——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而今天，这些敌人正对中国领导人的分裂主义活动拍手喝彩。

#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正确路綫而斗争

让纳特·維美徐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它們的 1957 年和 1960 年的共同決議，展开了爭取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爭取裁軍的强烈斗争。

“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已經成为世界政治的根本問題。”  
(1957 年會議)

“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的和平共处，还是破坏性的战争——現在問題就是这样摆着的。別的出路是沒有的。”(1960 年會議)

这些論断是以下列具体事实为依据的：

1. 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国家体系；
2. 存在着大規模杀伤武器；
3. 軍备竞赛不仅有引起可怕的战争的危險，而且它本身就带有許多不幸。軍备竞赛是千百万人貧困的根源，它由于散布放射微尘而危害人、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它保持冷战并有利于反民主的政权以及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活动。

这些論断也是以在我們时代能够永远防止战争的现实可能性为依据的。

“目前，和平力量已經大大成长，已經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

1960 年會議在列举了这些力量之后強調指出：在这些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完全胜利以前，尽管在地球上部分地区还

存在資本主义，但是有可能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并不满足于这些論断，还在1957年通过了一个和平宣言，在1960年发表了一个“告世界人民书”。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这两个文件中指出了战争的危險和防止战争的手段，并且号召各国人民行动起来以爭取和平、和平共处和裁軍。

爭取一切爱好和平的人的团結，这不是一件小事。

迫使資本主义国家采取和平行动，既不是容易的事情，又不是简单的事情。

要是不动員群众，不进行空前的意識形态的斗争，就不可能有和平、和平共处和裁軍。

然而，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譴責那些本着这个方向行动的所有党，說它們“把各国人民引向失敗”，“窒息革命斗争”，“背叛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欺騙各国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

这些臆造的和誹謗的断言，更加证明不仅要对資本主义进行意識形态的斗争，而且也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意識形态的斗争。

中国领导人硬說，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修正了它們关于帝国主义本性的看法。这是歪曲，中国领导人很难提出事实来支持这种指責。各国共产党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沒有改变，但它的力量却大大削弱了。

于是，中国领导人便說，既然帝国主义削弱了，为什么还害怕帝国主义呢？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不怕帝国主义。他們过去和現在每天都在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这一点。

虽然帝国主义已經大大削弱，但它还拥有大規模杀伤武器，这是事实。因此，只有丧失了起碼的健康理性的人才会像中国领导

人那样說，在核战争之后：

“战争的结果，决不是什么人类的消灭……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以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幸福为目的的共产党人，居然能够轻率地说要冒这种灾难的危险，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何况中国领导人很清楚地了解，以极迅速的步伐建设一个美好的将来，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在一场核战争之后，情况将是怎样呢？

他们说“原子能、火箭等等，这些新的技术，都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这种说法是不严肃的。我们不能武断地把技术同战略和策略分离开来，更不能把它同政治分离开来。在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中，我们不能不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原子优势。

我们不能简单地說，学会使用步枪以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将由人数决定胜负的国内战争，而不考虑某些人会使用核弹。其实，人数只能对防止核战争的爆发起大的作用。

帝国主义曾利用它的实力来把战争强加于人。

社会主义则利用它的实力来强令实现和平。

共产党从不认为战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它们一贯反对通过战争输出革命的理論。维护这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已被胜利地打倒了的理論的，正是托洛茨基分子。

列宁曾同 1907 年斯图加特社会党大会一样解释过：然而，一旦爆发了战争（就是说一旦人们未能防止住战争），各国党的义务就是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解放战争。今天，力量的对比已使我们能够防止战争了。

中国领导人认为，只要进行不懈的斗争而不坐等和平，和平

的前景就是可能的。他們这样做，将瓦解群众的斗争，事实上这是有利于战争挑拨者的阴谋的。

中国领导人在他們的信里，跟在别的地方一样，故意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一切民主斗争同革命对立起来。好象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同和平与民主事业是互相矛盾的。

保卫和平是各国人民的深切愿望，它始终是工人运动斗争的中心。和平并不损害劳动者的利益，而只会对工人争取面包、争取权利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和平时期，劳动者才能使他们的经济和民主要求得到最大的胜利，才能最好地加强他们的组织和思想工作以便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当中国同志谴责那些为争取和平共处而斗争的人是放弃殖民地人民的时候，他们不仅诽谤了各兄弟共产党，而且也欺骗了自己。

前殖民地国家或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的共产党，都赞同1957年和1960年的论点。

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主运动，都积极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共处与和平竞赛的政策。

这项政策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正如停止核试验符合它们的利益，建立无核区对它们和各国人民来说是重大的步骤一样。

如果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被迫接受裁军与和平共处，这是不是有利于弱小的不发达国家和被压迫的人民呢？

毫无疑问。

中国领导人自称是拥护和平共处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谴责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代表进行会谈，即谴责同帝国主义国家会谈。究竟同谁共处呢？

然而，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政策。



1917年11月，在列宁的主持下，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議，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約进行談判……本政府声明，它决不认为上述和平条件是最后通牒……我們不能漠視各国政府，否則就可能拖延和約的簽訂，人民政府是不应当这样做的”。

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們在进行談判时，都是忠实于这项政策的，他們对古巴就是这样做的，他們对停止核試驗也是这样做的。他們既考虑到各国人民，也考虑到各国政府。

中国领导人故意把两件不同的事情：革命与暴力混为一談。既可能有沒有暴力的革命，又可能有沒有革命的暴力。

对資本主义国家來說，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夺取政权，以便使生产資料、銀行、壟断組織社会主义化，消灭人剝削人的現象，为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創造基础。

1960年10月2日，莫理斯·多列士在什瓦济勒罗瓦提醒說：“当我们維護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的可能性时，我們絕沒有放弃馬克思主义关于資產階級永远不会自願放弃政权的論点。如果資產階級在革命时期不使用暴力，这并不是它的本性已經改变，它变得更人道、更和解，而仅仅是因为它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优势在反对它。”

資本家們一向是竭力想使各国人民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是一场血腥的內战，以最坏的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国内居民。

他們想这样来掩盖他們自己是对各国人民施行这种暴力的罪魁，并使人民怀疑自身的力量。

今天，由于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由于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的觉悟的提高，由于活生生的、无往不胜的共产主义的榜样，已經有并且将有千百万男女被爭取到社会主义事业中来。和平过渡到社

社会主义的条件一天比一天好。使人民意識到这一点并不是使社会主义革命倒退，相反地却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领导人給工人运动提出的办法，对和平和对社会主义事业都是有危險性的。

他們的錯誤立場，使他們采取了违反指导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的关系的原則。

他們独自为社会主义国家确定了一条与共同确定的路綫相对立的路綫。他們代替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党确定了这些党的任务。“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須……人民群众必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須……”

他們干涉各国党的内部生活，辱罵它們的领导人，在各国用各种語言散布与国际运动的論点相对立的論点以从事破坏活动。

在馬德里，人們可以随便找到西班牙文的中国文件，而散发民主传单却要被佛朗哥判处二十年徒刑，如果不是象我們光荣的胡利安·格里莫同志被判处死刑的話。

在阿登納的德国，也可以到处找到德文的中国文件，而我們的同志在那里却在被宣布为非法的情况下进行斗争。

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活动、意識形态活动和派別活动，損害着各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利益，損害着社会主义事业。这种活动与各国共产党的原則和实践相违背，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国际主义相违背。这种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民主运动与和平的敌人。因此，应该毫不犹豫地打倒他們在国际运动中的論点和实践。

为实行 1957 年和 1960 年會議所确定的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綫而斗争，为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共同制定的原則和政策的基础上团结而斗争，就是为国际工人运动、为人民、为中国共产党本身服务。

(譯自 1963 年 9 月 14 日法共《人道报》)

# 裁 軍

——恩格斯的教导和中国领导人的政策

弗洛里蒙·邦特

美、英、苏三大国外交部长在莫斯科签署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試驗核武器的条約，已經一个月了。

从签字的日期起，沒有一天沒有各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或那样地表示贊成这个重要的外交行动。

誠然，这是走向普遍、彻底裁軍的漫长而又困难的路上的第一步。整个人类为此而深深地感到高兴。

## 附和极端分子

但是，中国领导人却对这项条約大发雷霆。他們对待苏联——条約的最好、最主要的締造者，只有粗暴的謾罵。

他們用詞之恶毒，同戴高乐打击力量的最瘋狂的拥护者、同美国五角大樓的极端主义將軍們、同西德最极端主义的軍国主义者的調子是一模一样的。

他們說什麼“背叛”、“懦弱”、“欺騙”和“屈辱”。而他們帶有“左傾”調子中的所謂“不妥協”，被戴高乐的外交界高兴地看作为戴高乐將軍的不祥政策的辯解。戴高乐將軍拒絕莫斯科条約和东西方互不侵犯条約草案，成了整个西方最狂热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中心。

用言論和行动支持戴高乐反动政府，这真是保卫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奇怪的办法！

### 現在是可能的事情

他們在所謂馬克思列宁主义“正統”的狹隘的外衣下，断定說莫斯科条約绝对毫无价值，說莫斯科条約并不比一张破紙更有价值，因为条約沒有决定普遍和彻底裁軍，也沒有宣布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都是绝对非法的。

当然，沒有人否认，莫斯科条約沒有完全解决禁止各式核武器的試驗問題。每个和平拥护者都会衷心地希望三大国条約的范围能更扩大一些。的确，締結一項立即宣布一切原子武器非法及普遍彻底裁軍的条約，是理想的解决办法。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嗎？单凭苏联一国，能把这样一个决定强加給其他各国政府嗎？绝对不能。談判桌上不是只有苏联一国。苏联必須考虑到美国和英国，而这两国过去恰恰是頑固地反对任何有效的裁軍措施的，不管这种措施如何微小。

苏联尽了最大努力想从对手取得完全停止一切核武器試驗，包括地下試驗在內。

苏联既然无法实现它的全部建議，它应不应当让談判破裂，把門一推离开會場，因而放任加速进行瘋狂的原子軍备和热核軍备竞赛呢？不应当！绝对不应当。

### 荒謬的“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政策

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和实践，苏联从来沒有拥护过“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这种荒謬而又冒险的政策。它奉行的是明智

和现实的政策。

既然在目前阶段不可能一下子找到完全解决整个问题的办法，它就接受部分的解决办法，这种部分的解决办法对继续进行争取普遍彻底裁军的斗争是有利的。

它这样做是符合各国人民目前和未来的切身利益的。

果然，莫斯科条约对各国人民是有莫大的好处的，特别是对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太平洋沿岸其他国家的人民，美国参谋部核武器试验就是在太平洋进行的。

像中国领导人那样硬说莫斯科条约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就完全同那些盲人否认正午时分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有一个辉煌的太阳一样。

那末，签署一项禁止对全人类健康最危险的核武器试验的条约，难道不是为人民的事业服务吗？但恰恰正是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下水的核爆炸，由于大量的放射性现象，染污天空、陆地、水面、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腐蚀被感染者的血液、骨头和骨髓，并使妇女们有生育畸形婴儿、残废婴儿、甚至丑恶怪物的危险！

杰出的美国物理学家林纳斯·鲍林曾经完全正确地写道：

**即使除了禁止试验巨型炸弹及从而阻止染污大气层外，签署条约没有其他结果，即使如此，我们也有权说这项条约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这种令人满意的初步成果，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竟然冷酷地考虑，在一场原子战争中，牺牲三亿他们本国人民的儿女的可能性。他们宣称：一场原子战争可能使地球的一半人口死亡，但是也可能在各国的废墟堆上、在几亿死尸的坟堆上出现最高的文明！

屠杀十亿多人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的前提！这种疯狂的想法和

共产主义的、合理的想法之間，真有天壤之別啊！共产主义意味着繁荣、福利、幸福、文化以及人类的智力和体力在一个博爱的世界里无止境的发展。

把人类推进一个大屠杀的地獄，把它拉回去，回到穴居生活的黑暗时代，那是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的。

不是依靠死人，而是依靠活人才能使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

中国领导人的“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不祥政策是不人道的政策，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理論和实践絕對背道而馳的。

誠然，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爭取普遍彻底裁軍和爭取和平共处斗争的思想，认为应当并且必須贊助和支持任何前进的步驟，应当并且必須主张和接受任何有利的解决办法，即使是部分的解决也好，而这种解决办法是有助于新的跃进并接近最終目标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认为，在特定的具体条件下，如果不可能完全达到原定的目标，那末沒有別的办法，只有逐漸地、一步一步地向这一目标前进。

实现一部分总比什么也不做好，因为在部分措施上取得的協議是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从它存在以来一貫的政策。这一点是人們常常指出了的。

### 恩格斯 1893 年所写的

卡尔·馬克思的忠实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 1893 年所写的、正在发行的德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里重新发表的关于裁軍問題的一篇論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1963 年的形势同十九世紀最后十年的形势是完全不同的。力量对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然而，七十年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發揮的思想，對於我們这个时代來說，仍然保持了它的全部正確性。

和馬克思一起共同建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恩格斯，他的論點是以下列基本思想為基礎的；為了動員人民群眾，絕對必須具體地證明裁軍符合一切勞動者和各國人民的當前的和未來的切身利益。

他並且發揮了這一基本思想，直至提出最合乎邏輯的結論，他證明，必須超出而且是遠遠地超出工人階級的范围，必須向居民的各种階層呼喚，以便使他們清楚地、確切地懂得：實現裁軍是符合一切國家、全世界人民及酷愛和平和進步的各个階級和階層的真正利益和特殊利益的。

他說，這是孤立好戰集團、挫敗戰爭准备工作、迫使戰爭販子自己去簽署裁軍協定的有效的辦法。

而且，他強調指出，裁軍只能為每個歐洲國家、為各國人民帶來同樣的利益。

然後，在說明了任何宗派主義態度都是對各國人民絕對有害的之後，他又繼續論證了裁軍只能一步一步地進行。

他提出警告，要防止空想主義者的令人失望的幻想，空想主義者夢想着黑夜過後，有一天輝煌的黎明會出現一個沒有武器的世界，好像神話里魔棒一揮就出現一座美麗的宮殿一樣。

他也有力地譴責了那些同現實沒有直接接觸的個人和集團的宗派主義思想；這些個人和集團把他們的懈怠和悲觀主義掩蓋在“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公式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以對政治軍事力量對比作正確的分析為基礎而立論的。只有在對問題的各种情況作了深入的、細致的研究後，他才提出他的判斷。

正是採取這種科學的方法，他才得出如下結論：要在爭取裁軍

的斗争中取得成就，必不可免地需要确定在一定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时间内真正能够达到的现实的目标，而这样做，当然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了最终目标：裁军。

### “让事情动起来”

他在论文里用下列这些话表达他的思想（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71页）：

“根据这种形势，我暂时只建议每个现行政府都能接受的办法，这个办法对国家安全是没有危险的。

“我只是想证明：从纯军事的观点看来，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逐步取消常备军；还想证明：尽管如此，如果仍然维持常备军，那末，这不是出于军事上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谈到军备竞赛问题时写道（第373页）：

“二十五年来，整个欧洲都以至今闻所未闻的规模武装起来了。每一大国都想在军力和战争准备工作上超过别的国家。”

而且，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裁军，那不是发疯吗？”

他用下列意见回答说：

“然而，在世界各国里，正是人民阶级要求裁军，因为几乎只有人民阶级提供士兵，人民阶级还需支付大部分捐税。

“然而，世界各地努力扩军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力量已经开始不足了——这儿是人力不足，那儿是财力不足，而有些地方则是两者都不足。”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是喊道：

“除了世界从未经历过的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而外，这种僵局难道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說是有別的路的，那就是裁軍，以及隨之而來的和平的保證。他並且指出：在裁軍的道路上，向前進的每一步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例如，在研究關於縮短兵役時間的建議時，他寫道：

“我已經說過，不應當停留在這一點上，即兵役時間定為兩年。更重要的是要使關於國際縮短兵役時間的建議只是走向繼續縮短兵役時間的第一步。”

而他还加上這麼一句特征性的話：

“讓事情動起來，這是主要的。”

因此，讀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論文的這些段落，就容易懂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同中國領導人的錯誤思想和行為之間，差別有多麼深。

中國領導人的態度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反人道的。這種態度會導致最壞的冒險行為和最具破壞性的大災難。中國領導人把賭注押在戰爭上，他們真應當受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於1891年譴責德國社會黨人的那種譴責：

“如果德國社會黨人不等待和平的必然勝利而希望戰爭，那他們就是瘋子。”

## 法 國 的 請 願

戰爭煽動者和戰爭受益者的現代碉堡不會像耶利哥的城市那樣，只要約書亞<sup>①</sup>的喇叭一吹，就會垮台的。

要攻占和摧毀這些碉堡，應當使和平的敵人一步一步後退，應

---

① 耶利哥是巴勒斯坦一城市。據《舊約全書》記載，耶利哥被約書亞包圍，約書亞遵照耶和華諭，讓祭司吹喇叭，百姓大聲呼喊，城牆遂塌陷。見《約書亞記》第六章。——譯者

当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跳跃式地不断前进，在前进的路上插上路标，攻占目标点，确定方向，根据情况规定新的要完成的任务，具体地估计每次取得的成就的实际意义，并开展活动，直至胜利。

在我们法国，今后的路线是完全确定了的。

为了诸如签订东西方互不侵犯条约，缩减军费开支，建立非原子区，和平解决德国问题，满足能达到最终目标的其他和平要求，就得考虑需要经过哪些阶段，同时也可清楚地看到法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当前任务。

这一任务，主要就是为和平运动所提出的请愿书征集千百万个签名，请愿书要求法国政府“加入关于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及一切为了和平的谈判”。

我们相信，这一任务一定会光荣地完成的。

（译自1963年9月17日第934期法共《新法兰西》周刊）

## 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階級的作用 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

瓦德克·罗歇

在大国之中，只有法国和中国人民中国拒絕在关于停止核試驗的莫斯科条約上签字。

渴望和平的法国人絕大多数都指責戴高乐反对莫斯科条約，就是因为他們认为这项条約是有利于和平的第一个重要步驟。

同时，法国人难以理解的是，戴高乐竟在北京得到支持，中国共产党領導人也对莫斯科条約表示公开的敌視。

所有热爱和平的法国人都对中国共产党領導人的态度深感遺憾，他們很自然地提出关于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的問題。

中国共产党領導人站在反对莫斯科条約而贊成帝国主义集团的“狂人”扩散核武器的立場，不能不引起人們的严重不安。

中国領導人公开反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決議，对 1957 年和 1960 年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宣言和声明中的主要論点表示怀疑，实际上是背离了为爭取和平共处与和平而斗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立場，走上了只能导致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宗派主义、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道路。

因此，在 6 月 14 日的信中，中国領導人确认为排除新的世界战争而斗争的必要性之后，又提出了一大堆旨在证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不可能防止这种战争的論据，这就很自然地要使他們根据战争不可避免的前景而采取立場和行动。

因此他們斷言“和平共處不能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原則”，他們宣告“主要的是消滅帝國主義”，即使付出一場熱核戰爭帶來巨大犧牲也在所不惜。他們誹謗蘇聯政府的和平共處與和平政策，說這種政策的實質是“向帝國主義者乞求和平”。

很明顯，這樣一條路線是與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所確定的路線完全相反的，這兩個文件毫不含糊地肯定：國際力量對比的变化有利於社會主義，可以使我們通過各國人民的鬥爭來防止世界戰爭，而強令施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和裁軍。

### 和平共處與階級鬥爭

我們想在這篇文章里着重談談，如果各國共產黨不斷然拒絕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新的“總路線”，那麼這條總路線會給像法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帶來什麼樣的不幸成果。

中國領導人特別聲稱，蘇共中央委員會和赫魯曉夫同志所致力推行的正確的和平共處與和平政策，將阻礙和擾亂資本主義國家里的階級鬥爭。

但是，這種斷言的基礎是對形勢的毫無了解 and 對經驗成果的極端忽視。

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的軍國主義勢力和極端反動勢力，正是利用加劇國際緊張局勢時期和加劇戰爭危險時期來煽動戰爭狂熱和向民主自由進攻，即阻撓群眾運動的開展的。

相反地，全部經驗證明，和平共處政策——它無論如何也不意味意識形態方面的共處和階級鬥爭的削弱——大大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的高漲。

不能否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爭取和平的不懈鬥爭

中所取得的成就——莫斯科条約就是和平力量的一个巨大成就——大大促进了人民群众团結在工人阶级的周围，鼓舞了他們参加日益广泛和日益有力的爭取和平的行动。

比如，最近在法国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临时委员会，它的宗旨是反对戴高乐的原子打击力量和爭取国际监督下的全面裁軍。

这个最近几周将在全国組織巨大的群众运动的委员会现在已经吸收了許多組織与党派，其中包括共产党和社会党。这是实现爭取和平的統一行动的重大进展。

但是，显而易见，假如法国共产党采取中国领导人所建議的那条路綫，那就永远不能取得这样的結果。

中国领导人随心所欲地把爭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立起来，硬說“主要的是消灭帝国主义”。

当然，我們也願意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我們要通过工人阶级及共同盟者的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而不是在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

我們认为，以热核战争为代价来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道路。

同时，中国领导人似乎忘掉了，正是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胜利地建設社会主义，并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在人民群众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重要因素。

事实上，在我們时代，如果不开展旨在防止热核战争的积极斗争，不把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作为垄断資本政策的牺牲品——团結在爭取滿足自己要求、民主改革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就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因而不可能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

因此，法国共产党贊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正确而果敢的論点，拥护1957年和1960年的共同宣言和声明，认为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爭取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斗争，是在爭取和

平共处和防止热核战争的全面斗争中展开的。

## 不要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社会主义力量

但是，正是在现代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所有基本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持有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根本分歧的路线。

比如，他们硬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从而得出结论说，当代的主要矛盾不是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但是，这种分析是极端错误的，是同列宁主义学说相违背的，因为它试图否定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决定性作用和国际工人阶级在世界革命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当然，民族解放运动是这一过程中的巨大力量，但是只有在它不脱离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时才是如此。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巩固联盟和合作，是它取得新的胜利和走向远大前途的主要条件之一。

的确，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所以能够得到不可遏止的胜利发展，首先是因为这些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苏联的大力支持。

不能忘记，正是保证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并在粉碎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苏联人民，为包括中国的解放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何况大家都知道，苏联在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过去和现在都给了他们重大的援助。同时经验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促进着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发展。法国共产党就曾积极

地支持过这些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尤其是在摩洛哥、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期间。

因此，当中国领导人企图煽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苏联的不信任，从而分裂所有反帝力量的革命统一战线时，这是恶劣的行为，违反了这些国家人民本身的利益。

### 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发展

中国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规定的路线如果不被拒绝，其后果显然会是十分有害的。

的确，如果遵循这一路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面前就不会有任何革命前途了，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任务只限于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企图给工人阶级指定的这种“辅助”作用，只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陷于消极和孤立，结果使帝国主义得到加强和放手用各种方式去奴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

中国领导人提出这种见解，实际上是表明他们完全不了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进行工作的特殊条件，因为他们不考虑这些国家矛盾的深化和阶级斗争的发展。

例如，他们似乎不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次有数千万劳动者参加的罢工。

据统计，仅仅在法国，1963年头三个月就由于罢工而损失了八百万个工作日。

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持续了三十五天的矿工要求权利的罢工，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次罢工是反对国家老板的一次罢工，它击败了戴高乐签署的征调令。

在此以后，团结一致实现的其他行动，也在争取提高工资、縮减工作时间、延长工资照付的假期、争取罢工的权利、争取政治和工会自由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法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农民示威游行。最后，反对戴高乐的冷战政策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也扩大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发展。

中国领导人确实把争取满足迫切要求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立起来了。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采用这种方针，那么，这种方针就完全会把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堵塞起来，这首先是因为只有在反对垄断资本政权、争取真正的和平政策、争取满足群众的经济和社会要求、争取越来越深刻和越来越彻底的民主改革的斗争中，工人阶级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团结，才能把反对垄断资本的一切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孤立大资产阶级，进而为使人民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及其必要性创造条件。

莫里斯·多列士同志在我们党的上一次代表大会上，从这一点出发再次强调指出，争取民主的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

##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 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的团结**

中国领导人还不承认——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所确定的——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当然，这个或那个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道路，确实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而且也取决于大资产阶级可能进行抵抗的程度。

但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增长的作用和社会主义思



想在群众中的传播,在我们时代,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以而且应当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而改变,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了。

正因为我們确信我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符合工人阶级、人民、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利益的,我們才决定充分利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并尽一切努力来增加这种可能性。

然而我們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占居优势,使大资产阶级不能使用暴力和发动国内战争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尤其是通过和平道路的胜利,特别要求实现工人阶级的行动一致和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与所有关心社会主义胜利的社会阶层的反垄断联盟。

因此,法国共产党不放过任何努力去实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行动一致和实现所有民主和反垄断力量联盟。

正是为了促成这种行动一致和团结,我們党过去和现在都向其他民主党派提出共同纲领草案,这个纲领除要求消灭个人独裁外,还包含旨在限制垄断权力和建立新民主的深刻的民主改革。

我們党在自己的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论点也正是为了促进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团结一致,根据这一论点,共产党同其他民主党派的合作,不仅目前需要,而且将来在争取共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也需要。

我們也高兴地看到,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間最近时期有了真正的接近,共产党的劳动者和社会党的劳动者之間的统一行动取得了重大成就。

## 使共产党孤立的方針

但是，中国领导人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方針，将使共产党同本国其他民主力量的任何統一行动和任何联盟都成为绝对不可能。

因此，这个方針将导致我們共产党脱离群众而孤立，妨碍它实现先锋队的作用。这个方針将使工人阶级失掉自己的同盟者，而只对垄断势力有利。簡而言之，这是为了“革命”而恰恰使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拖延和成为不可能，因为达到这一革命的手段被抛弃了。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的“革命的”“左傾的詞句”，首先暴露了他們对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其革命能力沒有信心，既不相信能够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和平共处，又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能够取得胜利。

他們这种只会导致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宗派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冒险主义的路綫就是由此而来的。

他們为个人迷信辯护的企图也是由此而来的，个人迷信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同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和有关群众、政党和領袖之間的关系的一切論点都是格格不入和敌对的。

最后，他們的受到托洛茨基分子支持的、旨在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为帝国主义者效劳的分裂主义活动也是由此而来的。

为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我們真誠地希望使中国共产党同几乎所有其他共产党对立的严重分歧能够克服。

但是，这要求中国领导人必須停止他們对苏共和其他党的誹謗性攻击，放弃以新的总路綫来对抗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制定的总路綫。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和平斗争中的最有效的和最不可少的武器。这种团结一致也是民主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保证。

因此，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今年5月10日的决议中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党坚决拥护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制定的路线，坚决站在苏联共产党和所有兄弟党的一边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而斗争。

**《人道报》编辑部注：瓦德克·罗歇的这篇文章曾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过。**

**（译自1963年9月17日法共《人道报》）**

## 莫里斯·多列士 1963年 9月22日在山勒諾布勒的 演說(节譯)

不幸得很，我們不得不惊异地看到，戴高乐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意想不到的支持。中国领导人也起来反对莫斯科条約，离开了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立場。那些自称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怎么能进行这么恶毒、这么猛烈的誹謗宣传来反对苏联、反对苏联政府、反对赫魯曉夫同志（掌声）、反对在全世界以列宁主义精神为爭取和平和裁軍而进行頑强斗争的工人积极分子！

### 共产主义就是和平

“共产主义就是和平”。所有不为偏見所迷惑、到处看到共产党人站在和平战士最前列的人，都逐渐接受了这个真理。

有些人硬說，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可能在某个时期希望用战争来实现革命。即使中国领导人表示支持这些人，这些人的說法也是錯誤的。（掌声）

这些人忘記了 1907 年的斯图加特決議，这一決議使各社会党承担了这样一項义务：用一切手段为爭取和平而斗争，并在一旦“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利用由此造成的經濟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統治的灭亡。在这一点上，列宁和他的党始終是忠于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決議的，忠于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义务的。

列宁和布尔什維克掌握了政权以后，便向全世界宣布了和平。

苏維埃政府頒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关于和平的法令。

后来，列宁既沒有屈从于冒险精神和托洛茨基（他提出了錯誤的挑衅性口号，“不战也不和”）的假左派詞句，又沒有屈从于布哈林的“用战争来刺激革命”的詞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出現过巴比塞、罗曼·罗兰、瓦揚—古久里、加布里埃尔·佩里、馬賽尔·加香和約里奥—居里等人的我們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以爭取和平的斗争为特点的。（热烈的掌声）

### 中国领导人的分裂主义破坏活动

正当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在爭取緩和局势和爭取和平的斗争中取得第一个伟大胜利的时候，正当和平力量压倒战争力量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违背了我們的共同政策，更加远离了他們签过字的決議。

他們把和平共处的政策說成是对工人阶级和革命事业的利益的背叛。可是，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工人斗争的規模只会日益扩大，正像我們至今在法国和比利时所看到的那样，以及目前在阿斯土里亚斯英勇的矿工罢工中所看到的那样（掌声）。民族解放运动在全世界得到了势不可擋的发展，例如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进展、南越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美国黑人为了自身的真正解放而进行的勇敢斗争，都证实了这一点。（掌声）

人們的确可以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想通过他們在战争与和平的严重問題上的那种令人不可理解的行为，来給共产主义繪出一幅我們的各种敌人一貫描繪的那种丑象。

他們进行誹謗的目的，在于使共产主义及其光荣的先鋒队苏

联这个进步、自由与和平的国家的信誉扫地。(掌声)

他們的分裂主义破坏活动——他們竟敢利用最卑鄙的叛徒和其他反党残余分子的机构——損害了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而首先損害了中国人民自己。

我們殷切地希望中国同志馬上回头，重新为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共同努力和为我們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們將繼續为工人阶级的伟大理想而积极奋斗。我們將不辞辛劳地尽快使我們国家摆脱可能把它推进灾难的专制制度。

(譯自 1963 年 9 月 23 日法共《人道报》)

# 共产主义就是和平

伊夫·摩罗

中国领导人想要走到哪里去呢？苏联政府不得不对中国领导人的敌对行为所进行的揭露，使我国的劳动者对中国领导人的行为感到极大的忧虑和愤慨。

人们已经知道，中国领导人背弃了各国共产党共同制定的主要决议，特别是关于展开争取裁军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以便永远消除战争的决议。

人们也知道，北京发动了措词多么粗暴和多么恶毒的反苏诽谤宣传。

但是，怎么能设想中国领导人竟然加紧侵犯同苏联的边境呢？怎么能容许在仅仅一年之内就对后来引起了中国革命的十月革命的国家侵犯几千次的这种侵略行为呢？那些自称信仰列宁的人怎么能证明自己拒绝举行苏联为结束这种局势而建议的会谈是正确的呢？这种犯罪的错误行径将要达到什么地步呢？

这种错误行径对于中印边界冲突作了多么令人不安的说明！这场冲突正好是在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使冷战遭到了第一次打击的时候，在北京不顾对它提出的兄弟般警告的情况下爆发起来的。在这个边界问题上，中国领导人还拒绝科伦坡会议的建建议本来可以使之实现的和平解决办法。

他们不仅违反了1957年和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决议，而且还践踏了中国和印度在1954年4月提出的、1954年10月中苏声明确认的和次年4月万隆会议赞同的和平共

处五項原則。

他們这样做，严重地損害了被他們改变了目标的国际工人运动。难道对共产主义的歪曲还能有比仿效资产阶级宣传、硬說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的胜利宁願来一場战争的說法更加粗暴的嗎？莫里斯·多列士上星期日在山勒諾布勒重申，共产主义就是和平，同时他提醒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和出現过巴比塞、罗曼·罗兰、瓦揚·古久里、加布里埃尔·佩里、馬賽尔·加香和約里奧一居里等人的我們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以爭取和平的斗争为特点的。

我們继承了这种宝贵遗产，而中国领导人背叛这种遗产的企图同托洛茨基或布哈林之流为了使冒险主义战胜列宁主义所作的努力非常吻合。

这种背叛恰恰出现在和平事业取得显著成就和莫斯科条約签字国已达一百个的时候，这就更应当受到譴責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們就会理解苏联的声明对北京提出的有分寸而又坚决的警告了。这是一个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了解自己的国际责任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警告。声明所用的語調再次明显地证明了苏联的真誠和平意志，并将更加提高它的声望和威信。

苏联准备重新同中国领导人就这一問題进行討論。苏联认为，意識形态的分歧表现为国与国的关系方面的敌对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单方面的善良願望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在面临着这种分裂主义破坏活动的情况下，我們方面将不放过任何机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

（譯自1963年9月24日法共《人道报》）



##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个人迷信

让纳特·维美徐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他们用来同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立的政治纲领中，再一次对揭露个人迷信和反对个人迷信后果的必要斗争提出非难。

他们的“论点”的第二十点说：“有些人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

我们顺便指出，中国领导人也曾一度是这“有些人”中的一部分。

他们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就在最近，他们还竭力为斯大林辩护，同时对苏联共产党的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大肆进行粗暴的侮辱性攻击。

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否认过斯大林的功绩。相反地，他们倒是宣扬和夸大了他的功绩，以致终于掩盖了苏联人民、他们光荣的共产党和全体党员的巨大功绩，从而大大助长了个人迷信的发展。

不是揭露个人迷信的人把群众同领袖对立起来，而是个人迷信把领袖同群众及其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对立起来。

共产党从来没有把这二者对立起来。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1920年6月）一书中嘲笑了已经使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这些人说：“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列宁写道：“这是多么陈腐的、早已听腻了的废话！这是多么‘左’的幼稚！”

他又說：“誰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国家內，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較穩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經驗、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这都是起碼的常識。这都是簡單明了的。为什么不要这簡單明了的道理，却要来这一套胡說八道，来这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sup>①</sup>呢？”

中国领导人頌揚个人迷信，从而背离了阶级政策。

党的統一领导，是同个人领导对立的。統一领导要求在正常的組織內进行討論，以便共同作出決議，使之既有集体責任又有个人責任。

談到民主集中制这一党内生活所根据的基本原則，可以說中国领导人是把自己置于这一原則之上的。他們輕視 1960 年 11 月莫斯科會議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經過三个星期广泛討論后制定和决定的決議。然而，民主集中制却要求：經過最广泛、最民主的討論之后，一旦作出決議，任何人都要为貫徹決議而努力。中国领导人沒有忠于所承担的义务，而是从事破坏活动。

中国领导人为个人迷信进行辯解，反映了他們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深刻分歧。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发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可悲后果，当时对于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共产党人來說，有如头上的晴天霹靂。

这倒不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在报纸和电台猛烈发动前

---

<sup>①</sup> 沃拉皮尤克，系德国語言学家希萊耶于 1879 年所創之世界語，現已不通行。——譯者

所未聞的宣传,而是出于我們的共产主义良知、我們的共产主义理想、我們的共产主义道德。

为反对一切不公正、反对人与人的敌对、爭取我們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幸福而斗争的我們,都曾彻夜不眠地寻思:这怎么可能呢?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56年6月30日的一项決議中,专门分析了个人迷信的原因。

这项決議指出,当时的国内外情况要求有铁的纪律和对民主有某些暂时的限制,而斯大林却把这作为党内生活和国家的准则,从而粗暴地违反了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然后決議强调指出,这就是“斯大林的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的錯誤論点”。

人們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再讀斯大林的著作,的确会逐渐看出导致粗暴违反社会主义民主的种种因素。

然而,中国领导人又出于自己的考虑重新提出了这一論点。他們指責苏联共产党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綱領中确认:

“由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保证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同时,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它本身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剥削阶级被消灭,镇压他們反抗的职能也就消失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即經濟組織和文化教育的职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轉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全民組織的过程开始了。无产阶级民主已經日益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現阶段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

的确,人們不禁自問:在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五年之后,敌对阶

級已經不存在的时候，苏联还应对什么階級实行无产階級专政呢。

个人迷信的結束使苏联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从而促进了发揚社会主义民主和群众的創造性。同样地，苏联人也怀着高兴的心情欢迎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綱領。

包括我們党在內的所有共产党都贊同苏联共产党。

苏联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是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用了很多篇幅談“无产階級的使命是消灭階級和階級国家”。

苏联共产党人是根据馬克思主义的下述学說办事的：“要精确地描繪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們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证的方法，只有經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間、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中国領导人拒絕认为苏联的情况已經发生变化，拒絕认为斯大林犯了严重錯誤和这种錯誤使得他的行为同我們的崇高理想不相称。

中国領导人拒絕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和平的世界力量的新的对比，使我們能够通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和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之間的和平竞赛以及創造有利于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条件的方法，来消灭战争和帝国主义。

但是，当人們走上坏道的时候，走得越快就越加迷失方向。

所以毛泽东同意发生一場将会摧毁人类一半的热核战争。

所以那些領导人“以祖国的名义”頌揚人們絕育。他們鼓动青年人要有“終身当光棍和守貞节”来“为国家服务”的意志。

所以这些人把提高福利看作是“資产階級化”。

應該說，这样一些观念是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很远很远的。

这种論点在为爭取幸福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中間，是得不到任何良好反应的。刘少奇所謂的把活命理論同革命政策对立起来，

这就是忘記了一切革命因素的中心恰恰就是生命，也就是說，忘記了产生着和发展着的东西。

然而，假革命的空談仍有人洗耳恭听。

“革命”空談家同机会主义取消派又在实践中結合在一起了。

这两种人都非难爭取和平的伟大运动的必要性，非难在世界范围内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队伍紧密团結和意識形态无間一致的必要性。

这两种人都歪曲无产階級专政的概念，而无产階級专政首先是政权、生产关系改变的問題，以及給予广大群众以民主的問題。

法国共产党在它的历史中，始終坚持同敌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流派进行斗争。

法国共产党將繼續同勇敢地揭露个人迷信并正在成功地克服个人迷信的一切后果的苏联共产党一道，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道，为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为爭取国际运动的意識形态的一致，为爭取它的队伍在共同确定的基础上的团結而进行正确的斗争。

（譯自 1963 年 9 月 28 日法共《人道报》）

## 苏联及其共产党的历史作用(节译)

雅克·杜克洛

.....

正是苏联的明智而坚定的政策制止了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侵入古巴，同时使世界避免了一场热核战争的骇人听闻的破坏。中国领导人的吹牛、侮辱和其他蛊惑性空谈，是无力使肯尼迪作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的。但是，苏联在明智妥协的基础上取得了这种结果，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话来说，这“意味着美国军人集团的计划的破产”。这样，古巴人民的革命成果才得以保卫住。

.....

这些话，是给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和包括法国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兄弟党的诬蔑性攻击的坚决回答，这些党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声援，竟然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怀疑。

.....

### 公认的进步先锋队

苏联所以能够影响世界事件的进程，其原因十分简单。第一，它是走上共产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实践中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第三，由于它的过去、它的威力和它为人民开辟的未来前景，它对历史发展负有重大的责任。

苏联意識到自己所負的历史責任，沒有忘記在目前的軍备情況下，世界大戰勢必演成熱核戰爭，從而造成史无前例的人員傷亡和物資破壞。如果這種可怕的武器為帝國主義者所壟斷，那就得擔心出現最壞的情況，一場大規模屠殺的戰爭可能對社會主義國家發動起來，從而導致社會主義勝利的破滅和到處掀起反動的浪潮。但是，蘇聯擁有第一流的核軍備，這就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小心謹慎。

但是，由於這種軍備使人類面臨着危險，所以裁軍仍然是和平的最大保證。蘇聯為裁軍進行着頑強的鬥爭，這種頑強精神證明着蘇聯的和平願望，各國人民為此十分感謝蘇聯。而當中國共產黨和阿尔巴尼亞勞動黨的同志譴責蘇聯，非難它的有利於維護和平的行動的時候，人們不禁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蘇聯不是由於自己的威力而成為維護和平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和阿尔巴尼亞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世界和平運動為了維護和平作了巨大的努力，而中國同志不僅不支持這個運動，而且實際上加以抵制。

事實終歸是事實，而誹謗無論來自何方，都不能使蘇聯在人類各主要活動領域中所光輝確立的力量、威望、日益增長的影響這一現實受到懷疑。

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帝國主義國家在確定自己的對外政策時，必須考慮蘇聯的存在和發展。至於全世界的勞動者，他們在自己的爭取美好生活、爭取自由與和平的鬥爭中，都以欽佩的目光注視着蘇聯。沒有一個進步的人，即使不贊同共產主義理想的人，不是怀着興趣和好奇心來研究蘇聯社會主義的經驗和成就的。

的確，蘇聯愈來愈成為世界上一切進步的決定性力量。蘇聯在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這種日益提高的作用，同世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的事實有聯繫。不錯，正如1960年11月八十一個共產黨

和工人党的声明強調指出的，“我們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苏联是社会主义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目前給自己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的任务，它既研究了本身的实际經驗，又研究了整个工人运动的經驗，所以对丰富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最大的貢獻。毫無疑問，这样的国家不能不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先鋒队，不能不成为全人类的先鋒队。目前这种情况，是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繼續和合乎邏輯的結果。

苏联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假如沒有某些障碍，还会更快地取得这些成就。十分明显，比如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就妨碍了苏維埃国家的发展，阻止了苏联人民拥有的全部精力的發揮，削弱了人們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潜力。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所造成的罪行和錯誤，已被苏联共产党大胆地揭露出来。中国同志怀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決議（这些決議的基本思想鼓舞了1957年和1960年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工作）以及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反对揭露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然而，这种揭露是必要的，因为这会叫世界的劳动者看到共产主义的真面目。中国同志在这方面的行动和作法，证明他們对党的工作和生活有十分特殊的观念，证明他們抱着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馳的观念。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虽然阻碍了苏联的政治、經濟和思想的发展，但是它并不能使苏維埃社会的社会主义內容成为問題。这一事实突出地表現了日益确立自己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和穩固性，表現了苏联是人类发展中的先进的决定性力量。

苏联共产党的功績是伟大的。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平



等的，沒有上級黨和下級黨之分，這些說法雖然是对的，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1960年在莫斯科的一致聲明同樣也是对的。聲明中說：“……蘇聯共產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有經驗和久經考驗的隊伍，過去是、今後仍然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公認的先鋒隊。蘇聯共產黨在爭取工人階級勝利的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和實現全面共產主義建設中所積累的經驗，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具有原則性的意義。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及其兄弟般的同情，鼓舞着所有共產黨進行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並且是在實踐中運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革命原則的表現。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性決議，不但對蘇共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具有偉大的意義，而且开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促進了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

這一切理由，使蘇聯和蘇聯共產黨成為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的具有威信的先鋒隊。因此，很難理解而且不能同意中國同志對這個光榮的黨的侮辱性誹謗，他們也對包括我們黨在內的其他兄弟黨進行攻擊。由於偉大的蘇維埃國家起着先鋒隊、開拓者和共產主義社會建設者的作用，它理應給予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的一切力量以兄弟般的同情，而蘇聯共產黨也理應受到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尊重和信任。

中國同志指責那些支持蘇共正確政策的共產黨是“跟着它的指揮棒轉”，這無非是重複反動派的老一套誣蔑。僅此一點，就值得他們三思。

今年7月19日，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在其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形勢的聲明中指出：“法國共產黨重申，它現在和將來都要進行意識形態和實際行動上的兩條戰綫的無情鬥爭：既反對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又反對已經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法國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下，

現在和將來都要為反對有害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立場而鬥爭。

“法國共產黨在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偉大鬥爭中，同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站在一起。它將不遺余力地來擴大和加強這種團結。它將不遺余力地使和平、民主、社會進步、社會主義的事業取得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在莫斯科簽訂的禁止核試驗條約採取了敵對的立場，這種立場自然遭到了全體和平擁護者的譴責。

當然，莫斯科條約的目的還是有限的，但這個條約是走向有可能解決各種國際爭端的道路的重要步驟，它光輝地證明蘇聯本着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精神所實行的和平共處政策是正確的。

十分可笑的是，中國同志在和平事業取得了像簽訂莫斯科條約這樣的成就以後，竟然指責蘇聯政府向美帝國主義投降。實際的情況是，由於國際舞台上力量對比的变化，由於蘇聯的核實力，美國政府才同意了簽訂這個可使全世界核軍備競賽緩慢下來、限制這種殺傷力可怕的武器的十分危險的擴散的條約。這樣，就可使人類免遭放射性元素污染大氣層、水和宇宙空間的可怕後果。

中國政府還聲稱，莫斯科條約既沒有談到禁止各種核武器，又沒有談到銷毀現有的核武器儲存和停止核武器生產。可見，中國同志發展了所謂“要麼全要，要麼全不要”的政策，順便說一下，這一政策是同他們的強調必須“逐步”走向全面禁止核彈的聲明相矛盾的。這個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人在他們蓄意誹謗蘇共和其他兄弟黨時是不顧自相矛盾的。他們有意在莫斯科條約的性質和意義上欺騙中國人民。

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進行自己的宣傳時，利用一切叛徒集團，組織反對兄弟黨的派別活動。中國共產黨硬說，締結禁止核試驗

条約将使美帝国主义取得軍事优势，而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不能加强自己的防禦能力。可見，中国共产党根本沒有考虑到苏联可以用于保卫社会主义各国的那些防禦手段的威力。

戴高乐的論据同中国同志們的論据相近。在这方面，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从北京广播电台发出的中国宣传把戴高乐的政策說得很好，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其实，戴高乐在提到莫斯科条約可能产生的后果时曾說：“况且，也用不着有什么公約来让法国声明它永远不会首先发动进攻，然而有誰进攻法国或它的盟国时，它就会以可能有的一切手段起来自卫。可是在今天，法国通过它的共和国总统郑重声明，法国永远不会进行侵略。因此，說我們可能参加互不侵犯公約，都完全是无稽之談。”

事实上，中国同志由于他們对莫斯科条約采取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立場，已經同各国的“冷战”狂人——美国的狂人、西德的复仇主义者和戴高乐反动派串通一气。中国领导人企图为自己对莫斯科条約的敌視态度辯护，提出了他們的核裁軍計劃。誰都清楚，这个計劃在目前是无法通过的。中国领导人的作法同戴高乐一模一样，戴高乐也拒絕参加这个条約，并暗示他本人在适当的时候要提出一項核裁軍計劃。

事实上，这是玩弄手法，为的是造成一种假象，替同各国人民利益、同維護和平事业背道而馳的立場辯护。

反对莫斯科条約的人也不能不看到，已經达成的这个第一个条約，正在为維護和平的主要問題（例如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和华沙条約参加国之間締結一項互不侵犯公約）开辟繼續談判的道路。戴高乐不願意締結這項公約，大家知道他在本年7月29日的記者招待会上就公开这样說过。

这就是同中国同志一起反对莫斯科条約的那伙主要人物当中的一个人的行动。我們希望中国同志在一切共产党人都要忠实于

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原则来确定他们的政策的时候，想一想这种巧合的荒诞性。而苏联共产党——光荣的列宁的党，却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它没有忘记1960年声明的下述明确论点：“现在，对于所有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来说，再没有比使人类免遭世界热核灾难更迫切的任务了。现代军事技术的空前破坏性，迫切地要求把所有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力量主要行动集中于防止战争。不能把反对战争的斗争拖延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那时对于世界许多地区和那里的居民来说，进行斗争将会是太迟了。”

（译自1963年9月号《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法文版）

# 莫斯科条約簽訂以后

法共《共产主义手冊》月刊社論

雷蒙·居約

“在我們的时代里，要么和平共处，要么热核战争，別无其他选择。由于核武器愈积愈多，大規模毁灭性的軍事手段起了质的变化，使全人类面临巨大的危險。再沒有比防止爆发新的战争更迫切的任务和更崇高的义务了。”（1963年5月10日在伊符里举行的中央委员会決議）

苏联、美国和英国在莫斯科簽訂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間和 underwater 进行核試驗的条約，至今已一个月了。一切都证明这项条約具有伟大的意义。

几乎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在条約上簽了字。这是一些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同、甚至相反的国家。这就证明了——加勒比海危机时期早已证明了——在我們时代里，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問題也能通过談判找到解决办法。这是和平共处精神对十字軍精神的一次胜利。

莫斯科条約符合各国人民自从广島事件以来愈来愈明确的要求：把人类从放射微尘的毒害下解放出来。莫斯科条約单是这一点好处就已經很重要了，而且誰还看不到，禁試措施是和平拥护者所希望的下列前景中的一部分：把人类从热核战争的恶梦中解放出来。

条約的締造者在序言里說：“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在最短期間內，达成关于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普遍彻底裁軍的協議，这种協議将結束軍备竞赛，将停止煽动各类武器、其中包括核武器的生产和試驗”，这是很重要的。

这种贊成簽訂一項裁軍总条約的声明，在战争极端分子的陣营中引起了憤怒和混乱。最好战的力量，在遭到这次打击以后，騷动起来，并重新組織力量，其目的不在于阻止执行这项条約或阻止签字国議會批准这项条約，而是在于縮小其意义，尤其在于阻止任何在裁軍道路上的新的前进步子。

在美国，許多有影响的議員都表示反对这项条約，同他們一起的还有軍事領袖，如战略空軍头子鮑威尔將軍、空軍參謀长李梅將軍、宇宙計劃負責人許里佛將軍。在西德，几乎公开得到阿登納鼓励的施特劳斯和馮·勃伦塔諾开展了一个积极的运动，反对批准联邦共和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后签的字。

大家知道，戴高乐政权是激烈反对莫斯科条約的，因为这项条約妨碍它建立一支原子打击力量。戴高乐政权把它的賭注押在美国和西德的极端分子身上。《民族报》自得其乐地引证了一切反对莫斯科条約的人的話，它在警告人們注意“莫斯科精神”之后，又接着說：

“莫斯科条約是一个阶段，值得忧虑的是赫魯曉夫准备和肯尼迪討論的以后的阶段。人們不禁要問，目前是不是正在酝酿大規模的外交上的主动……波恩政府也有同样的恐惧……法国試圖清楚地表达欧洲好几个国家的想法。”

我們充分地考虑到这种活动。我們的义务是要粉碎这种活动。我們非常明白，莫斯科条約并未建立一个自动运行的和平“体系”。

帝国主义是从本性上需要战争的。因此，必須通过斗争，迫使

它和平共处。全世界都高高兴兴地、满怀希望地欢迎莫斯科条约，因为它符合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但是，莫斯科条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和平共处意味着紧张和经常的斗争。尼·谢·赫鲁晓夫在他致第九届广岛大会的贺电中提醒我们说：

“和平共处政策的实质在于：依靠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对军国主义和侵略力量的优势，迫使西方各大国放弃把战争作为他们的政策手段，强迫他们用和平方法而不是用军事方法来解决国际问题。”

莫斯科条约恰恰是和平人民的伟大胜利，因为它是国际局势和缓的一个因素，它有助于孤立战争极端分子，有助于强迫西方各大国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和平方法。

条约创造了一种新的气氛，对于和平拥护者进一步开展争取裁军的任何行动都是有利的。

赢得这场斗争，而且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赢得它，这是可能的。为此必须有一切和平力量的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团结、为崇高的和平事业而共同斗争的各国共产党人的团结。

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奉行冒险主义性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策，其结果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入反对莫斯科条约的国家的行列，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置于事实上同战争极端分子类似的地位上。我们在法国、更一般地说在全世界，碰到这些极端分子。落到如此地步的立场，不仅是可惜，而且应予谴责，首先因为它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声誉，其次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各国人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总斗争。

“兄弟的苏联党第二十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我们时代的一系列主要问题，提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新观点。关于和平和战

爭問題，关于民主力量和反帝力量的團結問題……就是这样。我們的一切經驗证实，苏联的国际主义态度具有典范性。”（1963年5月10日在伊符里举行的中央委员会決議）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竟至提出絕對荒謬的意見，根据这种意見，莫斯科条約似乎“有利于美帝国主义”，从而苏联似乎“背叛了和平事业”。

戴高乐的电台和报纸关切地传播中国文章——我們是最有資格了解这一点的——，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礼尚往来。今年2月24日北京《人民日报》不是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戴高乐說成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旗手嗎；戴高乐“提出要建立一个‘欧洲人的欧洲’，也就是一个排斥美国势力的欧洲……巴黎—波恩軸心的加强，显然是戴高乐敢于向美国进行反击的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莫斯科条約所采取的态度是站不住脚的。这就說明了，为什么他們的文章和讲话中，粗魯的話愈来愈多，至少在关于莫斯科条約这一点上是这样的。然而，他們应当懂得，謾罵即使重复一百次也不能代替說理。

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就已經用几乎同样的話攻击过苏联的和平政策。由于古巴人民的英勇和苏联人的力量和智慧，在复杂的情况下，避免了一次热核世界大战，保卫了古巴革命的独立；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却企图煽动世界輿論，特别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国人民，不是去反对侵略根源美帝国主义，而是去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被指控为“背叛了”古巴的赫魯曉夫同志。但是，記載在历史上的，却是世界各国人民对苏联表示的动人的敬意，苏联是忠于国际主义、忠于人道主义的典范。

去年秋季危机时期的这种行为和現在对待莫斯科条約的这种行为，无可辯駁地突出了这种政策的冒险主义性质。有人想把



这种政策强加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代替 1957 年和 1960 年各国党會議时共同制定的政策。

但是, 1957 年第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时, 中国党同我們党和所有出席會議的党一样, 通过了和平宣言。这个宣言說:

“既不需要科学家的知識, 也不需要詩人的幻想, 就能断定, 下一次战争——如果各国人民未能制止它爆发——将会超过人类至今所經受过的一切灾难。欧、美、亚、非、澳各洲的居民都知道, 人类解放出了这样巨大的自然力量, 并掌握了这样强大的手段, 以致能够使其破坏作用达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在新的战争中不会有人們能够平安避难的地方。原子弹、氢弹和火箭战争的烈火将会烧到世界各国人民, 将以无数的灾难威胁今天的人类和它的后代。”

因此, 我們当时就向一切善良的人們发出紧急呼吁:

組織起来, 爭取;

1. 立即停止原子試驗和热核試驗;
2. 在最近期內绝对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弹和氢弹。

1960 年 11 月第二次国际會議上, 八十一个出席會議的党重申决心不等原子弹和氢弹开始落下来就进行反对新战争危险的斗争。我們又向一切热爱自己的祖国、痛恨战争的人們发出了呼吁, 号召他們要求立即禁止核試驗及采取其他措施, 特别是締結一項关于普遍、彻底和有监督的裁軍的条約。在这次會議所通过的文件中, 各国党正确地断定說, 在我們时代里——社会主义力量和和平力量取得优势的时代里——“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 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 将会出現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就在現时代使人类摆脱新的世界战争的惨禍”的可能性。現在这种論点不但已被北京抛弃, 而且还遭到北京的譴責, 北京宣称战争是注定要发生的。

是不是还应当提醒中国同志，特别是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十三年前和約里奧一居里一起进行的反对原子武器的斗争。当时为斯德哥尔摩呼吁书征集了六亿人签名。这次签名运动对于遏止帝国主义的魔手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当时帝国主义还掌握着核武器的垄断权。这次签名运动拯救了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朝鲜人民，使之免受更残忍的广岛惨祸。是不是还需要提醒，一年前，在世界和平和裁军大会上一致通过了赞成停止核试验和其他裁军措施的宣言。

莫斯科条约禁止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的核试验。1957年和1960年，我们曾经要求这样做，1962年7月世界大会上也曾要求过。我们要求的还要多一些，这倒是真的。但是，争取和平的斗争并不止于此，而是恰恰相反。莫斯科条约签订后，现在的义务是抓住新的可能性，同世界和平运动及一切和平力量一起，开展广泛的斗争，争取停止一切核试验，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争取建立非核地区和撤消外国军事基地，争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同华沙条约成员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争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支持南越和安哥拉正在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争取普遍裁军。

大家知道，中国领导人非但不做一点赞助这种大团结的事，却发动可耻的运动，诋毁世界和平运动及其主席貝尔納教授，诋毁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国际民主妇女组织及其最杰出、最受尊敬的领袖，包括戈登夫人在内；他们系统地从事破坏活动，如同最近在反对原子弹氢弹的广岛大会上所发生的那样。这种行为激起了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愤怒和指责。

中国领导人就莫斯科条约只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的试验这一事实而大吵大嚷。所有这一切吵嚷事实上掩盖着更严重、更深刻的分歧。不难了解，条约缔结前，帝国主义者可以自由

自在地进行一切核試驗。正是和平力量應該去迫使他們停止地下試驗，从目前来看，这是較为容易的斗争了。很久以前，列宁在他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曾指責“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政策是特別有害的，指責自称革命的“左派”空談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活生生的应用完全相反的。那样一种狹隘的、反辯证法的立場，居然能表現到如此程度，这就表明，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險已經成了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險。

但是，中国党对莫斯科条約的态度，有其更深刻的原因，更严重的来由。

“社会主义陣营取得的、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識为基础的成就，使这个陣营成为人类进步的先鋒。这些成就有效地保卫着社会主义的成果，促进着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效地对维护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作出貢獻。”（1963年5月10日在伊符里举行的中央委员会決議）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同几乎全部别的党之間的分歧是由来已久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2月）提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論点，在1957—1958年前后就出現了最初的分歧迹象。今年6月23日，莫里斯·多列士同志在莫耶夫尔格郎德举行的东部各省共产党员学习日的讲话中，又重新提起了我們党员和法国大多数劳动者所熟悉的这些論点：

——今后有了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达成裁軍的可能性；

——由于国际范围内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工人运动的进展，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和社会党人团結的更大的可能性，尤其是由于資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輝煌的胜利，特別是苏联在科学

方面的胜利；

——为了取得进步，必須彻底根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必須糾正苏共整个一个时期活动中的錯誤的东西，这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來說不是沒有过影响的。

对于我們这个时代說来，这些論点具有首要的意义。1960年4月，在一本題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显然地公开了有关这些論点的分歧。中国共产党在公众間和在某些党内，大量地散发了这本小册子的各种文本。攻击特別针对关于战争并非注定不可避免的論点，而和平共处的提法則被称为反馬克思主义的。中国代表团在1960年11月八十一一个党會議上所維護的立場，反映了同上述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論点根本对立的一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策。莫里斯·多列士同志以我党代表团的名义，警告中国同志，注意他們的立場所包含的危險，包括他們的立場已經引起的分裂的危險。<sup>①</sup>

最后，孤立了的中国代表团也投票贊成一致通过的八十一一个党的声明。現在我們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領導是想“爭取時間”。

但是，事情却根本不是按北京制定的蓝图发展的。和平共处的思想是不可抗拒的，和平力量在前进，随之而前进的有各国人民爭取独立的事业，爭取民主、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越南人民的伟大斗争、美国黑人向华盛顿的进军、我們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大罢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和平大会和和平进军、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贊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古巴社会主义的发展、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恢复兄弟关系，最后，特别是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成就，首先是苏联的成就及其在宇宙方面的輝煌的胜利，这就是八十一一个党會議以来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

---

<sup>①</sup> 見《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問題文件》，1963年1月，中央委员会出版。

生活完全证实了那时候所做的决定。当然不能改变这条根本路线，去“迁就”一再表现出冒险主义现象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路线。

在法国，戴高乐政权拒绝参加莫斯科条约招致了广泛的谴责。天主教徒在教皇保罗六世的庄严的声明中表示支持莫斯科条约。法国社会党在它执行局7月26日的声明中宣称：“法国社会党把法国参加这项条约作为其宣传和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

法国和平运动发出了“要求法国政府参加莫斯科条约”的呼吁书，为这个呼吁书征集签名的运动正在成功地进行着。共产党人支持这一运动，像支持一定会越来越多的任何其他主动行为一样。他们将帮助建立一个强大的和平委员会网。

一个临时委员会已经考虑准备在秋天举行反对打击力量、争取裁军的大示威，这个临时委员会就是为此而成立的，我们党和社会党，同其他的组织和运动一起，参加了这个临时委员会。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帮助这次团结最广泛的示威获得成就。

在这次反对戴高乐打击力量的斗争中，我们将同撒哈拉周围各非洲国家的人民、同南太平洋、大洋洲和南美洲各国的人民一起，手挽手地共同行动。所有这些国家都已签署了莫斯科条约。

有关各国人民都知道，莫斯科条约是戴高乐想在非洲中部、往后想在玻里尼西亚进行新的原子爆炸时，所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北京反对莫斯科条约的“论据”，同戴高乐将军的一样，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看到，世界各国人民，不管他们是哪一洲的，对他们自己的力量是有信心的，他们反对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这类武器对世界和平说来，是可怕的危险。

北京对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行动没有信心，北京认为肯定的唯一的前景是：热核战争。北京公开说赞成扩散核武器。这可以从中国最近的文章中得出结论。由此他们拼命地反对莫斯科条

約，因为条約是扩散的障碍。在法国推动戴高乐的，或者在西德推动施特劳斯和馮·勃伦塔諾的，是同样的理由。

不，人类的前途和世界和平的前途不在于扩散核武器，而在于禁止和銷毀核武器，在于普遍裁軍。各国人民有一种願望一天天在增长着：“不許再有战争！把武器扔到废铁堆里去。”

苏联打破了美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从而对和平事业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就在这种时候，苏联建議（1956年）禁止核試驗。因为苏联的目的仍然和过去一样：防止战争。

苏联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陣营的軍事优势用于其他目的，因此，作为一个国家，它站在爭取停止一切試驗、反对扩散原子武器、爭取普遍裁軍的斗争的最前列。这种态度是明朗的、負責任的。反之，中国领导人却贊成扩散核武器。他們想要有自己的炸弹。

关于这个問題，苏联政府在8月20日的一項声明中說：

“中国领导人最抱怨苏联的是苏联没有向中国提供原子武器的样品。好像正是由于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奉行的不扩散核武器的政策感到懊恼，才促使中国领导人攻击苏联所采取的旨在緩和國際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的对外政策步骤，特别是促使他們攻击禁止試驗核武器条約。

“在核国家中增加一个或是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給社会主义陣营的防御力量不会带来实质上的变化，当然，如果把社会主义陣营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話。但是，核战争的危險将随着每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而增长。”

苏伊士运河事件、福摩薩事件和古巴事件表明，苏联具有必要的一切，以便把防御能力維持在所需的水平上，即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安全上，正如經驗证明，也包括中国的安全在內，所要求和可能要求的那种水平。苏联不向中国提供原子武器的样品，拒絕走扩散核武器这条充滿危險的道路，对世界和平力量怀有信心，这样

做，表明苏联是有远见的、是明智的。而苏联也是正确的。

如果苏联走扩散的道路，难道能认为西方大国会袖手不动吗？这样疯狂竞赛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一定会是热核战争。有人对我们说，不必为此而激动。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曾经冷酷地考虑让他们自己国家的三亿居民和人类的一半死亡，他们说，到最后，资本主义会灭亡，社会主义会胜利。但是，那将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那将是一个灰暗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整个整个的国家将要被消灭，活人将羡慕死人！

“真正美好的未来”、进步和富裕的人类社会，不是在那样的废墟上建立的。那样的冒险主义是和共产主义毫无关系的。

我们党一致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我们党谴责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国际民主组织内部进行的破坏活动。

早在1960年7月1日，而且另外还有好几次，我们曾警告中国同志，注意这种分裂活动，注意他们立场的冒险主义性质，我们着重指出了他们对和平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损害。我们也曾警告他们，注意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不同的思想，根据这种思想，反剥削、反压迫斗争的基础，不再是阶级原则，而是肤色，或属于世界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这样就堕落到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在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伟大斗争中，法国共产党是站在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边的。我们党站在苏联共产党这一边，因为苏联党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锻炼的队伍，是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英勇地站在前列的队伍。我们党将不遗余力，使这种团结扩大和加强。它也将不遗余力，使和平、民主、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获得胜利。

（译自1963年9月号法共《共产主义手册》月刊）

# 中国领导人的論点会把我們 引到哪儿去？

法共《共产主义手册》月刊社論

罗歇·加罗迪

苏联政府9月22日致北京的照会，根据确凿的事实，指出中国领导人的論点和政策对和平事业是多么危險。

这不是苏联和中国之間的爭吵，而是关系到各国人民利益的一場辯論，是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直接有关的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

中国领导人怀疑整个运动的战略和策略。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全世界广泛散发的包括二十五点提綱的1963年3月30日的信，公然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

因此，这是同每个共产党、每个干部直接有关的，作为法国共产党人，我們可以这样問：在法国，把中国领导人的論点作为我們的政策方針来执行，会把我們引到哪儿去。

关于中国领导人要我們回到“列宁主义”上来的意图，必須先提出几点意見。

首先，这一回到“列宁主义”的号召使用了列宁主义最恶毒的敌人經常用来反对我們的某些論点，这是怪事。

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宣传經常使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級资产阶級化”这一論点。現在中国领导人的宣传也使用这种論点来支持“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已經轉移的思想。

托洛茨基派的宣传已使我們听慣了“不断革命”和軍事輸出革



命等冒险主义的說法，而現在中国领导人又重新提出这种說法。

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各式各样的反动宣传曾經不倦地重复“跟莫斯科走”这种口号，現在中国领导人毫不躊躇地也用这一口号来反对我們。

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却傲慢地标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統派，想以大量引证和引用馬克思和列宁的話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列宁主义恰恰同教条主义相反，教条主义就是把过去历史条件下絕對正确的方法和口号拿来在新的情况下搬用。

列宁主义是在反对考茨基之流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考茨基之流自恃博学多才，利用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品来掩盖他們拒絕考虑階級斗争的新条件。

1917年4月，列宁在《論策略书》中写道：

“馬克思主义要求我們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階級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經得起客观檢驗的最确切的分析。我們布尔什維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論证，这个要求是絕對必需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說：‘我們的学說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們公正地譏笑了只会背誦和簡單重复‘公式’的人們，說明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是必須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經濟和政治环境而改变的。

“現在，革命无产階級政党應該根据哪些确切肯定的客观事实来确定自己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呢？”<sup>①</sup>

这种提問題的方式肯定是列宁主义的方法。

中国领导人是这样做的嗎？

\* \* \*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頁。

不是这样做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做的，很容易根据下列对于确定党的战略策略具有决定意义的两点予以检验：确定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及其主要矛盾。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确定我们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对于如何分析当前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论点，因所有兄弟党的实际经验和理论探索而更为丰富，在1957年和1960年两次会议以后，已成为大家的财富。这两次会议的决议中都包括了这一论点。中国领导人曾经承认这种分析的正确性，因为他们和整个运动一起，参加了共同讨论，投票通过了八十一个党的声明——各国共产党人真正的行动宪章。

然而中国领导人又使这些结论成了问题（这些结论是大家的理论工作和经验的成果），他们企图回到列宁所提出的定义上来。列宁的定义在列宁提出的那个时代里是完全正确的，那个时代是只有帝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因而是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成为历史发展的唯一规律的时代。

而当前伟大的新事实，是八十一个党的声明中这样阐明的事实：“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这样一种理论上的结论是有巨大的实际意义的：只有对力量对比及历史发展规律作出正确的分析，才能建立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列宁写道：

“我们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

基本特征，我們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計这国或那国的更詳細的特点。”<sup>①</sup>

而中国领导人却认为，对于列宁主义的正統学說來說，必須坚持符合于五十年前的实际力量对比关系的时代特征的定义，反之，他們却毫不躊躇地抛弃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階級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并且，他們提出“革命风暴的主要中心”理論，用被压迫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照他們說来更为重要的矛盾，去代替工人階級同帝国主义資產階級之間的首要矛盾。

我們时代里，殖民地人民爭取自己民族独立的巨大斗争，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却不能引导我們把国与国之間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去代替階級之間的矛盾。

而且經驗证明，帝国主义国家丧失殖民地不会引起資本主义垮台，因此，不管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一点不是現代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为了說明这类錯誤对我們法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只要回想一下，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我們不得不反对的某些人的意图就够了。照这些人說来，法国人民除了变成民族解放陣綫武装斗争的附庸而外，就沒有別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前景。这样一种策略，非但对民族解放陣綫英勇的正义斗争沒有帮助，反而会使我們脱离群众，变成毫无力量的一个小宗派，既不能通过深刻的群众性政治斗争帮助挫败殖民主义，也不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对爭取民族解放、进行反帝斗争的各国人民，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社会主义国家里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資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階級的斗争、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都是辯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哪一方面的每一个胜利，都加强其他方

---

<sup>①</sup> 《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3—124頁。

面的斗争，这在世界范围内是完全正确的。把劳动者的阶级斗争从属于其他目标，会妨碍劳动者充分地尽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而且只会削弱反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

莫里斯·多列士在向 1960 年 12 月 15 日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曾清楚地确定了我們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他说：

“处在我們时代中心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建设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团结着一切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或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力量，团结着組成强大的、震撼世界的反帝潮流的一切因素。”

从关于我們时代特征的基本错误出发，中国领导人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最危险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及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的战略上和策略上的结论。

\* \* \*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方面断定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而同时又說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就不可避免，这是自相矛盾的。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說来，证明帝国主义并非“纸老虎”，这是多余的事。对各国人民說来是痛苦的历史經驗证明，如果說帝国主义确已不再是主宰了，如果說将近五十年以来，面对着不断发展、不断壮大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不断扩大其威望和思想影响的社会主义世界，面对着更自觉的、組織得更好的、能够把强大的民主力量和和平力量团结在同一斗争中的工人阶级，面对着普遍发展的、迫使殖民主义后退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已經只能“且战且退”了，如果說是这样的話，帝国主义却仍然是一支可怕的力量，仍然是一种危险。

有些人怀有教条主义旧理論的幻想，这种“灾难性的”旧理論总說淹沒资本主义的危机就要发生了。同这种人的虛假的乐观主

义相反，經驗表明，資本主义虽然无法克服其基本矛盾，甚至矛盾有扩大和尖銳的危險，但是却还能使尽办法苟延殘喘，以至对我們进行打击。大西洋联盟、共同市場、新殖民主义的办法、扩軍政策、积存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这一切使帝国主义者还能且战且退，而提出“紙老虎”这种口号，低估帝国主义者的能力和危害性，这是非常危險的。

反之，引用列宁的話，說只要帝国主义繼續存在，战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忘記了自从列宁那个时代以来（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由于他的布尔什維克党，由于苏联人民），力量对比已有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领导人装着相信，誰要是說在我們时代里战争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誰就是修正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本性的思想，因为帝国主义在它的发展中是必然要带来战争的。

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仍然是完全有效的：帝国主义的本性沒有变，但是它的能力和力量变了。

因此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发展規律不再是我們时代里历史发展的唯一規律。另有一种力量在帝国主义面前壮大起来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正如八十一个党的声明所說，“在現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

还得指出，日前軍事技术的发展程度，已經到了有用原子武器进行灭絕的可能，热核轰炸的放射作用能使生物在全世界的大气层里无法生活，这一切使問題发生了变化，不能再滿足于重复克劳塞維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繼續”，而不考虑新的现实。当然，瘋狂行为还不能完全排除掉，但是，甚至連最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他們的侵略事业中，既不能无視对手的力量，也

不能無視他們自己的武器可能引起的集體自殺的危險。美國簽署莫斯科條約以及肯尼迪最近所採取的立場，證明初步承認了現實的力量對比和冒險行為的危險性。

能不能像中國領導人那樣說，由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而不得不實行的目前形式的和平共處是有利於帝國主義者的，是給了他們以喘息的機會？如果這樣說，那就是連帝國主義的本性都忘掉了，那就是忘掉了帝國主義是需要戰爭來解決其困難和克服其矛盾的。那就是忘掉了，譬如說，朝鮮戰爭曾使美國得以維持工業生產的某種水平，而掩蓋其不太明顯的經濟危機。那就是忘掉了《華爾街日報》的話，而這些話却是容易記住而且是多麼有意義的。當朝鮮恢復平時，這家報紙不勝留戀地寫道：這種局部性的戰爭對經濟能起良好的作用，能“維持繁榮氣象”。

裁軍政策應不應該受到中國領導人的嘲笑和誣蔑呢？如果說應該，那麼，也就是忘掉了軍備競賽和軍事生產是壟斷資本用以維持和增加利潤、用以解決因群眾消費不足而引起的困難的主要辦法之一。戴高樂製造的所謂“經濟擴張”的幻想，主要是以擴充軍備計劃和“打擊力量”計劃為基礎的，這一點，對我們法國人說來，難道還不明顯嗎？這種軍備計劃和“打擊力量”計劃給某些工業部門帶來了人為的、不健康的刺激。

裁軍道路上的任何成就，哪怕是部分的也好，都能使社會主義國家騰出資金，因而加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建設，這一點，難道不也是很明顯的嗎？

在政治方面，冷戰和國際緊張局勢被當作取消自由的辯解，以致在1947及1948年，把罷工說成是叛國，以致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泛濫，以致使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借口“保衛自由世界”，乘機加強其警察機構，而國際局勢和緩却使各國人民的鬥爭更容易進行，正如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勝利所證明的那樣，其中也包括為爭取民族

独立而斗争着的各国人民，同样也使得加勒比海地区保卫古巴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更为容易。

因此，还是在这一点上，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是在法国执行中国领导人所建议的路线，将会把我们引导到哪儿去？就拿当前的一个例子来说，将会把我们引导到同意戴高乐不签署莫斯科条约，也就是说，让我们跟着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分子走，让我们脱离群众，使劳动者迷失方向，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力量的空谈家的小宗派，对于最明显的现实视若无睹，不能起工人阶级和民族的、有觉悟的先鋒队的作用。

\*                     \*                     \*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也可以做出类似的证明。

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强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抹煞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这就是把我们的政策“建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

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任何必要去想像资本主义的本性变了，想像统治阶级会自愿让出政权；唯一的问题在于，统治阶级是不是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还有可能用武力抗拒工人阶级和人民取得政权。

考虑一条和平的道路，丝毫也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本性有任何幻想和修正，只不过是研究具体形势下和平道路的可能性而已。

我们党没有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不断地反对过关于资本主义演变的各种理论：人民资本主义、“资本的民主化”、垄断资本的“进步”性（根据其技术方面而忘了阶级关系）、关于“劳资协作”的阶级合作宣传，等等。我们既不相信资本主义会自行转入社会主义，也不相信帝国主义会拥护和平事业。

恰恰相反，我們經常維護下列論點：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進行的任何經濟改革都不會自動地自行導向社會主義：政權問題是決定性的問題。

但是，莫里斯·多列士之所以早在1945年就已考慮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那是因為估計到工人階級及國內民主分子的日益增長的力量。像1936年使人民陣綫不得不建立的群眾運動那樣強大的、像解放翌日的群眾運動那樣強大的群眾運動，能夠把統治階級在人民中的主要依靠剝奪掉，能夠瓦解用於鎮壓的軍事力量和警察力量，能夠使統治階級的武裝抵抗難以進行。

況且，如果說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過去曾撲向十月革命，從外面進行干涉，企圖把革命淹死在血泊中，那麼，十月革命的勝利、蘇聯不斷增長的力量、在歐洲和亞洲好些個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從前為帝國主義者提供後備力量的（1936年為佛朗哥提供摩洛哥人，法國帝國主義把塞內加爾人送去反對越南人民）前殖民地國家的解放，所有這一切，現在都大大地削弱了壟斷資本的國外支持和干涉的可能性。

因此，不能排斥（但也不能說是肯定無疑的），在一定的條件下，國內的力量對比（發動一次偉大的、統一的群眾運動）和國外的力量對比（社會主義體系的力量使別的帝國主義者進行干涉的意圖癱瘓）會發展到那種程度，以至於不管統治階級的願望如何，想要組織流血的武裝抵抗，物質上已經不可能了。

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但是，社會主義世界力量和影響的增長、工人階級團結的加強、民主力量和和平力量的團結的加強、帝國主義失掉群眾基礎和傳統的“殖民地”後備軍，所有這一切條件使那樣的前景越來越肯定了。

我們黨的主要任務，恰恰不是像中國領導人的方針所唆使的那樣，投冒險行為之機，講很多假革命的空話，而是通過群眾工作



的办法（群众工作为我们带来了1936年的胜利，带来了抗战和解放的胜利），努力为工人阶级的团结而工作，为把民主力量及和平力量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而工作。

法国社会党第五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群众的推动下，谴责了戴高乐政权（在好些点上和我们一致），提出了一个纲领，纲领里有好几点考虑也是我们据以制定我们自己的纲领的考虑，这就表明，尽管在思想上政治上存在着重要的分歧，但为反对垄断资本的戴高乐政权而统一行动是可能的，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而共同提出一个纲领和一种未来的前景也是可能的。

由于广大天主教群众在政治上的发展，尤其是约翰二十三世的《和平通谕》大大地帮助他们觉悟以后，就有可能扩大为和平而斗争的阵线，有可能为争取经济要求和民主而共同行动的其他形式开辟道路。

在这种条件下，选择中国领导人建议的路线，那就会是毁坏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可能性和前景，就会把我们变成一个教条主义空谈家的小宗派，不得不从事无结果的投机，脱离工人阶级，脱离人民。

\*                     \*                     \*

因此，我们法国共产党四十三年来的经验引导我们毫不犹豫地摒弃这条宗派主义的路线和学究式的空谈。人们想用这种空谈来证明这条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和“列宁主义的”，而人们的教条主义却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好相反的。

在这次争论的过程中，我们随时都遇到一些我们不得不反对的错误：机械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过去运动还处在幼稚阶段的特征；冒险精神，是由于把不够耐心提高为理论原则而产生的；同生活隔绝、同当前的现实隔绝、同新事物隔绝，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同群众隔绝；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第

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我們党第十四、十五、十六次代表大会都帮助我們反对这种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

我們党，自从建党以来，是在爭取克服阻碍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对工人阶级和国家有責任感的、伟大的、群众性的党的各种障碍的經常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們党現在和极大多数共产党工人党一起，摒弃中国领导人的論点，指出大量的中国宣传企图灌輸給劳动者的錯誤，繼續为保卫和平、为工人团结和民主力量团结而斗争，只有这种团结才能反对戴高乐政权，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我們党繼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譯自 1963 年 10 月号法共《共产主义手冊》月刊）

## 为爭取和平共处而行动 和阶级斗争

貝諾瓦·弗拉商

“……資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

“但是,既然現代制度下的实际情况有着这种趋势,那末,这是不是說,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資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如果工人在和資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縮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規模較大的运动。”

(卡尔·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

我們这段引文摘自馬克思在1865年第一国际总务委员会上討論工会問題时所发表的演說。

翌年,186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卡尔·馬克思起草的、关于工会問題的決議。決議分析了工会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它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是:在过去,“工会过分側重于地方性的、反对資本的当前斗争”,以及“它还没有充分認識到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反对現行生产制度”。以后,決議又宣称:“工会的这种活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現行生产制度存在,工会的这种活动就必不可免。不仅如此,这种活动还一定会通过各国工会的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

馬克思提出这些原則快一个世紀了。这些原則着重指出了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今天仍然是在資本主义国家里执行这些原則

的一切共产党人的宪章。

现在，工会在生活和社会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比过去大得无与伦比。工会更强大，更团结了，虽然目前还存在着分裂状态仍然削弱它的发言权。

· 馬克思所預見到的和主张的情况已經发生了：“除了原先的任务以外，工会还应当学会为了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自觉地作为工人阶级的組織中心从事活动。工会应当支持任何旨在达到这个目的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

在当前资本主义集中迅速发展及建立大垄断企业的时期里，为争取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斗争是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紧密地結合在一起的。

因此，在要求增加工资、要求减少劳动時間之外，还提出了诸如主要企业国有化等口号，继其他国家工会之后，英国职工大会最近一屆年会的情况就是这样。

工会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各国人民根据当代的口号而进行的一般行动：为反对战争、反对原子军备、争取銷毀原子军备、争取裁軍、争取不同性质国家間和平共处而斗争。

### **莫斯科条約：初步成就**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都认为关于禁止核試驗的莫斯科条約是积极的。倒不是由于它們认为这是一項决定性的条約，能解决战争与和平的主要問題，而是由于它們认为这是第一步，是各国人民斗争中的初步成就。工会是参加这种斗争的，斗争表明，如果行动更有力、更团结，成就还要更大。

· 工人阶级对于迫使帝国主义者原子军备竞赛中、在一般的战争政策中后退的可能性是有信心的，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不

同意这种信心，他們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是空想，是欺騙各国人民，是欺騙工人階級。他們的这种看法是以所謂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为基础的。

他們不仅在共产党內，而且也在群众組織和工会內發揮这种思想，他們不考虑这些非党組織的性质，而在这些組織內反对各国共产党所規定的政策。这是同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很少关系的宗派态度。

至于說只有他們是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么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事实，即使在实质上，他們也远不是正确的。

例如和平共处問題。中国领导人硬說和平共处会使劳动者脱离階級斗争，会对帝国主义本性产生幻想。

有没有可能把和平共处政策强加給帝国主义，这不是以幻想帝国主义的本性有甚么改变为基础的，而首先是以存在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为基础的。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的这个体系，大大地帮助了作为这一体系一部分的其他国家的解放，其中中国本身就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次是基于：殖民制度的瓦解严重地打击了并削弱了帝国主义。最后是基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强大的共产党和强有力的工会。

## **革命运动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

为什么不顾这些具体的现实情况而把和平共处政策看作为一种退却，一种投降，看作为卑躬屈膝地乞求和平呢？

至于說担心真正的和平共处会在階級斗争中促成退却，那么，提出这种假設就表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和工人組織十分不信任。革命运动并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限于被压迫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它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階級組

織是要起主要作用的。馬克思和列寧曾着重指出過保證其團結的重要意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鬥爭是在眾所周知的情況的基礎上發展的，這種情況就是生產的社會性同生產手段的個人私有制之間的日益增長的矛盾。

生產手段迅速集中在人數越來越少的一撮壟斷資本家手里，壟斷資本家對國家的統治，他們踐踏勞動者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踐踏勞動者的自由，所有這一切都使階級對抗更緊張，使階級鬥爭有所發展，同時也使鬥爭更加尖銳。

至於說和平共處會起緩和階級鬥爭的作用，那麼事實恰好相反。

首先，在國際局勢緊張時期，工人階級及其組織應當把大部分力量用於反對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宣傳。十六年來，我們在法國用了很大的努力進行鬥爭，反對越南戰爭和阿尔及利亞戰爭。直接反對資本剝削的鬥爭必然要受其影響。

反之，自從阿尔及利亞戰爭結束以來，罷工有了很大的增長。單是 1963 年頭三個月，罷工就達到八百萬個勞動日，而前幾年卻只有兩三萬勞動日。

### **爭取和平共處的行動越加強， 階級鬥爭越緊張**

在我們國家里，勞動者和工會正在進行鬥爭，爭取戴高樂政權放棄冷戰政策，爭取它停止製造原子彈，爭取它簽署莫斯科條約。但是，恰好相反，所有這一切並不妨礙發展要求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行動，爭取恢復民主制度的行動。反對製造國際緊張局勢的政策，也就是說爭取和平共處的行動越加強，階級鬥爭就越緊張，

工人力量也就越加團結。

這些天來，總理接見了總工會的代表。這是七年半以來的第一次。過去，我們是被排斥在這類會談之外的。當然，那種情況并未妨礙我們堅持不懈地行動，反對政府的政策。

政府已經了解到那種排擠政策對它沒有產生很多效果。我們認為政府不得不承認我們，就是一項重要的成就。但是，政府和我們之間建立起一種不太緊張的關係，對於我們正在進行的階級鬥爭會不會有所改變呢？當然不會。政府邀請我們的動機是把政府面對困難的經濟和財政局勢打算採取的措施告訴我們。

這些措施，我們不同意，我們反對。在政府和總工會之間恢復正常關係這一事實，絲毫不會改變我們的反對，也不改變我們的鬥爭意志。

我不禁要問：國與國之間建立和平共處的關係，就階級問題來說，會在哪一點上對工人組織起不同的作用呢。

後記——貝諾瓦·弗拉商的這篇文章也發表在蘇聯《勞動報》上。

插題是《人道報》編輯部加的。

（譯自1963年10月4日法共《人道報》）

# 中国领导人組織分裂活动

——他們建立分裂主义的国际組織

让-埃米尔·維达尔

几天前，新华社宣布北京成立了一个“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中心。

从已公布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不管这个“世界协会”的名称如何，它的目的是只团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科学工作者。

9月27日到29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筹备于1964年在中国首都举行一次科学讨论会，参加这次筹备会议的，确实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各国的代表，世界其他地区除外。

而且，会后发表的公报说明了这次讨论会的地理范围：

“会议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各国科学工作者团结和合作的良好开端。”（见10月1日、2日新华社电讯稿专号）

中国领导人也准备在国际学生联合会之外成立一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学生组织。会址设在布拉格的国际学生联合会是一个团结全世界学生的组织。

这是黑非留法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后，从新华社10月3日星期四发表的公报中可以看到。

为此，最近即将召开亚、非、南美学生会议。

我们还要指出，中国新闻工作者拒绝参加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起的会晤，而中国新闻工作者是这个协会的会员。某些迹象令人认为，在这方面，也准备在同上述团体一样的地理基础上成立



一个分裂主义的組織。

最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目前正在进行幕后活动，以便把苏联工会排挤出下一次亚非工会会议。他们也拒绝世界工会联合会参加这次会议。

## 分而治之

这样，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活动现在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了。

他们力图使三大洲的工会运动和各国工人队伍脱离世界工会运动，其目的是成立范围狭隘的集团。他们阴谋控制这些集团，并从而把他们错误的、危险的观点强加给这些集团。

中国领导人提出苏联是不是亚洲国家的“问题”。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可以看到，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哈萨克共和国、乌兹别克共和国、土库曼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都是在亚洲的。

但是，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是企图排挤苏联，不让它参加讨论和解决亚非问题。

这一切当然是妨碍国际工人团结的，只有利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国内敌视工人阶级的力量。

托派集团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和活动，这就不足为奇了。

中共领导人的活动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已经毫无共同之处了，已经不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了。他们越来越直接地拿他们的特殊路线去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企图用阴谋手段把他们的特殊路线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

## 北京的新“理論”

根据北京的新“理論”，我們时代的主要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而是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切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很远的。

中国领导人，从这种“理論”出发，发起了一个哗众取寵的运动，他們企图通过这种运动，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中贏得民心。

至于这种理論的实际意义，那就是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工人运动，脱离国际工人运动的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可以想像，这种行为，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來說，是多么危险呀。

苏联共产党在今年7月发表的“公开信”里提出了下列問題：

“……亚洲許多国家的人民，尽管有十分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后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从根本上动搖了帝国主义，摧毁了殖民主义者的力量，难道能够取得胜利嗎？”

“现在，当解放了的各国人民进入了自己斗争的新阶段，集中努力来巩固政治成果和經濟独立的时候，难道他們沒有看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解决这些任务要困难得无可比拟，甚至根本不可能嗎？”

“公开信”繼續說：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強調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伟大未来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他們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进一步胜利的

主要条件之一，是同作为反帝主要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结成巩固的同盟和合作，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同盟……”

## 不可告人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签了字的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阐明了这种立场。

这种立场所依据的，是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的思想。只有在建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条件下，民族解放运动才能最终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否认了这一切。

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它们的紧密联盟和合作是它们将来取得胜利的保证。

中共领导人进行的斗争，正是反对这种联盟和这种合作的。他们建立分裂主义组织，企图予以破坏的，正是这种联盟。

因此他们严重地损害了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译自1963年10月5日法共《人道报》）

## 雷蒙·居約在 1963 年 10 月 5 日 法共中央全会上的報告(節譯)

###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領導人的論点： 令人担心的吻合

当前国际局势的整个演变过程使人怀有这样的希望：莫斯科条約的可喜的締結将是走向有利于和平的其他措施的第一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力图貶低这一条約，并把它說成对和平和各国人民是“危险的”。因此，他們是同美国极端分子如参議員戈德华特和尼克松之流一致的，甚至在措詞上都是一致的。尼克松曾指責这一条約并不标志着局势緩和时期的开端，而是标志着“冷战的最危险时期的开端”。中共领导人甚至在闡明“論据”时，都是同戴高乐政府的领导人相吻合的。

現在我們更加了解，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不怕把戴高乐說成是“民族独立的旗手”而支持他；原来他們和戴高乐完全一样，也打算把拥有原子弹作为国家主权的标志和准則。

我們极其严肃地提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注意这种一致以及他們因而造成的局势。这种局势使我党和全国人民感到不安。

他們拒絕簽署莫斯科条約，并发动了反对这项条約的运动，这是同 1957 年和 1960 年共产党工人党會議上一致通过的文件完全背道而馳的，这也是同 1962 年爭取裁軍与和平的世界大会所一致通过的呼吁书背道而馳的。

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归根結蒂反映了他們对工人階級力

量和和平力量完全缺乏信心。它否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争取和平斗争的整个光荣历史，否定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历史，然而这种历史却是令人信服的。只举一个例子说吧，怎么能忘记斯德哥尔摩呼吁书对阻止美帝国主义给朝鲜、甚至给中国带来原子战争浩劫所起的作用呢？

恰恰同中国领导人所说的相反，核武器丝毫不改变战争的传统性质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由于一场热核战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整个整个的国家、甚至整个整个的大陆的毁灭，所以各国人民不能在这样一场战争已经爆发时才起来反对它。正如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所指出的那样，在原子弹和氢弹开始落下来以前，就应该行动，并束缚住帝国主义者的手臂。因此，从今天开始，就必须通过尽可能广泛的群众斗争，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可能导致缓和和国际紧张局势、减少战争危险，最终导致裁军的一切措施，哪怕是部分的措施也好。

苏联政府支持各国人民的要求，坚决反对扩散核武器。它完全正确地指出，这种扩散只能使发生世界性冲突的危险增加，并使中国本身受到最严重的威胁。它拒绝满足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给他们以原子武器的民族主义要求，这是尤其正确的，因为中国人表示过的对原子战争的想法，他们对在爆发热核战争的情况下牺牲的人数和活下来的人数的可怕计算，都引起人们对他们的责任感感到正当的不安。

（译自 1963 年 10 月 7 日法共《人道报》）

## 瓦德克·罗歇在 1963 年 10 月 6 日 法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同志們：

我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次会议上，已再次清楚地申明了法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种问题所持的立场。

使中共领导人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相对立的路线分歧，正当地引起了全体党员的不安。

十四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我们满怀喜悦地祝贺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胜利。

我党一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社会主义在世界取得进展和维护和平的决定性条件。

因此，我党坚持不懈地保卫和执行 1957 年和 1960 年共同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不幸得很，最近一个时期的事态证明，使中共领导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对立的路线分歧进一步加剧了。

事实是，在他们 6 月 14 日的信件中，在他们的声明和公开采取的立场中，他们明目张胆地坚持同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总路线根本不同的“新的总路线”。

这些分歧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为重要的问题，诸如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反对个人迷信以及同个人迷信的思想作斗争的问题，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本身等等。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赞成和平共处政策

首先,如果我们来看一看当代最急迫的问题,即战争与和平问题,那么,显而易见,中国领导人的路线肯定背离了1957年和1960年宣言和声明中所规定的路线。

1960年声明,在指出了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战争的危險仍然存在之后,清楚地肯定当代有可能防止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声明说:“能够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他们的世界战争计划的时候已经到来。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我们法国共产党人尤为热烈地拥护八十一个党会议作出的这一结论,因为,早在1949年,我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就已经说过:“不!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1960年声明,在列举了世界上能够强令实现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平共处的各种力量之后,向世界各国共产党人指明,争取和平和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是首要的目标。对避免新的热核战争而斗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的双重申明,是以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手段由于出现核武器而发生的质的变化为根据的。

战争手段的质变,即核武器空前的破坏力,迫切要求所有反对战争的力量倾全力防止战争,因为,如果等到战争已经爆发,对于许多地区来说就太晚了,它们的居民那时也许已遭毁灭了。

因此,面对着热核战争的危險,唯一可以接受的办法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因此,1960年声明指出,所有各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是,组织和领导各国人民展开反对热核战争危险的斗争,同时认为,在政治、

宗教和其他問題上的任何分歧，都不应妨碍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为争取和平与裁军而斗争，为迫使帝国主义后退、强令实现和平共处、寻求有争执的国际问题的谈判解决而斗争。

然而，中国领导人不论在他们的声明里，还是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中，正是决心对八十一个党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这些基本论点提出非议。

### 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政策

诚然，由于中国领导人难于公开表示反对争取和平共处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因为这有在各国共产党和人民面前暴露的危险，所以他们便小心翼翼地掩饰着他们对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不同意。

例如，在他们6月14日信件和其他文件中，他们一开头就说，必须为避免新的世界战争而斗争，但是他们紧接着就提出一大堆论据，企图表明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不可能阻止战争，这就引导他们处在战争不可避免的前景和在这种前景下行动。

今年9月1日中国政府代表的声明提到，毛泽东曾认为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战争可能不爆发，也可能爆发。

实际上，这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同样有效的可能性的模棱两可的理论，主要是用来掩饰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

这一点是中国领导人在他们6月14日信件中所确认了的，他们在信中说，“和平共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主要的是以不可避免的牺牲为代价消灭帝国主义”，他们系统地诬蔑苏联的和平政策，说这个政策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妨碍革命斗争”。

所有这些论点和指责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怀疑有可能避免一次新的战争，因为他们过低估计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过高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这引导他们奉行极端危险的冒险主义政策。

同时，他们的“左倾”路线导致涣散群众斗志，把他们引向消极被动，因为人们不对不可救药的坏现象进行斗争。

中国领导人也对争取裁军斗争的口号提出异议，说什么这是“不能实现的”，纯粹是“幻想”。

但是，今天，争取裁军的斗争同阻止战争的可能性是密切联系着的。

诚然，帝国主义者不赞成裁军，但是，问题恰恰是要动员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以便迫使他们后退，强令接受人民的意志。

裁军的口号符合各国人民的深切愿望。它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争取普遍裁军以及争取缩减军备的部分措施的斗争，是一项能够卓有成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目标。

1922年，列宁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热亚那会议上提出苏联的第一批普遍或部分裁军建议的。

但是，正是而且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破坏力表示的轻视，表现出了他们政策的冒险性。

他们在9月1日的声明中，指责苏共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看法”的论点，并且他们再一次说原子弹是“纸老虎”。

但是，这样来推理，这是丝毫不考虑现实情况。例如说，这是忘记了，仅仅一颗巨大威力的热核炸弹的爆炸，就超过了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过去一切战争中使用的所有战斗手段的爆炸力。

苏共答复中共的公开信提醒说，这样的炸弹，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千个。

中国领导人在他们 1960 年出版的叫做《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在解释了如果发生原子战争帝国主义将毁灭之后写道：

**“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各国人民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我们这些属于一个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诞生的党的共产党人，不能了解一个大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竟然这样轻率地考虑一场可能导致数亿人死亡和毁灭整个整个国家的核灾难的可能性。

## **关于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冲突**

这种冒险主义路线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特别因为中国领导人不仅提出错误的“理论”和“论点”，而且事实上还利用这些理论和论点来企图证明导致国际紧张局势恶化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们的这种态度，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在中印冲突问题上，以及最近在签订了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大家知道，在 1962 年 10 月加勒比海危机时，人类从未像那样接近热核战争。

但是，由于苏联强大的力量和勇敢的态度，由于光荣的古巴人民及其政府的英勇，热核战争得以避免，古巴革命的独立得以维护。

可是，尽管全世界人民当时对苏联拯救了和平表示由衷的感谢，中国领导人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态度。

在达成使危机得以解决的协议时，他们就从事猛烈的批评宣传，但不是反对发动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是反对苏联，指责苏联投降。

关于这一点，古巴政府首脑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在莫斯科的演说里说道：

“帝国主义干涉古巴的计划失败了。苏联3月间强有力的适时的警告，使军国主义分子发热的头脑冷了下来。苏维埃国家在伟大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期间，为了保卫自身的生存权利和开发它巨大的财富，牺牲了比古巴全国人口还要多的人，但这个国家不惜冒可怕的战争危险保卫我们小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类似这样支援的先例。这就是常说的国际主义。”

但是，尽管古巴革命主要领导人对于苏联的政策作了这种十分积极的评价，中共的代表们却仍然诬蔑苏联和赫鲁晓夫同志，指责他们从“冒险主义”滑到“投降主义”，似乎他们对苏联成功地防止了一场世界大战而感到遗憾。

关于中印边界冲突，我们的莫里斯·多列士同志在1960年八十一一个党的会议上曾表示，我们不理解中国为什么在制造边界问题时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它要就这个问题进行武装冲突。

此后，事实证明，中国在中印边界进行这种武装冲突并没有赢得任何东西，中国领导人反而严重损害了亚洲的反帝阵线的团结。

由于他们的这种政策，他们就同时帮助了印度反动势力进行活动，使得帝国主义势力加强了它们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并给印度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造成了最为困难的局面。这个政策打击了国际局势的缓和。

通过谈判道路解决中印冲突，完全符合这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 伙同戴高乐反对莫斯科条約和 贊成核子軍备竞赛

关于莫斯科条約，大家都知道中国領導人的立場了。

在大国中間，只有北京政府和戴高乐政府拒絕簽署条約。

中国領導人为了证明他們公然反对这一条約——这一条約已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和平希望——是正确的，便提出了一些令人惊愕的說法。

例如，他們毫无顾虑地說，苏联政府同美国和英国簽訂了这个条約，这就背叛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为了支持这种誣蔑，他們主要說，这个条約只是一个騙局，因为它只限于停止核試驗，而不包括禁止和完全銷毀核武器。

无疑，要求“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是容易的，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政策能够促进裁軍問題的解决。

因此，使用一些什么也不能证明的形容詞有什么用呢？整个問題在于要知道，禁止核試驗条約是否有利于和平向前迈进一步。

然而，虽然这个条約沒有取消为爭取解决其他許多国际問題而斗争的必要性，可是无可否认，禁止核試驗为在裁軍道路上取得进展創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受到一百多个国家贊同的这项条約，是和平共处政策的重大胜利。

一方面，这个条約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內部的矛盾，有助于减少极端分子和最富于战争冒险性分子的影响。

另一方面，尤其是这个条約进一步推动了各国人民爭取和平和裁軍的斗争。

中国領導人使用了同戴高乐一样的論据，譴責苏联想巩固三

个核大国的原子垄断。

但是，他們清楚地知道，这种譴責是沒有根据的，因为，他們不是不知道，只要存在着核武器，那末苏联的核力量就是为整个社会主义陣营服务的，此外，苏联是第一个建議禁止和銷毀世界上所有原子武器的国家，这个建議仍然是为了各国人民和和平的利益尙待实现的主要目标。

事实上，在攻击苏联所謂核“垄断”政策的掩护下，中国领导人表明他們要拥有自己的炸弹的愿望已使他們表示贊成在世界上扩散核武器，这对各国人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民来說，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因为，假如苏联，例如說，向人民中国提供原子弹，那么美国显然也会很快給予西德、日本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种种核軍备。

这将加速核軍备竞赛，其結果也会大大地加重热核战争对各国人民的威胁。

因此，很明显，中国领导人拒絕签署莫斯科条約，他們就采取了一种同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相违背的立場，这种立場为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结和一切反帝力量的团结带来了严重的損害。

因此，由于他們反对这个条約，他們便終于同像戴高乐之流的帝国主义“极端分子”和冷战支持者为伍。

## **和平共处促进了爭取社会主义 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

中国领导人专断地把爭取国与国之間和平共处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对立起来。

他們說，主要的是作出必要的牺牲从速結束帝国主义！

誠然，我們也希望結束資本主义，但是，我們正是要通过工人

階級及其同盟軍的鬥爭實現社會主義，而不是把社會主義建立在一場熱核戰爭的廢墟上！

中國領導人拒絕考慮當代的決定着革命運動道路的特點，竟然支持那些公開屬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和“革命輸出”論點的立場！

但是，共產黨人從來沒有認為戰爭是進行革命的手段，對我們來說，以熱核戰爭的代價換取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一條絕對不能接受的道路。

首先，因為我們關心的第一件事情是阻止發動一場熱核戰爭，从而使整國整國的人民免于死亡。

但是，我們之所以贊成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的政策，那也是因為這個政策還是幫助國際革命運動實現其主要階級目標——即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最好的手段。

不應該像中國領導人那樣忘記列寧的這一論點：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是通過經濟建設對世界革命施加主要影響的。

事實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勞動人民正特別傾向於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因為社會主義取得了成就，確立了它作為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優越性。

在今天的世界上，社會主義不僅僅是通過一些書籍而深入人心的，而是首先通過它的行動，通過它的生動的示範作用，就是說，通過生活和勞動條件的不斷改善，通過科學和技術中日新月異的勝利，通過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文化和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

然而，正是在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的條件下，而不是通過一場新的戰爭，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和證明它比資本主義優越。

因此，在我們時代里，如果不展開阻止熱核戰爭的積極鬥爭，不團結人民群眾進行爭取和平、民族獨立和民主的鬥爭，要在資本

主义国家里使社会主义思想取得进展和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歪曲和平共处政策以便更好地反对它的同时，企图使舆论相信，这个政策阻碍着阶级斗争。

但是，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何况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己在1956年举行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宣布的，这次代表大会明确地表示赞成和平共处政策。

然而，人们很不了解他们立场的改变，这特别是因为一切经验都证明，在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过去和现在都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反过来，众所周知，局势紧张和战争危险加剧的时期，则被帝国主义国家的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反动分子利用来煽起战争的狂热、进攻民主自由、打击工人和民主运动。

例如在法国，大垄断资本家利用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民主义战争和1958年5月阿尔及尔的法西斯暴动所造成的局势，取消了民主制度，建立了戴高乐的个人专权制度，这就是说严重地打击了民主力量。

相反，自从戴高乐被迫进行和谈和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我们在法国就看见了工人和民主运动有了新的飞跃发展。

中国领导人谴责那些为争取和平共处而斗争的共产党放弃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

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这样说是对这些党的诬蔑，因为他们不是不知道，和平共处只涉及国与国之间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既不涉及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争，也不涉及资本

主义国家內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关系。

此外，中国领导人也知道，民族解放运动在过去和現在都得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也得到各国共产党的支持。

至于法国共产党，它积极支持了这些国家人民的一切解放斗争，特别是在摩洛哥、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候。

和平共处政策不但远沒有削弱阶级斗争，反而紧密地結合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所說的一段話如下：

“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現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因此，贊同苏共二十大的正确和大胆的論点以及坚持 1957 年共同宣言和 1960 年共同声明立場的法国共产党认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斗争，是在争取和平共处和防止热核战争的总斗争范围内进行的。

## 不要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社会主义力量

但是，革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問題，同样是分歧的中心。

1960 年声明在強調指出我們时代的主要内容是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后指出：

“我們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同一声明中，还提到了一切参加和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胜



利斗争的种种力量，声明說：

“正在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所有这些当代的伟大力量，正在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和摧毁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洪流。站在现代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然而，中国领导人完全不同意在八十一个党的会议上所作的这种分析和这些結論。

他們在他們6月14日的信件中，用一种新的理論代替了这种分析，根据这种理論，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不是象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

实际上，他們在6月14日复信的第五点中，首先列举了当代世界的各种矛盾，并把所有这些矛盾放在同等地位。

其次，他們在第八点中进一步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因此，当代的基本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

因此，在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阶级，而是民族解放运动。

看来，中国领导人在提到这个反列宁主义的“新理論”时，企图使輿論相信，他們的立場可能比那些忠实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共产党所支持的立場，更加有利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

然而，这是绝对錯誤的。

我們共产党和所有忠实于1960年声明的共产党都认为，亚

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以及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民族解放运动是一支有助于破坏和摧毁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

但是，并不是通过否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决定性作用，設法使这些人民离开和脱离国际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才能支持他們进行的解放斗争。

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因为毕竟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之所以能够势不可挡地、胜利地开展，这首先是因为这些人民在他們的反帝斗争中能够依靠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依靠苏联的有力支持。

然而，人們不能忘記，正是首先苏联人民在保证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接着在粉碎德、日帝国主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飞跃发展（包括中国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創造了条件。

因此，值此中国领导人竭力煽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对苏联的不信任、从而分裂一切反帝力量的革命统一战线时，他們是采取了一种坏的行动，违背了这些人民本身的利益。

正如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指出的，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牢固联盟和合作，是解放运动爭取它的新胜利和伟大前途的主要条件之一。

###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的作用**

但是，虽然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路线只能严重地損害民族解放运动，可是，它同时也会对諸如法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如果这些国家的共产党

不断然拒絕这条新路綫的話。

实际上，根据这条否认国际工人阶级起决定性作用的路綫，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沒有任何革命的前景。

然而，中国领导人想要給工人阶级指定担任的这个“配角”，只会引导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陷入被动和孤立之中，归根到底，这只能使帝国主义在大工业国家中得到巩固，使得它們有可能以各种形式随意奴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

实际上，当中国领导人提出这种观点时，他們是完全不了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据以采取行动的具体斗争条件。

他們沒有考虑到这些国家的阶级矛盾的深化和阶级斗争的发展。

他們似乎不了解，最近这一段时期的特点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德、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罢工运动的重新高涨。仅就法国來說，据估計，在1963年头三个月就有八百万个罢工日，而且，在这样一些国家中，争取和平和保卫民主的行动也扩大了。

中国领导人确实倾向于蔑視这种行动，因为他們专断地把争取权利要求、争取和平、争取民主措施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对立起来。

然而，在这方面人們怎么能不看到他們正在背离1960年声明呢？这个声明指出：

“共产党人进行忘我的斗争，争取在当前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保卫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改善他們的生活条件，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不把这些事情拖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锻炼群众，为推翻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决战創造着条件。”

我們共产党完全同意1960年的声明，并认为在法国，工人阶

級首先是在爭取結束壟斷組織政權、爭取一個真正的和平政策、爭取日益深刻的徹底的經濟和民主改革的鬥爭中，才能實現它的團結，并把一切反壟斷階層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從而孤立大資產階級，為使人民了解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及其必要性創造條件。

我們黨正是處於這種前景中和在此前景中行動，同時認為，爭取發展民主的鬥爭是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 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以及 共產黨人和社会黨人之間的團結

中國領導人也反對承認在不同的國家中有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對此，人們知道，1960年聲明說，用和平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是符合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利益、符合民族的利益的。

聲明接着指出，在一系列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以工人階級先鋒隊為領導的工人階級，把大多數人民組成一個工人和人民戰綫，或採取各黨派和社會組織之間達成其他形式的協議和政治合作，就有可能不訴諸內戰而取得政權和保證主要的生產手段轉入人民手中。

同時，聲明說，選擇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道路不僅僅取決於工人階級，而且也取決於大資產階級可能抵抗的程度；如果它使用暴力反對人民，那麼工人階級將被迫通過非和平的手段保證過渡到社會主義。

但是，中國領導人在他們6月14日的復信中非議這些論點，否認我們時代中存在着使用和平鬥爭的方式確保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

為了支持他們的觀點，他們重新使用了他們在1960年莫斯科

會議上的討論中已經提出過的論據——莫里斯·多列士同志代表法國代表團當時已經駁斥了的論據。

首先，他們說，和平過渡的方式是沒有前例的，但是，他們沒有看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真諦正是在考慮到新的條件的情況下，預見到行動和指導行動。

他們追述說，列寧認為和平途徑是一個“罕見”的可能性，但是他們漏掉了說，列寧同時還認為這種可能性是“極寶貴的”，以便人們嘗試利用這種可能性。

事實上，中國領導人拒絕看到的東西，就是我們的世界不再是列寧所看到的那個世界了。

當時，資本主義在世界上為所欲為。它到處都有扼殺處在萌芽狀態的革命的干涉力量和手段。因此，一般說來，那時革命只能通過暴力手段才能取得勝利。

但是，從那時以來，世界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於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日益增長的作用和群眾中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发展，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形式可能而且應該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條件而有所變化，和平過渡的可能性也將愈來愈表現出來。

中國領導人還以為，重申統治階級是不會甘願放棄政權的，就能否認和平過渡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在維護在一定條件下能夠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時候，絲毫也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的論點，根據這種論點，資產階級是永遠也不會甘願放棄政權的。

正如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在上次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所闡述的那樣，恰恰相反，我們認為：

**“當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的力量占優勢，以至於大資產階級不再能夠訴諸內戰的時候，社會主義革命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就出現了。”**

显然，在这个問題上，这些人或那些人采取的立場必将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重大的实际后果。

事实上，根据人們对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向往和相信，或根据人們相反地认为这些可能性是一种幻想和不存在的，人們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則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我們法国共产党人則是决心要充分利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我們相信，对我們国家來說，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們深信，这完全符合我国人民和民族本身的願望。

但是，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发展要求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軍具有很大的优势力量的同时，我們完全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結論：为了走向社会主义，必須爭取千百万劳动人民支持社会主义事业，必須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結成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关心民主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社会阶层之間的战斗联盟。

因此，我們党不放松任何努力，以实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間的統一行动，爭取实现一切民主和反垄断力量的联盟。

正是为了帮助实现这种統一行动和所有民主力量的联合，我們才向其他民主党派建議制訂一个共同綱領，这个綱領包括取消个人专权以及旨在限制垄断組織的力量和建立新民主的深刻的經濟、民主改革。

也正是为了促进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間的团结，我們党在它的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样的論点：我們党同其他民主党派的合作，首先是同社会党的合作，不仅現在是必要的，而且在将来爭取共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也是必要的。

## 一条使党脱离群众和导致失败的宗派主义路线

但是，中国领导人在坚持武装斗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唯一有效的的方法的同时，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他们在6月14日复信的第十点和第十一点中，在提到两种可能性的形式之后明确地断言，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自己的思想、方针和整个工作，建立在可以阻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内战这一想法之上。

换句话说，党应该把它的思想、行动和它的一切方针建立在准备武装斗争的基础上。

但是，这样一条路线实际上是禁止共产党、社会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之间的任何联盟。

而且应该认为，中国领导人是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因为在他们6月14日的复信中，他们干脆排除了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达成协议和进行政治合作的任何可能性。

这就是读了中国共产党复信第十点所得出的明确印象。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他们的建议是一条违反1960年共同声明的宗派主义路线。

实际上，在这个声明中，人们诚然提到共产党人应该批判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立场和机会主义的实践，但是，人们坚持有必要实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统一战线。在主张恢复工会运动的团结之后，人们着重指出：

**“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迫切要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全国和国际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

“在爭取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維護和发展他們的民主权利、爭取民族独立和各国人民之間的和平的斗争中，以及在夺取政权和建設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都主张同社会党合作。”

我們党闡述它的团結和联合各民主力量的政策，是同这些論点完全一致的。

然而很清楚的是，如果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采取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宗派主义路綫，那么，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間的任何共同行动，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之間的任何联盟，哪怕是临时的和有限的联盟，从此都会成为不可能。

这样一种政策最終会使我們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把党变成一个毫无影响的宗派小集团，妨碍它起工人阶级先鋒队的作用，并将使它走上失敗的道路。

总之，从革命的角度来看，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由于放弃实现这一革命的手段而被推迟和成为不可能。

实际上，在中国领导人“革命的”和左傾的詞藻后面，主要是他們对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它們的革命才能缺乏信心，对迫使帝国主义者接受和平共处和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可能性缺乏信心。由此便产生了他們的宗派主义、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路綫。

## 关于个人迷信

中国共产党同所有其他各国共产党的严重分歧，还表现在反对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問題上。

中国领导人决定使自己成为个人迷信的維護者和传播者。

事实上，他們在6月14日的复信中写道：

“提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領袖同群众对立起



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但是，假如借口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問題会使領袖同群众对立而不該提出这个問題，那么，这等于說，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实行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應該被各国共产党所奉行。事实上，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所得出的錯誤結論。

显然，說那些揭露个人迷信的人使群众同領袖对立，这是不真实的。

恰恰相反，是个人迷信使領袖同群众对立，因为它否认群众的創造性活动。

馬克思和列宁看到了人民是历史的唯一創造者，同时又不否认工人階級领导人的重要作用；他們特別強調指出工人階級政党的领导和組織作用。

他們认为，领导人的活动和权威，是与群众的活动不可分的，他們的作用和責任，是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扩大的。

但是同时，他們坚决反对把这个或那个个人加以神化，因为这样只会把人民和党貶到次要方面，同时也縮小了党和人民的作用和重要性。

應該強調指出，中国领导人曾經同意二十大关于譴責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決議。1956年12月《人民日报》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写道：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个人迷信、揭露斯大林錯誤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錯誤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糾正錯誤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滿的成功。”

在中共也签署的1960年的共同声明中，首先把消除个人迷信

的有害后果看作是一种极为积极的因素，它要求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推动共产党员的活动，遵守符合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党内民主的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今天要反对他们昨天已经同意的决议呢？

十分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同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们党的立场是很清楚的。

我们曾经毫无保留地赞同二十大谴责个人迷信和赞成消除其有害后果。

我们说过，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作出的这个决定，不仅是对苏联人民的命运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这一点今天看来是更为清楚了。

无可否认的是，在过去十年中，消除个人迷信以及在党和国家生活中恢复列宁主义原则，已使苏联不论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民福利事业的生长、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对外政策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同时，消除个人迷信也大大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它使共产主义得以呈现其本来的面目，即完全为人服务的高级社会。

对此，苏共在公开信里着重指出它为反对个人迷信而斗争以便加速苏联社会的发展之后，又向国际工人运动说：

“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纯洁伟大的列宁留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清除玷污了这种理想的滥用个人权力和专横的行为。我们党这样做是为了永不重演那些伴随个人迷信而产生的悲剧性事件，是为了使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们从我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是的，无可置疑，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这样做，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了无可估量的好事，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解和反对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的斗争。

## 无产阶级暂时的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同中国领导人为个人迷信及其方法辩解的企图相关的，就是他们也维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列宁主义的宗派主义观点。

例如，他们认为，苏共二十二大纲领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变成“全民的国家”这一论点是错误的。

为了支持他们的论断，他们坚持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们说，在苏联还有盗窃分子、懒汉和流氓。

实际上，照中国领导人的推理，好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由工人阶级刚刚掌握了政权时的情况，同在四十五年后已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不错，无产阶级暂时专政——对全体劳动人民有最充分的民主——确实应当保卫反对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工农政权，这就需要某种暂时性的强制措施。

但是——中国领导人正是忘记了这点——这种专政的主要目标也尤其在建设不再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于教育群众，使之越来越广泛地参加对公共事务的领导。

这一来，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的话，那么，有朝一日，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社会上只存在朋友阶级了，这时曾决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条件便消失了，国家就变成了“全民的国家”。

这正是苏联发生的情况，那里的社会只有朋友阶级了：工人、

农民、知識分子。

因为，中国领导人所說的盜窃分子、流氓和寄生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因此同他們进行斗争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当然，即使在共产主义建設时期，工人阶级仍然繼續起它的领导作用，因为它是最进步、最有組織的阶级，也因为它最能代表共产主义理想。

但是，它是在同人民各阶层越来越紧密团結的情况下发挥其作用的。全体劳动者享有平等权利，不需要实行阶级强制。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维护个人迷信和反对二十二大通过的共产主义建設綱領表明，他們既反对在社会主义建設条件下，也反对在共产主义建設中发揚民主。

他們认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之后，阶级斗争仍然会繼續一个很长的时期，这种理論事实上同斯大林 1937 年提出的錯誤論点吻合，这种論点认为，社会主义力量越是强大，阶级斗争就越是剧烈，这种論点促成和助长了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和采取无道理的和不能容許的镇压行动。

中国领导人忘記了列宁說的：“在我們的理想中沒有对人施加暴力的余地”，他們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同由旧遗产产生的无产阶级暂时专政的必要性混淆了。

他們忘記了，共产党人的目标乃是爭取所有人的幸福，使人的全部才能得到施展，使每个人在一个和諧和友善的社会上有最大的自由。他們这样做好象是要使共产主义具有它的敌人所宣传的那种滑稽形象似的。

### 一种应该予以譴責的分裂破坏活动

最后，我們面临着两条根本分歧的路綫：一条是 1957 年宣言

和 1960 年声明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宗派主义、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路綫。

中国领导人在当代一切主要思想和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主张同他們的分裂破坏活动和他們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企图直接联系着。

他們在 6 月 14 日的复信中說：“中国共产党为維護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而斗争”。

不幸，他們的行动否定了自己的言語。譬如，我們知道，近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意地减少了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济合作。

中国领导人在对苏共及其他共产党的攻击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談南斯拉夫問題。

在 1960 年声明中，我們同意了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中包含的一些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

但是，我們认为，中国领导人硬說南斯拉夫恢复了資本主义，这个国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全然不顾事实。

尽管在某些問題上可能存有分歧，但我們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采取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接近的措施，感到高兴。

中国领导人的做法好象是他們想把南斯拉夫孤立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并把它推向帝国主义陣营。

我們党則相反认为，为了世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必須促使它同社会主义大家庭接近。

中国领导人在国际民主組織中繼續进行分化和分裂勾当，粗暴地违反决定兄弟党之間关系的最起碼的准則，嘲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以此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

他們干涉其他党的內部生活，污辱它們的领导人，通过在各國大量散发他們的錯誤論点进行真正的破坏工作。为此，他們靠最

卑鄙的叛徒和各种机会主义者帮忙，他們还得到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

此外，他們在宣传中还得到了帝国主义者和最卑鄙的反动派的帮助。

譬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和在阿登納的德国，散发了大量的中国文件，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人士却受到搜捕。

显然，中国领导人的行为是有意地违反 1960 年會議的決議，決議提出“不允許能够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任何行动”。

中国领导人为了达到伪装的目的，說什么他們同意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綱領的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

然而事实上，他們却非难这些文件的各个基本論点，反对他們通过签署两项莫斯科联合声明时所贊同的二十大的整个方針。

### **毫不猶豫地为爭取正确路綫而斗争**

面对中国领导人加剧他們同几乎所有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分歧的情况，人們可能要問，他們究竟是追求什么样的特殊目的呢，因为这种分裂活动同世界革命运动的整个利益显然是背道而馳的。

無論如何，显而易見的是，他們要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的願望，他們对加勒比海危机采取的立場，他們在中印冲突中的态度，他們反对莫斯科禁止核試驗条約，他們削減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联系的政策，以及他們煽动民族主义偏見和种族不和的明显傾向，这一切表明，中国领导人鼓励在中国共产党內民族沙文主义傾向和冒险精神的发展。

这些傾向与托洛茨基主义符合一致，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是絕不相容的。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使用“左”的“革命”詞藻只是为掩盖終归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錯誤政策。

这說明为什么戴高乐在阿維尼翁的演說中公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加剧表示庆幸。

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路綫同中国领导人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路綫之間，不可能不表示态度，不可能持一种和解的立場。中国领导人的錯誤論点和他們的分裂活动应当受到毫不犹豫的譴責和斗争。

这也是我們党的全体黨員的意見，因为近一个时期举行过會議的各省委会和省委执行局都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清楚明确的立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反对帝国主义、維護和平的斗争的最有效最必要的武器，它也是民主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保证。

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克服中国共产党同几乎所有其他党之間的严重分歧，是人們衷心希望的。

因此，今年年初，我們党曾贊同苏联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公开論战以便筹备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的建議。

我們遺憾的是，在苏共代表同中共代表最后一次会談之后，中共代表拒絕了苏共同志提出的这一建議，并进一步加深他們的分歧和进一步进行无理攻击。

### 爭取召开各国共产党會議

在这样一种情况面前，我們认为，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以便重申——考虑到已发生的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和作出可以确保維護运动团

結的一切決定。

正如多列士最近在山勒諾布勒所說的：

“我們殷切地希望中國同志馬上回頭，重新為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的共同努力和為我們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共同鬥爭作出自己的貢獻。”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中國領導人放棄把同 1960 年聲明相違背的一種新的總方針強加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企圖。

世界局勢的發展、和平力量的成就和我們自己的鬥爭經驗都再一次證明，1960 年聲明的分析和結論是正確的。

從那時我們黨就認為，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要求根據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聲明的精神，在兩條戰線上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反對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任何錯誤傾向——即右傾修正主義或成為國際範圍內主要危險的左傾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

因此，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堅持它過去的立場，它將堅決地堅持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聲明确定的總路線，並且繼續堅決地站在光榮的蘇聯共產黨和所有為爭取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基礎上的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而鬥爭的兄弟共產黨一邊。

我們黨將不遺余力地致力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這種團結是爭取社會進步、爭取和平、爭取民主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贏得勝利的保證。

（譯自 1963 年 10 月 8 日法共《人道報》）



##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10 月 6 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形势的决议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 10 月 5 日和 6 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党的总书记瓦德克·罗歇同志所作的报告。

中央委员会跟它 1963 年 5 月 10 日决议中所作的那样，重申我党在维护和始终不渝地执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1957 年和 1960 年国际会议上所通过的路线方面完全的一致。法共各支部、区委会和省委会通过的无数决议，证实了这种一致。

同时，中央委员会对于几乎所有兄弟党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而感到高兴。

自中央委员会上次会议以来，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实践证明，他们已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进行公开的斗争。

中央委员会拒绝中国领导人在他们二十五点复信和其他文件中提出的所谓新总路线。这些文件以及中共领导人所进行的活动证明，虽然他们签了字，但他们并没有真诚地接受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下述问题的共同基本论点：我们时代的性质，今天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和平共处，在一定条件下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景，同社会党人团结的必要性和奉行结成广泛反垄断资本联盟的政策，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在两条战线上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等。

中国领导人反对为大家的经验所完全验证过的这条路线，硬

要独自制訂一条根本不同的路綫。这条路綫既是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执政党制訂的，也是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新独立的国家和被压迫国家进行斗争的党制訂的。

他們有計劃地干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党内生活，并組織分裂活动。

法共中央委员会譴責这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对中国人民自己有害的分裂活动。

## (一)

不同社会制度之間和平共处，是面临热核战争危險的情况下唯一可以接受的出路。

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为禁止原子試驗进行談判的时候，它們是忠于八十一个党声明的这一根本論点的。

已經由一百多个国家签字的莫斯科条約的締結，是和平事业的伟大胜利，它证明可以强令帝国主义者接受和平共处。

莫斯科条約是走向以緩和国际局势的政策取代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的重要的一步。它为所有和平力量在爭取有监督的普遍全面裁軍方面取得进展和团结行动，开辟了新的前景。目前，它有助于寻求对下列問題的解决办法：停止地下試驗，禁止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进入空間，建立无原子区，禁止和銷毀核武器，締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国和华沙条約成員国之間的互不侵犯条約，談判解决有爭执的各种問題，特别是有关德国的問題。

戴高乐拒絕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条約上签字。他奉行着冷战、原子軍备和同西德軍国主义分子結成联盟的政策。这种政策使法国陷于孤立，使民族遭殃，并絲毫沒有保障法国的安全。

面对着垄断資本政权的这种好战方針，法国人民强有力地表

示一致反对；裁軍大会和和平理事会各种倡議取得了胜利，成立了有許多党派、运动和組織——包括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內——参加的反对打击力量和爭取普遍裁軍的临时委员会。

法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领导人采取同戴高乐和法国大資本家、美国和西德最好战集团实际上一致的立場感到遺憾。

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反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代表之間进行談判，鼓吹奉行列宁早已指出其左傾和不負責任性质的“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政策。他們对维护了古巴独立和領土完整、同时也维护了世界和平的正确妥协所持的态度，以及他們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場，都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他們以自己要拥有原子軍备来代替对于世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高涨那末有利的爭取裁軍与和平共处的令人振奋的斗争。这样，他們就鼓励了只对战争販子們有利的大規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他們輕率地考虑可能导致数亿人死亡和毁灭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的热核战争的前景。他們认为，人們可以在这种废墟上建設“真正美好的将来”。

法国共产党人拒絕以战争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托洛茨基理論。他們打算通过我国工人階級和人民的斗争来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們的理想就是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幸福、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財富。劳动人民要胜利，又要活着。

中国的立場完全是悲观主义的和涣散斗志的，它表明了对国际工人階級的力量缺乏信心。

在同資本主义旧世界的經濟竞赛方面，共产党人相信工人階級和人民力量能够实现他們的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的本性沒有改变，但是，今天，由于世界上現存的新的力量对比，它已大大削弱了。它的发展規律已不再决定历史的演变。同

时，人們不会忘記，它还拥有大規模毁灭性武器，它仍然能使各国人民蒙受巨大的不幸。如果不动員群众，不进行空前的意識形态斗争，就不可能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和平共处。

法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一直說，爭取和平的斗争是决定性的問題，他們认为，事实完全证实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針的正确性。

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利用它們的力量来通过世界热核战争建立社会主义，而是利用它們的力量来强令实现和平。共产党人同所有和平的拥护者共同斗争，以便使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的而不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分子那一边的大多数人行动起来，以制止新战争的爆发，并在实现裁軍和和平共处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 (二)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中共领导人硬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焦点”。因此，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不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

中共领导人把民族解放运动說成是反帝斗争的决定力量，这实际上是否认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更高级的新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的創造者，作为现代社会中一切反资本主义力量的鼓舞者和天然领导者在历史上和世界上的作用。

工人阶级已成为当代主要的政治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和巩固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成果。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所有劳动者的斗争条件。

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力量，它的影响和它的作用的增长，也是由于工人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加之故。工人阶级现在已经存在着，

它在各大洲的几乎所有国家中进行着斗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加成熟了，它的组织有了发展。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增强表现在权利要求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巨大规模上。工人阶级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起着日益重大的影响。在法国，工人阶级越来越坚决地反对垄断组织的政策。它在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卫自己的权利要求、争取自由和争取真正的民主而行动。它正在扩大和发展自己的争取和平和裁军的行动。它制订和执行着符合民族利益的政策。

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助于带动人民群众的其他非垄断阶层。在它的推动下，反对戴高乐政策及其政权的反对派加强和扩大了。由于它完全忘我的斗争，这就有助于在法国创立一种对胜利地实现它的眼前的和长远的目标充满希望的新的政治局面。

中共领导人低估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性和世界性作用，这不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来说，还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来说，都只能产生不幸的后果。

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进程中一支巨大力量。自殖民体系崩溃以来，帝国主义大大削弱了。辽阔的土地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已不再是它的禁脔。年青的民族国家是世界和平地区的重要的一环。所有这些，都不应同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劳动群众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分隔开来。实际上，近几年的事实证明，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巩固联盟和兄弟般合作，过去和现在都是共同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粉碎法西斯主义起的决定性作用，加速了帝国主义土崩瓦解的过程，促进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许多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

今天，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是所有尚未打碎世界奴役鎖鏈的人民，以及解放了的爭取巩固本国主权、确保經濟独立、实现民族复兴的的人民的主要支点。

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民主运动对垄断資本的打击，正在削弱帝国主义，并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同样，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支持了工人和民主力量的总的斗争。

至于法共，它的活动一贯建立在这种思想之上，即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劳动者同正在为爭取独立而斗争的人民之間，存在着客观的联盟。它一贯积极支持这些人民的解放斗争，特别是在摩洛哥、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候。

中国领导人否认国际工人阶级的这种决定性作用，目的在于使人们看不到今后为被压迫人民开辟的多种多样的道路。这种新的可能性的出现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决定性的存在和作用，帝国主义的削弱以及被压迫人民得到宗主国工人阶级和人民越来越大的声援。生活本身表明，虽然越南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为夺取独立不得不进行一场英勇的战争，但是，黑非洲的其他人民不用武器也取得了独立。

全体劳动者的国际团结和共同战线，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的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和决定性的条件。

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脱离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象中国领导人所作的那样，就是竭力分裂各国劳动者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破坏诸如我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殖民地国家和新近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党在长期的、共同的反帝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友好团结关系。

中国领导人口头上承认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他们的态度却否定了这种说法。

为了证明他们的正确，他们提出了“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公式。诚然，在每个国家中建设新社会的工作，首先是该国人民、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的事情。中国领导人仅仅强调这一方面，赋予这个论点以一种旨在削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必要的友好合作联系的内容。

这种态度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态度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以至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 (三)

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指出，在我们时代，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中，保证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

但中国领导人否认这种可能性。他们蔑视事实，说什么象我们这样的依据以工人阶级可能和平取得政权论点的共产党，要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

中国领导人在实际中反对利用和平斗争形式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这就违背了现实。他们否认工人运动日益增长的力量和组织性，否认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否认社会主义体系对世界革命进程的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提出这样一种“论据”：“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真谛及其力量，恰恰在于它能依据对人们正在采取行动的历史时代的主要特点的深刻分析，来预见到这种行动，并指导这一行动。只限于重复半个世纪以前当帝国主义还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时所提出的一些定义，这不仅是无视现代世界的深刻变化，而且也是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领导人认为武装夺取政权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唯一

有效的方法，这样他们便阐述了已被列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駁倒了关于“不断革命”、武装少数派、“战争是促进革命的手段”、和平使帝国主义“合法化”的腐朽主张。

这种理論完全违背馬克思主义，馬克思主义一贯拒絕“外力促进”革命，革命是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剧而发展的。这种理論是危险的，因为它蓄意把革命和暴力等同起来，以图证明大资产阶级的誹謗是正确的，大资产阶级竭力使人民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是一场国内战争。这种理論是冒险主义的，因为它使党在群众中孤立，使工人阶级失去同盟军，它仅仅有利于垄断組織政权。社会变革不可能是在暗中組織一个派别的结果，不可能是对大多数人民施加暴力的阴谋的结果。它只能由那些决心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千百万人民来实现。

关于可能通过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論点，絕不是基于这种考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願意自动让位，因此也絕不是基于阶级斗争削弱的考虑。这一論点是考虑到列宁关于工人阶级必須“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生活的一切形式和一切方面”、准备好应付“一种形式使另一种形式发生的最迅速、最意外的变化”的教导。

当然，工人阶级要采取的斗争形式和方法并不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决定，而也取决于大资产阶级可能进行抵抗的程度。因此，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为所有国家制定一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的方法。然而，在我们时代，每天都在創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越来越好的条件。使人民意識到这一点，就是推进了革命。

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要求所有决心改变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动员起来，采取空前的团结行动。只有当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拥有足以制止大资产阶级訴諸暴力和内战的强大优势力量时，才会出現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法国共产党的团结和結成反垄断資本联盟的政策，其目的正是要造成



这种局面。

为了有助于实现所有民主和反垄断资本力量的这种团结行动和联合，我党向其他民主党派提出了一项共同纲领草案，它包括随着个人专权的消除而进行的旨在限制垄断资本势力和由于建立新民主而发挥群众创造性的彻底民主改革。

正是为了有助于取得通过和平道路——包括利用真正民主的议会——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我党在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了这种论点，即它同其他民主党派、首先同社会党的合作，不仅在目前是必要的，而且在将来争取共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也是必要的。

法国共产党将坚持这种方针：它的努力业已取得了重大成果。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共和人士，正在各个方面同时展开共同的和平的行动。它们现在能够也应当就一项将向人民提出的共同纲领达成协议，保证将共同充分实现这个纲领。

法国共产党正在为实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一致行动、为实现所有民族民主力量的团结而行动，它相信，它这样做正是为争取法国的独立与和平、争取不可分割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 (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维护和平和使帝国主义遭受新的失败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之上的和建立在执行共同确定的总方针之上的团结，要求遵守规范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八十一个党会议一致通过的。这些准则意味着在国际范围内谴责一切破坏或分裂活动，谴责一切组织多数派或少数派的企图。这些

准則还特別意味着，任何一个党都没有权利以任何方式干涉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和生活。

同时，決議指出，苏联共产党現在和将来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鋒队，这不仅是由于它的过去的經歷，而且也是由于它在目前的总斗争中和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設中所作出的貢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破坏了他們自願簽署的准則。他們企图通过他們的行动严重損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他們企图千方百计地把他們的方針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到了踐踏国际团結的最基本的原則的地步。

中国领导人在維護他們的錯誤观点的借口下，并不滿足于进行令人遺憾的和有害的公开辯論。他們迅速地把这种辯論变成了一种粗暴的論战。他們歪曲那些沒有服从他們命令的兄弟党的意見，硬把这些党从来沒有維護过的立場說成是它們的立場。他們甚至辱罵这些党的领导人，首先是辱罵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它的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同志。

他們进行的一些誣蔑，例如所謂“服从苏联的指揮棒”，一向是最坏的反动派的誣蔑。事实上，特别是对那些遭到鎮压的兄弟党來說，这些誣蔑是对这些党正在勇敢地对之进行斗争的敌人的帮助。

中国领导人正在鼓励、支持和組織各共产党內的反对派集团，这些集团的目的是制造分裂。他們在世界各地正在竭力散发他們攻击其他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为此，他們正在利用被共产党驅逐了的一切机会主义或左傾叛徒的反对派小集团。在法国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他們贏得了托洛茨基殘余集团的支持。在許多情况下，資產階級的警察和宣传机器协助他們散发材料。在一些散发各兄弟党的任何材料遭到严格禁止和共产党人遭受迫害的国家——如佛朗哥的西班牙和阿登納的德国——，都能合法地

和自由地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

在大的国际民主組織中，中国领导人挑起了不考虑这些組織的宗旨和綱領的辯論；他們破坏这些組織的活动，并且企图在这些組織中制造分裂。他們在反帝解放运动中經常地开展种族主义性质的中伤宣传，其目的是孤立这些运动和促使它們反对它們的天然同盟軍。

中国领导人的所有这些民族主义性质的破坏活动，都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明显对立的。应当坚决地挫败这种活动，因为它們会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导致大的国际民主組織的分裂和导致組成世界革命运动的力量之間的对立和斗争。

对共产党的作用的錯誤概念，也表现在中国领导人企图为个人迷信辯解方面。今天，他們說，提出这个問題是“錯誤的”和“有害的”，等于是把“領導同群众对立起来，丑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們濫用列宁写的关于領袖、党、階級和群众之間的关系的文章，在我們学說的奠基人清楚地研究过的一些問題上造成混乱。

对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來說，在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階級斗争和人民群众的斗争。领导人的作用只能依据階級斗争、人民群众的活动和这种斗争产生的社会需要来理解。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硬說某某人物起了万能的英雄的作用，說这个人起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作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宿命論观点，这种观点否认群众組織的政治领导人的作用，主张社会自发的發展。

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推动了群众的活动，發揮了一切共产党人的主动性和力量；这种斗争無論如何并不意味着否定或縮小政治领导人的作用。

领导人的活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一种客观必然性。

群众运动愈是广泛积极，领导人的作用和责任就愈大。领导人的威望，他們的作用，同发揚党内民主和各級集体领导是分不开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給予人民群众、党员和领导人在历史創造中以真正的地位。

对个人迷信的批判恢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色。它是对全体劳动人民的最广泛的民主，而不是一种为了报仇的政权。它完成了一项积极的和创造性的任务：建設社会主义。它仅仅是对旧的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行使强制的职能。这种职能将随着这些階級的消灭而消失，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为准备过渡到全民国家的一个必然的、然而却是暫时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譴責苏联共产党坚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暫时性质的列宁主义观点时，提出了一种被深深丑化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像。

\* \* \*

法国共产党热烈希望，使中国共产党和几乎所有的其他共产党之間的严重分歧能够被克服，希望中国同志能够重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为我們爭取和平、爭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作出贡献。

要做到这一点，必須要以中国领导人停止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党进行誣蔑攻击为前提。

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須以他們放弃以一个新的总路綫同共同制訂的总路綫对抗为前提。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平和民主力量取得的成就以及我們自己的斗争經驗充分证明了这一共同路綫是正确的。

认为只有一个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蔑視各兄弟党的意見，这是绝对不合理的。当其是关系到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头等重要問題时，这尤其是不能容許的。

只有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經驗，尊重我們的学說及其分析方法的基本原則，才有可能制訂一个方針和做出正确的和对大家都有效的結論。

法国共产党过去和現在始終在两条战綫上进行着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对已經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險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思想和实际斗争。

在中国領導人的身上，左傾和民族主义互相滋补。这对一个执政党來說，是特別危險的，使它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諸如在涉及全人类未来的战争与和平問題、民主和社会主义問題上，采取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路綫相反的立場。法国共产党在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反对一切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态度，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贊成在最适当的时候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以便在考虑到发生的变化的情況下重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并作出一切能够有助于維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決議。

法国共产党站在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原則和共同确定的政策的各国兄弟党一边，它將繼續为扩大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保證——而斗争。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年10月6日于伊符里

(譯自1963年10月9日法共《人道报》)

## 莫里斯·多列士在 1963 年 10 月 6 日 法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中央委員們一致同意了瓦德克·罗歇代表政治局作的关于同中国共产党領導人的爭論引起的問題的報告。

在既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也反对左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两条战綫上的不妥协和不懈的原則斗争中培养出来的我們党，毫不犹豫地拒絕中国領導人的錯誤立場。这种立場同时打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修正主义（正如塞夫<sup>①</sup>所指出的那样）的烙印，我还要补充一下，也打着民族主义的烙印，这始終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态的反映，始終是完全机会主义的路綫錯誤。

我們党譴責这些領導人老早就已經进行的瓦解和分裂活动。他們逾越了一切界限，公然利用一切反对派残余、一切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小集团，而某些報紙对这些人产生共鳴。

这种活动已在亚洲和美洲的一些党内造成很大的損害。而且也对所有群众性国际組織进行这种活动。

对瓦德克·罗歇的報告进行討論的內容是极其丰富的。同志們的发言很好，他們提供了許多論据。

不过，我想着重談談同中国領導人的分歧中的几点，特别是关于他們用来試圖使自己的錯誤观点取胜的那些不能容許的方法。

### 中国領導人的不能容許的方法

今年年初，他們借口雷蒙·居約 1962 年 12 月在中央委員會

<sup>①</sup> 法共候补中央委員。——譯者

作的报告、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和我当时讲过的关于他们的几句话，对我们提出了凶狠的指责，所有一切反对我们的人都大量散布了这种指责。中国领导人硬说自己受了诬蔑，可是我说过什么呢？请你们允许我重说一遍这些话：

“应当说，中国同志，阿尔巴尼亚同志实质上还没有同意苏联共产党二十大的论点。

“他们没有同意关于避免战争的可能性的论点。他们没有同意关于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可能性的论点。他们没有同意关于发展同社会党人的团结的可能性的论点。他们也没有接受对个人迷信的谴责。他们违背了最后一次国际会议的决议，逐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展开了一种破坏分裂活动。”

所有这些话都是绝对客观的，可以说是有分寸的。尤其是，这些话都是我们近三年在中央委员会的信和决议中——有些信是1960年开始寄的——，或是在我们向八十一个党会议发表的、中国人气势汹汹的作法逼迫我们公布的演说和声明中，已经向中国领导人说过的话，并没有再增添任何东西。

我在八十一个党会议上发言时，首先谈了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全世界散发的教条主义文件和他们在北京世界工会联合会大会上进行的派别性质的活动，接着代表我们代表团说：

“我们看到了中国同志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我们特别是在这里听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我们现在已能肯定，这不是限于在向会议提交的声明的两三点上的分歧，而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对立的一条整个路线的分歧。

“同时已经证实，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而是中国同志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深刻分歧。”

因此，我们中央委员会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在阿尔巴尼亚同志一再进行攻击之后，不得不也谴责那些支持他们的人，即中国领

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对此是不该感到惊异的。

但是，本质问题在于要知道，我们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并且在前此一个月在什瓦济关于教育工作<sup>①</sup>的研究日上，维护二十大的正确论点、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维护我们党的政策和反对中国领导人在法国散发小册子的作法，是否错了。由于出于团结的考虑，我们在什瓦济表示意见时，从未指名提及小册子及其作者。

中国领导人在对我们进行的诬蔑诽谤中终于承认，他们不同意二十大的论点。一方面，他们指责我们说他们不同意这些论点是诽谤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文件却说：“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他们更不同意自己签了字的1957年会议宣言。从那时以来，他们在所有的信件和声明中，在他们的对立的和冒险的路线上越走越远。

## 殖民地人民和工人阶级

早在1960年会议上，我们便抗议把殖民地人民的运动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对立起来的企图。这一次，中国领导人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反列宁主义论点：从今以后，只有殖民地人民和正在求解放的人民才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用这一观点来同关于我们时代性质的列宁主义论点相对立。在我们时代里，社会主义创造着历史——这里说社会主义，即是说工人阶级，因为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高结果。

中国领导人的论点是违反列宁这一教导的：殖民地群众的革

---

<sup>①</sup> 在什瓦济的演说已发表，题为：《只有依靠人民的不懈斗争，和平和民主才能取得胜利》。



命是无产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要是沒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会有民族解放运动的如此发展。要是沒有十月革命，就不会看見出現中国的解放，无论如何不会这么快地出現。要是沒有十月革命和苏联人民在反对希特勒和反对日本軍国主义的斗争中用鮮血换来的胜利，中国同志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取得政权。同样，在另一方面，要是沒有宗主国无产階級的支持，我們越南同志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便会艰苦得多。

要是沒有十月革命，要是沒有北京领导人目前从各方面大肆加以誣蔑的苏联共产党，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我願意追述一下毛泽东所說的話：

“假如沒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沒有苏联在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假如——而这一点对我們特別重要——沒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沒有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現，假如沒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日益强大的斗争，假如沒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等資本主义国家內部的人民大众和掌握政权的反动派之間的斗争，假如沒有这一切因素，那末，国际反动势力的压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們能够胜利嗎？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

这就是毛泽东过去說的話。这才是符合事实的話。

中国同志也忘記了，在目前社会主义在世界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的經濟成就在促进所有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同时，也是使新近从殖民枷鎖下获得解放的年輕国家得到巩固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成就使得这些国家能达到真正的独立，这种独立要求經濟独立。

現在你們看到，中国领导人是怎样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时代性质、关于为爭取改造世界而斗争的主要力量的基本論

点的。

##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严重分歧

在談了这一切之后，我現在願意回头来談談我們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严重分歧。大家都已知道中国領導人对莫斯科条約采取的不能想象的立場了。應該再說一遍，他們的態度是一种违反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文字和精神的，违反由毛泽东签署的1957年和平宣言的，这个宣言提出以下的口号：“要求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和氫武器，而其第一步是立即停止試驗这种武器。”

中国領導人的態度是违反1960年八十一個党的声明的，这个声明上也有他們的签字，声明說：“應該日益广泛地进行这种斗争，坚持不懈地爭取达到现实的结果——禁止試驗和生产核武器等。”

因此，苏联、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赫魯曉夫同志本人，一直为爭取执行共同声明中确定的各点之一而斗争。

中国領導人現在使用的論据是：沒有裁軍，沒有停止地下試驗。这就等于是所有宗派主义者所作的这样的推理：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如果我沒有得到全部，那末我就什么也不要。我們自己會同这种錯誤的思想进行过多少次斗争啊！我們也曾解释多少次，在一次罢工中，为爭取工資有一定的提高而斗争的劳动人民，即使沒有得到完全滿足，也可以使他們复工，这并不是說他們放弃了他們的全部权利要求，不再进行爭取实现这些权利要求的斗争了。

如果說中国領導人目前对莫斯科条約和一般說对战争与和平問題的态度，是同列宁主义路綫和国际會議声明相违背的，另一方面，他們这种态度也是符合让納特·維美徐剛談到的毛的講話

的精神的。1960年，在什瓦济和在八十一个党的會議上，我們提到了列宁反对希望用战争刺激革命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立場的演說。

还可以补充一下勒托卡同志所透露的他最近在中国时有人向他提出关于在法国存在游击队的問題。是的，我們应当組織游击队；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問題。难道我們能够在我們国家里这样来提出問題嗎？这是多么违背列宁的一切教导啊！大約三十年前，在我們摆脱了宗派主义集团在一个时期內对党的领导机构的影响之后，我們曾引用列宁在1918年12月17日所写的这样一段話：如果社会主义沒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那末和平只能是一种幻想。和平和面包仍然是工人和被剝削者的基本要求。

而在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变化的今天，我們是否应当不那么注意爭取和平的斗争了呢？如果我們說——同中国领导人所断言的相反——，并不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改变了，而是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我們对帝国主义的阴谋和行动是否一定会不那么保持警惕了呢？我們是否一定会不那么注意战争危险了呢——正如現在有人說的那樣，这种危险可能由某些技术錯誤而引起？

談一下人民中国和印度之間关于喜馬拉雅山若干公里的山地的冲突，可能不是多余的。我們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上坦率地对坐在我們对面的中国同志們說，我們不了解你們的战争，我們也不了解这些軍事行动。我們對他們說：印度是一个和平地区的国家。正是1957年的宣言談到了这个和平地区。印度是一个从殖民枷鎖下解放的国家。这是人民中国与之签订了万隆五項原則的国家。

讓我們順便指出中国领导人的自相矛盾的說法。一方面，他們說，前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是决定性的因素，正是在这些国家

里卷起暴风雨。但是，随后，他們便在他们们的边境上进行反对印度的斗争，他們把印度說成是比真正的帝国主义国家更富于帝国主义性的国家。这是多么矛盾啊！

印度最后解放了属于葡萄牙的領地果阿，而中国人則让安哥拉黑人正在与之斗争的葡萄牙人安安静静地在澳門，这一事实，是否可以說明上述态度呢？这是否是人民中国对安哥拉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的有效支持呢？我們知道中国人的忍耐是有悠久的声誉的，当他們沒有触动澳門时，他們也許是有他們的原因的。

他們也沒有触动香港，他們让强占者在那里安然无事。但是，为什么沒有表示忍耐、沒有仅仅通过談判来解决同印度的边境問題？为什么教訓別人？为什么对別人解釋說，必須促进事态发展、进行战争、制造冲突和只能使用暴力来解决一切問題呢？

### 关于个人迷信問題

我还想談談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問題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破坏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則、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則、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法制、专断、镇压党的領導人和党员、有时还有犯罪，总之，一切损坏共产主义面目的东西，一切只能使人們远避和唾弃的东西，更不用說那些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具有教条主义面目的东西了。

这种禍害过去不仅能在苏联感觉出来，而且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感觉出来。

我来給我們党举个例子：所謂医生事件，在这一事件中，涉及到我本人所認識的大部分医生，因为他們曾經整周整周地、夜以继日地在我病床旁度过。他們被捕、被下獄、受毆打，他們庶几免于死。他們是在我們离开莫斯科的同一天得到释放的。苏斯洛夫

同志来向我们告别时对我们说：高兴吧，医生们已经释放了；他们是无罪的，这是一个阴谋。

当时，在法国也曾对我们的共产党医生施加压力，要他们立即在一份赞成由于他们所不了解的事实而对他们的苏联同事施加武断的暴力的文件上签名。他们自己的职业良心不可能承认一个医生会谋害自己病人的生命。他们怀疑这种谴责的真实性。怎么能不认为，对我们的医生采取的这一步骤，至少部分地是引起我们的同志产生怀疑和犹豫的根源呢？这些同志中的大多数人直到当时以前对党的立场都是坚定的，但人们在这个事件中把他们引入了歧途。

如果相信中国领导人的话，本来就不应当提出这些问题，以便不致损害共产主义运动。

我要问：是否应当叫无辜的医生们坐牢，或者是否应当对他们的释放、特别是对没有道理的逮捕他们时的情况保持缄默，从而就不会为共产党人造成“混乱”呢？是否应当让那些在文件上签字的人继续陷于错误中？是否应当让这些犯罪作法继续下去，或者像苏共所做的那样，像赫鲁晓夫同志所做的那样，排去脓疮，说出关于错误、罪行和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全部后果的真象，以便首先能使这种情况不在苏联重演，也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难道不是更好些吗？

难道也不应当提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后要防止粗暴地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吗？

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论点，就是对劳动群众的最广泛的民主。这并不是对工人阶级、譬如说对参加曾称之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的苏共十七大的半数代表们施加的暴力。此外，无产阶级专政的矛头即使是完全指向旧剥削者及其代理人的，但它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所使用的必要的暴力；对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对工人

階級的某些階層來說，這主要是一種教育工作，以便提高群眾的覺悟，引導他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你們已讀過了以我黨名義在1960年會議上發表的講話。我們曾就此問題發表意見，當然還不知道二十二大將因為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完成而在經歷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就全民國家問題作出決定。接着就來了這樣的時刻：管理人的政府應讓位於管理事的政府，這是蘇聯的實踐和民主制的發揚所很好地證實了的。

這幾年來凡是到過蘇聯的人，都感覺到了這些變化。這不僅僅是一些聲明、文件和決議；在那里刮起了一陣民主的大風。的確已經實行了某種程度的自由化。我們感到人們更加開誠布公了，安祥地談話和討論了。他們在物質方面是安祥的，他們在精神和政治方面也是安祥的。

然而，中國同志說，不應該向這個方向採取行動。我並不堅持在這裡已經證明了的這一事實；也許原因在於他們那里實質上還沒有停止實行個人迷信。

但是，讓我們追述一下劉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的一番話；他說，蘇聯共產黨揭露了個人迷信及其引起的一切惡果，這是對國際工人運動、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作出了巨大貢獻。為什麼現在改變了看法？

我不再談其他一些問題，例如對群眾工作和群眾組織中的工作很不了解的問題。蘇吉埃爾剛才談過了這個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在三年多以前就開始了討論。我們開始時討論的，正是關於中國領導人在和平運動和工會運動中的態度。的確，中國領導人根本不了解在我國進行鬥爭的條件。甚至他們對於在我國困難條件下進行鬥爭的工人階級懷有某種蔑視，同時把工人階級同剝削者混為一類。

## 蔑視国际經驗

中国领导人蔑視我們这些党，他們企图指責这些党，想通过他們的压力和他們的分裂活动迫使我们这些党采取一条将把我们导致灾难的宗派路綫。事实是，中国同志在他們的二十五点复信中，企图命令所有的人接受他們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应当这样做，新近获得解放的或正在为爭取解放而斗争的国家的党应该那样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该这样做。

这同列宁的教导，同列宁主义的实践，是何等地格格不入啊！

列宁曾致力于解放一个伟大的人民，那里的工人阶级当时还居于少数，应该吸收国际工人运动所积累的全部經驗。列宁知道，馬克思主义应该运用在他的国家的条件下，运用在俄国的条件下。为此，他为了实现不妥协的原则性路綫，为反对孟什維克、托洛茨基的一切合法馬克思主义观念而斗争，但是，他并没有使馬克思主义学說俄国化：他重視在旧的沙皇俄国时发生的每桩事件，同时，他不断地去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在我們这里、在法国学习过。他试图掌握法国工人阶级的生活。

他在德国和瑞士居住过。他在德国认真而深刻地研究了德国党的經驗，在当时，德国党是第二国际最大的党。

列宁这个名字，意味着馬克思主义的运用、馬克思主义的丰富、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决不意味着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相反地，在后来他还反对第三国际組織起草的某些文件，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文件如果不說在精神上、至少是在提法上太俄国化了。

今天，也不能使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蔑視国际工人运动的經驗——我們曾在1960年會議上坦率地对中国同志說过这一点。

有些同志在奇怪，为什么和怎样会发生这种事的，这种不安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些严肃的問題，可以試图回答一下。人們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特殊結構，它主要是以农民为基础、完全以知識分子为干部的。

中国共产党人长时期地远离城市和工业中心。他們对于真正所謂无产階級斗争的經驗是相对薄弱的。

我們并不是忽視他們的伟大功績。他們进行了斗争，以巨大牺牲为代价解放了他們的国家。但是他們低估我国工人階級进行的日常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不那么壮丽的，不那么鮮明的，但是并不是不艰巨的，这是每天都在反对資本主义大国中的資產階級剝削者的斗争。

人們还可以提出另外的解释。你們大家都記得，在1960年我党中央委员会中，我們試图了解中国同志的处境。我們曾提到他們国家的地位，人們拒絕这个国家参加联合国、蒋介石还盘踞在福摩薩、美国第七舰队还在中国沿海。我們当时說，中国同志有时可能被导致采取一些不完全是人們本来期望一个伟大的共产党所采取的那种立場。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开始进行試驗的时候，我們表示了我們的怀疑。中国领导人当时說：在两三年內，我們將要超过英国，我們將生产出二千万吨鑄铁。

情况究竟怎么样呢？他們生产鑄铁的那种情况，使得大部分不能用，并且他們調用了大批农民，而且由于在目前条件下，农村的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虽然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給了他們援助，但他們的机器仍很少——，因此田里就缺少农民。自那以后，人民也就缺少收获。

后来，对人民公社談了些什么呢？他們想立刻过渡到共产主义。請想一想苏联的經驗。在苏联，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設。



而中国同志似乎觉得已經过渡到共产主义了。然而，物质条件还没有保证，这只能算是貧困的共产主义。

这样，他們在經濟方面就遭到了新的困难，遭到了更大的穷困。在这种情况下，他們不是像列宁做的那样，像布尔什維克人教我們做的那样去做，不是承认說，我們錯了，应当改变方法，应当对人民說犯了一个錯誤，他們不是这样做，而是仍然頑固得像铁一样繼續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好得不得了。

不过，追問为什么和怎样会这样，并不是主要的問題。而主要的是，中共領導展开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斗争，它在任何事情面前，甚至在为了达到它的目的而从事分裂活动方面，毫不后退。

## 重申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則性政策

不仅仅是苏联共产党遭到誹謗，也不仅仅是我們党遭到不公正的攻击。也还有因边界冲突而处于困难处境的印度共产党。还有美国共产党，它的一部分領導人已被监禁；还有其他的党。

在比利时共产党和巴西共产党內，已爆起分裂的企图，中国領導人在这些党內公开支持分裂集团。难道这是根据列宁主义的精神行动嗎？

我还想追述一下在 1960 年會議上有爭执的四点，而在这之前，筹委会——雷蒙·居約和列昂·斐盖尔参加了这一委员会——曾进行了数星期的討論。人們終於起草了一个文件，但是其中有四点是中国代表所不同意的，并繼續在會議上进行斗争。

关于什么問題呢？

(1)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提法問題，而这些提法是 1957 年路綫的自然延續。

(2) 关于譴責民族共产主义的問題，这一点是插在針對着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上下文中的。現在自称要与修正主义一刀两断的中国同志，却拒絕接受“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他們說，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可能是針對着他們的。（他們說得对，但是我們当时还猜不出这一点。）

(3) 中国同志不同意再提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但是，他們曾經在自己的八大会上頌揚二十大和二十大的主要決議，并且接受在1957年的宣言中明文提到二十大的論点。

(4) 中国同志拒絕譴責分裂活动和小集团活动的段落。現在人們看清楚了这是为什么。

关于这四点，我們曾为达成協議而努力。最后，同其他的提法一样，声明的内容在政治上仍然是明确的，中国同志在經過人們多次要求之后，表决贊同这一声明。

今天，任务是要坚决对付中国共产党領導人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无原則的攻击，这种态度就是对共同声明的蔑視。

确实，如果他們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綫得胜，我們將走向灾难。这条路綫已經給工人运动带来太多的困难。中国領導人的政治立場同1957年、1960年會議所通过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論点之間，沒有妥协的可能，这些論点仍然是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路綫。

有些人說，他們对中国的立場表示惋惜，但是他們不願意譴責这种立場。这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卡博在为八十一个党會議作准备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的論調。这位代表同所有阿尔巴尼亚的領導人一样，实质上是同意中国人的，只是他們还不敢公开这样表示罢了。他仅仅說：不能譴責一个大党。但是，如果这个党不奉行共同制定的路綫，为什么不能譴責？

此外，也还有一种相反的論調：当阿尔巴尼亚人开始肯定他們

的頑固立場時，當恩維爾·霍查發表的演說使整個八十一個黨的會議憤慨——當然除掉中國人——時，當伊巴露麗表達了人們共同的感覺，說我們從未在國際會議上聽過這樣的言論時，就在這時，又有些人說：“算了，這是一個小國！應該諒解小國。”

從那時起，不論是大黨還是小黨，都不能受到批評，人們便不再討論政治問題的實質，而是開始了感情上的、甚至人數上的考慮。

我們應該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戰鬥，特別是在涉及一些與我們直接有關的問題上。這是我們大家的問題。假如我們那怕只是在一剎那間認為，這些問題無關緊要，那末，中國同志的錯誤論點就可能擾亂某些思想。

必須鬥爭，而且也必須經常堅持我們在1960年會議上曾經說過的：這不僅牽涉到蘇聯人同中國人之間的爭論，而且牽涉到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的根本反對。

對蘇聯共產黨來說，千真萬確的是，它再一次地享有和擔負了站在前線為維護馬克思和列寧的原則、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則而鬥爭的榮譽和主要責任。

最後，我想說，我們堅決支持舉行一次未來的國際會議，以重申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則性政策。我們希望中國同志醒悟並重新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重新為爭取我們的國際運動的團結和爭取我們的鬥爭的效率而作的共同努力作出貢獻。

我們在1960年已經本着這一精神做了。我們將堅持這樣做。我們將不使用辱罵。我們將繼續為求得諒解而努力，但這永遠不以作原則性讓步為代價。

我們仍將面臨一場嚴重考驗，這一考驗造成一些困難，但絲毫不能根本改變事物前進、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成就、世界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局勢緩和取得的進展、爭取和平、民主

和社会主义的总斗争的发展。

对我们国家来说，正如就第一项议程通过的决议指出的，大家已充分衡量到了：为争取和平和民主而进行一致斗争。我们将象以往一样继续前进，履行共产党人的义务，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为争取团结而斗争，组织群众活动。我们将为在法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奋斗，我们将这样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插题是《人道报》编辑部加的〕。

（译自 1963 年 10 月 10 日法共《人道报》）

## 中国和核軍备

让-埃米尔·維达尔

来自东京的一則电訊說：中国总理周恩来昨天在接見前日本首相石桥湛山时，声称他深信由于中苏同盟条約“始終活着”，一旦中国遭到攻击，苏联必将援助中国。

周恩来的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

苏联政府在9月21日的声明中重申：

**“毫无疑问，如果帝国主义侵略者竟然进攻社会主义陣营，他們将遭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一再重申的这些保证，由于周恩来的声明，所以促使中国领导人不惜任何代价要有自己的原子軍备的动机，促使中国领导人說莫斯科条約是“美苏联盟反华”，說“受到这个条約限制的只是那些尚未取得核自卫力量的国家”的动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8月1日在北京的演說），就变得更加奇怪了。

上星期日，瓦德克·罗歇在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报告中指出：**“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攻击苏联采取所謂核‘垄断’政策的掩护下，表明他們要拥有自己的炸弹的愿望已引导他們表示贊成在世界上扩散核武器，这对各国人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民來說，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为什么周恩来自己承认：一旦中国遭到攻击，苏联将保证保卫中国，而中国领导人却用戴高乐为他的打击力量辯护时所用的同样論据否认这种极大的危险呢？

这种行为的动机仍然是暧昧不明的。既然核军备对中国防御不是必要的，中国领导人是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要求核军备的呢？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可能用军事力量支持的那些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毫无共同之处的目的吗？

（译自 1963 年 10 月 11 日法共《人道报》）

# 生活中的馬克思主义

雅克·杜克洛在新大学的讲话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委员会書記雅克·杜克洛于上星期日主持了新大学学年的开学典礼。

他在提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影响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震撼世界的变化之后，指出这些变化提出了新的問題。苏联共产党的伟大業績，是在研究这些变化的基础上，推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思想（苏共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这些表明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教条的新思想，已經被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采纳。

雅克·杜克洛談到了最重要的一些問題，主要是战争与和平的問題——由于社会主义、和平的力量对比的关系，在我們这个时代里，战争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必要的”——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問題，新的国际形势及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使过渡到社会主义可能具有更大的独特性。

这里我們发表他讲话中关于新大学的任务：传播和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及关于締結莫斯科条約的那些部分的摘要。莫斯科条約事实上意味着美国承认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的现实，这种现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想要否认的。

开始时称作工人大学的新大学，三十多年来，力求把馬克思列

宁主义传授給学生、教員、工人、職員和公務員。成千上万不同社会成分的、抱有不同見解的巴黎的男男女女都听了这个大学的課，他們在这所大学里学会了官办大学故意忽略的东西：馬克思主义科学。

新大学是在像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保罗·郎日万、弗雷德里克·約里奥—居里、亨利·瓦隆、乔治·波利塞尔、雅克·索洛蒙、阿拉貢及其他对提高法国的荣誉和威望有过貢獻并正在作出貢獻的人那样的法国思想界的杰出代表的支持下誕生的，它依靠了著名的大学教授、有声望的研究員和有經驗的工会干部的宝贵帮助，传授馬克思主义科学的財富。我謹在此感謝并祝賀所有对这一事业作出了貢獻的人。

巴黎的新大学无疑是最强大的，但是，馬賽、里昂、格勒諾布尔和其他城市，那儿也都有一所新大学。

在目前时期里，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时期的特点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大約化了一百年的时间，就是說比人的一生活略长一些的时间，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期在欧洲游蕩着的“共产主义的怪影”，今天在地球上包括十亿以上人口的广大地区内成了现实，同时也成了其他成亿男男女女的伟大理想。

我們光荣的革命歌曲《国际歌》說：“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是既成事实了，而且已經发生的变化一定还要更加扩大。

## 談判的道路

这里，雅克·杜克洛談到了莫斯科条約問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一条約表示的敌意問題。



……当然可以说，莫斯科条约是部分的、有限度的协议，但是，不仅应当看到条约本身，而是应当在注意到条约所具有的潜力的情况下来看这项条约。应当把这项条约看作是，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对世界和平危险很大的争执问题都是能够通过谈判的道路获得解决的证明。因此，认为莫斯科条约是走向国际局势缓和及和平共处道路上的重要的第一步，这是恰当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能接受的。他们谴责这项条约，从而在这一点上同美国最坏的好战分子和戴高乐将军同流合污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说，当中共领导人企图为他们反对已有一百多个国家签署了的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进行辩解，而提出目前毫无成功希望的普遍和有监督裁军方案时，他们奉行的是“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政策，这种政策同列宁的教导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 那些引证列宁的人……

而那些引证列宁，企图为他们反对缓和局势的具体措施进行辩解的人，最好还是参考一下在列宁的帮助下起草的1922年4月10日齐切林在热那亚会议上提议的计划。齐切林说：

“苏联代表团打算在下次会议时，建议普遍限制军备，并打算支持一切旨在减轻军费负担的提案，例如裁减各国军队及补充战争法律，严格禁止最野蛮的战争方式，如毒气、空战等，而特别是利用破坏手段袭击平民。”

苏联代表团发言人接着又作出结论说：“为了千千万万因目前的经济混乱而蒙受非人的匮乏和痛苦的人的利益，我们准备……拥护一切足以改善——即使是暂时的改善也好——世界经济形势

及防止新战争威胁的计划。我们准备支持别的国家在这方面提出的一切进步建议。”

因此，在与目前不同的形势和条件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经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能够具体地帮助发展和平力量的斗争。他从未过低估计能够有助于维持和平的措施，不管这种措施是如何的带有局部性。

### 和平：主要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当共产党人断定说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当然他们仍然认为开展人民群众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要推行和平共处，就必须有各国人民的联合斗争。

和平共处不是也不可能是放弃阶级斗争，恰恰相反，它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

因此，如果说共产党人认为世界上新的力量对比使永远防止战争成为可能的了，那么，他们也认为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 戴高乐使法国陷于孤立

极大多数法国人民都懂得，戴高乐反对这项条约，使法国陷于孤立。法国一宣布要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因为不能在撒哈拉——继续进行核试验，像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秘鲁这些国家就都提出抗议，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法国的孤立。因此，戴高乐努力吹毛求疵，企图为他的政策辩解。他的政策在法国是很少有人拥护的，但是，却反而受到北京宣传的鼓励和祝贺。

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政治态度，这种政治态度的

来龙去脉很难捉摸，因为他们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他们充满了沙文主义思想，充满了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毫无共同之处的对人类的蔑视。

### 而中国领导人……

他们向世界提出了一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面貌，这种面貌非但不能为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共产党人的目标——服务，反而有害于它，而且在客观上助长帝国主义者野心。帝国主义者能够以中国领导人的行为为根据谴责一般的共产党人深刻地蔑视人类，谴责他们在对未来含含糊糊的憧憬中企图发动世界大战。

最近，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一再重复了中共惯常对和平共处的攻击之后宣称：“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眼里，活下去是问题的实质。”他企图这样把拒绝中共领导人冒险政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作缺乏勇气。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共产党人所不能同意的，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行不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战士们热爱生活，希望群众生活改善，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必要时牺牲自己，但是，却不能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去考虑可怕的大屠杀，正好相反，他们要阻止战争以避免这种大屠杀。

### ……記性不好嗎？

中国同志们低估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这种倾向同他们过去的某些声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这一点却丝毫未使他们为难。

我们不会忘记，1957年4月2日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

事会常务委員会上，中国代表投票通过要求停止試驗核武器的呼吁书。1957年4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理事會批准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員会的这一呼吁书，1957年5月19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宣称：“核武器竞赛的加紧和氢弹試驗的继续，愈来愈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其影响所及，并将为害于人类后代。”

讀了这些讲话，很难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居然現在能譴責莫斯科条約，竟至蔑視现实，說由于这项禁止核試驗的条約而“战争危险增长了”。

然而，中共同志們于1957年11月同其他兄弟党一起签署了和平宣言，宣言中說：“在新的战争中不会有人們能够平安避难的地方。原子弹、氢弹和火箭战争的烈火将会燒到世界各国人民，将以无数的灾难威胁今天的人类和它的后代。”

## 万隆原則

中国领导人似乎忘記了万隆會議上通过的和平共处原則，这些原則規定：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領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平等；不过問或干涉他国内政；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独立；通过如談判、調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手段来解决一切国际糾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因維護这些原則而贏得了很大的威望，但这种威望已經由于他們对印度的軍事行动而受到損害，并因中国领导人現行行为而正在受到損害。

現代落后分子——美国、法国、西德和別的地方都有这种落后分子的令人忧虑的典型人物——“轻松地”考虑打一場核战争的前

景，那还可以解释得通，但是，标榜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領導人也抱有同样的論点，那就无法理解了。

不仅如此，中国領導人还乞灵于那些被开除出党的人、那些可疑分子来散发他們的材料和开展他們的宣传，这种宣传，在許多点上，令人想起从前托洛茨基集团所作的宣传。因此这些托派集团的殘余分子支持中共，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 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

那样的一种行为却毫不妨碍中共領導人談論什么党的独立原則和平等原則，但是，誰要是不同意他們的錯誤論点，誰就成为誣蔑攻击的对象。

中共領導人最近在法国散发的一份宣传品中，在談到 1960 年莫斯科會議时，他們說他們曾反对把譴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小集团活动和分裂活动的一段話列入會議声明中，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們在签署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时，显然是不够誠懇的，因为声明中說：

“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基础上的团結，不允許能够破坏这种团結的任何行动，是在爭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爭取順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的任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违背这些原則，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

### 苏联的經驗

中国同志們曾經认为，有了“大跃进”的政策，就可以不考虑經濟規律，而且他們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原始的想法；这种同科学社会

主义相违背的想法，企图毫不考虑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的经验，似乎可以把中国看作一个出现奇迹的国家。

这难道不是大国傲慢的表现吗？这种傲慢已经达到了很厉害的程度，而且已经妨碍中国领导人从别人已取得的成就和已克服的困难中吸取必要的教益。

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贫困的普遍化，那是不能使人民群众接受的。如果中国领导人责备苏联生活水平比中国高，责备苏联继续经济竞赛政策就是“资产阶级化”，那么，实质上，他们就是怪苏共进行了共产主义建设。

###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对我们说来，要防止把共产主义说成并非它原来的那个样子。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争取和平和裁军的伟大斗争中，不得不指出，硬说战争不可避免并按这一方向行事的中共政策，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

希望中国领导人终于会懂得他们的政策是不祥的政策，希望他们停止对共产主义运动有害的论战，但是，照事情发展的情况看来，这是值得怀疑的。

因此，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应当紧密地团结起来，同苏共一起，反对中国同志的分裂活动，并按照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精神行事。声明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解决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切任务。”

〔插题是《新法兰西》编辑部加的〕。

（译自1963年10月15日第938期法共《新法兰西》属刊）

# 爭取和平的斗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

雅克·杜克洛

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試驗核武器的莫斯科条約的簽訂，是1963年的突出事件。苏联、美国和英国所簽訂的并有一百多个国家签字的这个协定本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防止放射性物质对空气的污染，而它所以更重要，是因为它为走向和緩国际紧张局势和裁軍道路的新步驟打开了可能性。

虽然各国人民都高兴地和信任地欢迎莫斯科条約的簽訂，但也有一些人反对締結这项条約。在这些反对者当中有戴高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他們的立場(即使动机各有不同)同美国“狂人”的立場紧密地結合在一起，美国“狂人”正在反对莫斯科条約，因为他们想要……加剧“冷战”，使他們能够更便于推行反动的、种族主义的政策。这种立場也同德国复仇主义者的立場紧密地結合在一起，因为德国复仇主义者指望战争能帮助他們实现自己的目的，并想利用戴高乐打算建立的核打击力量作为雷管。

戴高乐患了沙文主义自大狂，竭力要建立这种打击力量，而不考虑經濟和社会状况的显著恶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老反动分子，充滿着对“伟大”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完全不符合当前法国的现实的。但是，法国政府首脑今天由于拒絕簽署莫斯科条約而遇到了困难。法国极大多数人民明白，戴高乐由于反对这个条約而正在使法国陷于孤立。

因此，戴高乐进行了辯論，企图为自己的在法国几乎得不到支

持的政策辯解，可是他的政策却受到北京宣传的贊成和欢迎。

在这里，也反映出一种政治行为，它的动机和目的簡直难以理解，而且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原則完全对立，严重地渗透着沙文主义和蔑視人的精神，与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毫无共同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領導人也使自己的国家受到孤立，給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危害。他們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不能为共产党人的目的服务——为解放人类的事业服务，而且給这一事业造成巨大的損失，客观上对帝国主义者有利。中国領導人的行为使帝国主义者有借口指責全世界共产党人极端地蔑視人，企图从启示录的幻想出发走向世界战争。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朝鮮平壤的讲话中，再一次企图縮小原子战争的危險，他說：“原子弹是紙老虎。真正强大的是人民。战争的決定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但是，如果說原子弹仅仅是“紙老虎”，那末，为什么中国領導人由于沒有这种武器而表现出如此不滿呢？人們不禁要問：如果他們自己有了原子武器，他們会怎样干？

\*                     \*                     \*

事实上，中共領導所維護的論点同 1957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會議所通过的論点完全相反。中国領導人抛弃了关于由于社会主义陣营与和平力量为一方同帝国主义陣营为另一方之間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战争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論点。中国領導人的行为使人产生这样一个問題：他們是不是打算为自己的观点辯护，而要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压力呢？

因此，苏联政府在 9 月 21 日的声明中有充分理由說，中国領導人不惜任何代价获得原子弹的意图，只能使人对他們的对外政策的目的产生严重的怀疑。“要知道，他們不能证明这是为中国国防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利益所必需的”。



中国同志的文章的特点是具有一些可以用来给自己开脱的论点，他们使用同这些文章的总的精神相矛盾的论点企图为中共的立场辩解，使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在为自己的基本上是错误的论点辩解时，可以引这一段或那一段来说明对他们的攻击是不公正的。

例如，一方面他们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不顾虑他们自己所写的和所说的关于热核战争可能导致的毁灭，而当人们完全有理由指责他们的立场实际是意味着希望热核战争或者至少对它抱欢迎的态度时，他们便引证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的话说：“我们认为，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低估这种破坏力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这纯粹是文字上的花招，它被这篇文章本身所否定。刘少奇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平壤的讲话中，他对和平共处政策进行了中共所惯用的攻击以后说：“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心目中，问题的实质就是活下去。”这是企图把拒绝中共领导人的冒险主义政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描绘成缺乏勇气的人。

共产党人不能允许这种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格格不入的解释，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都热爱生活，希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在必要时愿意牺牲自己，但不能轻率地对待可怕的破坏性危险，而相反地愿意防止战争的爆发，避免这种破坏。

中国同志过低估计使用核武器的后果的倾向，是同他们以前的某些声明相矛盾的，但是他们对这丝毫也不感到难为情。显然，他们是指望听他们说话的人都缺乏记忆力。可是须知事实俱在，不能忘记：1957年4月2日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柏林会议上，中国代表投票赞成号召停止核武器试验，4月26日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常设委员会赞同世界和平理事会常设委员会的这个号召，5月19日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声明说，“核武器竞赛

的加紧和氢弹试验的继续，愈来愈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其影响所及，并将为害于人类后代。”

读到这些声明，很难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现在怎么可以谴责莫斯科条约，并且不顾实际情况，要人相信由于这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战争危险正在增长”。

难道中国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的代表于1957年4月2日投票赞成号召停止试验核武器，是出于要加剧战争危险的意图吗？难道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于1957年5月19日表示赞成立即停止核试验，是出于要加剧战争危险的意图吗？

想必郭沫若显然是忘记了自己在几年前所作的声明，因为今天他在攻击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显然和中国领导人一样，不再记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于1957年11月所通过的和平宣言了，在这个宣言中关于核武器是这样写的：

“既不需要科学家的知识，也不需要诗人的幻想，就能断定，下一次战争——如果各国人民未能制止它爆发——将会超过人类至今所经受的一切灾难。欧、美、亚、非、澳各洲的居民都知道，人类解放出了这样巨大的自然力量，并掌握了这样强大的手段，以致能够使其破坏作用达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在新的战争中不会有人能够平安避难的地方。原子弹、氢弹和火箭战争的烈火将会烧到世界各国人民，将以无数的灾难威胁今天的人类和它的后代。

“全世界的普通人，不分民族和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皮肤颜色，都希望和平地生活。全世界的普通人要问：

“人正用自己的无往不胜的智慧探索自然的一切秘密，并且愈益增强对它的控制，而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不久即将使人可能达到星球，难道人就不能避免战争和防止自我消灭吗？”

\* \* \*

这一段文字和中共领导人的立场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这是谁

也不能爭辯的。中共領導人對於要死掉兩三億中國人的前景抱着滿不在乎的態度，他們根本不考慮許多小國和生活在這些國家里的人民會剩下什麼。

中國領導人不妨認真地想一想，他們在1960年簽署了什麼。他們在看到具有反蘇情緒的帝國主義報刊怎樣利用他們的某些領土要求的同时，不妨重溫一下和平宣言，這個宣言在提到反动派反復地硬說什麼“世界共產主義”威脅他們的自由、他們的和平生存之後指出：

“然而，無論哪一個共產黨或是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發動戰爭和對別國進行軍事攻擊的動機，都沒有掠奪別國土地的動機。蘇聯、人民中國自己就擁有遼闊的土地和無數的自然財富。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熱中於戰爭的階級或社會階層。這裡執政的是工人和農民，他們在過去所有戰爭中都受犧牲最大。難道他們會希望新戰爭嗎？共產黨人的目的是要建成能保證全體人民的福利、各族人民的繁榮、各民族間永久和平的社會。社會主義國家需要持久的和平來建設這種社會。所以，沒有比共產黨人更一貫反對戰爭、更堅決擁護和平的人了！”

遺憾的是，這些話已經在中國同志的記憶里消失了。除了其他一些事實外，他們甚至用威脅的口吻對蘇共進行的可恥的攻擊，也證明這一點。我們在戴高樂的《民族報》上讀到了中國領導人廖承志關於蘇聯政府對美國的政策的話，他說：“問題不在於政策的靈活性，而在於赫魯曉夫背叛”，這怎能使我們不憤怒、不憂慮呢。

這種誹謗是危險的思維的結果。它似乎證明，中國領導人能夠開始把蘇聯當作自己的敵人。

這種事實，以及近年來中國當局對蘇聯邊界的多次侵犯表明，中國領導人的明顯意圖是要造成國際緊張局勢，以轉移中國人民

对内政问题的注意。

当中国领导人还忠于万隆会议所通过的和平共处原则的时候，他们表示赞成：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民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对他国内政进行任何干涉；不以威胁或侵略或使用武力来破坏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曾享有极高的威信，后来这种威信被中国对印度的军事行动和中国领导人现在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

中国领导人由于过分地傲慢自大，看来根本不关心各国人民想的是什么，否则他们会明白，由于他们不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对外政策和表现出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扩张意图，而正在严重地损害共产主义的威信，这种威信由于苏联以巨大努力向劳动者证明共产主义就是人的文化、物质和道德水平的增长，而大大提高了。

未来属于社会主义，属于共产主义，这是不容争辩的。一小撮充满着使自己同封建制度的某些中坚人物（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制度垮台前夕说：“我们之后必有洪水”）为伍的情绪的顽固分子，比如美国、法国、西德和其他一些国家目前存在的反动分子“以极其轻率的态度”对待热核战争的后果，这完全是可以解释的。可是，这种论断出自在这方面滥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领导人，这就简直无法理解了。

\*             \*             \*

在中国领导人为扩大派别活动和反对兄弟共产党而在各国大量散发的宣传材料中，他们企图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捍卫者，但是他们自己却轻率地践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他们以反对苏共和整个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精神的各国共

产党和工人党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中国领导人利用被各国共产党开除出去的分子和各种可疑分子来散发自己的宣传材料，这些材料在许多方面同今天出于反共主义的动机而支持中共的托洛茨基集团过去所进行的宣传一模一样。

由此可见，中共领导人正在公开进行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并全面展开反对兄弟党的派别活动。

这种行动丝毫不妨碍中共领导人谈论党的独立平等的原则。同时，谁不赞成他们的错误论点，谁就要遭到诽谤性的攻击。这种攻击暴露了中共领导人想使各兄弟党服从于他们的“指挥棒”。正因为如此，中国领导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才指责包括法国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党“服从指挥棒”，对它们进行滔滔不绝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侮辱。

中共领导人最近在法国散发的一份宣传小册子里，谈到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他们反对在声明中列入谴责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进行派别活动的一段文字的经过。这清楚地表明，中共领导人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上签字时，表现了阳奉阴违，因为关于这一点，声明中说：“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允许能够破坏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是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争取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违背这些原则，就会导致共产主义力量的削弱。”

中共领导人对兄弟党的行动目的何在，如果不是要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那就是要削弱它吧！而且正在为了达到这个不体面的目的利用可疑分子。

中国领导人采取如此有害的行动的原因，在于他们由于国内

政策的失敗而需要某种誘人的手腕。

中国同志认为，“大跃进”政策使他們能够不去注意經濟規律。在他們那里已經形成了无視科学社会主义的、庸俗的共产主义概念。他們不来研究苏联——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の經驗。似乎可以把中国当作正在創造奇迹的国家！难道这不是大国的狂妄自大的表現嗎？这种狂妄自大已經发展到极端，妨碍着中国领导人从別人取得的成績或別人已克服的困难中吸取教訓。

在現代社会条件下，认为共产主义是使人民普遍貧困的观点，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中国领导人責备苏联，說苏联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說苏联由于繼續执行經濟竞赛政策而正在“資產階級化”，实际上他們是譴責苏共着手进行共产主义建設。

中共领导人在經濟問題上采取錯誤的立場，使中国人民遭受失敗，但却指責苏共对列宁的忠誠，列宁在 1921 年曾說：“現在，我們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濟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意識到中共领导人給我們为之奋斗的事业造成的危害，揭露他們的只能使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高兴的分裂活动，并反对这种活动。

为了阻止对共产主义概念的曲解，尤其有必要这样做。在各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爭取和平与裁軍的伟大战斗中，必須指出中共坚持战争不可避免并在这一方面采取行动的政策，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

幸而，苏联体现了另一种共产主义，显示出真正的社会主义陣营的面貌，显示出站在和平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前列的工人階級的面貌。各国人民理解到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所以他們忧虑不安地注視着某些中国领导人在怎样推行冒险的、可能发生危險的政策。

我們本来希望，中国领导人会明白他們所奉行的政策的害处，

并停止进行有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論战。但是，事态的发展使人对此产生怀疑。正因为如此，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应当紧密团结起来，同苏共一起为反对中国同志的分裂活动而斗争，按照 1960 年莫斯科声明的精神行动起来，声明中说：

“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解决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一切任务。”

（譯自 1963 年 10 月 17 日第 20 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 中国领导人咒骂法国共产党人 和吹捧戴高乐

伊夫·摩罗

中国领导人在他们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所使用的手段，现已超过了一切限度。北京的《红旗》和《人民日报》前天联合发表的一篇文章，已经不再是论战了。这是主要针对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同志进行的集诬蔑和诽谤之大成，以致中国报刊竟把赫鲁晓夫同志比作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这篇文章有一段针对法国共产党，指责它“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sup>①</sup>。《人民日报》竟然硬说，“法共领导人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给戴高乐等人。同时，法共领导人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

在这里，谩骂和无耻捏造代替了论据。我们引述这一段话决不是重视它，而是为了证明北京的人走到了什么地步。

在这方面，我们决不学中国领导人。

是否用得着驳斥他们的诬蔑呢？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完全否定了这种诬蔑。是否应当提一下我们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的不断斗争呢？是否应当重提一下在党刚成立后不久，法国共产党人最初进行的伟大战斗之一就是反对摩洛哥战争呢？是否应提醒一下马塞尔·加香在他临终前还要求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呢？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2年4月给我们写信说：“我

---

<sup>①</sup> 这篇文章的全文还没有到巴黎，我们所做的摘录取自通讯社的电讯。



国人民取得的胜利——埃維昂協議，也是你們的胜利。你們党在法国对这一伟大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貢獻。”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961年5月致我們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賀电也說：“你們党不仅为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而且也是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典范，它为促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貢獻。”

中国领导人今天企图破坏的，正是在几十年的共同反帝斗争中这样結成的巩固联盟。他們所作的努力，大部分是要把民族解放运动孤立起来，以便利用这一运动来达到他們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目的。《人民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法国共产党人的侮辱，是再一次同贊揚戴高乐同时进行的。如果相信北京报纸的話，那么，戴高乐实际上倒是坚定地高举着“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了。

实际上，戴高乐是个多么奇怪的独立的旗手，他最近在一次記者招待会上說，在他看来，同美国的联盟是一个“基本事实”，大西洋公約是“一种基本的需要”！正是根据这一点，法国东部的飞机场，主要是土尔、香布列、肖蒙和布里昂的飞机场，这几天才交给美国空軍进行“大空运”演习的……

戴高乐是多么奇怪的民族斗争战士，他最近不顾我国的利益和和平的利益，听命于美国的指令，拒絕給予人民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照《人民日报》所說，我們就应支持戴高乐政策了。这也正是我党某些机会主义分子抱的幻想所导致的結論。当时我們对这些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严厉的原則性斗争，我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一致地譴責了他們这种錯誤立場。

今天，这种幻想已不容存在；我国所有工人和民主力量正起而反对戴高乐政权，只有保卫新共和联盟的机器人还在說，戴高乐奉

行着民族和独立政策。

那么，这种宣传现在怎么会在北京引起这种共鸣呢？是否中国领导人认为，获得原子武器的意愿和拒绝国际缓和是独立不独立的考验呢？他们可悲的文章还提出了别的什么解释呢？

（译自1963年10月23日法共《人道报》）

## 中国领导人的虚构和捏造

法共《人道报》

中国共产党最近那篇文章(我們刚收到全文)中对法国共产党的攻击,充满了证明中国领导人的恶意的典型例子。

这就是其中之一:“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

这一粗暴的前提提出了以后,就用两种手段来支持它。

(一)虚构,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们跟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领导人把别人从未发表过的观点说成是别人的,然后就在彻头彻尾由他们制造出来的这个问题上攻击别人,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能力是大家所知道的。关于上述引文,纯粹是中共领导的虚构。

当然,法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叫喊”过“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之,早在1939年1月,莫里斯·多列士在阿尔及利亚旅行时,曾在阿尔及尔宣称:“有一个阿尔及利亚民族正在历史地形成中。”那是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斗争开始前十五年的事。

1954年,斗争一开始,法国共产党就表示积极声援。独立的要求一经提出,法国共产党人就予以支持。

## (二)捏造：

《人民日报》写道：“当法国殖民地的独立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公然说：‘问题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经过法国来实现。’”

这段引文的整个上下文，都是为了歪曲引文的意思而安排的。中国领导人是这样来引用这段话的，似乎这段话不是对法国人民，而是对殖民地人民说的。

我们党号召法国人进行斗争，以便迫使统治者同意这种不可避免的独立，迫使统治者同新独立的国家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友好联系，而中国的文章却力图使人相信：我们党要求殖民地人民不要同法国分离。

中国领导人整页地使用这种不老实的手法。正是这样，他们才得出下列令人不能相信的结论：

戴高乐及其政府，让我们提醒一下，是和洛希尔银行、米拉波银行、拉萨尔银行、巴黎荷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等，一句话，是和国内的受外国影响的金融寡头有联系的，戴高乐及其政府掌握了“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而法国共产党却支持“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中国领导人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了，暴露了他们的恶意，也暴露了他们论点的空虚。

（译自 1963 年 10 月 28 日法共《人道报》）

## 陈毅同戴高乐一样

让-埃米尔·维达尔

中国共产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回答在北京访问的日本记者向他提出的问题时发表的谈话，使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出，中国政府和戴高乐政府在关于核武器和对外政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立场是相似的，论据是相同的。

据法新社报道：“陈毅元帅说，拥有核武器和导弹对任何一个大国的威望都是必要的。因此，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进行核试验，因为中国不能允许被列为二等或三等强国之列。”

这些话同戴高乐企图建立以核军备为基础的“民族伟大”的主张几乎一模一样。陈毅和戴高乐的声明都使人认为：北京和巴黎一样，所考虑的不是减少冷战，而是加强冷战，那里跟这里一样，都拒绝强令实现和平共处的艰巨斗争。

\* \* \*

“陈毅先生还指出，苏联说北京当国家还缺乏一切东西的时候，却要用大量资金生产核武器。但是，”他接着说，“即使中国没有裤子穿，它也必须拥有核武器。”（美联社）

在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想使国家拥有核武器的顽固意志，即便为此而推迟一些重要经济部门的发展和使人民付出沉重牺牲也在所不惜。在我们法国，就有为了充实“打击力量”而剥夺中小学校和大学的必要经费的灾难事例。

正像中国领导人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国家的经济还很落后，而中国领导人却要部分地牺牲和平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还严重不

足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要叫人民——像陈毅的说明所暗示的那样——为创造标志“伟大”和“威望”的武器而付出很高的代价。

\* \* \*

“接着，陈毅元帅在谈到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时说，这个条约不过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为在政治上统治世界而玩弄的把戏。反对这个条约的唯一斗争方式，就是继续猛烈地抵抗它。”（法新社）

因此，中国政府站在戴高乐政府一边，两个政府孤立地充当不签署莫斯科条约的七个国家的小小队伍的首领。对那些自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领导人来说，还有一种严重的情况，那就是他们竟敢于把苏联和美国等量齐观，谴责苏联政府同华盛顿政府一样想要“在政治上统治世界”。这种谎言的离奇本身，就大大减少了它的作用。

\* \* \*

“此外，陈毅还说，北京不想在不久的将来出席联合国，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它在联合国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美联社）

这一声明同戴高乐对联合国所表示的多次轻视是相呼应的。他们越是千方百计地想用原子弹和氢弹来装备自己的军队，越是坚持积极参加军备竞赛，也就越会认为在联合国中不能发挥作用，不能作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联合国中为争取裁军所作的努力。

还应该指出，中国政府这样不热心，对于恢复它的国家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不会有好处的。

—— • ——

中国政府同戴高乐政府的立场和论据是相似的，而其后果也是相似的。

中国的经济状况，不会使它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得到别的，而只会得到一支无益于国防但很危险的“打击力量”，这是有很多理由的，首先是因为它可能引起核武器在全世界扩散。

人們知道，戴高乐的“打击力量”的特別有害的方面之一，就是波恩指望以此作为給联邦国防軍制造核武器的借口，而西德的經濟力量可能使它大大超过法国的“打击力量”。

就在日本广播电台广播陈毅的談話的同一天，东京举行了盛大的軍事检閱。

合众社报道說：“因此，在場的人可以了解到，日本的武装力量加强和現代化了。參觀者可能看到最現代化的大炮、美式 R 30 型火箭和地空導彈。”

不必有多大学問就可以了解，日本軍国主义者正注視着中国，如果中国制造和試驗原子武器，他們就一定要抓住机会来直追中国。而日本有高度发达的最現代化的工业，它可能使日本迅速超过中国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就。

——。——

人們可能要問：既然苏联已經重申它的全部力量將在中国遭到侵略时用来保卫中国，那末，是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促使中国領導人要制造核武器呢？

人們还可能不安地問：中国領導人是否意識到了他們对于在世界上煽起核武器扩散所应負的严重責任？

（譯自 1963 年 10 月 29 日法共《人道報》）

## 为什么,怎样……

雅克·阿尔诺、弗朗西斯·古昂、雅克琳娜·耶里、安德烈·希赛耳布雷什、让-皮埃尔·普瓦特文、克劳德·普雷沃、让-埃米尔·维达尔

阿尔诺：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领导人直到1959年都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一致行动的，并且取得了震撼全世界的成就，而今天怎么会走上同整个运动分离，甚至以接近狂热的劲头儿来反对整个运动呢？”

事实是，今天在中国，凡是参加把苏联人民从其领导人——他们被称为革命的叛徒——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十字军的公民，都被授予英雄的称号。

现在大家知道，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意见分歧开始于1956年，即从二十大提出关于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和揭发个人迷信的论点的时候开始的。但是大家知道，分歧的公开化应该说是与尼基塔·赫鲁晓夫访美和1959年10月他在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进行的会谈有关。当时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普雷沃：为了找出“为什么”和“怎样”，确定出分歧的时间并不是次要的。例如，当苏联人用中国领导人在1956年就二十大所写的文章来反问他们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是回答说人们没有理解他们当时所写的文章，就是回答说他们当时没有完全说出他们所想的东西，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是为了不损害已被二十大所严重动



搖了的社会主义陣营的紧密团結。

最近我重讀了《共产主义手冊》刊登 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的专号。在仔細閱讀之后，人們可以承认，刘少奇在他的报告的一开始便強調了在中国夺取政权的特殊条件（不是通过和平道路取得的），而在 1956 年的条件下，強調这一点似乎是有所指的，特别是現在我們都已經知道了这件事。但是，对于个人迷信的批判，則是得到多次明确贊同的。我們可以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确是像他們今天所說的那样当时真不贊成批判斯大林，那么至少他們当时在这个問題上應該保持沉默。然而并非如此！无容置疑，他們当时是贊成的：首先，毛在开幕詞中以相当含糊的口吻（这是真的）表示贊成；刘少奇則比較明确地承认这个事件“具有世界意义”，并且用贊揚的語調评价了对于个人迷信的揭发；邓小平在关于党章的报告中两次談到这个問題，每次都表示贊成。邓小平在报告中着重指出，批判个人迷信的意义超出了苏联共产党一党的范围，其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曾避免了这种錯誤。总之，邓小平說，在中国，我們早从 1949 年起就决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議）禁止給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为工厂和城市等的名字。有心人可以看到，这些說明充滿了我所說的文件集的第 109 頁。他們特別可以从中看到这样一句話：“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从这句话里，确实看不到对几个月前苏联发生的事情的絲毫不贊成，哪怕是“含蓄的”不贊成。当中国领导人今天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的时候，毫無疑問，他們修正了（我沒有別的字眼！）自己在 1956 年的观点。人們可以說，他們当时确实有些保留，今天我們事后就不难看出这种保留了。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这种保留在当时并未大到阻止中国领导人提出“百花”政策，一

切观察家都认为这一政策是中国实行苏联二十大提出的原则。西蒙内·德博沃瓦不是1957年在《长征》中说过这一政策是在“非斯大林化的影响下”采取的吗？然而“百花”政策并没有继续很久，第二年就把它放弃了。那末，我就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保留最后竟会占了上风呢？中国或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们对二十大的几乎全部经验加以彻底怀疑以至最后全盘否定呢？

阿尔诺：我们还要指出，中国人过去也是赞成尼基塔·赫鲁晓夫访美的方针的。下面就是中共八中全会公报的一段：“全会完全支持苏联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中的努力，并且对苏联和美国宣布两国首脑将互相进行访问一事表示欢迎。全会认为，这对于进一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是有益的。”<sup>①</sup>我们要指出，这个文件是1959年8月16日发表的。

古昂：不错，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这些事件，至少我们当中确实有许多人没有预料到。对于这些突然的事件，必须很好地做出解释。

我们的中国同志对于帝国主义作了许多出色的揭露。但是在最近时期，即最近几年，如果说资产阶级进行了谩骂，那末，中国同志的实际行动是怎样的呢？

在军事上，同印度发生了边界事件。当然，印度是个资产阶级国家，但它是一个不发达的反帝国家，所以它更与中国亲近，而不是与中国的敌人更亲近。

在经济上，急剧地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来往。由于撤销定货而给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打击。

阿尔诺：顺便指出，捷克斯洛伐克人是完全有理由埋怨的。最

---

① 北京外文出版社1959年9月版，第6—7页。

近我曾到捷克斯洛伐克訪問，人們举例对我說，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专门按照中国的規格为中国承制的水輪机和水壩設備，預先沒有通知就被撤銷了，而這些設備中的一部分已經運到中国，另一部分正在布拉格到北京的途中，最后一部分在捷克斯洛伐克即將完工……苏联自願承購了這些貨物中的一部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所受的損失仍是很大的……。

古昂：同时，人們可以看到，資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对外貿易中的比重增加了。如果垄断資本家在这方面的热心不是随着北京領導人的反苏劲头儿而无耻地加强，那么这种貿易来往倒是值得庆幸的。

團結全世界群众的几个巨大的国际运动，即和平运动、工会运动和妇女运动，是当代面貌的特点之一，中国代表在这些运动中放弃了兄弟般的討論方法和在不同立場之間寻求諒解，而訴諸于阴谋活动和激烈的舌战；他們把自己置于孤立而絕望的宗派主义立場上。

在資本主义国家中，中国政府付出大量的宣传費用来大規模地散发百分之九十是反对各国共产党的文件。

在外交方面，比如在古巴事件这样的严重关头；或在爭取簽訂莫斯科条約以使局勢緩和的时斯，人民中国的宣传都是譴責苏联的。

最后，我觉得西伯利亚铁路事件达到了反苏的頂点。中国学生、公務員和铁路員工扣留了一列火車，滋事生非，原因是海关沒收了反对苏联政府的宣传小册子。我要指出这一事件的令人不快的一个方面：这种行为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沒有任何一个革命者在資本主义国家的边界上这样做过；中国人所以做出这种坏事，是因为他們知道苏联人不会訴諸武力。我认为还有一个情况可以說明問題，那就是当时在場的那些普通中国同志，都觉得向全世界表明

反对苏联共产党就是英雄气概的实际表现。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北京像民族英雄一样地受到了欢迎。人们不禁要问这条道路会走到什么地方去。

耶里：我参加了今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我也读过中国代表团回北京后所做的报告，这真使人惊讶。在这篇报告中，可以看到如下的词句：“大会强行通过了一个没有革命内容的《告世界妇女书》（……）这次大会完全违背了全世界妇女和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大会的组织者仰承帝国主义尤其是世界人民公敌肯尼迪的鼻息，蹂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妇女群众的愿望，把错误的政治路线强加给大会，并且用错误的组织路线来贯彻它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反之，“中国妇女代表团不畏种种压力，勇敢坚定地批判了以全面彻底裁军与和平共处为国际妇女运动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错误路线，击破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并以最大的耐心和克制，同坚持这条错误路线、坚持反华的苏联妇女代表团领导人和国际民主妇联一些领导人，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这次大会是彼此交流思想、建议和经验的极其广泛的集会。要把大会过程中的讲话、解释、批评和建议汇集起来，大概要写成好几本书。出席大会的妇女十分不同，她们各有自己的生活习惯、社会条件和哲学观念，但经过八天的讨论和交换意见以后，她们一致通过了《告世界妇女和平呼吁书》，中国代表不顾最起码的真理，硬说这份呼吁书是强加给代表们的。

如此不同的妇女能在如此远大、如此崇高的目标上取得一致这一事实，表明人的觉悟的提高。这也是智慧和自尊的光辉表现。

怎样解释我们对中国代表们的那种既不願意看也不願意听的态度先是感到惊讶继而感到痛苦呢？

我們曾經全心全意地希望同中国朋友们进行接触。我們希望

了解她們，并使她們了解我們。我們希望打動她們的心。

我們不得不明确指出：这些妇女，这些母亲，我們的姐妹和同志，对于任何与她們的論据不同的論据，都充耳不聞。她們以罕見的頑固态度不考虑大会絕大多數人的意見，不断重复她們认为是代表着世界妇女运动的“革命路綫”的东西。

印度代表刚一結束她的講話（这篇講話很有分寸），中国代表立刻冲上讲台，不顾任何民主法則，硬要“答复”印度代表之后才走下讲台，而不考虑已有好几十位代表登記等着发言了。事实上，中国代表利用了而且濫用了发言時間，她們一再重复裁軍与和平共处不是当代的關鍵問題的錯誤观点。

对于她們对世界妇女运动領導人的态度應該說什么呢？当全体起立欢迎戈登夫人、尼娜·波波娃、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和其他許多人，對她們的正确的、具有濃厚人道情感的講話報以經久不息的欢呼声的时候，中国代表端坐不动，聳聳肩膀，发出冷笑，进行热嘲。以我个人來說，我因此而為她們感到害臊，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这样。

她們剛回到中国，就把种种打击指向苏联妇女。

在这种情况下，人們真不知道她們究竟要走到哪里去。

古昂：是的，他們已在中國人民群眾中間種下了主要的敵人在苏联的思想。必須有一整套意識形態來支持這種實踐。必須使中國的男男女女確實相信革命被人出賣了，分歧比估計的差異深得多。1949年取得勝利的革命家們陷入錯誤之中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因為他們一心想要充當朱比特。以後發生了一樁事情。他們有一天忽然決定，他們的道路要不同於蘇共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道路，以致他們現在要對蘇共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行最無情的打擊。這一定有其深遠的原因，而且無疑是從他們的歷史、他們的親身經驗和當前利益積累起來的原因。

我确信，生活迟早会駁倒这些謬誤，我們希望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做到这一点。到那时，中国同志自己将会對我們說出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必要的批評和糾正，就像苏联同志对斯大林时代的錯誤的后果进行的耐心斗争那样。

但是，我們需要設法立即辯明是非。如果我們认为他們是“偶然地”从正确走上錯誤的，那么我們的推論就会是錯誤的。据我們推測，这种大转变是由一些困难造成的，此外还要有适当的土壤和某些錯誤思想。如果我們稍微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我們就会更加坚信我們的想法，更好地解答生活向我們提出的往往是使我們迷惑的問題，更好地駁斥我們认为是有害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可能散播的幻想。

普瓦特文：我认为，我們簡要地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变化是有益处的。

我們回想一下1949年建国之初的情况。幅員与欧洲相等的辽阔的中国，当时有五亿五千万人口，其中80%住在农村。国家的經濟状况极端落后，工业的水平很低，农业中只有人力和少数畜力，还完全处于中古时期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很低的：1949年，中国人80%是文盲，只有20%的学龄儿童能够上小学。

另外，还有十年的战争所造成的混乱状态：生产衰落，財政混乱，通貨膨脹，物价飞涨，交通瘫痪，等等。此外，还得加上潜伏下来的或被国民党和美国派到中国的大量特务。

总之，百废待举。中国共产党当时掌握了国家的領導权，尽管发生了朝鮮战争（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中国共产党还是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长期武装斗争中鍛炼出来的党，得到了工农劳动人民和所有对国民党的无耻行动怀恨的人的支持。同时，它还利用了有利的国际形势和苏联与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的援助。最后，我认为还有一个条件，而且不是无关紧要的条件，那就是经过长期的斗争而获得独立和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的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因此，中国人民热情顽强地进行了把落后的国家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艰苦劳动。

我们可以把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从1949年到195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以土地改革运动这一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为标志的。三年期间，就根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农民无偿地分得了四千七百万公顷耕地和大量的耕畜及农具。从此以后，农民变成了土地的主人，再也不用向地主缴纳沉重的地租了。这次改革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如此彻底，是因为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从城市下乡的干部的帮助下，自己进行改革的。土改以后，在农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个体小生产。我们只要用三亿农民除一下四千七百万公顷土地（每人合零点一五公顷），就会知道农民得到的土地究竟有多少。土改的完成和国内秩序的恢复，造成农业生产尤其是工业生产的显著增长。

与此同时，全中国还进行了几大政治运动：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时候，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国家机关中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资本家中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当时，在生活的各个角落，真是一片沸腾的政治和思想活跃景象。我们也不要忘记1953年春为彻底贯彻三年前公布的婚姻法而发起的大规模宣传运动。这项法律取消了男子对妇女的特权，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和男女权利平等，发生了极其伟大的社会作用。此后，妇女都可以参加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凡是访问过中国的正直人士，无不赞扬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

从 1953 到 1957 年为第二阶段，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使全中国人民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力宣传，所以这条总路线和计划的指标是家喻户晓的。

计划规定的指标全部完成了：根据政府公布的材料，工业增长了 128%，农业增长 25% 以上，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不亚于经济建设。

1956 年，把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到年底，占私营生产 99.6% 的七万个私营工业企业变成了合营企业。

有人对我说，当时成千上万的小资本家在街上敲锣打鼓，并在自己的店铺门前张灯结彩，以庆祝这一改造。

在这同一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也深入到中国的农村：起初，使农民结成互助组（1954 年占农户的 58%），同时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也发展起来。在初级社中，农民的土地交给社里共同经营，但仍保留土地的所有权，正像他们仍保留自己的牲畜和农具一样。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了农村社会主义化的远景：“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末尾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开头，即在 1958 年春季，全国将有二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我们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 1960 年，对于包括其余一半农村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

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化的进展如此飞速，能不遇到资产阶级分子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们的反对吗？1957 年，继毛



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之后，便开始了整风运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和受他们影响的人，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满足于批评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他们——至少是其中某些人——还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作用进行了非难。工厂、机关和大学举行了无数次集会，处处的墙上都贴满了无数张大字报；反对社会主义化的人被揭发出来了，他们成了“右派分子”，或按照中国的说法，他们成了“百花”，人们给他们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在获得这些成就之后，1958年本可以出现一个休止时期。事实上并非如此，“不断革命”——中国领导人有意不绝于口的说法——的步伐加速了。这就是小高炉、大跃进和公社之年。

维达尔：我在1958年到了中国。我在那里呆到1961年，其间到过全中国二十八个省份的一半。

我在这里应该说，在这整个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我同所有在这一时期访问中国的人一样，完全被迷惑住了。只要重读一下我当时写的文章，就会看出这一点。由于人地两生，以及对中国现实毫无了解，使我不能一时冷静地判断事实。

我觉得，指出下述的情况也是有益的：当时使我们感到惊异的一些事实本身并没有多么大的意义，然而天长日久，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暴露出他们的立场，这些事实便彼此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现象。

我认为，不能把中国领导人表示的分歧同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割裂开来。1958年出现了人民公社。

1958年，把今天仍然是徒有其名的人民公社的建立说成是农村人民群众的一个创造。当时，我信以为真了。

后来发表的许多文件和以后几年把人民公社变成完全不同的

东西(虽然还保持着同一名称)的方式,都使人感到人民公社的概念,事实上是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强加给农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斗争中赢得的非凡影响,再加上对毛泽东的极端迷信,使他們可以暂时地、但又能使人热情地接受强制推行的一些错误措施。

“大跃进”的口号事实上就是1958年5月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提出来的,随着便出现了人民公社。

1960年3月《红旗》杂志第五期写道:“在1958年5、6月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方向,应当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1958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河北省北戴河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发表之后,占农户总数99%以上的一亿二千万农户组成了人民公社。

人们立即相信了人民公社的成绩。因此,1958年的丰收多次被领导人和报纸归功于人民公社的建立。但是,人民公社主要是在1958年9月建立的,这就是说,那时夏收已经结束,秋收也已成了定局。事实上,人民公社对这次丰收没起任何作用。

可以说,恰恰相反。因为在秋收时节,有六千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忙于建立和照管那臭名远扬的“小高炉”去了。现在,小高炉都不见了,其质量低劣的产品,从第二年就不算入钢铁的产量了。

可是,收获时却缺少了这六千万人。周恩来总理在次年承认了这一点,他谈到“秋收过程中劳力分配不善。”

我还记得,1958年12月,我在河南省穿过大片大片的没有收获的棉田,棉花都烂掉在地里了。我记得,我在禹县参观过一个“小高炉中心”,那里集中了来自附近各人民公社的两万农民。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国内政策的左倾表现，达到了不大令人相信的地步。

在这个时期，他们宣布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的大门口，人民公社的分配采取了“按需分配”的原则，食物是在人民食堂根据平均主义分给农民的，衣服、住所，有时甚至日常消费品也是如此。货币工资在分配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我们应当指出，中国农村的自身消费要占生产的80%。因此，收入主要是在平均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分配的。当时，自留地，有时连住宅都成了公社的财产。

农民不论劳动多少，都分得差不多同样多的东西。这种情况，不久就使劳动的人松劲儿了，造成1959年农民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的大大下降。

因此，不得不在1959—1960—1961年期间着手“修正”人民公社，再度重视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按劳分配”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把犯这些错误的责任都推到基层干部身上，有时推到中级干部身上，说他们没有很好理解领导人制订的政治路线，这就使领导人可以回避作任何自我批评。的确，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贫苦农民中是根深蒂固的，而1958年出现的左倾错误，则完全来自最高领导人。他们急于跨越应有的发展阶段，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的大门口。

下面是新华社对刘少奇1958年9月视察河南人民公社所做的报道：“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完又接着说：“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办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

刘少奇同志说“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新华社1958年9月24日讯）

这种工农相同的奇特观点，可以由下述两个方固来解释：一方

面，工人階級在中國所占的比重很低（工人約有二千五百万左右），而中國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屬則接近六十萬人<sup>①</sup>；另一方面，當時許多工人是剛離開農村不久的。

人們可以認為這是对工廠的影射，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完全可以在工廠里實行。

過了幾天，劉少奇在江蘇省視察時，參觀了一小塊水稻試驗田，他數了幾棵稻穗上的谷粒，問县委书记在那塊地里可以打多少，書記回答說：“可以打一萬斤”，劉少奇同志笑着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新華社電訊稿）

緊接着，我就看到生產隊用鋤鎬翻地達一米多深，因而把生土翻上了地面，把熟土埋到下面去了。

“密植”的情形也是這樣：1959年初，又不得不在地里“疏苗”，因為苗都擠得喘不過氣來了。

就是在劉少奇的這次視察中，第一次出現了另一種主張，而這種主張不久就造成了沉重的後果。在上面提到的那篇電訊中，可以讀到如下的話：“劉少奇同志在和淮陰地委的同志們座談時說：‘我在河北、河南視察的時候，有些县委书记認為少種多收比廣種薄收要節省的多，應該把豐產田的經驗推廣，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來種好田地。這樣再過幾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三分之一植樹，三分之一休閑。種得少，種得好，但是收得多，這是農業政策上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希望各地好好算一算賬，認真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1958年12月初，中央委員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宣稱：“應當爭取在若干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種農作物的耕

---

<sup>①</sup> 系六億人之誤。——譯者

地面积縮減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輪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紅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

可惜，这种詩情画意般的对事态度，距离中国的可能条件太遙远了。

第二年夏季，党又号召千方百計地扩大耕地面积，甚至要把土坡、路边、河岸都利用起来，但不是在上面种植花草，而是种植粮食作物。

上面引述的那篇決議，在談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指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 8 月決議中曾經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合作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人們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这项決議为一个需要緩慢演变的复杂过程規定了极其短促的期限，这个过程先要农民群众理解，然后他們才能加入。从那时到現在，已經过去五年了，如果再来考察一下人民公社的发展，可以說这只是 1958 年以来扩大了的合作社所有制、甚至个体所有制的发展。

再举一篇很能說明問題的文章，即李先念在 1958 年 10 月初視察河北、河南后所写的文章：“今年 8 月我們党的政治局在北戴河會議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吃飯不要錢，現在看来，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实行这个办法并不困难。哪一种产品丰富了，那一种就实行供給制的办法，按需分配和定量供給的部分逐步扩大，按劳取酬的部分逐漸縮小，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共产主义过渡。”(新华社 1958 年 10 月 17 日訊)

阿尔諾：这是十足的傅立叶式的空想共产主义！

維达尔：但在实际上，这个“一步一步”却是沒有节制的有害

奔跑。从1959年起直到目前，不得不处处恢复“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把它当作根本的办法，因为在1959年初农民的出工率大大降低了。

当时，这种“左倾表现”扩大到各个方面。1958年9月刘少奇对开封地委市委说：“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半工半读，可搞到高中，也可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三小时上课，或者四小时劳动四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定，搞他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新华社1958年9月24日讯）

这也是必须“又红又专”的时期，即处处要把政治学习和政治讨论放在第一位。

有时候，学生必须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花在小高炉身上，或者到人民公社去顶替那些被派去搞小高炉的劳动力，或者用于每天永无休止的政治会议。

在这个干部奇缺的国家里，学业的水平一下子就降低了。

1961年夏，陈毅在对北京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讲话时，敲了一下必要的警钟，他说：“而目前，我们应该强调专业学习。专业学校用很多的时间去搞政治、搞劳动，把专业学习放松了是不对的。我们不重视专业学习，我们的国家的科学文化就将要永远落后……学习专业要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孔夫子读书‘发奋忘食’，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公元526年去中国传佛教的达摩祖师‘面壁九年’，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求学问的精神。

“前一个时期，有的单位把那些埋头搞业务，少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的人，当作白色专家来进行批判。这是不对的，应该予以纠正……”。

在工业方面也有小高炉(我已經在前面提到了)。这些小高炉建于1958年秋季,1959年就被放弃了,因为它们的产品不能使用。搞小高炉的成千上万农民又回到农业方面去了。

在大部分是由苏联提供的现代化的工厂里,为了迎合大跃进的需要,机器的实际运转超过了原设计厂的规定。苏联专家指出了这种危险,但是没有人听从。结果,许多机器都被用坏了。

从1960年起就不再提苏联的援助了。他们把苏联机器的商标取下来,对记者说工厂是中国人民自己建立和安装起来的。

经济方面还有所谓“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原则。例如,他们突击生产钢,认为由于这一部门的高度发展而产生的不平衡,必定带动有关各部门的突飞猛进,并在更高的水平上再达到新的平衡。一些中国和外国经济学家指出过这种急于求成的危险。事实上,1960—1961年间,像武汉钢厂这样一些钢厂的生产减少了,因为原料(煤和矿石)供应不足。其他比较小的钢厂,也曾暂时停产。

1961年,我看到许许多多无人过问的工厂架子,其中有些工厂的机器已经摆在那儿,可是连包装还没有打开。大跃进和向共产主义强行过渡,已被改变不了的现实阻止住了。

希赛耳布雷什:在人民中国的历史上,的确有过一个决定性时刻:决定马上建成某种社会的时刻。这就是1958年期间,读一读当时中国的文件,就会知道,当时的一切都归结为速度问题。那是怎样的速度啊!“再多一些,再快一些,再省一些!”在这个问题上,也跟在其他方面一样,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是十分明显的。《毛泽东选集》上清楚地写着:“全党必须注意调查和研究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免陷入空想和冒险的深渊。”这种说法很对。他们与苏联的差别,在于他们不认为应该在中国消除这种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大跃进”不是由经济学家而是由思想家想出

和提出来的。如果当时听从被人輕蔑地称为“学者”和“专家”（諷刺的說法）的經濟学家的意見，中国本来可以不必以大嚷大叫的国际“运动政策”来摆脱这个巨大的失败的。

維达尔：新华社1958年9月29日南京电，就决定建立的社会类型作了如下报道：“他（刘少奇）說，例如，規模較小的农业合作社轉变成規模很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这完全是軍事社会主义。

普瓦特文：談到1958年这一年，人們可以提出各种問題。有两类問題我认为是重要的。

首先，要求中国人民付出的努力是否过分了？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社論（1960年北京“八届中央全会”的文件里引用了这篇社論）写道：“一小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他們附合着国内外敌对分子的誹謗运动……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的情緒……这种悲观主义的思潮，右傾机会主义思潮，是資产階級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內的反映，是当前的主要危險。”我們應該对这股悲观主义潮流作什么想法呢？中国共产党譴責了这种思潮，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內部事物。我个人认为，而且我只代表我个人說話，党内某些久經考驗的黨員的这种“悲观主义”，本来是應該公开地（的确我們沒有掌握所有文件）很好地加以分析的。这也許不单是甚么資产階級思想的反映，而且是考虑某些现实情况的值得称贊的关心。然而應該承认，1958—1959年人民的热情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现实，以致使人不能放慢生产运动。不过人們当时或許可以避免某些“錯誤”，但是我再說一次，这在当时可能做到嗎？

第二类是与人民公社有关的問題。但是，在提出这些問題以前，必須回顾一下某些无可否认的事实。农民看到了人民公社比



原有的合作社优越；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組織才能进行像水庫这样的基本建设工程，而合作社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只有人民公社才有足够调撥的劳动力来建立小工业生产单位（1959年6月有七十万个这样的单位）；只有相当大的組織才能兴办一些社会事业（卫生所、小医院）或建立学校，等等。在农民的眼中，这些优点是无容爭論的。

下面是我想到的一些問題。首先，党和国家当时是否拥有足够的称职干部来领导这些新的复杂組織呢？公社一級的生产指揮机构，在农民看来是否距离生产地点太远了呢？很难回答。只有在1958—1959年以后的几年里对人民公社进行仔細地研究，才能提供答案的内容。可惜，根据我們所掌握的文件，我們还做不到这种研究。

最后一个問題：1958—1959年时期的人民公社是否有使农民心中产生幻想——和幻想的破灭——的危險？的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決議也提醒注意防止某些誤解。決議中指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1958年12月決議）但是，隔了几行，这项決議接着写道：“不錯，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給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則的萌芽。”該決議的以后几頁，明确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則的差別。決議宣称，只要社会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的丰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則，就会妨碍人們劳动的积极性”。但是，在公社的实际生活中，这些正确的原則是否都被正确地付諸实践了呢？他們是否凭着一股热情打算走得太快一点了呢？他們是否賦予“共产主义原則的萌芽”以它所沒有和不能有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了呢？

我們对这些問題同样不能作出滿意的答复。我个人希望中国

同志能給我們提供大量的精確資料，以便對這些問題作出滿意的答复。

維達爾：中國領導人實際上沒有提供可以解釋為什麼修正1958年觀點的資料。1958—1959年的人民公社的特點在於：它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基層單位。正像人們所說的，人民公社的優點之一應該是在更大規模內（包括數以萬計的人：兩萬到六萬之間）組織生產、安排勞動力和建設大型農業工程。公社擁有生產資料，處理收穫下來的東西，向各生產大隊分配它們應得的收穫份額，決定投資和管理全社。後來所做的修正，首先在於將生產大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變為基本核算單位，即生產大隊現在有權制定生產計劃，擁有生產資料和處理收穫下來的東西，並根據普遍恢復起來的“按勞分配”原則進行分配。

今天，財產、管理和分配的基本核算單位是由十戶到五十戶組成的生產隊。

這樣一來，人民公社甚至生產大隊的作用大大縮小了，人民公社的作用與從前的鄉的作用沒有太大差別，即起了某種行政和政治的協調作用。總之，真正的人民公社的經濟不斷縮小。在大部分情況下，公積金完全歸生產隊所有。在其他情況下，拿出很少一部分上繳給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

1958—1959年賦與人民公社的作用的消失，同樣還表現在國家又買回了人民公社的拖拉機，把它們交給為數個公社服務的拖拉機站。

宣揚一時的人民公社小工業不斷減少，而仍然存在的這種小工業，雖然仍受人民公社的控制，但已不再向公社繳納任何款項了。

至於人民食堂，早已無影無蹤了（除去在收穫時期），這是完全正常的。

普瓦特文：毫無疑問，他們已經修正了原來的觀點。這是因為重新審理理論，還是由於需要的影響呢？

在1959、1960和1961這三年當中，中國連年歉收，這一方面是由於波及全國的嚴重自然災害，另一方面毫無疑問是由於人民公社組織的缺點和缺陷。但是，兩方面應各負多大責任呢？歉收特別給城市帶來了嚴重的糧食困難。這些困難，由於採取一系列有利於農業的措施而被克服了，比如停建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工程，使不久以前到城里來的農民回鄉，根據“以農業為基礎”的口號使工業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的需要服務。這就是說，他們採取了十分古典的觀點。

現在的形勢確實好轉了。凡是在1963年到過中國的人，以及所有外國觀察家，都確認了這個結果：比起三年前，人們的生產、飲食和生活都好轉了。

我認為也應當強調一下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對新中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援助。十年當中，蘇聯先後派遣了一萬零八百多名專家，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派遣了一千五百多名專家；蘇聯幫助興建了一百六十六項大型工程，各人民民主國家幫助興建了一百二十五項大型工程。（1959年周恩來在《偉大的十年》中引用的數字）

維達爾：此外還能提出許多其他問題。我覺得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左傾的發展同時表現在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上面，但是對內政策路線未做任何自我批評，就相當迅速地得到了糾正，領導人在對內政策方面做得靈活了一些，採取了比較現實的觀點。

我覺得，這是由於中國的錯誤後果造成了立竿見影的災難，領導人每天碰到的執拗的現實毫不準備向唯心主義的觀點屈服。

反之，在國際問題上，中國領導人對局勢的許多因素一無所知，長期以來一直凭空推論，但是我認為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後果，

因为不光是他們在世界上活动，而且后果也不是立竿見影的。

古昂：然而，这却是一个与全人类休戚相关的决定性問題。这是有关革命运动道路的分歧問題，換句話說，是我們时代人类进步道路的分歧問題。

生活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世界各国人民之間的发展极不平衡，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現在与以前不同的地方在于，最迅速地填补这些不平衡的問題，向所有的人或者向几乎所有的人提出来了。但是怎样解决这个問題呢？为了全面地了解高度工业化的各国人民的进步以及刚刚摆脱部族阶段和經濟非常原始的各国人民的进步，必須作出巨大的努力。与此同时，还必须作出和創造經驗，創造具体的形式。在观点上可能发生分歧，这是不足为奇的。

各国人民之間，甚至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間，都可能存在着极其现实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經濟互助委员会的专家们知道，要想恰当地确定各成員国的生产、进口和出口是多么困难。但这都是次要的矛盾，如果总的战略一致，这些矛盾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問題似乎正是出在这里。

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首先是最早建立和最先进的苏联的生产力，过去和現在都有日益巨大的发展。因此，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較晚或将要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間，便出現了很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現象消除得相当快，但还比以前設想的慢。在这种情况下，最先进的国家是應該放慢发展速度而用更多的力量去援助发达較慢的国家（不論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呢，还是應該更加加快本国的发展速度以增加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威信，从而增加物质援助能力，尤其是政治援助能力即示范力量呢？

阿尔諾：可以不客气地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假如苏联在某时候拥有一亿美元，本着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这笔錢是投在苏联

好呢，还是投在中国、埃及或馬里好呢？”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时代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既然根本问题是“如何战胜帝国主义？”，那么，考虑到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就不能忽视下面这样的事实：在目前情况下，这一亿美元在苏联会获得最高的生产率，就是说能最多地增加社会主义与和平阵营的威力。

但是，可能有人这样回答：政治和经济的最高利益，要求在苏联投资五千万美元，在埃及投资二千五百万美元，在馬里投资一千万美元，等等。

我想强调的只是：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不能从道义角度而只能根据力量对比来考虑事情，这是一个实际问题。

过去曾经一度提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同时进入共产主义的主张。这个主张很美好，做大哥的等着小弟弟，并把他们养大。但是，这样就必须放弃苏联和最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张，就会带来这种选择可能造成的后果。

古昂：看来，中国领导人选定了这种看法。这或许符合于他们国家人民的利益。但这是错误的。唯一能使中国人达到真正富裕的办法就是增加生产。为此，第一件事情是中国人民自己劳动。其次才是外援，例如得自苏联的援助。但是，这种援助怎样才能最有效呢？——是苏联把它拥有的全部产品（机器或消费品）都供给别人时有效呢？还是它继续加快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使它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年复一年地拥有更多的用于外援和交换的财富时有效呢？不提高苏联本国人民的福利，又怎么能继续这种发展呢？

因此，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和苏联人民的利益并不矛盾。

再谈谈另一个问题。苏联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是以强大的工业、技术和科学力量为基础的。苏联的军事力量是保卫和平的最

有效因素之一，它迫使帝国主义者用比較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这一点，今天比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楚了），从而导致了局势的緩和与減輕了沉重的軍备負担，解放了用于和平生产的能力，特别是消費性生产的能力。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在这个問題上同样希望看到苏联加速发展。

肤浅地看待事物就会看不到这个真理。他們好象是想說：你們有富余的，那就給我們好了。也应该承认，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反的誤解：有些人认为，为什么要把我們的劳动果实送到那些不反过来帮助我們的遙远的国家去呢？他們这样认为，是忘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可使新近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看到社会主义的具体成就，使它們得到执行反帝或至少是中立的政策的物质手段。同时，这种政策是削弱帝国主义的一个因素，它可以減輕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努力，并减少威胁着他們的危險。这里沒有所謂“慈善的”援助，而是双方互利，各为共同事业（和平和向社会主义迈进）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

阿尔諾：这个問題值得大家多談一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間（有时与新近独立的各国人民）平分財富的主张，似乎会使好心腸的人向往。但是，我們試想一下苏联人同七亿中国人共分自己的財富。这样，苏中两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呢？也就是說，得用多少年社会主义体系才能显示出自己对資本主义体系的优越性呢？人們一定会說，这是卑陋的唯物主义！这是我們时代的一个现实問題。

在社会主义还不存在的时候，斗争只是在思想領域内进行。社会主义优越与否，当时仍然属于理論范围的問題。社会主义誕生了。历史容許它首先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困难重重的国家里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理想从思想領域走出，变成了现实。它应当显示的不再是理論上的优越性，而是实际上的优越性了。我們不能

为将来可能建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而消除今天正在建設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在我們时代，示范的实际教育已成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并不是說，为了使其他各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非使社会主义在所有人的眼中都显出它在各个方面都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优越不可。首先，这是脱离实际（看一看古巴，看一看阿尔及利亚和馬里的努力）。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得成就，已使人剝削人的現象、主要生产資料和交換資料的私有制显得愈来愈不合理了，而生产資料的集体所有制則显得合理了。

如果不把西欧和北美各国人民当作无足輕重的人民（以后我們还要談到这一方面），那就确定无疑地要以这种方式来綜合决定着高度工业化国家人民的革命成就和工业化程度不高国家人民的革命成就的那些因素。（弗朗西斯·古昂已經談过这个問題）

希賽耳布雷什：中国领导人現在的观点并不总是他們过去的观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論》一书中写道，中国革命“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但是，理論闡述的正确性，是和由于孤立而缺乏的实际經驗脱节的。因此，像意大利記者余波迪这样的观察家早在1959年就指出：“中国人似乎确信西方世界正处在严重危机的前夜，他們害怕共处政策会延迟这一危机。”还应该加上一句：他們深信非洲和拉丁美洲明天就会爆发革命。反正，他們已对共处作出等于否定它的狭义解释：“不应把共处和帮助资本主义苟延殘喘混为一談。”按照这种說法，倒好像资本主义本身沒有能够繼續生存下去的源泉似的。

古昂：我认为中国同志的一个严重錯誤，是企图把自己的經驗普遍化。为此，他們就要忘記自己历史的具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条件。中国的幅員广大和政治割据，使过去的斗争常常采

取运动战的形式，各个地方不能同时解放，建立起共产主义的地方“根据地”。中国居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民，存在具有一定传统的远离城市进行活动的革命部队，这便使武装起来的农民具有了头等重要的作用。旧制度的极端腐败，使道义行为增添了革命意义。这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

这个经验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贡献。但是，不能把一项贡献同整个理论混为一谈，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与这个部分经验相符合的东西抽出来当做“全部”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不单是中国的问题。当确定国际工人运动的共同路线的时候，一开始就要放弃这样的主张：要使这条共同路线成为某一个党的路线，是它“自己”的路线。共同制定出来的东西，正是对各党的经验作了分析，同时又使这一经验回到整体中去了；由这个分析得出我们所说的共同战略，每个党都有责任使这个战略适应于自己斗争的实际条件。这种适应带来的策略上的分歧，甚至推断方法上的分歧，都是十分正常的和必然的。因此，可能有人留恋以往时期的完全的、组织的统一。

我想起了关于解散第三国际(1943年)的秘密争论。当时有些同志说，第三国际的解散是由于战争期间联系困难所造成的，战后还要重建国际。这当然是另一回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应该重建革命政党，以取代陷入沙文主义和阶级合作的社会党。按照当时流行的一种不管恰当与否的说法，应该使各党“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说，仿效第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样子，使各党都成为阶级的党。一个由全体选出的集中的国际机构，当时无疑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各党在本国人民中日益生根和各国无产阶级日益明显地成为民族的主要力量，再加上各党的政治进展，而使共产国际的组织成了一种障碍。所以才解散了它，这不是一个阴谋，而是(共产主义)运动过渡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使各党具有更大的机



动性,更具有民族色彩,更好地結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如果人們現在要想去找策略的提法和决定上出現的分歧,这是违反这一发展的。有时人們企图这样做,并且不去了解这种或那种立場就加以譴責。但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績在于能够把所有这些經驗归納在一起。双边或多边会晤,交換意見和情报,定期举行綜合性的或筹备性的大型會議——这些已經使用的方法,正是把“战略”目标的共同性同根据条件和經驗而由各党具体貫徹的灵活性結合起来了。苏联共产党在这个整体中所起的杰出作用,并不是出于甚么主观选择,而是来自最明显的事实:苏联是第一个国家,它有最丰富的經驗,代表着最先进的社会主义。

这一切都說明:中国共产主义具有自己的特色,本来无可非議。严重的是,我們的这些同志不再正确地看待本国的特点,而开始以己度人。事实上,恐怕中国领导人不是真想犯这种錯誤,而是他們的态度有問題。也許他們以为,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問題,相当接近他們过去所遇到的問題,所以他們能够取得解放运动的領導权。于是,把自己的經驗当作理論来普遍推广,就不只是一个錯誤,而是要使这种做法成为爭夺領導权的工具。

結果,他們的論点具有了如下的內容: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經疲憊,丧失了革命銳气(“如果把眼前的运动当作一切,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牺牲无产階級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十足的社会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五点在談到資本主义国家无产階級政党时是这样写的);苏联工人階級获得了一定的福利,他們害怕失去这些福利,因而也不再是革命者了,这使他們的领导人背叛革命,并且与帝国主义妥协;你們这些受尽屈辱和貧困的人民,轉向我們吧!你們是当代的革命力量,我們是最重要的不发达国家,已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們来引导你們!这个論点是以烏托邦的、唯心主义的革命观点为基础的。更通俗地說,这是民族主

义論点。

民族主义是一个可怕的危險。由于它总是与伟大的人民运动的主要动力之一（民族情緒）并行，所以就更为可怕。中国革命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它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初步成就，1953—1957年计划的初步成就，发展了理所当然的自豪感。在产生困难的时候，毫无疑问只有一件事情要做；或者向人民說明真相，分清錯誤和自然灾害应摊的責任，承认事情的进展并不像以前所說和确认的那么快；或者试图人为地維持热情，更确切地說維持对热情的丑化；紧张的建設气氛。他們似乎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于是陷入錯綜复杂的困难局面。外来的敌人（先是日本人，后是美国人）被打敗了，国内敌人也被击潰了，所以不得不制造出使他們現在必須保持动员状态的敌人，即制造出困难的責任者。那些沒有給予他們以足够帮助、与帝国主义妥协、背叛革命、抵制中国革命者的奋发精神和正确观点、不了解他們的問題、不能理解他們、成了前进中的主要障碍的人，就成了他們的敌人。

苏联的經驗本来可以使人引以为戒。苏联曾經遇到过大致類似的問題。在苏联，革命的第一个热潮，曾經是热中于和平，热中于分配土地和推翻专制制度；第二个热潮（国内战争期間）是既热中于維持这些成果，又热中于成为世界革命的战士。但是，世界革命沒有到来，这种热潮变成了建設的热潮。这是不能太浪漫的，而要求冷靜的思索，但人們知道这会得到什么。人們还知道，由于資本主义的包围，苏联始終沒有完全避免民族主义的誘惑。人們尤其知道，为維持一定的紧张气氛，也曾几度运用过一些人为的方法。中国领导人非但不从人命的巨大牺牲这种悲剧中以及随之而造成的創造力的損失中吸取教訓，反而为这些方法辯解，維持最丑恶的斯大林时代的做法。

普雷沃：不承认錯誤，拒絕学习理論，拒絕對錯誤和必要的后

退做公开的批評，这始終是很危险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在这方面开了先例。有人說，在二十大的时候，苏联人民已經成熟到足以接受打击的程度。但是，当列宁实行新經濟政策的时候，苏联人民是不够成熟的（列宁也說过），而且毫无疑问不会比現在的中国人更成熟。另一方面，这一切都是很抽象的，因为中国人民看得很清楚，有人抛弃了經驗。結果怎样了呢？人們进一步了解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害怕对斯大林的方法进行批判……

古昂：他們在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和《紅旗》的評論文章中指責赫魯曉夫“背信弃义”地控告斯大林是“迫害狂”，是“严酷的专橫”，“走上了大規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为什么要这样否认今天不幸为历史所证实的事实呢？若不是他們认为这些方法本质上是正确的，那就是因为他們认为人民應該听从指揮棒。实际上，中国报刊紧接着指出：“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階級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产階級专政必然要求施行恐怖嗎？真是糊塗已极！不錯，无产階級专政带有群众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强制的成分。不錯，从雅各宾党人的观点来看，在一定时期，为了应付具体的威胁，恐怖可能是必要的。列宁沒有隱瞞这一点。在內战方酣的时候，他在回答一位美国記者的問題时說：“只是在剝削者即資本家展开反抗以后，我們才开始有系統地鎮压这一反抗，直到采取恐怖手段。”但是，从来沒有人把无产階級专政同列宁为回击少数剝削者的恐怖行为而“正确采取的”并“加以限制”的恐怖做法等同起来。

中国的这种无产階級专政观点所以令人特別担忧，还在于这种观点走得太远了。它使得中国领导人用放大鏡在苏联的流氓和行賄者当中寻找出一个“資產階級”，苏共必須对这个階級实行鎮压，否則苏共就被宣布为反革命。“理論上”的論述无力到这种地

步，真是可悲的。实际上，这是对革命观点本身提出了怀疑。按照他們的观点，革命永远沒有完成的时候，敌人永远消灭不干净。根据辩证的观点，已經达到的阶段都是新阶段的始点，已經克服的困难将让位于新的困难，新困难的克服又会带来新的成績。他們认为我們沒有这种观点，而是对革命抱有軟弱无力的观点。在他們看来，革命是采取同样形式、反对同样敌人（实际存在的或不存在的）的永久斗争，当敌人被消灭了以后，就应该制造敌人。

阿尔諾：历史原因的落后問題，是我們时代最令人关切的問題之一。我认为这是許多观点分歧的根源。我們大家和整个进步运动，恐怕都对这一点有过烏托邦的想法。我們低估了困难，想用很少几年来填补历史原因的落后。绝对不要忘記，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了好几个世紀才使国家工业化了，从欧洲最初建立高炉到出現现代化工业经历了七个世紀，工人階級經過好几代人方在技术上、心理上和政治上鍛炼出来。只用二十五年的时间就能走完欧洲五百年走过的路程嗎？欧洲工业化所需的資本，一部分是依靠掠夺其他各国人民积累的；另一部分是依靠本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对劳动力的无耻剝削、使用童工和采用奴役制度而积累的。美国的飞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不需要解决土地問題和消除农民生活中的数千年来守旧东西。土地都空着沒有利用，工业化所需的建設資本来自外地。而一些新兴的国家，則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情况。

在欧洲緩慢进行的、經過几个世紀以强制手段实现的过程，在亚洲、非洲能够較快地不采取强制手段而实现嗎？同时以什么速度来实现呢？

从性质上来說，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都是既反对当地的封建制度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从性质上来說，所有这些革命差不多都是由出身于资产階級的人（他們有时是受到馬

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领导的,(也是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农民起义。在初期,事情还比较单纯,容易区分敌人:地主、高利贷者、贪官污吏、警察、外国人。一旦占领者被驱逐,贪官污吏被清除,地主被剥夺,得到土改的好处和摆脱债务的农民就会产生自满情绪,因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已经达到了,有了自己的土地。

只有储备农民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才能进行必要的工业化。由于技术水平很低,这只有依靠更多地劳动(没有空闲时期)和更好地劳动(更加迅速地)才能做到。怎样提高产量呢?

简单地合作是一个方法。经验证明,这很容易做到。共同使用土地和农具是理论上的理想。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些困难。最后,农民可能感到集体化是一种剥夺。但是,集体化还是被接受了,因为他们信任自己的领导人。不过事实上,农民在自留地上往往要比在集体田里劳动得更有效和更好。

让农民通过经验去认识个体所有制的生产水平太低不是更好吗?但是,时间紧迫,落后状态有扩大的危险!此外,个体所有制的扩大本身带有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而人们正要消灭资本主义。因此,就紧张起来。这不是要强制推动事物的进程吗?目的不是要证明方法的正确性吗?

人们越取得发展的经验,就越对苏联的成绩感到钦佩。苏联只用了四十年,就能与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争雄。当然,这是以举国一致的紧张努力为代价而取得的。有人可能要问:中国人面对着国内发生的困难,就不应当把表现在各方面的这种紧张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吗?因此,对斯大林的指责就是没有根据的。人们还可能要问:苏联人今天是否不再需要“个人迷信”了呢?这种迷信在过去可能有过好处,也许是个必要的坏处。中国人在这里符合了《快报》的法朗索瓦兹·吉鲁的说法。二十二大以后,吉鲁在维护斯大林时写道:“他的手……抓住懒散浪漫的旧俄罗斯,使它在血

流成河的同时，流出无数吨的钢铁，建成许多学校；誰能比他做得更多更快呢？”当时我们就写道，我们摒弃这种辩解。

弥补历史原因的落后是有困难的，而面对着这种困难所产生的急躁情绪，可能是中国领导人的某些观点产生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于能够提高威望的个人迷信非常感到兴趣。这可能是提高威望的一个因素。在中国农民中间，有了这种迷信，事情可能就好办了。当然，农民群众本身不会想出迷信以外的威望。意识总是落后于现实的。一方面确认意识的落后，另一方面又维持这种落后。

雄达尔：事实上，中国盛行着对毛泽东个人的狂热迷信。中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反对谴责这种实践，这是不足为奇的。

人们把毛泽东个人神化，到处树立着他的半身像和雕像，周围还布满了鲜花和绿丛，儼如一个祭坛。他的彩饰肖像也是到处悬挂着，在西藏，他的肖像甚至披上了人们献给菩萨的哈达。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这种现象或试图说明毛泽东只是一个人。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一些诗歌，充满了神秘主义的祈禱性质，这表明人们不是在反对个人迷信，而是在推崇个人迷信。

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而不归功于全党和人民。许多错误就是因为对他的思想和其他领导人的思想的不正确解释而产生的。

我认为，回想一下如下的严重反常现象是有好处的：中国共产党的上次代表大会是在1956年召开的，迄今已经七年了。这届代表大会的第二届会议，是在1958年5月召开的。但是，中共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形下，中央委员会可以决定延期或者提前召开。”（第三十一条）人们可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年以来都是处于特殊情形下了！

希冀耳布雷什：因为我們談到迷信問題，所以我觉得 中国人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恰与斯大林对待中国革命采取的行为形成完全明显的对照。在这个問題上，既有一些光明面，也有一些阴暗面。长期以来，中国革命运动所犯的錯誤，尤其是到 1935 年（这年毛成了党的主席）糾正以前，都被說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錯誤。現在，却說在这些錯誤中也有斯大林的份儿。中国发表的《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第一次指出斯大林犯有“左傾”过火行为，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主要打击目标（1927—1936 年間）。的确，人們可以进行討論，以便查明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某个領導集团过分狹隘地解释了斯大林在“国际”和东方民族大学提出的意見（因为斯大林也曾強調指出在中等阶层很多的国家內实行联盟的必要性）。但是，事实（即战前中国共产党的失敗）俱在。另一方面，斯大林也确实不相信 1945 年后中国武装暴动会获得成功。但是，尽管如此，中国最近論述斯大林的文件，仍然总结說光明面胜过阴暗面。看来，这不是为了說明斯大林在新中国的誕生中起过作用，而是为了說明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过作用，即贊同他的領導方法。

人們还記得，二十大以后，中国人和我們一致，曾要求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进行科学的分析。但是，后来的事件表明，他們当时对这个問題的关怀是不够純洁的。他們认为匈牙利事件是“非斯大林化”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非斯大林化”本身就是一件坏事。这样，人們便理解一位中国領導人曾两次到华沙去的原因了：第一次是去鼓励哥穆尔卡，第二次去是提醒他注意共产主义运动只有一个头，这个（乐队的？）头当时就是苏联。但是，仔細一看就会发现，早在 1957 年中国人就已經认为，苏联由于揭发“迷信”而沒有完成共产主义运动引路人的使命（他們曾經特意把这一使命托付給苏联），所以这个使命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他們中国

共产党人身上……

阿尔諾：我們現在又回到中國人對我們時代的革命運動及其任務的看法上了。

我們已經談過，他們對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生活條件和鬥爭條件是不了解的。這是一個令人關心的問題。1960年世界工聯在北京召開理事會會議的時候，中國的同志向職員聯合會書記皮埃爾·德隆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工會的基層組織是否備有武裝？”當時，德隆以為他聽錯了。也有人向我提出過同樣的問題，那個人問我：“你向我說說，既然法國共產黨擁有幾十萬黨員，法國農民走上了街頭，而法國又存在着事實上的工农聯盟，那麼，你們為什麼不在中部高原山區建立游擊隊，從這些山區開始組織解放區呢？”我未能以我的交談者得以理解的話回答他，因為這至少要把兩世紀以來的法國史講給他聽。

維達爾：1958年夏，我剛到北京。在同一個專門負責西方問題的工作人員討論的時候，他突然問我：“可是，像你們這樣的一個黨，或者像意大利那樣的黨，為什麼不在你們國內建立紅色根據地呢？”

阿尔諾：只按照自己的經驗來判斷另一個國家的情況的傾向，一般來說是很大的。這種推廣自己經驗的傾向，在所有的革命運動中到處都可以看到。我在古巴看到過，在旅居國外的法國共產黨人身上也看得到。在一般幹部身上出現這種傾向是不足為奇的。但不應當出現於領導人階層。一個共產黨領導人，應當竭力全面掌握世界局勢。我不相信許多杰出人物沒有作過多次旅行。旅行並不一定會使人明智，但是沒有旅行就沒有明智。如果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老是呆在德國或俄國，他們還能成其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嗎？肯定，斯大林也從旅行中得到了好處……我確信，赫魯曉夫在訪問英國、美國、法國、印度、緬甸、中國等等國家的過程



中，也得到了不少收获。一个共产党领导人不能只从本国内或甚至只从社会主义阵营内吸收经验。他也不能忽略各国的历史。这里所说的，不是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优越的问题，而是必须认识各国的差别的问题。

维达尔，对于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肯定是中国领导人犯错误和出偏差的原因之一，人们可以在1960年7月间充斥中国书店的《列宁主义万岁》这本小册子里看到这种无知。

我只举书中有关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部分作例子。文章的作者为了证明这种可能性实际不存在，就以西藏为例，说那里具备最好的和平过渡条件。解放军就在当地，但是剥削者仍然制造了叛乱。

我还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当时不曾相信我的眼睛。一年以前，即封建分子叛乱后几星期，我到了西藏。到了这个高原，我好像进入一个完全处于十二世纪、完全屈服于农奴制的社会，一个没有文化、受“活佛”统治的社会，一个由于丛山峻岭环绕而可能是世界上最隔绝的社会。这里连工人阶级的影子都没有，而是就像任何中古社会一样，只有以完全原始的方法从事劳动的农民和几个手工业者，以及僧侣和领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这个社会为例子，来说明我国的工人阶级同农民、中等阶层和垄断资本的一切受害者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指望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当《人民日报》的领导人第一次请我写一篇文章谈谈我国的情况时，我感到他们也同样暴露出对法国以至西方情况的无知。当时，正是1961年我国农民走上街头，冲进省政府的时候。

他们把这些现象看得比在这前后展开的工人斗争更为重要，这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把一切现实都同自己的经验联系在一起

了。他們的經驗尽管很丰富，而且反封建的农民起义也在中国的解放中起过决定性作用，但也是有局限性的。

阿尔諾：在中国領導人的看法中，这也是令人不安的一面。在他們看来，欧洲（包括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北美好象变得不甚重要了。甚至觉得它們可以不必存在了。在我們引用的《中国》这个杂志上所刊登的最近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报告說：“大会的組織者仰承帝国主义尤其是世界人民公敌肯尼迪的鼻息，蹂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妇女群众的願望，把錯誤的路綫强加給大会。”毫无疑问，中国領導人有一种傾向，想要强制人們蔑視或仇視欧洲和北美。他們企图在体育、科学等等方面建立一些只許世界的这些地区参加而排除欧洲、苏联和美国的組織。

这种企图实在荒唐。并非因为我們是欧洲人，而是从一般人的观点，从人类的未来的观点来这样說的。不管人們乐意不乐意，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內，整个世界的未来主要还不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为轉移，而要以欧洲和北美所发生的事件为轉移。因为毁灭人类的手段以及人类发展的最重要手段，都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里，这里仍然要拥有最先进的科学。詛咒是改变不了实际情况的。

有过一个时期，人类发展的中心确实曾在东方。后来，随着产业革命，这个中心就移到欧洲了。也許这个中心明天会回到东方或移到其他地方。但是，如果欧洲和北美今天消失，这将导致人类的大倒退。

因此，目前对人类前途負有决定性作用的世界这些地区的工人階級和先进分子，便具有特殊的責任。中国領導人认为，說这些地区是“风暴地区”，可以討好欧洲以外的其他大陆的人民……全体人类都是休戚相关的，所有的斗争都是相互依賴的。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階級給本国帝国主义的任何打击，都有利于欧洲以外各

国的斗争，反过来也是如此，正像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任何成就都有助于同一目的一样。这是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

中国领导人所以否认这种现实，实际上只是因为他們别有打算——争夺领导权，或者对于革命抱有特殊看法……

普雷沃：只要重读一下法朗兹·法农的著作，就会发现这是十分明显的情况。我觉得分析这个情况是容易的，因为关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迟钝”的理论，关于把全部革命精力集中于“第三世界”的各国农民身上的理论，已经广泛地传播到新近摆脱殖民主义或正在从事解放事业的国家之中。令人惊奇的是，目前某些中国人也说，必须承认他們的马克思主义还不十分巩固，因为它没有受到过抵制。

“法农主义”也是“幼稚病”的一个方面，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还没有免疫性。我们可以从《现代》的那期他們称为“中苏争论”的专号中找到例证。大家知道，让·保罗·萨特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作为这个理事，他毫不含糊地拥护和平共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为法农的书作序，赞扬法农是“恩格斯以后第一个”(?)再次阐明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的人。——顺便说一下，这表明他把《反杜林论》读得太快了。这能说明什么呢？在上边提到的那期《现代》里，发表了安德烈·高尔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前三分之二，基本上是说苏联人有道理的，而最后三分之一则以后悔的形式对前边刚刚说过的话作了自我批评，而结果必然得出折衷主义的结论：“事实上，要同时进行两种斗争：既要进行和平共处和以富裕的共产主义示范的斗争，又要为无产者人民的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而斗争。”

这种推论也给我们规定了一项基本任务：对现代世界的各种矛盾继续进行深刻的分析。初步的结果已经表明，中国的论点不仅对经济先进的国家的政治斗争不适用，就是用于不发达国家也

是有害的。不管我們作出多大的努力去了解中国領導人的理論，这种分析仍然确定了我們拒絕妥协。

阿尔諾：中国領導人当前的文章的特点，就是他們的那种喧囂語气。但是一陣风过去以后，便沒有什么了。

这些喧囂真能对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国家的战士們有什么帮助嗎？任何帮助都不会有，只有把他們引向悲劇的死胡同。例如，我清楚地看到生活在欧洲（不是在非洲，而是在欧洲）的非洲留学生，被中国的革命号召迷惑了。他們当中有一些人，往往因本国所要解决的任务繁多，因本国的发展緩慢，因新殖民主义和腐化墮落所造成的障碍而感到不安，所以可能被这种奇迹般地解决他們問題的使世界发生灾难的观点所迷惑。我應該說，这种使世界发生灾难的观点，会对各个大陆的各代革命知識分子产生影响……但是，激昂的情緒过去以后，现实依然如故。革命的辞藻可以誘惑人，但是听到这种辞藻的人依然沒有防禦能力。

那么，人們不禁要問：中国領導人所說的革命是什么呢？他們确定革命的意义时不是根据革命力量所負的实际任务，不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全人类的和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于每个革命者來說，这些任务都必須根据实际可能性来确定。例如，对于一个象法国这样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來說，革命的任务是通过为了达到目的所要进行的斗争和斗争方式，在政治上孤立資本主义垄断集团，剝夺他們的政权，根据本国条件实现主要生产資料和交換資料的集体所有制；对于新独立的国家的革命人士來說，他們的任务是实现民族民主的綱領。1961年11月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对民族民主的綱領作过概括的規定。

过去，中国領導人很善于制定每个阶段的任务。而今天，他們只用风和风暴这类不具体的辞藻来談論革命了。

普雷沃：过去，他們也善于分析局势，并从中得出斗争所需的

实际結論。我們可以从上面引用过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公敌肯尼迪”这句话作例子。不久以前，他們关于在一个特定的帝国主义的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的估計，也是很細致的。我还要提一下他們1956年的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确实人們看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文件！刘少奇正确地譴責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而且他还补充說：“美国人民也已經逐漸地体会到这种政策为他們带来沉重的負担和战争的危險。就是在美国統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較清醒的人逐漸認識到战争政策未必对美国有利。”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当我們的美国共产党同志在1962年的时候說了同样的話（这句话在当时显得更加正确），却被同样的中国领导人指責为“有罪”。当赫魯曉夫象所有貫徹始終的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于出现在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和每个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持有类似的想法时，他受到了人所共知的攻击，而中国领导人却没有重新估价他們在1956年所写的东西。他們并未給我們說明，为什么这种說法不再正确了。

阿尔諾：此外，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世界上的群众要求权利的行动，所有的男女都反对帝国主义和贊成革命，一号召他們起来他們就会起来。这不符合西欧的实际情况，尽管那里的无产阶级人数最多……同样，这也不符合其他地方的情况。在非社会主义世界里，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态依然是反共主义的意識形态。人們應該想起，古巴的革命者从1953到1959年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者从1954到1962年的反帝斗争的胜利，就一部分是在非共产主义或甚至是在反共主义的旗帜下取得的。古巴领导人自己也說，这是他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反共的意識形态后退了，但是它还占有統治地位。它的后退恰恰是因为阶级意識还没觉醒的人正在取得經驗，因为共产党人拥护和平，因为他們是生活的旗手，因为他們譴責对于生命的摧

殘，否則共产党领导人就会犯罪。

另外，中国人所吹嘘的正是已故的福斯特·杜勒斯的策略的翻版。在美国握有原子垄断权和领先地位的时候，杜勒斯曾主张采取“推回去”政策，首先把社会主义推到苏联境内，然后设法叫它屈服。杜勒斯认为，必须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上施加压力，必要的话，一直走到战争边缘，估计苏联不敢交战，一旦爆发战争，美国也必然取胜。中国人认为，既然今天军事力量的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那就应该对资本主义实行军事压力，迫使它后退，直到战争边缘。他们考虑的是，如果战争不能避免，那末帝国主义无论如何必将毁灭。这是“另一种意义的”冷战政策。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政策是不相信人民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希赛耳布雷什：最近，我偶然想起毛泽东的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虽然我个人早已把它忘了，但在当时传诵一时的这段话，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叫人感到惊奇。毛泽东写过一些杰出的理论著作，比如《实践论》、《矛盾论》等等，将来也许应该根据我们已知的事实来重读这些著作。但是，他也是这句话的作者，这句话就是：“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和白纸一样白。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对诗人的这种比喻需要加注。这样一种观念只能出自一个文人，按照这种观念，人民不过是艺术家手中的一块软蜡，可以用它做一切，而且可以把它做成一切。这样的观念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直到1956年为止，中国完成了一个真正的跃进，而且没有人研究过是对人的什么观念激发了中国的革命。今天，在深思这个观念的含意（公社的冒险行动已经作了清楚的说明）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想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来不是群众的观念，而是某些知识分子的个人所有物。农民是通过土地改革争取过来的，而且人们一致把土地改革看作是“毛泽东的杰作”。

但是农民是否受到了馬克思主义的熏陶了呢？

在論毛的革命理論的小冊子里，陈伯达非常简单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們党拥有大量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

我认为必須从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点中寻找中国领导人在对内和对外方面，由于真正冒进所犯的錯誤和失败的根源。

有人談到苦行主义。我又看了一下著名作家韓素英女士的一次談話。在这次談話中，她是这样回答“在中国，一个共产党人是什么”这个問題的：“是一个圣人”。她接着說：“这是些真正的苦行主义者，他們富于責任感、謙虛、耐心、平易近人，他們的待遇为別人的十分之一，工作却比別人多十倍……，他們无限忠誠：言行一致，不怕自我牺牲。”有人會說：韓素英并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我們还可以在刘少奇的著作中看到关于共产党员的定义：“在沒有人監督的情况下，能以自己的行为有別于人。”換句話說，就是一个人在素不相識的群众中要有鋼铁般的意志。布莱希特在他的关于青年的剧本《决心》（正在中国上演）里提供这样的共产主义形象时，他是不是一个預言家呢？在那个时期，他对共产主义有一种“神学”观念：个人不再存在，革命是上帝，它可要求信徒牺牲一切。在布莱希特的思想里，也把馬克思和孔夫子看成一样了，但布莱希特并不是一个国家的首腦……

阿尔諾：也許要为《人的条件》（一本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中国革命者的书）的作者馬尔罗恢复名誉吧！并且要追想陈某人对1935年时期的年輕革命知識分子的誘惑力呢！

希賽耳布雷什：这不也正是那种要进行所有的工作人員和其他知識分子都从事体力劳动、“回炉改造”——这是什么修身名詞！——的苦行主义观念嗎？讓我們看看事实：被送到乡下去的，主要是那些“右派”。应当指出的是，他們竟把这个說成是符合于

列宁关于消除官僚主义的原则。“对于政府的高级工作人员来说，为了消除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最好的方法就是离开办公室，放下架子，完全象农民一样去种地或种试验田。”另外，我们还可以读到：“他们的思想方式和他们的感情可以真地变成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他们同广大的群众之间的思想隔阂可以消除。”还有：“这一创举一下子解决了特殊和一般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领导联系群众的问题。”

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乌托邦主义。我们所以指责中国领导人，并不由于他们那么希望建立这种或那种类型的社会，而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愿意考虑人们在一定发展水平可以理智地考虑的问题。当唯意志论支配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的精神状态时，人们是会感到不安的。

古昂：在重读阮克维在《思想》杂志 105 期上发表的《儒教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之后，我懂得了碰到的这种革命观点的许多因素。作者多次指出，他的看法也适用于中国，他把中国和越南都称为“儒家之国”。我认为，对于一个不是象我们这样从外部观察事物而是从内部观察事物的人所提出的看法，必须予以极大的重视。

阮克维指出，儒家思想必然给中国革命者打上烙印。他说明了这种思想的世俗的人道主义性质及其对个人的社会义务的重视。但是，他接着说，儒家所毕生从事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灌输道德，传授人生的准则和处世之道，使人合理地结合永恒的道德格言，然后再通过继续不倦的努力铭记这些格言。然而他又写道：“由于生产力的水平低，技术落后，而使人只从道德的角度来观察历史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士也自发地把儒家的政治道德论算作自己的东西了”。

只要再读一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就能看出这是如何真实的了。本书 1955 年在法国出版时，曾轰动一时。在



这本书中，关于党员忠于人民、理论联系革命实际的必要性，有许多精辟的叙述。同时必须考虑到这是他在1939年所作的一次讲演。但是怎么能不为这篇文章的纯说教性质而感到惊讶呢？文里特别强调“自我改造”，重视个人的修养。引用孔子和孟子的话，这很好，各国人民都应吸取本国的精华。但是，书中引用孟子教训人所说的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时，怎能叫人不惊奇呢？

当然，必须知道，这种个人修养的道德，对于那些被长期的压迫制度压榨的毫无希望的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安慰。人们把它看作一种寄托，但是正象基督教的道德一样，它既适用于受到安慰的被剥削者，又适用于利用它的剥削者。

共产主义的道德并不是牺牲的道德。共产主义的道德把牺牲看作一时的必要，但它是为了共同的目的（全人类的幸福）而进行战斗和互助的道德。

阮克维看到了这种危险，他写道：“在儒家之国，革命的道德往往有压倒历史发展规律概念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既重视说理，又重视教育，但教育往往有占上风的危险（……）这种道德论有时可能导致一种唯意志论，唯意志论只要求战士们尽可能努力，不管什么任务都应该是可能完成的。如果不失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科学性，这种冒险就不太严重。”

但是，万一失去了这种科学性呢？

那个关于发生原子战争也能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著名论断，不正是这样吗？让我们举出一篇作过这种论断的文章吧，这就是《列宁主义万岁》那本小册子（1960年），其中写道：“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或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旦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原子武器和核武器进行战争，结果将只是这些在世界人民包围中的野兽自身很迅速地被毁灭，而决不会是什么人类的毁灭……胜利

的人民，他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出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這篇文章被中國領導人引用到他們同陶里亞蒂同志的論戰里（《紅旗》，1963年第3—4期），他們還補充說：“有一些自命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人，硬把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說成是‘人類的廢墟’，把帝國主義制度和人類的命運等同起來。這種論調，實際上是維護帝國主義制度的論調。”

讓我們來看一看這種評論的詭辯性吧。我們要問一問，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我們不要在分數上吹毛求疵）毀滅以後所創造出來的“高度文明”究竟是什麼樣的文明呢？共產主義嗎？然而這個共產主義將是什麼樣的：是一個平等正義的社會嗎？不錯，平等正義是共產主義的特點。但是，共產主義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有極其豐富的資源供人享用，以使人類不受自然的奴役。共產主義所以已提到日程上來，就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達到了要求集體組織生產和分配的水平。在一場原子戰爭以後，這種生產力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最主要的生產力——人，一部分被屠殺了，而剩下來，也大部分要在生理上和精神上受到摧殘。最發達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裝備，正好是互相投擲炸彈的目標，而被全部摧毀。難道用幾億中國人的幾乎空空的手，用非洲農民的鐵鎬，用拉丁美洲農業工人的彎刀，就可以以“極迅速的步伐”建造起工廠、道路、橋梁、拖拉機、電力網、印刷所、實驗室、大學這些為了有比資本主義“高千百倍的文明”而非有不可的東西嗎？還是這種文明只是在道德上“高出”資本主義呢？沒有物質和知識，憑什麼東西來產生道德品質呢？這哪里還有什麼科學社會主義呢？

他們是不是要用“摧毀資本主義國家”的口號來代替“趕上並超過經濟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口號呢？（事實上，這個遠遠

超过人们的想像、但毕竟是激动人心的目标，已在中国领导人最近的文章中消失了。)

普雷沃：如果注意到他们把这一革命途径看成是人的净化之道，那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令人十分吃惊的言论了。当然，我们也认为社会主义和以后的共产主义将创造一个更好的、出自更高的社会组织的人类，但是在列宁看来，革命者的努力必须主要用于建立这种新的社会组织上。中国人则往往觉得个人的成就是与政治斗争并行发展的，有时甚至超过政治斗争。

有时，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就是“想使自己的生命得救，反而丧失了生命的人”的故事……他们竟认为：既然从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出发都能生出新人来，那么为什么不能从一场热核战争后的可怕赤贫中开始呢？在我看来，除去这种集体发狂的假设以外，我看不出对“美好的未来”这句名言还有什么别的解释。

阿尔诺：没有疑问，人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把共产主义的概念看作道德理想，把革命斗争看作人的净化之道，把苦行主义看作生活方式。由此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认为一个有小汽车的工人不可能是个革命者。他们没有想到小汽车可能变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洛林铁矿工人最近驱车向巴黎“进军”就是证明）……人们很可以拿他们对欧洲工人的判断和《快报》妇女栏的判断相比。这家报纸就曾认为，不要多久，洗衣机将“征服”法国工人阶级。

所有这一切，当然说明了中国领导人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和某些行动。

在这次讨论中，我们发现中国领导人：

企图把他们自己的经验、民族主义和对世界局势的无知普及化；

有不科学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在组织方面、在经济政治活动方面，有一定的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认为革命是超出具体人类社会

会的历史运动之外的事。

必須补充指出他們对民主准則的輕視：中国领导人今天执行的政策不同于他們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政策，已經有七年沒有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来决定政策了，他們是以誰的名义来执行这种政策的呢？

这一切都沒有使人得到完全滿意的回答。中国领导人的立場、論点(或是缺乏論点)和态度，有一部分我們是不能理解的。

如果把这些看作是策略的基础，那就比較容易理解了。这个策略旨在保证中国领导人取得当前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把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合在一起，是可以构成世界的大多数的，所以他們要坚决地依靠这一事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我們看到那些应当称为中国文章作者的恶意的东西，都为之驚訝。

已經說过，这些文章是經不起事实和时间的考驗的。下面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它涉及到法国的政治。中国人在他們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讀者不必費事，只要看一下最近十年来的《新批評》就可以了。叫讀者去說中国的断言是否符合事实吧……

这些指責当然不是为法国人写的。从經驗中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斗争是如何困难的工人战士，是不会对这些指責有任何响应的。这些指責是为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写的。这是中国领导人对意大利、美国……的共产党人，更广泛地說，对先进的工业国的共产党人进行的系統的誣蔑宣传的組成部分。

維达尔方才說过，中国领导人在对内政策方面“每天碰到的执拗的现实毫不准备向唯心主义的观点屈服”。

他又說：在国际問題上，中国领导人可以坚持錯誤，但“并沒产

生多大的后果，因为不光是他們在世界上活动，而且后果也不是立竿見影的”。

現在很难評价这个判断。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只应认真地考虑他們是否会碰到这样的现实，在这些现实中有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运动，它同样不向“他們的唯心主义观点屈服”。它要坚定地說：不！

我們再回到最初提到的問題上来。無論是在事实方面还是在理論方面，中国领导人都走入了歧途。必須指出这一点。不能脚踏两只船。对莫斯科条約不能一半贊成，一半反对。对和平共处不能一半贊成，一半反对。

中国同志关于辯证法、矛盾、批評、自我批評、革命的道德，曾經写过許多东西。

我們期待他們把自己的实践同理論协调起来，因为我們同他們一样并同他們一起意識到对世界的未来負有責任。

（譯自 1963 年 11 月号法共《新批評》月刊）

## 关于中国报纸上一篇誹謗性文章

列昂·費克斯

《人道报》在第三版轉載的北京《人民日报》和《紅旗》杂志的文章摘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使用的令人不能容許的作法。

对法国共产党的攻击的缺乏严肃性和公开撒謊性，使人可以对中国同志业已走上的冒险道路作出正确的評价。因此，揭露他們的某些所謂論据是有益处的。

現在讓我們来看一看所謂法国共产党“把反美的民族旗帜让給戴高乐”的断言吧。事实上，我們曾經多次指出戴高乐政策的民族主义的、自发沙文主义的性质。蓬皮杜最近对美国人說，法国也許是一个难对付的但却是一个可靠的盟国，美国将会看到每当美国需要它的时候它都同美国站在一起。蓬皮杜的这种說法，并不是民族独立的崇高表现，特别是在人們回想起这位总理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表示反对古巴的时候。不过，我們現在只来談談关于殖民地問題对我们的攻击。

中国领导人认为，法国共产党对长期处于法国殖民主义者統治下的殖民地人民采取着“同化的”、沙文主义的立場。

事实俱在，有文件和生活作证明，并活在今天已經解放或正在解放斗争的各国同志的思想和心目中。法国共产党人曾經同他們一道，共同进行反对法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艰苦斗争。

只有真正心怀恶意，才会用中国领导人那种作法来非难法国共产党对于殖民地問題的一貫立場。法国共产党的基本要求始終是給予殖民地人民以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这种权利包含着直到

他們脫離法国的可能性，假如他們願意的話。

中国同志拚命攻击莫里斯·多列士，这当然是因为他是譴責他們的立場的一个大党的总书记。也无疑地是因为他們不原諒他从1960年12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时，就指出了他們的路綫是多么危險。不过，重溫一下莫里斯·多列士关于殖民地問題的許多談話，也許对中国領導人有所启发。

早在1932年，莫里斯·多列士就写道：“我們的印度支那或阿尔及利亚兄弟們給予法国資產階級的每一个打击，都是對我們运动的直接帮助。

“反过來說，我們对我国資產階級的每一个打击，也是对在‘它的’殖民地受它压迫的奴隶們的直接援助……我們法国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为解放法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各族人民而斗争。”

1933年7月，党的总书记公开提出使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的問題。

1935年，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主张坚决支持北非和印度支那殖民地人民爭取独立的斗争。

1939年2月，当阿尔及利亚进步运动中的絕大多数人站在改良主义和同化主义立場上的时候，莫里斯·多列士在阿尔及尔宣布說：“有了正在历史上形成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它的发展可以得到法兰西共和国力量的促进和帮助。”

1954年2月，在阿尔及利亚起义之前九个月，他在《前卫》周刊上写道：“法国只有承认它以民族压迫的桎梏統治的各族人民的完全独立，才能成为这些国家人民的朋友和盟国。”

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采取敌視行动后，法国共产党人的立場依然未变。1954年11月8日，即起义后一个星期，政治局就清楚地表示，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是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要求和停止軍事行动。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七年半黑暗岁月中，同在七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中一样，法国共产党没有一次采取过可以被正当地指责为以某种方式损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立场。它的行动没有一次是不符合无可非议的国际主义实践的。

人们可以看出，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竟敢说共产党人“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时，他们的论断是多么没有根据。更加可恨的是，他们硬说我们党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

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根据我们没有作出可能使我们脱离广大群众、可能使我们的报刊和我们党更容易遭到打击的指手划脚的高谈阔论吗？大家知道，我们进行了反对迫害的顽强斗争。这种迫害是：从1954年11月到1962年3月，对共产党人的报刊查封过六十五次，其中查封过《人道报》二十五次；诬告三百一十三次，罚款数千万法郎。

那样大量引用列宁著作的中国同志，难道不知道列宁1917年4月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文版）一书的序言里所说的话吗？他在这个序言里指出了这样一种必要性：不要全盘说出一切，要用“暗示”的方法，要用极其“谨慎”的口吻，以便能够在沙皇的统治下出版合法的作品。列宁谈到过书刊检查官的“铁钳子”。法国共产党人也曾多次领教过这种“铁钳子”。虽然他们根据运动的利益一贯努力争取放宽这种限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损害过列宁主义的政治基础。我们当时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他们的“自决权”、“阿尔及利亚民族事实”的时候，不论在法国还是在阿尔及利亚，谁也没有弄错这说的就是独立。

此外，中国领导人还指责法国共产党帮助殖民主义者，使他们容易进行阴谋活动。看来，这似乎是由于“法兰西联邦”而产生的指责。



他們故意把我們党的民族政策同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政策混为一談。

我們是法国共产党人。我們要在我国工人階級和我国人民面前，在国际工人运动面前，對我們的行动負責。我們一貫致力于在各方面把国际主义要求同民族利益密切地結合起来。我們曾經指出，我国人民为爭取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受我們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压迫的所有其他国家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是符合真正的民族利益的，这种利益同垄断資本家和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是迥然不同的。莫里斯·多列士在1957年3月2日的《人道报》上写道：“法国无产阶级支持殖民地各国人民要求自由的願望，正是为了为自身的利益服务。”

我們有理由这样做嗎？我們从来沒有忘記我們共产党所担负的重大使命：不顾重重困难，致力于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团结开始的民主与和平力量的团结，我們有理由这样做嗎？毫无疑问。这曾經是对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的最好援助。这也是促进我国目前发生的政治变革的最好手段。

資本主义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之間的关系，則是另外一种情况。

讓我們重說一遍，那样好引用列宁的話的中国同志却“忘記”談到这样一个公式：“享有分离权并不一定要求分离”。这个公式还有效。它使人們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宗主国”人民和以前被压迫的各国人民之間建立固定的联系，如果这是符合他們的相互利益的話。在人民陣綫时代，曾經真正出現过这种可能性。在解放以后，也出現过这种可能性。

并不是只有我們这样想。1946年3月6日的法国和越南共和国协定曾明确规定：“法兰西政府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并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

邦的一个組成部分。”1954年7月15日，即在簽訂日內瓦協議頭幾天，胡志明同志在越南劳动党第六次會議上的報告中說得更明確：“我們同意在談判中討論我們可能在平等和自願原則的基礎上參加法蘭西聯邦的問題。”（這篇報告重新編在1962年河內用外文出版的《胡志明選集》中，第2卷第458頁）

法國共產黨人一貫認為，法國和前殖民地的各國人民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只能建築在權利平等、自願和互利的基礎上。

在這方面，為什麼我們法國共產黨人不能希望現在和將來在法國同最近擺脫法帝國主義枷鎖的亞非國家，以及目前還處在打着戴高樂“共同體”幌子的新殖民主義壓迫下的國家之間建立沒有任何陰謀和任何新殖民主義暗算的有益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關係呢？

我們主張——是在1945年6月，他們“忘記”指出這一點——由阿爾及利亞提供肉類和小麥，以換取法國向阿爾及利亞人提供他們最迫切需要的農產品，這又有什么可指責的呢？我們不是為了避免一切誤解而先指出必須“放棄殖民主義方法”以後才這樣說的嗎？（第十次黨代會報告）這又是中國指控書中的一個“忘記”。

我們根據正確而有號召力的論據（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和法國之間的未來關係，一部分要取決於法國人民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解放鬥爭的支持），一再號召加強團結以迫使實現阿爾及利亞的和平，這又有什么值得如此大驚小怪的呢？

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用法國共產黨近十五年來曾經遭受的那許多攻擊來攻擊法國共產黨，真是令人感到遺憾和痛心。

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法國共產黨在整個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所組織和發動的許多活動一個也看不上眼，也是令人遺憾和痛心的。

中國同志“忘記了”在戴高樂執政前四十三個月的戰爭時期和

戴高乐执政后四十五个月的战争时期（他們甚至似乎“忘記了”最后这四十五个月的存在！……）所举行的請願、派遣代表团、罢工、游行示威等种种行动。他們“忘記了”1962年2月8日的死者。

他們“忘記了”指出我們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例如在迈卢扎、薩基埃特—西迪—优素福或比塞大的殖民主义者进行挑衅时期，为了防止工人阶级和人民“陷入沙文主义的泥坑”而做的一切工作。

他們“忘記了”阿耳邦·里什迪、皮埃尔·居約、塞尔日·馬尼安和他們的战友，也“忘記了”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青年在他們“应征入伍”后变成和平力量天平上的决定性因素之前在军队中进行的几乎难以想象的艰险工作。

中国领导人是不择手段的。他們提出的一些說法，有的純系臆造，有的是断章取义，脱离具体情况，脱离提出这些說法时的历史条件。他們就根据这一点对不同意他們观点的这个或那个党和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誹謗。

新近的攻击可以使人們更好地衡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行徑对国际工人运动造成的危险。

这只能促使我們进一步研究10月5—6日中央委员会會議的文件，对这些文件进行討論，从中得出肯定的結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基础上采取一个共同的方針是必要的。

（譯自1963年11月19日法共《人道报》）

# 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

馬賽尔·杜弗里希

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的进展、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爭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世界革命进程中的三大潮流。

1960年11月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声明第四节中说：

“殖民主义的完全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說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

这样十分重视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是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向来非常注意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

当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那个时代，不可能像列宁那样探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这是不无理由的。到十九世紀末叶，资本主义才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并拚命地去夺取殖民地。

当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論时，落后了上百年的亚非国家不可能像西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向他們提供材料。

然而，对馬克思說来，民族自决权却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則。在英国住了那么久的馬克思，他不断支持爱尔兰的合法要求，要求

同压迫它的大不列颠分离。过去指导了、现在还指导着共产政策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这一公式是马克思提出的。

至于恩格斯，他在1882年9月12日致考茨基的一封信里，提到印度、阿尔及利亚、埃及的独立，提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但是，他没有确切说明这些国家如何取得独立。他说：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胜利的无产阶级想把任何幸福恩赐给外国民族，这只能损害它自己的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撰写《共产党宣言》时，曾科学地论证了我们时代里，代表人类未来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因它失去的只是自己的锁链，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是社会改革的基础，无产阶级革命将把世界，包括被压迫民族，从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列宁在他1916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瓜分世界，就是说占有殖民地，对垄断资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列宁还揭露了“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满足其追求利润的欲望而在海外各国进行的掠夺和所犯的罪行。

列宁同时论证了压迫民族工人阶级的斗争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一场持续二十五年的关于思想问题的争论中，列宁不仅要反对像鲍尔(O. Bauer)那样的第二国际领导人，甚至还要反对像罗莎·卢森堡那样的革命社会党人，因为他们陷入机会主义，而且不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在每个国家里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列宁则坚决向俄国的无产阶级指出它对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应尽的义务。他写道：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坚决革命

的民主主义的訓練而要战胜資產階級，那是根本不能設想的。”<sup>①</sup>

民族自决权，这意味着压迫民族中一切标榜社会主义的人应当要求被压迫民族有分离和自成为独立国家的自由。任何其他的立場“只是一句空話，只是一种伪善”。

同时，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者应当为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間的团結和联盟而斗争。

这种辯证的立場中沒有任何矛盾，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是贊成民族融合的。

“无产階級不能贊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贊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別、打破民族壁壘的东西，贊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間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采用其他的做法，就是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儈方面去。”<sup>②</sup>

很显然，在爭取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重視压迫民族的无产階級的责任，压迫民族的无产階級应当首先要求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权利。

“誰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語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和不平等作斗争，誰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同样毫無疑問的是，那些大罵其他民族的馬克思主义者贊成‘同化’的冒牌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只是表明他們自己是民族主义的市儈而已。”<sup>③</sup>

\*                     \*                     \*

这样一种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看法遭到沙文主义的反对。沙文主义是浸透着資產階級国家的群众的思想，近几十年来，社会民

① 《革命的无产階級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7—388頁。

② 《关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19頁。

③ 同上，第11頁。

主义滋长了沙文主义，即使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沙文主义还会继续存在。

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它是打击帝国主义的，所以对于反对共同敌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是宝贵的援助。因此，无产阶级更应当支持附属国人民的这种解放运动。

要全力支持、毫不含糊地支持这种运动，但是，这种运动的目的必须是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列宁说过：

“关于民主的各种要求，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内，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世界民主（现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有可能在某种具体情况下部分和整体有矛盾，那就应该丢掉部分。”

列宁在支持这种论点时，是忠于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思想的。“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理论同忽视民族运动的观点却有天壤之别。”<sup>①</sup>

马克思、列宁发表这种思想时，整个地球还完全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

但是，历史发展已经证实了这种理论立场的正确性。

东方各民族觉醒而起来斗争，那是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而民族解放运动在大部分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蓬勃发展，则是在1917年10月之后。

这就开辟了人类的一个新时代，关于这个时代的内容，1960年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说：

“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帝国主义的任何挣扎都不能阻止历史

---

<sup>①</sup>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7页。

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取得进一步决定性胜利的巩固前提，已经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換句話說，国际工人阶级处于目前时代的中心，而这是各条战线斗争中，包括民族解放这条战线的斗争在内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以往五十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其中，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帝国主义遭受接二连三的失败——首先是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后，才在许多国家里兴起、发展和取得胜利。

至于受法国统治的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也是很典型的。例如在黑非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且是在我们共产党兄弟般的支援下，非洲民主联盟才于1946年成立。

当然，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反过来也壮大了打击和进攻帝国主义的力量，而这就证明了列宁主义关于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群众必然建立共同战线的正确理论。

\* \* \*

而现在中国共产党却背弃了1960年11月它所同意的分析，提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新论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6月14日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的标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其中第八点，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代替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帝国主义崩溃的主要因素。

照中共中央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世界反帝力量的这种企图是一种分裂活动，而这种分裂活动又是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整个行动范围内的。



三大洲特殊團結的“理論”不但是錯誤的、反列寧主義的，而且是危險的、有害的，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解放運動尤其如此。

反帝鬥爭的主要力量似乎已不再是社會主義，而是性質不同的民族解放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力量當然是不能否認的，但畢竟不是階級的運動。

對中國領導人說來，歐洲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成了次要的，至少也是從屬的，這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好是完全相反的，而中國共產黨卻自稱是唯一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中國共產黨那封信的第八點里，另外有一段說“有人”借口打破民族的、膚色的和地理的界限，企圖維持“優等民族”的統治。事實上這几乎是赤裸裸的號召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

這種手段必須予以最嚴厲的譴責。被壓迫國家的人民仇恨壓迫他們的國家，這是完全正當的。有時候，這種感情甚至还擴大而針對“宗主國”的無產者。至少存在着某種不信任，而我們是根據經驗這樣說的。然而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則是煽動這種仇恨，煽動這種不信任，在同一事業的戰士中間製造隔閡，這只能有利於共同敵人：帝國主義。前被壓迫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同前壓迫國家的工人階級及民主運動（一般說來）之間，常常比新取得獨立的國家之間，更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

譬如，幾星期前，馬格里布兩個國家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之間的衝突就是一個例子。法國絕大多數工人階級譴責摩洛哥王國對阿爾及利亞共和國的侵略，支持阿爾及利亞，因為法國帝國主義無可辯駁地是和目前還統治着摩洛哥王國的封建分子勾結在一起的。

但是，中印衝突本身難道不是最決定性地否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維護的論點嗎？如果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解

放运动（就用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本身不仅因为思想意识有分歧、而且因为卑鄙的领土野心而弄得四分五裂的话，那么它怎么能够领导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总斗争呢？

\* \* \*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无可辩驳地是浸透了民族主义的。他们的思想同弗朗兹·法农的《饥寒交迫的奴隶》一书里所包含的思想多么相似呀。这真是奇怪的事情。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书记巴希尔·哈吉·阿里同志，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周上所作的题为《什么是1963年的革命者》的演讲中，反对了法农的思想。<sup>①</sup>

法农写道：“欧洲的群众应当觉醒，应当动动脑筋，应当停止不负责任地睡大觉。”

巴希尔·哈吉·阿里同志反驳得对：“是道学家的空想主义论调？还是引向绝境的理论的表现？我们担心，按照这本书说来，似乎反抗的阶段还没有完全过去。”

自从出现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以来，从奴隶社会直到现在，有多少次反抗都被淹没在血泊中，而这种剥削却仍然没有永远地被消灭。直到工人运动有了一个科学的学说，社会主义，无产者才能依靠革命觉悟和先进的政党而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将来还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全世界散发小册子，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利用了从共产党队伍中被驱逐出去的分子。在这些小册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硬说别的党的政治立场这样那样，其实这些党的立场从来不是这样的。中共领导人这样做，就是为了要诽谤这些党。

最近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1963年10月22日题为《新殖民

---

<sup>①</sup> 见1963年4月号《共产主义手册》。

主义的辯護士》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的。

这篇文章攻击了两个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大量引用斯大林的話，企图誣蔑世界上第一个解决了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党。这个党把当时像某些法国殖民地剛独立时那样落后的沙皇殖民地变成繁荣的国家，譬如，在一万个居民中平均有八十八个高等学校学生，而法国却只有四十个，意大利三十四个，西德三十一个。<sup>①</sup>

关于在一篇討論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文章中大量引用斯大林的話这个問題，我們要插几句话。列宁在 1922 年 12 月 31 日的一系列札記中，就当时在格魯吉亚发生的事情，譴責斯大林要“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負政治上的責任”。<sup>②</sup> 中国领导人难道不知道嗎？

因为中国领导人现在反对揭发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以他們企图利用斯大林的某些著作以便反对他們所謂的苏共的立場。但是，就这一点來說，想证明太多东西的人什么也证明不了……

中国领导人对法国共产党及其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的責难是歪曲事实真相的。

这些领导人又一次攻击我們党，說我們“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給戴高乐等人”。

在一篇所謂討論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文章里，有关戴高乐的上述提法是不是意味着，中国领导人贊成：戴高乐是当代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者这种說法？

戴高乐政府流露出来的一点点民族主义是不是足以使法国垄断資本最喜欢的这个政权具有一切美德了呢？而且这个政权最近

---

① 尼·赫魯曉夫，1960 年 9 月，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② 《論东方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633 頁。

通过总理蓬皮杜（他是洛希尔銀行的）的口，又一次申明是美国最可靠的同盟者。

\* \* \*

但是中国领导人瘋狂攻击的，特别是法国共产党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間，在殖民地方面提出来的問題的政策。中国领导人的結論是共产党人經常可以从最恶劣的反动派嘴里听到的一句話：“他們（法共领导人）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辱罵肯定不是說給法国劳动者听的，因为法国劳动者对共产党的信任不是《新殖民主义的辯護士》这本小册子的誣蔑謾罵所能动摇得了的。中国共产党辱罵的目的是要打击我党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无可否认的威望。我們党坚决地譴責了中国共产党的冒险主义路綫。莫里斯·多列士早在1960年12月的代表會議上就曾說过：这不仅是苏联人同中国人之間的爭論，而是根本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綫。

1963年10月6日中央委员会的決議再次譴責了中国领导人的立場，他們的立場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主要論点是相违背的。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攻击我們共产党，是想冲淡这种譴責的意义。他們知道过去是法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如何重視法国共产党。

1961年5月，我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越南劳动党在賀电中写道：“你們党不仅为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而且它还是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范例，它对推进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貢獻。”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这样說：“你們在法国是大大地促成了我国

的死敌、极端殖民主义者的失败的酵母和决定性的力量。戴高乐今天之所以想要人家忘掉他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立场，他之所以不得不放弃直接统治的政策，他之所以說到一个有主权的阿尔及利亚国家，这是因为在最近这些考驗的年代里，除了我們的抵抗之外，还有你們在那里不倦地进行活动，以便剷除法国体内的殖民主义毒素，以便引导群众、团结群众、吸引群众参加統一行动，以便不断地扩大要求談判的运动。”

在法国殖民主义压迫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馬提尼克共产党的代表，也在我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說：“亲爱的同志們，讓你們相信，知道感恩的我們党和劳动人民高度评价你們在政治上、实践上給我們斗争的帮助——出于最純洁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帮助。”

我們还可以繼續引证下去，但那就太无聊了。然而，重复一下中国共产党自己致我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賀电中的一段，倒并不是多余的。把这段賀电同現在的辱罵对比一下，就能看出目前的攻击如果不是前后不一致的，至少也是輕率的。

“現在，法国共产党在以多列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正在团结法国工人阶级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农民群众、知识分子、中等阶级和非垄断的资产阶级等广大社会阶层的統一战线，为反对垄断資本統治，反对法西斯危险和个人专制，爭取恢复和革新民主，爭取一个真正独立、民主和爱好和平的法国，而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事实上背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他們忘掉了列宁在 1916 年所写的教导：

“斗争尖锐化是主观主义者的一句空話。主观主义者忘掉了，为了证明任何口号的正确，馬克思主义要求对經濟情况、对政治形势和对該口号的政治意义同时作精确的分析。”

仔細观察一下中国领导人，他們好像患了“无政府主义絕望”

症,这种病症会使他們走向最坏的极端。

当帝国主义的一切基础正在瓦解的时候,当共产主义的曙光已在地平綫上升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在那里敲丧钟!

由于他們信心不足,因而不耐心,但是一点也不能证明他們热衷于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恐慌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他們的分裂活动是有害的,因为我們的队伍在国内范围或国际范围的团結是我們最宝贵的财富,是我們胜利的保证。

因此,我們將坚持根据 1960 年 11 月的声明,繼續“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基础上的团結,不允許能够破坏这种团結的任何行动”。

〈譯自 1963 年 12 月号法共《共产主义手冊》月刊〉

##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种道路

维克多·约纳

在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中，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道路和方法问题，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问题。

中国领导人硬说，帝国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尤其是我们党，忘掉了革命，硬说这些党害怕革命，只关心那些“不值得”真正的革命者去关心的事情，如和平、争取民主和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斗争、争取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团结、争取一切民主民族力量团结的行动。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去着重讨论下列事实：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说来，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局面比国际紧张和“冷战”的局面更为有利。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总是利用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严重时期，煽动沙文主义、好战的歇斯底里和反共，并向民主自由、向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进攻。法国大垄断资本就是这样利用了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造成的形势，利用了1958年5月阿尔及尔法西斯暴乱，才取消了民主制度，并建立了戴高乐个人专制政权，严重地打击了工人阶级和民主。

反之，自从戴高乐被迫进行和谈，不得不让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法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又有了新的高涨。

各国共产党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他们同群众的联系，提高了他们的威信和影响。这种斗争巩

固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地位，有助于提高它的经济力量，提高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对外政策方面，这种斗争创造了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有利于它的条件。

在帝国主义国家里，这种斗争有助于发展进步力量，便利共产党和民主组织的行动，给人民以新的可能性，去进行反对军事侵略集团、反对外国军事基地的斗争。它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也是有利的。它有助于准备较好的条件，使各阶层人民懂得，和平事业同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分割的。

而中国领导人竟然不懂得这一点，这是难以相信的。中国领导人是有经验的人，他们自己进行了一场革命，由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存在及其和平政策，由于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这场革命是较为容易的。

也难相信，他们竟然不知道社会主义是通过事实来检验的，社会主义的和平性质是使人民去选择它的又一个理由——在我们时代是有决定性的理由。

### 如何领导革命斗争？

但是，让我们更详尽地来研究一下中国领导人关于我国以及一般地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的领导问题的看法和评价。中国领导人用“革命的”空话，把我党所奉行的、完全符合1957年和1960年决议的政策，说成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议会迷”。我党的政策是：在我们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运用反垄断资本的广泛联盟的一切可能性，大胆发展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统一阵线，利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其中包括通过议会道路的可能性。

事实上他们责备我们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



号，他們把我們爭取工人階級部分經濟和政治利益的斗争同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对立起来。

然而任何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知道，革命从来不是单单依赖于宣传的，只有当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大部分改变了看法时，革命才有可能。而首先，正是斗争及群众取得的政治經驗才能引起这种改变。

列宁深刻地研究了過去进行的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紀的三次俄国革命，他提出了革命的基本規律：

“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剝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使剝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照旧統治下去。只有当‘下面’不願照旧生活而‘上面’不能照旧統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sup>①</sup>

对这些条件中的每一个条件采取任何不够細心的、不够自觉的、不够考虑的态度和任何錯誤，都是危险的。在每个国家里，只有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队，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够确定階級矛盾的尖銳程度，才能确定革命形势是否已經到来，才能选择宜于行动的时间。

如果1958年6—10月間，我們在分析了戴高乐政权的階級性质后，分析了公民投票时选民投贊成票的緣由后，指出了寄托于戴高乐將軍政策的希望含有矛盾后，我們沒有热情地为組織群众运动、为群众运动的团结而工作，我們沒有努力使群众运动越来越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目的及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如果这样，那么今天我們在法国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們沒有根据我国男男女女的日常需要，把我們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說清楚，如果我們沒有增加同他們的接触，以便帮助

---

<sup>①</sup>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6頁。

他們从亲身經歷的經驗中得出全部結論，那么，我們的情況又會怎樣呢？

如果在群众已有了初步的行動之后，戴高乐政权在其政策的某些特殊方面不得不有所让步——当然还是很有限的——之后，我們沒有提出自己的主張，必須把一切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運動集中目標，去反對壟斷資本及其政權，爭取消滅這個政權，限制金融資本的控制及擴大民主，那么，我們的情況又會怎樣呢？

如果我們沒有大胆地、創造性地執行統一陣綫這一基本政策，那么，我們的情況又會怎樣呢？

生活回答了并正在回答這些問題。公民投票和1962年大選后，法國輿論對戴高乐主義的看法的變化，已經可以看得出來了，到現在1963年底的時候，那就看得更清楚了。結束這一政權，用另一種政策去代替其反人民的政策，這種意志愈來愈強烈，要求也更明確了。所謂另一種政策，那就是堅決以使國家擺脫壟斷資本的枷鎖為中心的政策，以面向未來的民主為其基本方針的政策。把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及其必然性告訴我國全體人民，這樣做的更有利的條件正在形成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國共產黨才認為爭取民主的鬥爭是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認為在我們的時代里，這兩個階段之間沒有很長的間隔。

中國領導人反對我們黨和其他兄弟黨制定和奉行的政策，這就表明他們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對世界革命運動事業的貢獻是无知的和蔑視的。他們“以革命的名義”譴責正好引向革命的方法。如果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遵循了他們的方針，其結果只能是孤立，只能是工人階級在反對壟斷資本的統治、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喪失同盟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就不再是能帶動群眾的、革命階級的政黨，而是沒有影響、沒有前途的空談家的小宗派。

## 暴力的道路，还是和平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也在不同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脱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家知道，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及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在这方面，是以关于和平或非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1957年及1960年莫斯科文件为依据的。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却硬说我们党和别的兄弟党只承认一条和平道路。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3年5月10日的决议中，又一次规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

“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打算在沒有内战的情况下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符合国民经济利益的，也是符合劳动人民的愿望的。然而，选择革命发展的道路并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而且也取决于大资产阶级还可能进行的抵抗。

“当工人阶级及共同盟军拥有力量上的优势，以致大资产阶级已不能求助于内战的时候，和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就出现了。我们的反垄断资本的团结政策和联盟政策，正是为了创造这样的局面……”

“……无论如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求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取得政权，要求主要生产手段社会化，要求建立不管什么形式的、暂时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劳动者的最广泛的民主。”

可以看得出，上述政策中谈不上所谓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谓相信大资产阶级分子会自愿让位；中国领导人却在他们的文章中硬说我们有这种观点。恰恰相反，上述政策肯定，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要求空前地动员群众，要求决心改造社会的一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统一行动。这就意味着，在国内经济生活、政

治生活及思想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行規模特大的、頑强的階級斗争，以便利用現存的一切客观矛盾，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中国领导人說，無論何时何地，武装起义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他們忘了或否认存在着这些客观条件。实际上，他們要我們只做阴謀家，玩弄“夺取”政权的把戏。然而，問題不在于“夺取”政权，而在于改造社会。而这只有通过基础巩固的、依靠大多数居民的政权，才有可能。中国领导人濫加引用的馬克思和列宁在关于使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方法問題上會有更现实、更灵活的想法。例如，馬克思承认，上世紀七十年代，英国有过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根据的事实是：那个时代，即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全盛时代，英国的官僚軍閥集团比任何別的地方少；因而革命可能不致于逼得資產階級大量使用暴力，所以也可能不致于逼得无产階級用暴力措施去反对資產階級。在这种条件下，馬克思說社会主义和平获胜是可能的，例如，通过工人向資產階級贖买生产手段的形式。

列宁在談到馬克思的这一立場时会着重指出，这种立場多么符合辯证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辯证唯物論和历史唯物論从不提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有效的、絕對的方法，而总考虑到现实是永远在运动、永远在变化的。列宁写道：

“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馬克思既沒有束縛自己的手脚，也沒有束縛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問題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过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頻繁而劇烈地变化。”<sup>①</sup>

大家知道，列宁和俄国共产党人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及革命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变化。就这样在1917年4—6月期間，当向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平过渡的

---

<sup>①</sup>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8頁。

可能性出現了時，列寧在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綱》中提出了和平革命的口號。只是在七月事件以後，當臨時政府下令掃射彼得堡街頭示威的工人和士兵時，才撤銷了和平革命的口號。用武裝起義回答資產階級政權的暴力行為，這在當時已成為必要的了。如果說政治革命未通過和平方法進行，這不是布爾什維克的過錯。

然而，列寧把社會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情況看得非常重要，甚至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了以後，他還建議同俄國的和外國的資本家締結協議，對他們作些讓步，成立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同樣，1919年5月，列寧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指出，在匈牙利，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是在同俄國完全不同的形式下，在比較容易、比較和平的條件下進行的；資產階級政府自動辭職，工人階級的統一、社會主義的統一立刻在革命綱領的基礎上恢復起來。列寧在指出了這點以後，強調說這種情況是“特別重要的”。而且他還着重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不僅在於暴力，而且主要不在於暴力。”<sup>①</sup>

中國領導人系統地只是把革命和暴力等同起來，因此，他們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拒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一基本教導；對於工人階級說來，必須“毫無例外地熟悉社會生活的一切形式和一切方面”，必須準備“最快地、最意外地由一個形式轉變到另一形式”。此外，中國領導人還在替大資產階級的誣蔑作證，大資產階級力求使人民相信，社會主義革命必然是一場內戰，暫時性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以報復為目的的政權。

## 走向社會主義的新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提到的歷史先例沒有能完成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

<sup>①</sup>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51頁。

义的和平过渡，那主要是由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干涉，当时，帝国主义还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是，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简单化，企图为他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从中找到“论点”。

首先一个原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实质和力量，恰恰就在于走在行动的前面，在对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主要特点作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指导行动。其次的原因是，不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深刻的历史变化，那就证明是危险的盲目性。

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工人党的 1957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宣言和声明，都阐明了这些变化。它们指出，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于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吸引群众，由于工人阶级的组织有了进步，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结成广泛的反垄断联盟的可能性，所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了，它们还指出，不经过武装起义，不经过内战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也更多、更肯定了。这种和平过渡的一个特殊例子可能就是利用真正的民主议会，同时在议会外，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先锋队所指引和领导的、强大的群众运动。

还得提醒一下，这些论点对于我们党说来，不完全是新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翌日，我们就已公开提出了这一方针。那时候的情况是，我国群众运动发展壮大，党和党的影响日益加强。我们党的总书记在 1946 年 11 月 18 日接见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时曾宣称，

“全世界民主力量的进步，尽管有极少数例外，使我们能够考虑通过同俄国共产党人不同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每个国家的道路必然是不同的。我们始终认为并宣布，富有光荣传统的法国人民自己会找到走向更民主、更进步、更多的社会正义的道路。但是，历史指出，没有斗争就不会有进步。人们可以毫不费

力地前进的現成的道路是沒有的。总是要克服一些障碍的。这也正是生活的意义。”

我們相信，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将日益有利。因此，我們党考虑到已經出現的全部新因素及其发展情况，在第十四、十五、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声明决心彻底研究及利用法国不經內战、和平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包括利用議會道路的可能性。

在我們国家里，議會一直是社会一切階級最感兴趣的一个机构。它代表着一种古老的传统，这种传统，通过人民群众的斗争，而且也就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几經变迁而維持了下来。議會是同爭取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普选，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引用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er Français)綱領里的話說，工人階級在某种条件下能够“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騙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sup>①</sup>

法国共产党經常揭露改良主义在劳动者中間散布的議會幻想，但是，它从来沒有放弃过議會活动。在它有史以来的全部活动中，它总考虑到这样的事实：一切階級之所以参加議會斗争，那是因为議會反映了階級利益和階級冲突。議會始終是階級斗争的舞台，而議會里的党派关系則是紧密地同階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法国的情况也許比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更其如此。

法国共产党在議會斗争中所采取的列宁主义方針，是經過1936年人民陣綫的經驗和1945年解放的实践檢驗过的，这两次实践，由于有劳动群众的支持和統一行动，因而使我們能够在議會里促成重大的变化，并实施一种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的政策。我們的方針也在1946年1月間經過了一次檢驗，那时候戴高乐不願尊重人民通过普选表达出来的、要求有一个民主的議會和民主的政

---

<sup>①</sup> 恩格斯为《法兰西階級斗争》写的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4頁。

府的願望，他不得不辭職，因此，尽管有人与之同謀，尽管成立了一个忠于他的政党：法兰西人民联盟（Rassemblement du Peuple Français），但是他沒有可能成立为垄断資本服务的、反动的个人政权。大家知道，一直到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分裂，进行內战詭詐，在阿尔及利亚問題上形成思想混乱，这才使反动派的进攻在 1958 年暫時取得了优势。

上述两次实践，由于工人階級同其他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結成同盟而使这些实践带来的胜利，表明存在協議和合作的真正可能性。这些实践的成就及限度，为創造新協議、新合作的条件提供了宝贵的指示，未来的新合作将要更强大、更持久、更有成效。这些实践也证实了：只有无产階級及其同盟軍的統一和集中的斗争，才能首先使选出的議會里劳动群众的代表人数公平合理，其次才能对議會里的各个派別施加有效的压力。只有工人階級的統一和一切民主力量的团結，只有开展广泛的群众性行动，議員們才能把議會变成一个符合他們的渴望和要求的机构，才能强令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而这种改革又将把議會变成执行人民願望的革命的工具。

当然，反动势力不願服从民族的意志，企图用暴力阻止民主組織的联盟取得政权，抗拒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抗拒人民所要求的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組，这种情况也是不能排除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敌对活动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也是非法的，因为违反了由議會表达出来的民族的意志。于是議會就有义务、也有权力号召人民接受反动派的挑战，使之尊重人民的权利。那时候，斗争会持續多久、尖銳到什么程度、采取什么形式，都将取决于階級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

关于这个問題，必須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1960 年莫斯科會議声明的論点所具有的特別重大的意义。声明說：



“共产党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从来反对革命輸出。同时，它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輸出。它們认为自己的国际义务是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自己的一切内部力量，积极行动起来，并且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防止和坚决回击帝国主义者干涉任何一个国家的奋起革命的人民的事务。”

这是事实，我們只举这么一个例子：如果說美帝国主义还有可能在危地馬拉进行干涉，那么，对古巴它就不再可能了。

所以，当我们党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包括通过爭取議會多数，以及依靠强大的、統一的群众运动把議會变成人民的工具，以便在議會形式下成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辯护时，它并不像中国领导人所說的那样，陷入“議會迷”，把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允許的范围内”。恰恰相反，它为了促进革命和暫时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行动。

## 民主政党和人民群众

因此，我們党目前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为远景而进行斗争的。它认为，只有在爭取結束垄断資本的政权、爭取真正的和平政策、爭取成立一个工人阶级在其中的地位符合工人阶级在国民生活中的真实影响的議會、爭取更加深刻和彻底的民主改革的斗争中，工人阶级才能实现其必不可少的統一，才能把反垄断的一切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这是孤立大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創造基础的主要条件。

为了推进这种統一和团结，我們党向其他民主党派建議共同制定一个綱領，綱領将包括消灭个人政权，实行深刻的經濟改革和民主改革，其目的是依靠建立一种新的民主制度，限制垄断資本的权力和激励群众的創造性、主动性。我們党在第十五次、十六次代

表大会上提出了这样的論点，根据这种論点，我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首先是和社会党合作，不仅目前是必要的，而且将来在爭取共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也是必要的。我們党之所以提出这一論点，也是为了有利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統一，从而为了对成功地通过和平道路——包括利用真正民主的議會——而走向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是有效的，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和方法，当然他们就反对我們的論点。他們甚至于脆摒弃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間有任何協議和政治合作的可能性。

在这一点上，他們也大量地引证列宁的話。但是，他們引证的話是不全面的，因此也是不正确的。当然，共产党人应当批評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立場和右的实践，这是对的——列宁和我們党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列宁始終強調必須实现工人阶级的統一，工人阶级各种不同队伍的統一。正是列宁教导我們說，爭取劳动者統一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他說：这种斗争之所以必要，是由于“资本主义使人分散各不相关并使人愚昧无知的条件”。因此，要实现統一就必须付出“頑強的劳动和巨大的耐心”<sup>①</sup>。

而且，正如我党总书记在中央委员会5月會議上提醒我們的那樣，列宁自己成立了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五个代表参加的第一个苏維埃政府。众所周知，1918年1月，第三届俄罗斯苏維埃代表大会指定了一个俄罗斯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党委員名額按該党在代表大会代表中的名額比例分配。除了一百六十名布尔什維克外，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包括六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其中有一百二十五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然，后来只剩了布尔什維克，但那是由于既不取决于布尔什維克的意願，也不取决于列宁的意

---

<sup>①</sup> 《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7頁。

願的緣故。<sup>①</sup>

但是，事实仍然是共产党人不仅在原則上，而且也在实际上，贊成同其他民主党派，首先是同社会党合作，在目前合作，也在将来合作。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例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及其他国家——包括人民中国——就是证明。

在这个問題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 1945 年以来的丰富經驗和教訓（中国领导人自称是参照了这些經驗和教訓的）是如此之明显，以致他們也同意了 1960 年莫斯科声明的这一段話：

“在爭取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扩大和維護他們的民主权利、爭取民族独立、爭取各国人民間的和平的斗爭中，以及在夺取政权和建設社会主义的斗爭中，共产党都主张同社会党建立合作。”

我們党，新型的工人階級的政党，向其他政党建議的（这些党表达了社会各阶层想要同工人階級結成紧密同盟以便扩大和革新民主的願望）正是这种合作。1936 年以来，我們党不断重复說，重振法国既不是一个党的任务，也不是几个政治家的任务，而是千百万法国男女的任务，而是全民族的任务。这就需要有严肃地組織起来的大党，充分意識到它們对全民族所負的責任，能够清楚反映全民族各种不同社会潮流的利益，以便能代表这些潮流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这就意味着，表达人民各阶层的需要和願望的这些党派的代表，在同我們党的关系中，必需利用一切合作形式：議會斗爭、辯論、制定共同綱領、为实现这些或那些目标而統一集中行动，等等。

这样，各党派就可以相互了解。过去，只要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肩并肩地行动，許多障碍就会迎刃而解。由于觉悟到需要共同

---

<sup>①</sup> 參閱路易·阿拉貢著《平行的历史》一书，可对这些事件有个正确的認識。

努力以實現共同目标，所以就越来越希望把工人运动的两派重新统一到唯一的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里去。这就为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同知识分子和城市中间阶级的必要联盟打下了巩固的、持久的基础，这就便于战胜资本家的寡头统治，这就可以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更彻底、更完全的改组社会更快地前进。

因此，我们党拒绝中国领导人建议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路线，我们党认为这种路线是危险的。我们党将坚持自己选择的完全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规定的道路。我们党的组织和干部将加倍努力，以便实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团结，实现一切民主力量和民族力量的团结。法国共产党相信，这样做，就是为争取法国的独立、和平、不可分割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译自 1963 年 12 月号法共《共产主义手册》月刊）

## 法国共产党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法共《共产主义手册》社论

原编者按：几个月来，中国报刊发表了难以确切计数的大量的诽谤性文章，反对苏联共产党和绝大多数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场的共产党，这些立场已在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以及1960年11月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里作了规定。在这些诽谤性的文章中，有一篇（载于1963年10月28日《北京周报》。参阅11月19日《人道报》对此文的摘要及列昂·费克斯同志的文章）特别涉及了我们党。中共领导人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在他们看来，法国共产党对于长期以来受到法国殖民主义者蹂躏的各国人民采取了沙文主义的和“同化”的立场。但是，事实俱在：既在文件中，也在实际生活中。它在今天已获解放或正走上解放道路的各国同志的心灵中，法国共产党人曾和他们一道共同进行了反对法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艰苦斗争。我们党三年多来曾多次提请警惕中国领导人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场，并揭发了他们的破坏活动。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他们使用的“论据”吧。这就是《共产主义手册》写此文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的发言人是以此个论断开始的，即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反帝革命的态度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他们自己——阵营里的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按照他们的说法，即苏联共产党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共产党——之间的一个“重

要的分水岭”。在他们看来，苏共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共产党“蔑视”至今仍在殖民枷锁下呻吟的或新近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甚至成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中国领导人想通过这种巧妙的方法来唆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从而造成世界反帝统一战线破裂，这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

按照他们的说法，似乎只有他们才认为“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殖民地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表示的声援，以及它以各种方式对越南南方人民目前进行的斗争的支持、对至今仍在殖民主义枷锁下呻吟的中非和南非人民斗争的支持、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国控制的支持以及对一切为争取独立或保卫独立反对新殖民主义阴谋而斗争的人民的人民的支持，都不能明显地证明所有共产党人都认为这一任务并没有结束，从而必须予以支持到底。至于我们党，我们没有等中国领导人来上课就已经揭示：昨天仍在法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非洲人民，为了获得彻底解放，还要走漫长的道路，而其他各国人民，如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留尼汪和圭亚那正在为取得本国事务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这就决定了我们自己对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

应该进一步来看看中国领导人对已取得政治独立的各国人民面临的问题所持的态度。他们写道：“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应该感激文章作者的这个发现啊！真好象八十一个党的声明没有明确地指出摆在各国人民面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是紧紧地互相依存一样！

事实是：任何共产党人都认为，只要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只要本国反帝革命尚未完成，那末，该国人民的独立就没有足够的保证，就仍然是不稳固的。这绝不象文章作者想使人相信的那样，是苏联共产党为了贬低这些国家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意义而完全凭空臆造出来的什么“新”理论。这是长期以来为事实所证明了真理。不仅共产党人抱有这种看法，而且有许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他们距我们的观点很远，但由于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经验教训，因而在这一点上和共产党人抱有同样的看法。这种看法怎能被认为是“经济主义”或政治上目光短浅的表现呢？

事实是：正是中国领导人出于自己恶劣事业的需要，才人为地将一个问题的政治与经济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假如我们也采取他们的论战手法，我们也可以类似地问一句，这些自命为各国人民真正政治独立的旗手的人是否真正关心这些人民的真正的政治独立。如果真的想打碎新殖民主义镣铐，怎么会对各国人民取得政治独立后所面临的根本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只字不提，一句话也没有，并且根本不提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和不可回避性。然而，只要追述一下在许多新独立国家中正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政治领导人的数不清的言论中的一小部分，就能使中国领导人确信，这些“重要的”问题是不能轻率地对待的。

## 十月革命开始的援助

文章的作者还攻击苏共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新近独立的、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问题上的言论。他们责备苏共同志吹嘘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援助，并且高估了它的影响。然而文章的作者并未能提供任何证明来支持这种毫无根据的论断。社会主义国

家援助新近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的问题，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个内部问题，而是涉及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花费了很多精力来批驳这样一种有关援助问题的观点，而这种观点从来也未在世界工运中得势过，而且它纯粹是被捏造出来的，这一观点就是：“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难道有人这样主张过吗？文章的作者很难能举出一个具有这样的观点的文件。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其他人一样，仍然忠于八十一个党的声明。声明指出，只有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才能使新近获得解放的人民解决本国的社会问题和巩固本国的民族独立。但声明进一步指出：是否选择这条道路，“这是各国人民自己内部的事情”，在解决这条道路所提出的问题中，“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应当起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正是本国人民，本国人民的牺牲和努力，而不是外援——不管这种外援多么有效——，在争取独立和进步的斗争的各个阶段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该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给予新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援助呢？应该持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正如《声明》所规定的：

“社会主义国家是正在争取解放或者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人民的真诚的和忠实的朋友。它们根本反对任何干涉年轻的民族国家内政的行为，它们认为促进各国人民争取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是自己的国际义务。它们对这些国家在沿着进步道路向前发展方面，在建立本国工业，在发展和巩固民族经济和培养本国干部方面给予大力的援助和支持。”

我们还要指出，这种建立在友好和平等基础上的无私援助，是历史上一桩全新的、独特的事件，它使国际局势朝着有利于新独立



国家的方向发生变化，因为它为它们的向前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现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列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拥有高超的技术和强大的生产手段，并且愿意有效地、不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地帮助不发达国家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经济。这一事实完全改变了历史条件，而这不是一件小事。

我们看到，历史上第一次，贸易的潮流正在发生变化，新独立国家之间以及它们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之间的合作正日益扩大，这不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它影响范围内的地带，不利于它施展阴谋诡计。文章的作者们说，哼！这些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小事，谁要稍微看重这些，谁就是顽固的“家长制拥护者”。但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假使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人民单独面对帝国主义列强，那末，在争取和巩固本国的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不是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吗？所有通情达理的人都会回答道：肯定是这样。1962年5月22日莫迪博·凯塔说：“马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联各族人民在巩固我国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1963年10月，本·贝拉在阿尔及尔对《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我们非常感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已给我们的援助，以及目前在我們着手建立独立的和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大量物质援助”。

此外还必须看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正日益增长，帝国主义者必须予以考虑。今天，从巴拿马和桑给巴尔民族斗争的发展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

新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世界间的经济关系的不断改善，迫使帝国主义者约制他们有某些方面的野心。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贷款利率低，而且偿还条件优惠，所给予的技术援助不附带关于参加

新企业的管理或分享利潤的任何要求。帝国主义把这种援助称之为“不光明磊落”的“竞争”，由于害怕看到新独立国家愈来愈转向与社会主义世界达成这类协议，他们被迫在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做出重大让步。这当然不是他们真心诚意作出的努力，而是对留给他们的那一点愈来愈少的机会作出重新的、现实的估计。但是不能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新独立国家的一种额外的——无疑是间接的——但也是可观的援助。这就是我们的看法，仅此而已。

中国领导人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给予新独立国家的援助时，故意贬低这种援助的意义，人为地把经济援助和——必须把此种援助置于其中的——极其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背景隔离开来。

实际上，这种援助有着一段漫长的历史。对于被压迫人民的第一次援助首先是十月革命的援助。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和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理论来确定国家的命运，并解决自己的问题”。

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援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各族人民所给予的援助。他们的英雄气概和所作出的牺牲在消灭希特勒政权及其同盟国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格勒的士兵们不仅使旧欧洲各国人民免遭奴役，由于他们彻底破灭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及其亚洲帮凶统治世界的希望，他们同时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人民打开了自由之门。事实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么目前时期，援助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它不再仅仅由苏联，而是由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来提供。尤其是，如果只提这种援助的物质方面，则将是错误的。事实上，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成就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影响，使它们能够在国际机构中，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以及在某些严重情况下，给走上解放道路或新

获解放的各国人民以宝贵的援助，在这方面，只须回顾一下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美帝国主义对古巴、伊拉克人民和其他中东国家人民的各种侵略阴谋就足以看出，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态度使侵略者后退。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各种援助的问题上应该说的东西。

\* \* \*

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中，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应该“代替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还说，苏联共产党“认为……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同样是错误的。无论是苏联同志，还是我们自己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嘱咐被压迫人民采取消极的态度，从来没有主张“乖乖地”等待、不要进行民族解放革命，也从来没有认为有了和平共处就什么都行了，天长日久，不通过斗争也能使人获得普遍解放。

我们党恰恰揭穿了法国统治者的这种调言，他们始终力图把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人为地从外部挑起来的、与和平共处不相容的“内乱”。

如果人们按照列宁的教导去理解，那末，和平共处绝不意味着同帝国主义调和、扑灭革命斗争和缩小民族解放运动的规模。这一原则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它规定了这些国家间实行共处，并禁止任何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在谈到和平共处时，没有说它应该去“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说它促进这种斗争，它远远不是妨碍这种斗争，而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这种斗争。我们这样说，也同样是忠于八十一

个党的声明的。声明說：“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現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殖民地或附属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和平共处思想取得发展的时期更加重大，这是事实。

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絕不是維持现状的同义字，根本不是将国际关系固定下来不变，而是恰恰相反，要求加紧开展争取通过談判解决悬而未决的問題，不干涉他国事务，促进貿易、文化和科学交流和争取裁軍的活动。这必然会削弱帝国主义陣营內最冒险的和最富侵略性的势力。其結果是为被剝削者进行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为至今仍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国家进行争取或巩固独立的斗争——不論这些斗争采取何种形式——造成更加有利的形势。

### 我們对新殖民主义的譴責

中国作者們多次指責他們提出非难的共产党不仅不反对新殖民主义，而且自觉地成了新殖民主义的帮凶，也就是說，这些党的立場，实质上和实际上都是与帝国主义的立場吻合的新殖民主义立場。

中国领导人对于苏联共产党多次揭露并提醒注意帝国主义的新方式——通常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一事假装不知。我們党也是这种手法的受害者。中国的批評家們事实上认为，近十几年来，即法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新殖民主义的方法来力求掩飾自己的政策和真正目的的时期中，我們党的领导人“追隨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

让大家来判断吧！每当执政的资产阶级企图施展新的阴谋詭計来欺騙他們企图維持在自己控制下的各国人民和法国人民的时候，我們始終不断地揭露了他們的真正意图。我們正是通过以事实为依据的分析，闡明了这些阴谋詭計的新殖民主义的实质。

譬如，关于戴高乐 1958 年上台一事，莫里斯·多列士曾說过，如果大资产阶级的政策今天正在得势，并且由于更加紧张的局势将以其他方式得以貫徹，“如果这就是戴高乐將軍上台的真正意义，那末就將由这一政策的决策人即垄断资本家、大銀行家以及一切称之为帝国主义的分子，来解决阿尔及利亚問題”。（多列士在 1958 年 10 月 4 日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从对我国政治现实的这个明确看法出发，我們曾不倦地說明法国大资产阶级將力图朝着什么方向来解决这些問題。我們当时即已指出：法国大资产阶级怀着恐惧的心情看到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取得了前所未聞的进展，因而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訓。他們懂得，如果不迅速修改他們在殖民地問題上的观点和他們直到那时一直使用的統治手段，則会冒全部失去自己殖民特权的风险。

难道这不是提醒警惕法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的詭計嗎？而中国领导人却对这些詭計默不作声。这些新殖民主义的詭計后来繼續发展起来了，在戴高乐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結束前一直搞阴谋詭計的整个期間中，我們天天加以揭露。我們从来沒有抱过幻想，而中共领导人却似乎毫无顾虑地持有幻想，因为照他們看来，我們已“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給戴高乐等人”，似乎戴高乐及其政府——世界大財团的代表与工具——沒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东南亚条約組織，而我們却随时随地予以揭露。

当今天戴高乐政权終於承认了它不久以前还在誣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我們衷心地表示祝賀，因为我們从未停止过支持

中国人民在 1949 年以前整个时期进行的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后，我们也从未停止过要求这一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政府得到承认。在法国承认人民中国这一外交姿态中，不是没有帝国主义的阴谋和野心，我们根本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事件主要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这样一个事实。

埃维昂协议一经签订，我们党没有认为一切都已经解决了，法帝国主义已放弃对阿尔及利亚的一切野心。因此，我们号召法国人民要求“忠实执行协定，反对把殖民主义的新形式强加给阿尔及利亚的一切企图”（《1962 年 3 月 22 日伊符里中央全会决议》）。

与此同时，我们揭露了法帝国主义对其原来帝国的其他国家人民进行的各种阴谋。正如军事行动得不到胜利一样，旨在限制争取解放的人民的自由的阴谋，同样不会取得胜利。“新殖民主义绝不能挽救帝国主义的阵地”（莫里斯·多列士 1960 年 10 月 2 日在什瓦济勒罗瓦市教育工作研究日的讲话）。

所以，我们有根据地說，我们不是等到中共领导人向我们解释问题何在以后才发现新殖民主义的。我们甚至冒昧地相信，就及时揭露法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阴谋来说，就研究这些阴谋的发展和解剖其微妙的结构来说，我们比中国领导人更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对戴高乐的欣赏就是明证——，因为我们对我国资产阶级的手法有长期的经验，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党，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很擅长，送我们进了一所好学校。

近两年来，本刊曾就此问题发表了两长篇专题研究，其一是：《什么是新殖民主义？》，文章分析了国际现象，指出了新殖民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本质及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各种表现（1962 年 9 月《共产主义手册》第九期，艾克勒杜著《什么是新殖民主义？》）。第二篇是：《法国新殖民主义与非洲》，文章分析了法

国新殖民主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特殊表现，并研究了法国新殖民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情况及其目前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在欧洲共同市场范围内的表现。（1963年3月《共产主义手册》第三期，《新殖民主义与非洲》，作者同上。）

我们希望中国的编者們，与其向我们党发出一些空洞的和輕率的指責，倒不如钻研一下这类論文并对我們說說你們对这些文章的想法。但是他們宁願这样做，似乎这些論文并不存在一样。当然，这样做起来要省事一些。

### 从“里弗战争”到南越和阿尔及利亚战争

根据中国編輯們的說法，似乎我們党的领导人反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的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我們党四十年来一贯坚持原則立場，这种立場证明，我們党是忠于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論点的，可是，尽管我們的誹謗者對我們的立場非常了解，但他們却对此完全保持沉默。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掌握着一个龐大的殖民帝国——的党，我們过去一贯不懈地运用这个原則来估計从1920年起法国帝国主义同它的殖民地人民之間的多次武装冲突。然而，突出的事实是，我們党的领导机构为了使列宁主义关于这种冲突的性质的观点战胜社会民主党的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說法而进行了有力的斗争。里尔代表大会（1926年）用下面这段文字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于矛头指向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革命运动，必須給予更有效的支持。关于这一点，这不仅是我们支持阶级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們要联合殖民地的本地的和欧洲的无产者反对资本主义——，而且是支持民族革命运动。法国的压迫使殖民地人民

产生了民族感情，这种感情占主导地位，并且压倒往往被它完全掩盖的阶级斗争。由于我们支持民族解放，我们无权对于我们承认其历史作用的这种运动持中立态度。”

莫里斯·多列士早在1932年就写道：“我们的印度支那或阿尔及利亚的兄弟们给予法国资产阶级的每一个打击，都是对我们运动的直接帮助。反过来说，我们对我国资产阶级的每一个打击，也是对在殖民地遭受我国资产阶级压迫的奴隶的直接帮助……。我们法国共产党人要竭尽我们的全力，为争取受法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在二十五年以后的1956年，即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们重提了这个原则立场：“人们不应该孤立地或根据运动的领导人物的社会、政治成份来估价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运动，而是要按照这个或那个时期出现的整个政治问题来估价。我们党支持切实反对帝国主义的任何民族运动、任何政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管这些政党、组织和个人的性质与纲领如何。”（1956年6月11日列昂·费克斯在塞纳省和塞纳—瓦兹省委共产党员教育会议上的报告）

我们的这个原则立场是明确的。让我们顺便指出一点，它使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所谓我们不了解列宁关于“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观点这种虚伪的论点真相大白。

我们党正是由于执行了这个原则，所以它才坚决投入了1925年支持以“里弗战争”闻名的摩洛哥人民武装斗争的战斗，我们揭发了持下述说法的人们，他们说，这次起义只能是“反动的”，因为它是由一位封建领袖阿卜戴尔·克里姆领导的。我们党也正是由于执行了同一原则，所以它才在三十年后又自始至终地支持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武装斗争，因为我们党认为，尽管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大多数领导人宣称赞成离我们的理论很远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他们仍然投入并领导他们的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解放的



正义斗争。

同时，我们党利用了一切合法的、半合法的或秘密的条件，在同这些国家的同志保持紧密联系的情况下，从未停止过在处于法国帝国主义殖民枷锁下的人民中散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的工作。

我们关于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二个行动原则是：对压迫国的共产党人来说，仅仅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积极开展宣传，指出要求解放的人民所进行的武装斗争的正义性质，这是不够的。还必须以一切适当的方式切实地支持这种斗争。莫里斯·多列士在1949年越南战争期间说：“作为在殖民地压迫着数千万奴隶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我们会高声地宣布，这些国家的人民有自决的权利，包括脱离法国的权利……。我们尤其有义务给予正在为争取自由与独立的被压迫人民以切实的实际支持，就像我们在1925年摩洛哥战争期间和现在反对越南战争所作的那样。”（1950年1月《共产主义手册》第一期）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立场。现在我们来看看事实，看看我们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

对我们党来说，反对摩洛哥战争的活动是在法国工人阶级和受法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之间第一次切实实现了广泛的共同斗争战线机会。根据党和统一总工会的倡议，建立了反对摩洛哥战争中央行动委员会，由莫里斯·多列士任委员会的主席，他当时二十五岁。这个委员会组织了許多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1925年10月12日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各组织的号召下，举行了反对摩洛哥战争的二十四小时罢工。九十万工人参加了罢工。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第一次政治大罢工。但是，行动不只是这些。党在士兵中提出了亲善的口号，1925年10月党的全国会议对这个口号作了如下解释：“我们不要求士兵们孤立地拒服兵役，这样作

不会有任何效果，但是，我們要組織亲善运动，作为士兵的一个自觉运动……。在反对摩洛哥战争的斗争中，亲善运动只有依靠工人运动的全面发展才能获得成功。”一些装载着士兵的列车在《国际歌》的歌声中出发，士兵高喊要求和平。好几艘军舰停泊在码头上，因为参谋部由于水手们提出强烈的政治要求而不敢使用它们。

资产阶级对我们党和正在斗争的法国劳动人民进行了镇压。在徐莱斯纳的一次示威游行中，有一个工人被杀害，一千三百七十一人受到军事制裁，五百三十五人受到民法制裁。政治局的全体成员都被搜捕，莫里斯·多列士被判处十四个月监禁。但是，这场斗争不是徒劳的，它锻炼了党，使工人阶级在了解殖民地问题和了解同民族解放运动联盟的必要性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在1947年到1954年整个越南战争期间，我们党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开展了坚持不懈的、紧张的和卓有成效的行动。这七年中，在党和各大工人组织与民主组织的推动下，组织了許多行动。我们一直为在法国联合足够的群众，以便迫使统治者停止战争并进行谈判而采取行动。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开展了经常性的群众政治运动来反对“肮脏战争”。工人阶级广泛地响应了我们的号召。許多工厂的工人停止军事生产，許多港口的码头工人拒绝装载军事物资，許多铁路工人和海员拒绝搬运。

关于这一点，雅克·杜克洛1952年3月在波尔多所作的一篇赞扬该地码头工人的模范行动的演说中说：“不要看不到这样一点：在必须进行反对装运和制造军备的这样一个艰巨的斗争中，问题不是寻求个人性质的解决办法，而是必须在工人阶级群众的行动中寻求解决办法——这种行动得到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和声援精神的支持和鼓舞——我们必将找到这种解决办法。”（1952年3月17日《人道报》）

雷蒙·迪安和亨利·马丁的榜样表明，法国青年在我们党的

号召下，在这个艰巨的斗争中，包括在法国远征军队中坚持了光荣的岗位。

资产阶级统治者再一次对我们党和越南全体和平拥护者加紧镇压。雅克·杜克洛被捕了，列奥·斐盖尔被追捕，成百的党员和青年士兵由于参加反战活动而被抛进监狱。

我们比谁都更加清楚地知道，法帝国主义的失败——它被迫在1954年日内瓦协定上签字——首先是越南人民及其英勇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在我们应承担的方面对这一胜利也作出贡献，我们并为此而感到自豪。我们在行动中从未把民族利益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分割开来。我们动员了一切真正关心法国利益的民族力量起来反对战争，从而给了法国殖民主义以严重打击，使它不得不分散一部分重要的力量，包括用于镇压的力量来对付法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对。越南劳动党多次承认过我们这样做所给予越南人民的帮助的重要意义。

## 阿尔及利亚战争

至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从1954年到1962年这七年多的时期中所进行的正义武装斗争，我们从一开始就给予了支持。阿尔及利亚最初的武装行动发生以后两天，《人道报》曾以《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为题写道：“实际上，阿尔及利亚事件同突尼斯和摩洛哥事件一样，是人们在地中海彼岸顽固地奉行不幸政策的結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说过，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满足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列昂·费克期，1954年11月3日《人道报》）

在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我们曾说过：“今晚我们向全体阿尔及利亚人民表示我们的声援，表示我们要竭尽

一切努力来满足他們的民族要求的意志。”（1954年11月5日雷蒙·居約在維尔—迪夫〔冬季賽車場〕的演說）

1954年11月8日，政治局在一項聲明中表示了如下態度：“由于（政府）一口否認阿爾及利亞存在着民族性質的問題，它便違背了阿爾及利亞的現實，尤其違背整個人民要求自由地生活和民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務的願望”，政治局並要求“立即停止鎮壓……，承認阿爾及利亞人民要求自由是合情合理的”。

當時，除了我們和共產黨人在其中參與鬥爭的各個強大工人與民主組織，諸如法國總工會、法蘭西婦女聯盟和和平理事會以外，法國輿論中沒有人出來公開地表示這樣的立場。至於各政黨，我們黨是在這個歷史時刻對阿爾及利亞人民表示聲援的唯一的黨。

在從這個時候起的七年中，我們黨在特別艱巨的條件下，頑強地開展了強大的群眾鬥爭，鬥爭的目標是：

——揭發對阿爾及利亞人民進行的戰爭的非正義性質，指出阿爾及利亞人民要求獨立權利是正當的，因而他們進行的鬥爭也是正當的，指出承認這個權利是符合法國的民族利益的。

——組織法國的一切人民民主力量爭取談判與和平的聯合鬥爭，由於我國的特有條件，這種群眾性的政治行動不僅是唯一符合現實情況的，而且構成法國人民能夠對阿爾及利亞正義事業提供的最有效的援助。

——根據各種可能條件，促使我國的政治發生變化，以加速談判時刻的到來。

我們曾通過傳單、小冊子、標語和在成千上萬的會議上和群眾集會上的演說，為開展群眾性宣傳運動作出了巨大努力。

這種努力的廣度是同法國資產階級一個多世紀以來在法國人民最廣泛的階層中灌輸的殖民主義和沙文主義偏見——特別是對阿爾及利亞的偏見，因為它在法國殖民帝國中占有特殊地位——

的深度相适应的。这项长期的任务对引导法国人民为争取停止战争和强令实现谈判而进行的斗争来说，是绝对必需的。如果不是完成了这项任务，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会困难得多，取得独立的代价会大得多。

、 我們曾不得不同逆流进行斗争，我們在某种情况下，沒有屈服于在法国人民群众中用制造挑衅的办法——政府宣传以强大的手段使这种挑衅具有巨大的规模——开展激烈的沙文主义的仇恨宣传运动的人所施加的强大的压力。例如，在1957年6月迈卢扎大屠杀期间，我們党曾是唯一抵制了罪恶歹徒的党，除我們以外，所有人把这个事件說成是民族解放陣綫干的。当时，过去經常教訓我們并且口口声声高談“革命”空話的左傾小資产階級分子——其中某些人今天同中国领导人一唱一和地反对我們——也被吓住了，并且放出厥詞反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领导人。只有我們党公开揭露了迈卢扎事件，指出这是法国法西斯軍事头子們所制造的无耻挑衅。

我們并不要求中国編輯們来估量我們在这种环境中的行动的意义，正如他們整篇文章所表明的那样，他們是无法理解在像我們这样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斗争条件的。至于我們，我們从未怀疑过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的坚定态度和决心。

关于揭发法国殖民主义者对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問題，回顾一下这样的事实也不是沒有益处的：在法国，我們党第一个揭露了法国軍队的軍官經常不断地使用酷刑。我們党从1956年起就这样做了，1957年公布了一些駁不倒的文件，尽管当时存在着镇压的条令。它在进行揭露的时候指出，殖民战争必然要导致法西斯主义非人道的行为，指出要結束这种恐怖行为，除了对战争的根本原因采取行动以便制止它以外，別无它法。接着，在同样这些反共的“左派”分子中——今天中国领导人正企图从他們中

間寻找支持者——，有人抓住使用酷刑这个問題当作一面旗帜，但是，却有意把这个問題同总的問題分割开来，只抓住这个問題道义的一面，这是企图要使人相信，这样一場战争可以“人道化”。我們拒絕了这种方便的道路，并且認識到，由于把使用酷刑这个問題重新放到反对殖民主义、爭取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的总的斗争范围中来，从而使得在这个問題上，包括在道义方面的斗争更推进了一步。我們在采取这种态度的时候，我們只仿效阿尔及利亚战士们本身的范例，尤其是《毒瘤》一书的作者們、《审問》一书的作者亨利·阿雷和《集中营》一书的作者阿卜杜勒·本齐納等人的范例。

至于促使通过談判在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权利的基础上达成解决办法的政治变化，它不是自己发生的。这成这种解决办法的功績不像中国批評家所认为的那样，属于戴高乐，属于他的寬闊胸怀和他的寬宏大量。这种解决办法是通过三个因素强加于他的——这些因素的压力不断加强，最后终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們在整個战争期間經常揭示的并且最后导致作出决定的这三个因素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英勇斗争；法国工人阶级和人民不断强大的行动；对阿尔及利亚事业的国际声援。

我們在斗争崗位上尽了自己的职责。1960年2月1日和1961年4月27日，一千二百万法国劳动者在惊人的一致气氛中停止了工作，从而使他們的政治罢工具有毫不含糊地譴責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尔的法西斯头子們所奉行的、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暴力政策的意义。这两次运动通过其广泛的規模对后来事态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一次使远征軍的高級軍事人物惶惶不安的运动是青年現役軍人的大規模的行动，由于他們坚决勇敢的态度，对于挫敗1961年4月的軍官叛乱作出了貢獻。

但是，在工厂、学校、街头，甚至在派往阿尔及利亚的軍隊里开

展的動員了數以十萬計的勞動者、民主人士和青年的強大的群眾性的行動是長期努力的結果，這種努力往往是表面上看不見的、堅韌、勇敢的努力，它首先引導工人階級中最覺悟的分子參加行動，然後，再接觸到越來越廣泛的群眾。

1955年，士兵們在車站舉行的示威遊行以及和平擁護者制止軍用列車前進的行動——在這些群眾行動中，有許多共產黨員被逮捕——為法國所有反對繼續進行殖民戰爭的力量的聯合作出了準備。

1956年，在我們黨和和平理事會的號召下，舉行了多次示威遊行，包括街頭遊行。礦工和冶金工人在好幾個工人中心，特別在1957年10月17日我們黨組織的全國行動日那天舉行了罷工。

年輕的共產黨員士兵，諸如阿爾邦·里什迪、皮埃爾·居約、塞爾日·馬尼安等同志曾採取勇敢的行動，號召入伍的法國青年提出停止人們驅使他們進行的非正義戰爭的要求，因而被處重刑監禁。

1958年以後，即戴高樂政權建立以後，街頭遊行儘管遭到政府禁止，但是，仍然越來越多，在遊行中，勞動者、青年工人、學生和婦女都勇敢地抵禦着戴高樂警察的野蠻毆打，成百的人受傷，而且往往受了重傷。我們想提醒一下，1962年2月8日倒在巴黎街頭上的九名烈士中，有八名是我們黨的黨員。

雖然中國領導人認為法國工人階級、它的黨和我們全體民主力量以各種形式給予阿爾及利亞事業的支持是無足輕重的，但是，我們卻知道，阿爾及利亞人民是承認這種幫助的重要意義的。1960年6月，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在一項官方公報中指出，“它滿意地看到，法國人民中越來越強大的力量表示反對殖民主義強加於我國人民的戰爭”。

我們忠於列寧的教導，一貫對這種行動持這樣觀點：反對革命

的高談闊論，浪漫的勇敢、個人行動和冒險主義。也許中共領導人認為，對壓迫國的共產黨來說，幫助一個拿起武器謀求解放的殖民地人民的最好辦法，是派幾支軍隊到起義人民的戰場上去——這種軍隊必然是人數有限的、象徵性的軍隊，但是卻可以使某種“革命”狂熱自由泛濫。

如果中共領導人關於像我們這樣一個黨支持一個殖民地革命戰爭的概念真是像上面所說的那樣，那他們就大胆說出來吧！我們將泰然自若地同他們進行討論，特別是因為我們的曾在西班牙國際縱隊的队伍中進行過戰鬥的同志們可以證明，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這種軍事援助的意義是什麼——這種意義的價值我們是了解的。

關於殖民戰爭問題，正如列寧教導的那樣，我們一貫認為，壓迫國的無產階級應該在與殖民地人民進行自己的鬥爭的同時在自己的陣地進行鬥爭。雙方的鬥爭都是朝着同一方向進行的。結成共同的鬥爭陣綫並不意味着同盟雙方的任務是完全相同的。

我們為反對殖民主義戰爭、支持正在鬥爭着的人民而進行的鬥爭，在法國是在法國人民和法國軍隊中進行的。鬥爭的目的是要把一切人民力量聯合起來採取行動，以便最大限度地削弱進行殖民勾當的帝國主義，在它的後方困擾它，直至使它放手為止。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必須作為一個在人民面前對自己的行動負責的黨而行動。我們在每一個階段都必須充分地考慮到群眾運動的水平，考慮到什麼是可以辦到的，什麼是辦不到的。所以，我們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沒有讓自己走上冒險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在這個或那個鬥爭時期會使工人階級脫離整個民主運動，會給資產階級提供對運動的先頭部隊進行挑釁活動的手段。我們沒有墮入左傾空談者的陷阱，他們號召採取個人行動，主張青年士兵不進行群眾性的鬥爭——儘管現役軍人的鬥爭行動在1961年4月



提供了如此杰出的榜样——，并且主张采取这种行不通的解决办法：拒絕服兵役，或者煽动法国民主人士代替阿尔及利亚爱国者去完成他們的革命任务。我們党对这种态度提出过警告，指出它不能加强反对战争的运动，反而会削弱这种运动，进而損害阿尔及利亚事业的本身。

我們曾指出：“法国和平战士的任务在于說服全体法国人，并把他們联合起来，以便向他們指出，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来說，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一場灾难，对法国人民也是有害的。大家努力使战争結束得越快，对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越是有利的。”（莫里斯·多烈士 1960 年 10 月 30 日在圣·德尼紀念法共四十周年的演說）

关于那些要求“法国青年有拒服兵役的权利”的人，莫里斯·多烈士这样說过：“不，出路不是拒服兵役，出路是列宁教导我們走的那条路，我們要走这条路，并且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已經走了这条路，我們的青年士兵里什迪和其他人也都走了这条路。

“这条道路就是在群众中，甚至在军队中，尤其是在军队中进行工作，以便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以便使最优秀的分子不致陷于孤立，不致使能够进行工作、已經觉悟的人們在尚未醒悟的士兵群众中間陷于孤立。开小差，离开军队，这意味着把士兵群众让給往往是法西斯的军官，让給极端分子……，任务就是进行工作，进行艰难、困苦的工作，这种工作要求人們作出牺牲，有时要求青年士兵付出坐几年监牢的代价。但是，我們將支持他們，他們将进行斗争……”（同上）

我們正是这样理解我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正是这样理解我們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的。中国领导人應該把討論放到这个列宁主义的陣地上，以便對我們的行动作出估价，但是，他們却避免选择这样的陣地，因为他們知道，在这个陣地上，他們的誹謗将会被駁得体无完肤。

## 我們为反对殖民主义毒素而不断做出努力

《北京周报》的編者們在他們的文章中以《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为小标题的专门論及我党的那一部分中，不仅指控我們拒絕支持“民族革命战争”——我們已指出这种誹謗是白費的——，而且更一般地說来，还指控我們維護“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我們的党、特别是我們的莫里斯·多列士同志被指名說成是維護一种“同化主义”政策，企图拒絕給殖民地各国人民以同法国分离的权利。从而，我們的党只是在沒有办法的时候，最后才承认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权，而过去我們是长期否认这种权利的。

把我們說成是出自“民族沙文主义”始終支持法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包括在經濟上的利益，直到宣揚为了法国的利益而掠夺阿尔及利亚的財富。

最后，說我們始終遵循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支持建立“法兰西联邦”和建立戴高乐的“共同体”的“新殖民主义花招”。

人們看到，当中国領導人以糾正別人錯誤者自居时，他們不怕做得过份，似乎他們确信自己随便什么都可以說，而不会冒任何风险。

但是，我們并不准备讓他們逍遙自在地对一些我們特別有理由关怀的严肃的事情完全不負責任地胡說。

\* \* \*

要正直地談論我們党对待受法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功过問題，至少要有对待历史真相的最起碼的正直态度，也就是对待事实、对待每个人都可能驗證的簡單事实的正直态度。

首先，必須考虑到，从我們党誕生到今天在党的整个历史过

程中，我們開展的反殖民主義行動所處的實際的歷史和政治條件。

法國資產階級支持儒勒·費里<sup>①</sup>的殖民主義思想，他們會通過巧妙的宣傳，成功地使我國大多數人民，包括工人階級的一大部分，接受了殖民主義勾當的論據。大多數法國人認為擁有殖民地是符合民族利益的，因此認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的起碼的職責是保護被資產階級宣傳為“文明和進步”的事業。在這方面，第三共和國、特別是儒勒·費里這個“東京人”<sup>②</sup>——這不是一種簡單的巧合——所建立的“初級小學”在對法國廣大群眾進行的殖民主義毒素的宣傳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天主教人士中，對傳教士作用的頌揚，舉辦慈善事業，也促進人們認為法國在它的殖民地起着“人道主義的作用”。

1920年在法國誕生了一個新的政黨，它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堅決站在列寧主義的行動原則基礎之上。這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法國工人運動的優秀傳統和十月革命的神奇般的事件在世界工人階級引起的希望相結合、融化的產物。但是，這個新的政黨——法國共產黨曾是這樣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在這個無產階級的思想中經常同時共存着最優秀的階級思想和最惡劣的殖民主義和沙文主義的偏見。

這個黨是一個十分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政黨，這個帝國主義在它龐大的殖民帝國中對數千萬被奴役者進行着剝削。如果這個黨要配得上列寧的稱號，它就必須勇敢地面對着從它一誕生就碰到的這種巨大的困難和投身于一場巨大的鬥爭來克服這些困難。它是否這樣做了呢？全部的問題也就在這裡。

我們可以說，我們的黨從它一誕生就把這個任務看成是它需

---

① 儒勒·費里(Jules Ferry, 1832—1893)，是侵略越南的法國殖民主義的主謀者。——譯者

② “東京人”即越南人。——譯者

要进行并且要很好地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們曾展开了巨大的、持續不断的、頑强的行动来消除法国工人階級和人民所受的殖民主义的毒素，这种毒素甚至經常表现为种族主义。在本文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已对我們所做的长期的努力提供了一些证明，但是我們願意在这里重新談談这个問題，以說明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首先，我們的党曾在自己队伍的內部进行了艰巨的斗争，以使第三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立場取得胜利。

不仅是在开始，而且是在每一場艰巨的斗争中，我們都必須以最大的不妥协性来捍卫、解释、恢复列宁关于这个問題的教导并使每个共产党员都能接受它，首先是关于我們在我們的教育和宣传中置于第一位的下述思想：

“在压迫国家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須是宣传和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沒有国际主义。”

我們全部的理論教导是一貫基于这一原則的基础之上的。只要看一看党在四十年期間的教育和政治文件的全集，就可以相信这一点。

我們只举出最近一个时期的例子：我們的十二大（1950年）曾譴責“某些黨員有时迟疑不願公开表示越南人民和一切殖民地人民拥有独立权”的态度。十三大（1954年）公开譴責了那些“在宣布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自决权面前后退”的黨員。十五大（1959年）在它的提綱第四十一点中曾指出：“有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观点被忽視……。但共产党……的立場是明确的：只有通过以毫不含糊地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的权利为基础的談判，阿尔及利亚問題才能得到解决。”

問題不仅仅在于我們說了些什么，而且在于我們做了些什么。我們为反对我国資產階級的殖民主义罪行曾进行了坚持不渝的斗

爭。在每一个时刻，我們都展开了支持被压迫人民斗争的群众性行动。我們已經說明了我們党在1925年的摩洛哥战争、1947年到1954年的越南战争、1954年到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間所采取的行动。但这并不是全部情况。

在1930年，我們曾就安沛和宜安一河靜省的越南爱国者起义开展了巨大的运动。

在1940年9月北山大屠杀的事件中，我們党地下出版的《人道报》曾写道：“殖民地的人民，我們的兄弟們，在你們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的斗争中，法国人民向你們高呼：拿出勇气来！法国人民站在你們一边，我們一起努力定能打败我們共同的敌人。”

在1945年5月，我們党揭露了造成四万人死亡的君士坦丁的屠杀。1947年，我們党发动了声援馬尔加什人民的热烈运动，并且只有它譴責了法国资产阶级对島上九万居民进行的万恶的屠杀。我們党通过它激烈的鼓动工作，在法国輿論中激起了对1950年血腥挑衅的牺牲者——黑非洲各国人民的最大的同情，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給予了最有效的法律上的、政治上的和物质上的声援。从1951年到1955年，我們动員了工人阶级和广大的民主阶层反对在突尼斯和摩洛哥进行的軍事镇压。目前我們正在給予那些为爭取承认它們的自决权而进行斗争的“老殖民地国家”（馬提尼克、瓜德罗普、留尼汪、圭亚那）人民以坚持不懈的声援——人們通过最近的馬提尼克青年爱国者們的訴訟案可以看到这点——以及給予为爭取真正的独立而正在进行着武装斗争的喀麦隆爱国者以同样的声援。

\* \* \*

在这种情况下，人們怎么能够硬說我們始終拒絕承认被压迫人民有“同法国分离”的权利呢？中国领导人又是根据什么来毫无

廉耻地说我们一贯把法属殖民地的各国人民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主张“民族同化”政策，并从而反对分离权呢？

就拿阿尔及利亚来说，我们的党经过在第三共产国际的范围内长期协助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组织在无产阶级和贫农中巩固和发展自己的行动之后，又鼓励他们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党，从而大大促进了他们同我们的组织的分离，并在1936年建立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

正是莫里斯·多列士在1939年2月11日在阿尔及尔的演说中确定了阿尔及利亚特有的性质，从而做出巨大的历史贡献。在那个时候，当还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政党考虑到这样一个前景，当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本身还没有达到足以为自己的愿望提出一个巩固的理论基础的水平的时候，通过杰出的分析，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愿望第一次得到了肯定。

莫里斯·多列士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态度是清楚的……，我们承认阿尔及利亚人，一切阿尔及利亚人享有作为个人和集体的自由生活的权利……。阿尔及利亚民族正在历史中形成，法兰西共和国的努力可能促进和协助它的发展。”

1945年，艾蒂安·法戎在谈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时指出：

“我们不能承认，这种联合可能在武力的基础上实现。当人们宣布阿尔及利亚像其他的省份一样是法国的一个行省的时候，就以为一切都已经说清楚了，而完全违反事实地否认阿尔及利亚有着与我们不同的人民，在那里居住的男女都是十分不同的种族的后裔，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有着古老和丰富的文化的后代——讲着和我国不同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独特的精神面貌和习惯，这样做，那是过于简单了。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在目前世界正在进行的总的运动中，必

須看到，一种民族的独特感情和要求自由的思想正在阿尔及利亚发展着。”（艾蒂安·法戎 1945 年 7 月 11 日在諮詢議會上的演說）

这难道不是同对阿尔及利亚实行“同化主义”的概念恰巧相反嗎？

在 1954 年，当政府首脑孟戴斯—弗朗斯宣布“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时候，我們坚决地回答說：“不！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利亚，”而且我們通过大量的闡述阿尔及利亚历史的传单、小册子、通俗讀物具体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些材料还指出阿尔及利亚当前的形势，指出它的民族願望是正当的。

关于越南問題，让納特·維美徐曾在国民議會对殖民主义者說：“你們这些高談自由的多数派們，你們應該承认越南人民有他們所希望的生活权利，有像他們所做的那样根据自己的选择建立政府的权利。承认越南人民有权自己判断是否願意和法国連系在一起！承认他們有权来自由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絕同法国結成联盟。”（让納特·維美徐在国民議會发言，1950 年 1 月 27 日《官方公报》）

然而，中国文章的作者們不惜以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們以极不老实的态度利用下述事实作文章：即一个在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斗争的共产党，它有时必須对阶级敌人狡猾，迴避敌人的检查，以便以全力最广泛地扩大党的宣传并找出最适合的方法来。因此，在整个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間，我們在我們的文件中，提到阿尔及利亚人民享有“获得自由”的权利，阿尔及利亚人民享有“自决”的权利，“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事实”。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含义十分明显的暗示，正如列昂·費克斯在 1963 年 11 月 19 日的《人道报》上談到列宁本人也曾采用这种做法时所指出的：“無論是在法国或在阿尔及利亚，在这个問題上沒有人会弄錯；我們所指的就是独立。”

## “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政策，被压迫

### 人民的利益与民族利益

关于分离权問題，我們想进一步說明的是，我們曾竭力按照列宁对我們的教导，正确地貫徹这一原則。而中国领导人忘記提到的是列宁就此問題曾这样說过：“分离权并不意味着必須分离”。他想通过这段話說明什么呢？列宁本人通过下述解釋闡明了他的思想：“对民主的各种要求，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內，并不是什么絕對的东西，而是整个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別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

这就是說，列宁主义者不能滿足于“革命的”詞藻，局限于不断地重复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一般公式。这种态度是左傾主义者、左傾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所有下述一类的人們所持的态度，这些人拒絕對生活中出現的意料不到的新情况負責，并且特別由于不懂得事态的发展，竭力采取騙人的态度，采用一些“激进”的喋喋不休的語言来掩飾自己的无能，从而給帝国主义助威。

在最近四十年的过程中，曾有过两次这样的时期：受法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从他們的民族解放的角度来看，不是同法国人民分离，而是和法国人民团結在一起。

从1935年起便出現了这种局势。在全世界，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抬头在当时对各国人民构成严重的危险。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軍国主义的日本都明目张胆地表明它們要并吞北非、中东和亚洲各国的企图。

在法国，人民陣綫的胜利和1936年5、6月大罢工的重大胜利，曾为大部分法属殖民地带来重大的、可喜的变化。

从而，在阿尔及利亚，那些被放逐到南部、被监禁和被通緝的



阿尔及利亚人都获得释放和赦免。穆斯林劳动者正式被承认享有組織政党、工会和领导这些組織的权利。集会自由与出版自由得到了承认。四十小时工作周，休假工資照付，集体合同等有关社会福利的法律条款得以付諸实行。

讓我們回想一下人民陣綫以前执行“土著居民法”的时期，当时只消根据总督的决定就能把任何一个被怀疑进行政党或工会活动的阿尔及利亚人（不論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党人）监禁起来或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极南部。

在突尼斯，被流放到南部的宪政党人和共产党的爱国者——其中包括布尔吉巴，都获得了释放，因举行示威游行而被判刑的齐東納大学生获得了赦免，人們获得了結社、集会和新聞的自由。前此一直未获准許的“宪政党”和突尼斯共产党成了合法的政党。最后，劳动者享受到在法国通过的某些社会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我們說了些甚么呢？

1937年12月，莫里斯·多列士在阿尔代表大会上，除了重申“我們共产党在殖民地人民問題上提出的根本要求仍然是自决和独立权”以外，还这样指出：“如果說当前的决定性問題是取得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那么各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就在于他們同法国人民的联盟，而不是采取可能有利于法西斯主义阴谋的态度。”他接着指出：“因此，必須为殖民地人民与我国人民建立这种自由的、信任的和兄弟般的联盟創造条件。”

我們当时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否对呢？我們不来回答这个問題。我們請越南的共产党同志們来回答。在越南劳动党的题为《越南工人阶级政党的三十年》一书中（1960年，河内出版）做了如下的评价：

“季米特洛夫同志（向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正像最后決議一样，都強調指出：当前各国人民最危

險的敵人並不是一般的帝國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因此，國際無產階級必須團結自己的隊伍並和其他的階級和社會階層建立一個反對法西斯和戰爭的廣泛陣綫。……

“雖然法西斯主義正在發展，但是反對法西斯和戰爭的運動也在同樣有力地發展着。西班牙的人民陣綫，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陣綫，特別是，法國的人民陣綫在印度支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36年5月3日的大選，在巴黎導致了人民陣綫政府的建立。這對法國殖民地的人民說來是一個強大的推動力。”

我們的（越南）同志在強調指出政府在越南實行的改革所發生的影響以後，進一步指出：“黨到處都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有數以萬計的人參加的集會，要求進行民主改革。事實上正是由於群眾廣泛地動員起來，才吓壞印度支那的統治者……人們看到，重大的政治鬥爭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影響（例如1937年鐵路工人總罷工），黨徹底地利用了合法報刊，並把它當作武器加以使用。”

接着，這本書的作者們指出這一鬥爭如何擴大到很廣泛的階層：“1938年5月1日，屬於各種社會成份的五萬河內人民舉行了一次集會，提出如下的口號：民主自由與工會自由，改善生活條件，支持法國人民陣綫。”

1938年到1939年間，世界大戰的危險更加明顯了。越南民主運動討論了這種威脅在越南人民面前提出的問題。我們的（越南）同志在這個問題上這樣指出（我們提醒，這本書是1960年出版的）：“唯一正確的立場就是黨在當時所持的立場。面對着一個還不是法西斯主義的法國，黨提出展開印度支那群眾性的行動，以迫使巴黎與印度支那群眾一起參與對印度支那的保衛，給印度支那群眾以民主自由，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以鼓勵他們抵抗侵略。印度支那人民應該自己鑄煉自己的武器以便打敗法西斯的入侵。”

我們的（越南）同志們在總結1936年到1939年時期這一章

时，強調指出它的积极面和他們党取得的光輝成就：它“丰富了党在传播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利用合法条件与半合法条件的經驗；丰富了党关于动员群众的經驗，……关于为革命的目的把合法行动与地下活动結合起来的經驗。”

因此，团結在人民陣綫周围的法国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之間的这种联盟，虽然它是处在这样的范疇內，即法越之間的关系使越南仍处于受保护的地位，但它并不是由我們强加实行的。这种联盟符合我們两国共产党人的共同的列宁主义概念。

\*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的时期中，提出了同样的問題；只有根据这一时期的情况，人們才能恰当地估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對我們的“法兰西联邦”的观点的粗暴的誣蔑。

由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参加了反对希特勒占領者的爭取国家解放的斗争，当时民主运动在法国获得蓬勃的发展。工人阶级在政府中有自己的代表。同时，越南已宣布了独立，解放运动在所有殖民地中大力发展着，虽然程度很不同。

相反，法帝国主义大为削弱，而美帝国主义正开始暴露其独霸世界的野心。

通过确定法国和海外人民之間关系的一个新的規定——名之为“法兰西联邦”，只是这种力量对比的表现。这个規定一方面对殖民地各国人民來說，与过去来比是进了一步，因为它向他們提供了政治、社会方面的新的手段，使他們能够开展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对法帝国主义來說，是一种新的統治形式。这就是这个历史現象的辯证的意义。

在这方面，我們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爭取最大限度地扩大承认殖民地人民的权利。

1946年3月5日提交公民投票的并为我们所支持的宪法草案规定“法国与海外领地及联系国组成一个自愿的联邦”。但是戴高乐和反动派终于使这个草案遭到拒绝。

然而——我们不准准备跑得太远——，1946年10月13日通过的宪法在序言中宣称：“法国与海外各民族在权利和义务均等的基础上，不分种族和宗教，结成联邦……法国准备把由自己治理的各国人民引向自己管理自己并民主地处理本身事务的自由道路上去。”谁能认为肯定这些原则不是对法国在自己的“帝国”范围内所强加的旧的规定的毫不含糊的谴责呢？

毫无疑问，法国资产阶级——它已表明了这点——丝毫不想遵守这个原则。1947年起，它进行了越南战争，奉行了典型的殖民主义政策。但是法国各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曾大力以这个提法为依据来强有力地提出自己的民族要求。在黑非洲，当时“非洲民主联盟”所代表的强大的人民反帝运动彻底地运用了这个纲领，使非洲群众运动取得一个飞跃；从法国资产阶级把1957年这个联盟的代表大会说成是巴马科的“雷动事件”这一事实，人们就可以衡量当时这种飞跃所取得的结果。尽管在这时期中，由于殖民主义镇压和帝国主义对某些非洲政治领导人所施加的压力而造成的局部的后退和挫折，假如不说明使这个运动当时得以发展的历史条件，非洲人民在1960年“非洲年”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将是无法解释的。也不能忘掉，在我党十二大上（1950年4月），莫里斯·多列士曾宣称：“在法兰西联邦的虚伪的字样后面，实际上，在马达加斯加，正如在整个非洲、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到刚果一样，都在恢复着最恶劣的殖民主义方式。”

关于法国和殖民地各国之间的关系，列昂·费克斯曾在我党十四大（1956年7月）讲坛上这样说：

“法国与每个海外国家之间的联系，只能是法国政府和这些国

家的有資格代表之間談判的結果……

……我們認為，儘管殖民主義者做了許多壞事，仍然來得及實現這樣的聯邦，其條件是：

一、必須毫不猶豫，不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地立即承認至今尚受壓迫的各國人民按照自己的願望處理自己的事務的權利。

二、聯邦只有在權利和義務絕對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實現。

三、沒有各參加國人民的自由決定，也就不可能有聯邦。

因此，我們當時所主張的正是與實際存在的法蘭西聯邦——它只是法帝國的掩護——完全相反的東西。我們不斷地這樣表明過。”

如果人們相信這篇誹謗性的文章的作者的話，那末以上的話譯成中文變成了什麼樣子了呢？變成這樣，“當法國壟斷資本統治者玩弄新殖民主義的花招，提出建立法蘭西聯邦的時候，法共領導人就跟著……”我們讓讀者自己去對這樣一種做法得出看法。

幸亏我們可以參照一些更嚴肅的、也是毫無疑問更有權威的意見，因為這是附屬於法國殖民地各國的解放運動的領導人的意見，他們曾經同我們一樣對法蘭西聯邦表示了態度。然而，這些領導人毫不猶豫地抓住了在當時世界形勢下以法蘭西聯邦為形式向他們提供的機會，來使本國人民向獨立前進。

在這裡，越南同志們表現出最大的現實主義。他們曾與法國簽訂了1946年3月6日協定，根據該協定，法國政府承認“越南共和國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它有自己的政府、議會、軍隊和財政，並參加法蘭西聯邦和印度支那聯盟”。

但是，法國統治者很快地違反了他們所承擔的義務；即使如此，在1947年5月21日，即戰爭爆發後六個月，胡志明又重提了聯邦的建議，要求越南成為“在法蘭西聯邦範圍內與法國聯合的獨立國家”。

甚至在1954年，即日内瓦协议签订前几天，胡志明主席还在自己党的会议上宣称：

“为了反对美国干涉、延长并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政策，我们应当坚决举起和平的旗帜，因而我们的政策应该随之而修改：过去是没收法帝国主义者的财产；现在由于他们与我们进行谈判，他们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保持在印度支那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既然进行谈判，就应该作互相的、合理的让步。过去我们说：彻底地赶走和消灭法国远征军；现在我们在谈判中要求——法国人已接受这点——在一定的期限内撤出他们的军队。过去，法兰西联邦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同意在谈判中讨论我们可能在平等和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参加法兰西联邦的问题。”（胡志明在1954年7月15日在越南劳动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胡志明选集》第2卷第458页，1962年河内外文出版社出版）

这是对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积极妥协的了解的杰出例子，也就是说，这种妥协并不妨碍而是推动前进，中国领导人将难于把这当作一种可耻的投降，因为这是奠边府的胜利者所提供的榜样。

与胡志明同志和一切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一样，我们并不赞成，“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我们并不口口声声高谈革命的空话，我们认为要有效地支持解放运动，也就是要支持每一前进的步伐，不管它多小，只要它能促使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高涨。这就是我们在整个“法兰西联邦”时期努力使这个联邦变为“自由人民的自由的联邦”的意义。

也是从这种考虑出发，我们在1955年7月赞成给突尼斯“内部自治”的法突协定。瓦德克·罗歇曾就这问题说：“所取得的这些初步让步和自由能够并且应该使突尼斯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走向新的胜利。因此，表达法国人民对突尼斯人民支持的法共议会党团将投票赞成协定，并且确信这些初步的自由只是开

始和开端，它将为突尼斯人民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所利用。”（瓦德克·罗歇 1955 年 7 月 8 日在国民议会的发言）

同样，在 1957 年，我们曾经支持扩大黑非洲和马达加斯加政治自由的“根本法”。这个根本法尤其是使几内亚民主党得以实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组织工作，这个国家中后来发生的事情——它从 1958 年起取得了独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这件工作。

至于戴高乐的“共同体”，则与中国领导人所说的相反，我们从来没有支持过。

我们的党是为号召 1958 年 9 月 28 日公民投票时投反对票而开展有效的和特别有力的运动的唯一的政党，当时公民投票的目的正是要通过“共同体”宪法。由于我们的运动，四百多万法国人投了反对票，尽管戴高乐作了大规模的宣传，并采用了恐怖和威胁打内战的手段。我们对“共同体”的立场很明确。我们当时说：

“戴高乐向海外人民提供的唯一前途是合并或组成‘共同体’。他已企图将合并（即同化）强加于阿尔及利亚。‘共同体’归根到底只是根本法的简单的调整，一种恩赐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非洲人民——根据戴高乐的宪法草案——将继续被剥夺主要的权利……任何人民都不会接受合并，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共同体的唯一前途。”（列昂·费克斯，1958 年 9 月《新民主》月刊）

当宪法通过后，我们曾这样说：“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改变我们的意见。我们相信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这就是说完全承认一切成员国的独立和权利平等的整体；每一个成员国是自由参加的，并且得到完全尊重互利的保证。戴高乐的‘共同体’不具备上述条件。”（列昂·费克斯 1959 年 6 月在法共十五大上的发言）

中国领导人就是无耻地篡改和歪曲上面这段话，企图使人相信我们“又一次地跟着”赞成戴高乐共同体。

\* \* \*

不錯，我們過去和現在一直主張在法國人民和一切曾經或還在遭受法帝國主義壓迫的各國人民之間建立密切的、兄弟般的和平等的關係。

不錯，我們過去和現在都希望這種歷史的改變將通過自願的、保證這種聯盟的牢固性的協議而具體化！

中國領導人卻大肆歪曲這種公開宣稱的正當的願望，把它說成是沙文主義的表現，對原來的法“帝國”的留戀！

然而，這究竟是什麼呢？這是我們黨的民族的——而不是民族主義的——考慮。作為一個民族的黨，我們不能對法國成為過去受它奴役的各國人民的“朋友”和“盟友”這件事毫不關心。我們從未將法帝利益與法國民族利益混淆起來。但是，我們認為，由於“歷史所提出的問題”，我們為之而鬥爭的、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民主的法國，將能有效地幫助曾受法國壓迫的各國人民解決他們所面臨的許多問題，而且法國採取這樣的態度，若無剝削和掠奪的思想，則本身也將得到好處。

我們一直揭露以殖民主義丑惡面貌出現的“法國的存在”。但是，我們感到高興的是，海外人民了解並尊重法國文化、法國工人階級和人民的進步、正義和自由的傳統。我們所要維護的也正是這種遺產，我們有責任維護它，並且今後將繼續維護它。我們維護這種遺產，也為的是要反對我們所談到的那些歪曲者。

當我們說各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將“與法國一起，或不與它一起和反對它”來實現時，他們卻在這裡看到了什麼與法帝的勾結，而大家都懂得，這事實上是對法國人民的一種號召，號召他們迫使資產階級承認這些人民的民族獨立的權利，並且使法國和一切取得獨立的國家之間的關係的未來在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基礎上得以維護。



当我们提到必须改变法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方向，使贸易往来建立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时，他们叫喊说我们希望使帝国主义的掠夺长久下去！

例如，我们似乎说了，为了解决法国“缺乏肉类”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的问题，必须每年向阿尔及利亚人强索“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对这样无耻的谎言，我们必须说清事实。

这段被歪曲了的引文是从莫里斯·多列士在1945年我党十大上的报告中摘出来的。当时，法国面临着巨大的粮食困难。在提到此问题时，莫里斯·多列士谈到法国可能从改变与海外各国的经济关系中找到供应的手段。他说，应该“改变这种结构，也就是说，实质上是放弃殖民主义方式。我们不应光从这些国家提取原料和粮食。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发展工业和人民食用所必须的作物。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机器。”

接着，他指出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实际存在的经济关系的帝国主义和掠夺的性质。他指出必须将土地还给阿尔及利亚农民，向他们提供农业机械，“首先是犁”，结束大庄园主的政策——他们“种葡萄而不是种小麦”，而“回民是不喝酒的”。

他最后说：“这种典型的殖民主义政策使得今天在阿尔及利亚饥荒在扩展，而我们在法国也正愈来愈勒紧裤带。”

因此，我们要求采取措施使对阿尔及利亚农民的剥削得以终止，使它首先能自己吃饱，之后能在生产能出口的剩余物资中找到新的资源。我们当时很有理由地提出，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及利亚能够出口小麦”并“补充我们谷物方面的不足”。我们同样地说，在以同样的精神改进畜牧业的条件下，它可以不仅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还能向法国出口“一百万头羊”。

因此，并不是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是加紧对阿尔及利亚财富的掠夺。恰恰相反。莫里斯·多列士在这里对法国和阿尔及

利亚之间的经济关系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预先确定了今天在合作协定中具体化了的关系典型，这些协定在合理的基础上将一大批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联系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帮助这些国家工业化，而且只要求它们在建设时期向它们提供本国经济的传统产品作为交换，这些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并且在长期内仍将是农产品。

人们可以看到文章的作者在用这个“论据”的时候是在耍多么可耻的把戏。

我们一直说，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维护真正的民族利益之间是没有丝毫矛盾的，我们从未将两者分割开来。

对中国作者为了证明自己诬蔑性的论点而企图提出的“证据”的核实就到此为止。我们还可以提出别的具有同样价值的材料。所有这一大堆违反事实的东西归纳成为一种诬蔑，中国领导人就把这种诬蔑当作他们认为苏共和“它的追随者”“背叛”的基本解释。这里的“追随者”是指所有不同意他们的共产党，也就是指绝大多数党。

## 面对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践

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些党有意識地在理論上縮小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把它淪为次要的甚至是无足輕重的地位，因为它们惧怕这个运动，想要取消这个运动。

由于中国领导人感到难于坚持这种誹謗，他们不得不从辯論的角度采取預防措施，例如假装同意1960年11月声明中所确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于是他们假意承认这样的必要性，即必須考虑在我们时代規定世界力量对比的四个基本矛盾：資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矛盾，資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

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和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壟斷資本集團間的矛盾。

但是他們隨後所給予的解釋表明，他們事實上在估價每一種矛盾的特殊作用和相互影響時，完全修正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論點。

他們親自簽署的 1960 年 11 月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聲明是怎樣說的呢？例如它說：“我們時代的主要特徵，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正在成為人類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它又說：“在現時代，決定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內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點的，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是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力量。”

人們在聲明中還可以看到這樣的估價：“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沖擊下，殖民主義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意義來說，僅次於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形成。”

從這些不同的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低估任何瓦解帝國主義的矛盾，但是它認為由於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帝國主義的對峙所造成的深刻的和深遠的影響，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同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最具有決定性的矛盾。這是一個客觀的判斷，而不是對進行反帝鬥爭的各種力量所各自具有的優點的道義上的判斷。

這樣的估價在哪一方面低估了正在爭取民族解放的人民的作​​用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向承認和贊揚亞非拉人民所表現的強大的革命力量以及他們在反帝鬥爭中的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

但是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共產黨人完全有理由堅持這樣一條，即現代世界革命的三個偉大力量間存在着事實上的緊密的團結。他們認為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民的鬥爭，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鬥爭，爭取民族解放的被壓迫人民的鬥爭，

这三者融汇成为一股力量，共同决定着我們时代的世界革命进程的性质和内容。

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論点。但是，中国領導人是怎么說的呢？他們在这篇文章中硬說組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数党拒絕承认“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只讲社会主义陣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的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援作用。他們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貶低或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人們不可能找出更无耻和粗卑的謊言了。但是事实是，对于已經走向他們所选择的道路的中国領導人竟然采用这样的手法，人們已經不感到奇怪了。

請允許我們在这里提醒一下，我們的党，法国工人階級的政党，四十多年以来所进行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一貫遵循了原則性的立場，而这个立場同人們硬加在我們头上的立場是截然相反的。

“每一个无产者遵循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根本思想，即在宗主国工人階級和殖民地国家人民間存在着客观的联盟。爭取解放的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行动对于宗主国无产阶级进行的反对社会压迫、政治反动、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构成直接的援助。因此，法国无产阶级支持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的要求正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法国从把阿尔及利亚人民变为我国人民的敌人的暴力和战争手段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它只需要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平等地位，以便认他作朋友。”（莫里斯·多列士，1957年3月2日《人道报星期刊》）

而今天，我們对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禍害是怎样說的呢？我們只引《共产主义手册》的一篇文章的話：“我們所要強調的，就是非洲人民同法国人民对于結束在今天以戴高乐为象征的法帝国主

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具有共同的利害。……这样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不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使法国人民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法国工人阶级同法国人民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和非洲人民不是无关的。同样，非洲人民的斗争也首先关系到我们。二者的斗争在客观上具有相同的方向。”（《共产主义手册》1963年3月号艾克勒杜文章：《法国新殖民主义和非洲》）可是，尽管如此，似乎法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承认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的”。

\* \* \*

正是中国领导人在提出他们的修正主义论点的同时，企图破坏各种革命力量之间的必要的团结。他们的辩解是徒劳的，因为正是他们在这一点上修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宪章。

他们的全部论证都是来源于他们拒绝一件事，他们拒绝把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最高表现——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看成为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决定性力量。

我们并没有说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是说这个作用是“决定性的”，这就有所不同。我们认为每一种力量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和革命斗争的战斗友情，在各自的战线上坚守各自的岗位，而不去毫无意义地争优先地位。

正是中国领导人企图分裂这些力量，把其中的一种力量同另外两种力量对立起来。难道他们的旨在使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相信苏联要把他们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诬蔑不正是这种目的吗？难道不是为了要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挑动人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仇恨，中国的编辑们才从事这样的工作，并以这样大的篇幅——专门的篇幅——诽谤这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之一——法国共产党吗？人们指名法国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不能不令人怀疑。

他們說蘇共領導人“要把民族解放的革命從屬於他們的和平共處總路線和本國人民的民族利益”。他們硬說蘇共中央認為民族解放運動必須受社會主義國家和宗主國工人運動的領導。這是多么大的欺詐啊！只需要提醒一下蘇共綱領中的一段著名的提法就夠了，這個提法在當時對國際輿論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它說，“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組成部分的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群眾進行的。革命不能根據命令來進行。不能從外部強加於該國人民。革命是資本主義內部和外部的深刻矛盾的結果。勝利了的無產階級要把‘幸福’強加於另一國家的人民，只能損害自己的勝利。”當一個黨面對全世界這樣有力地提出這樣的原則，它怎麼會考慮從外部領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代替這些國家的人民力量，並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們呢？

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發展”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意味着什麼？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意味着什麼？這難道不具有托洛茨基的“推一把”的理論的臭味嗎？不具有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從外部加速還沒有實現革命的國家的革命的味道的嗎？這難道不是說，如果社會主義國家不在進行鬥爭的人民的國家中領導革命，這些人民是不可能獲得勝利的嗎？那末，在這樣的情況下，究竟是誰表現對人民的輕視呢？

中國領導人在最近時期的全部行動表明，是他們要把自己的錯誤看法強加給整個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想盡辦法這樣做，甚至直接干預一些黨和革命運動的事務和活動。這種態度反映出奇怪的野心。

他們不惜加強民族主義的偏見，力圖把爭取民族解放的黨和運動導向以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概念為基礎的理論，而不是導向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列寧主義概念。他們強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和世界其他人民——其中自然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

人階級——之間存在着政治地理和種族上的對立。這就是對我黨攻擊的含意。

文章的作者企圖反駁人們對於他們的錯誤的方向所提出的批評，但是他們由於傾向性地、從全文孤立地引用了列寧的話——這是他們慣用的手法——而不自覺地暴露了自己。這是文章中所引用的話：“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中，中心問題應該是把民族區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這種區分構成帝國主義的本質，而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却虛偽地避而不談。”

文章作者對於這個引言的評論就是教條主義的典型例子。因為評論不考慮如下的事實：

1. 列寧後來沒有要求以民族區分來代替在國家和國際範圍內的社会力量間的劃分，這種社会力量劃分，就導致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國家人民力量間的聯盟；列寧後來沒有提出這樣的謬論，即把共產黨人的綱領建立在這種民族區分之上。列寧的全部著作都證明這一點。

2. 在我們的時代，出現了第三種類型的國家，即社會主義國家，它們是被壓迫民族的天然同盟者，關於這一點，列寧在當時同考茨基論戰時自然不可能提到。

但是這樣地引用列寧，難道不正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混亂的典型嗎？這種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拒絕承認社会力量在階級鬥爭範圍內的決定性作用，而把民族對立置於首要地位。

此外，中國領導人甚至指責蘇共領導人走上“民族主義和蠅化的道路”，指責我黨墮入“沙文主義的泥坑”。的確，如果我們像他們一樣犯下這樣的錯誤，把戴高樂的政策首先估價為是獨立於美國的政策，然而必然導致執行違反民族利益和國際主義義務的政策，那末，我們是會墮入沙文主義的泥坑的。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理由把論據倒過來，並且向中國領導人

提出下面的問題：“你們沿着民族主義的道路要走向何處去？難道你們看不到，如果你們最近在伊拉克事件上的立場在我們的行列里獲得上風的話，你們所口口聲聲說的無產階級革命會走向多么嚴重的蛻化呢？”的確，看到中國領導人由於民族主義偏見而瞎了眼睛，竟對於遭到阿拉伯復興黨法西斯分子屠殺的伊拉克工人階級的优秀兒女保持絕對沉默，這是令人痛心的。在蛻化的、充滿反共反蘇仇恨的、為了迎合美英石油大亨的掌聲而從事可恥的屠殺的民族主義者以及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伊拉克祖國的伊拉克共產黨的英勇兄弟們之間，中國領導人採取了奇怪的态度。難道人們現在在北京就是這樣來理解列寧的教導嗎？

我們不認為我們是完美無缺的。我們從來不認為我們在擺着一些尖銳問題的鬥爭的某些階段，從來沒有犯過錯誤。我們黨自創建以來，在進行反對殖民主義的無數鬥爭中，我們的唯一的願望，我們的最大關懷，就是要經常地熱烈地忠實於列寧的教導。我們毫不遲疑地並且毫無其他動機地謙虛地向這位現代思想的大師、這位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科學理論的創始人學習。我們把他看作是愛好正義與自由的我國人民最值得贊揚的傳統的發展的最高峰，在他之前，曾經有蒙太諾、狄德羅、貢德塞、羅伯斯庇爾、維克多·雨果、讓·若萊士和儒勒·蓋德譴責過殖民主義罪行，但是他們都未能得出哲學、政治和實踐上的結論。我們意識到我們根據人的可能性，忠誠地執行了這個偉大的人道主義教益。我們在這裡使用了人道主義這個字，因為我們並不害怕這個字。

在今天，我們需要駁斥不是來自階級敵人而是來自一個兄弟黨、一個具有光榮鬥爭傳統的中國共產黨的誣蔑，我們是感到痛心的。

但是，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證明我們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忠誠，使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得出客觀的看法。這就是許多最近解



放的国家的兄弟党和朋友們或者是人民还在进行解放斗争的国家的兄弟党和朋友們对我们的行动的评价。

例如苏丹联盟党(馬里)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代表說：“在談到各国人民的国际团结时，我們特别高兴地指出，在法国殖民主义枷鎖下的国家的革命运动，获得了法国民主組織的支持和兄弟援助，首先是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以及一切民主进步組織的支持和兄弟援助。在向这些民主卫士致意的同时，我們苏丹联盟从来没有把法国殖民主义者——我国人民的压迫者和剝削者，同法国人民等同起来。”

喀麦隆人民联盟的勇敢的爱国者致我党十六大(1961)的賀电中說：“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喀麦隆人民向正在努力支持从事斗争的各国人民并从而促成斗争統一陣綫的实现的法国劳动者的光荣的党致敬。”

越南劳动党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致詞說：“你們的党不仅为了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进行了斗争，它还是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榜样，它积极为加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贡献。”

我們还能引用其他党的賀詞，如朝鮮劳动党向我党致意，說我党“不断为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奴役政策而进行斗争”。又如伊拉克共产党“非常赞赏你們的光荣的党对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拉伯馬格里布人民的爱国斗争所給予的兄弟支持”。

至于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同志們，他們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說：“你們在法国是打垮我国的死敌——极端殖民主义者的推动力和决定性力量。……你們作为法国工人阶级和法兰西民族的伟大的党的重大作用，作为一个負責任的和严肃的党的重大作用，在今天，已經越来越被阿尔及利亚爱国者注意到，其中包括在过去几年的恶梦中較难于区分法国的殖民主义力量和反殖民主义力量

的某些民族主义兄弟在内。”

这样的区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不久以前也曾經能够做到，因为我们看到它在1959年致我十五大的贺电中做出了这样的估计：“最近几年，法国共产党同法国其他民主进步力量一起，领导着法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因此，作为结论，我们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中国领导人什么时候是真诚的？什么时候应该相信他们的話，什么时候应该认为他们是在扯谎？我们希望他们自己能在不久的将来为我们提出一些线索，以便解决这个问题。

（译自1964年2月号法共《共产主义手册》月刊）

## 法国議員們报道的毛泽东的談話

法共《人道报》

六名法国議員代表团不久前在亚洲好几个国家作了旅行，代表团在中国逗留期間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見。

这些議員向报界談过了他們的会談，据他們說，毛泽东談到原子弹时主要說：

“我知道你們走在我們的前头，但是我們也要有我們的原子弹。这是一种力量的手段。这不是說我們將要使用这种炸弹。但是，現在有两个大国想领导世界而不同任何人商量。它們同戴高乐將軍商量过嗎？莫斯科条約是个騙局。一定不要这两个国家在我們头上‘拉屎’。”

这段話把苏联同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論，并以同样方式对待苏联。此外，这段話使人看出，中国领导人打算制造原子軍备，是出于同戴高乐所持的相似理由。

接着，毛泽东問这个代表团的成員貝尔納斯科尼議員，对他說：

“你是最年輕的。你多大了？三十六岁？好，你所清楚我的預言：你会看到赫魯曉夫这只紙老虎垮台。”

在貝尔納斯科尼面前这样侮辱赫魯曉夫，而貝尔納斯科尼是一个著名的法西斯分子，当他在“西姆卡”汽車公司时是皮戈齐手下人之一。

議員們还說，毛泽东向他們闡述他的第三世界的观点如下：

“法国可以在亚洲恢复它的全部影响。法国已結束了它的非

殖民化，我們清楚地知道，它不是仅仅出于貿易的目的而要回到亞洲。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只要它不再是美國的掮客）、日本和我們自己，這就是第三世界。”

從毛澤東說法國“已結束了它的非殖民化”到戴高樂政府派兵去加蓬扶植姆巴獨裁因而給毛澤東一個反面證據，這當中只相隔很短的時間。

至于所說的第三世界，它除包括中國而外，還不僅包括法國和西德等國人民，而且正如今年1月21日《人民日報》評論毛澤東的一篇談話的社論中所說的那樣，也包括這些國家的領導階級。

主張同巴黎和波恩的壟斷資本家及其代表結成共同戰綫，這是充當革命者的多么奇怪的方式。

這個共同戰綫反對誰？誠然，反對美帝國主義。但是也反對“蘇聯領導人追求美蘇合作主宰世界”——1月21日的《人民日報》這樣說的！

（譯自1964年2月21日法共《人道報》）

## 雷蒙·居約在1964年3月25—26日 中央全会上的报告(摘要)

自从去年10月6日中央委员会开会以来，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证明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形势的情况报告是正确的。

近几年，各国人民在争取和平和裁军、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同大多数共产党相反）践踏共同作出的决议，试图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入一种冒险主义的宗派政策。他们对我们时代的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防止战争和强令裁军的能力完全没有信心。这种态度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共产主义事业；正当存在着给予帝国主义侵略力量以新的打击的巨大可能性的时候，正当各大洲、古巴和阿尔及利亚同世界所有和平力量一道共同积极进行争取和平和平共处的斗争的时候，这种态度就使争取和平的斗争更加困难了。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断加紧他们的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反对坚持1957年和1960年会议立场的各国共产党的宣传。

他们对于我们党和它的领导所进行的攻击越来越多，越来越粗暴了。

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分裂主义活动。最近这种勾当的表现是，本周中国代表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团结理事会会议上所作的企图破坏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发言。

中国报纸2月4日发表的公开主张分裂的文章，表明了中

領導人的意图：在他們的霸权下建立一个具有特別政綱的派別集團；越来越野心勃勃地自封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創始人的唯一繼承者、共产主义理論和实践的最高裁判官；对各国党——資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或新独立国家的党——发号施令，要它們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而且由中国共产党領導人自己来断定哪些党是杰出的馬克思主义者，哪些是现代修正主义者。

他們信口談論历史和哲学，說什么革命中心正在轉移，这是正常現象（言外之意是說中心在中国）——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是自然規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一样等等。

在好几个国家中，在叛徒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下，发生了在党内組織集团或組織与党平行的集团的事情。特别是瑞士、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情况更是如此。最近一个时期，人們看到了假党的建立，例如在比利时；也看到了企图以分裂主义集团代替中央委员会的活动（錫兰和秘魯）。

他們对于向法西斯独裁进行斗争的兄弟党，采取了一些特別值得譴責的作法。瓦德克·罗歇在10月的中央委员会上已經揭露过，中国的文件在西班牙得到大量地散发，而西班牙的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战士却遭到追捕。我們最近从我們的西班牙同志那里得到如下情况：……佛朗哥的政治警察已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行了一期伪造的《工人世界报》，试图給人以我們党已經分裂的印象。散发和邮寄这一期《工人世界报》的是警察，我們的党员已經证实了这一点。我們的党员坚决反对警察的这种欺騙。但是，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进行論战的手法和它在各国所支持的分裂主义阴谋，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尤其对在非法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各个党來說，該有多么危險。

最后，我們还要指出，中国領導人利用国家电台反对苏联。北京电台的节目故意采用有粗暴攻击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

的內容的文章。《人民日報》和《紅旗》1964年2月4日的誹謗性文章在發表後頭兩周用俄語轉播了八十小時，共一百二十五次。

北京電台的活动是对苏联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在我们党内引起了憤慨，遭到一致譴責。想靠叛徒和托洛茨基分子支持建立反党集团的一些企图失败了。不过，应当提請中央委员会注意法中友协内部情况的某些方面，法中友协的目的在于表达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和友誼并促进其发展。然而有些人，比如馬賽分会的一些人的活动，不是为了促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友誼的最广泛团結，而是为了能够散发中国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法国共产党的文件，这同协会的崇高目的毫无共同之处。由于珍視法中友誼、和平共处、裁軍与和平的全体法国人的警惕，这种企图必将被击败。

也还必须加强反对中国领导人对待戴高乐政权采取的态度方面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他們說，戴高乐举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旗帜！

我們为使法国承认人民中国进行了一貫的斗争，我們同样也将繼續为联合国接納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斗争，但联系法国正确地承认中国和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来看，中国领导人对待戴高乐政权、垄断組織的政权所采取的这种反馬克思主义立场便明显了。

北京人士假装不知道戴高乐对外政策的深刻动机（为垄断资本家寻找新的銷路，拥有原子弹，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占有更大的位置 and 同德国軍国主义結成联盟，法帝国主义企图在亚洲和拉丁美洲重新夺取一些陣地，等等）。最近，蓬皮杜在美国俱乐部的讲话和德姆維尔对《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的讲话，都說明了戴高乐政策的性质。《民族报》也毫不介意地写道，“好久以来就在大洋洲出現的法国，正在那里准备新的設備”——这当然是关于核彈的設備。該报問道：“难道人們真的不认为，在这个观点上，法国同世

界这个地区的主要大国有正式关系，也是适宜的嗎？”

毛泽东在同訪問中国的戴高乐政府的議員会談时发表的关于原子弹的讲话，同戴高乐的野心正相呼应。他說：“我知道你們走在我們的前头，但是我們也要有我們的原子弹。这是一种力量的手段。”

我們應該指出这个事实：在中国报纸上沒有出現任何一个譴責戴高乐鎮压加蓬或鎮压馬提尼克青年以及在留尼汪迫害保羅·維吉斯同志的字。中国也沒有抗議在波利尼西亚建立核弹試驗中心，而在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魯却都提出了抗議。

这就是北京制訂的“新理論”，即所謂“第二中間地带”的理論，其中也包括英国、西德、戴高乐法国和日本。这些国家“不再是美国的掮客”，它們也将同中国一起构成一种“第三世界”。这是一种反列宁主义的露骨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可能导致取消法国和这些国家中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工人階級的斗争。

我們党正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的斗争，它也在进行反对本质沒有什么不同的本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它还在反对（正如莫里斯·多列士同志昨天指出的那样）戴高乐政策中的一切违反民族利益、各国人民的独立与和平的东西。

国际运动的局势证明，我們党对所有这些問題所采取的立場是多么正确。

为了我們只坚持我們党最近所采取的立場，讓我們再提一下10月中央委员会會議的重大意义，我們曾把这次會議的文件編成小册子（譯成德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并寄給了各兄弟党）发表；讓我們再提一下列昂·費克斯在《人道报》上对中国报纸誣蔑我們党及其领导人的一篇文章的答复和后来在《共产主义手册》2月份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更全面駁斥的文章，現在后一篇文章也印成了小



册子。最后，让我们指出关于筹备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中关于这些问题的一章，这个草案正在全党进行广泛的讨论。

在这个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特殊意义的斗争中，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而是中国共产党同全世界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分歧。如果象有时发生的那样，回避具体地揭发和谴责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他们的破坏活动，这就是拒绝确保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的前途。

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遭受的使我们感到不安的严重威胁，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企图强加给世界运动的立场、他们的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党的宣传以及他们的破坏活动而产生的。这正是造成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目前局势的原因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应对这种的确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局势负严重和完全的责任。

在1963年10月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已经宣布赞同尽快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今天，我们认为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已成为更迫切的了。

在本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们重申了我们党在许多文件、特别是在最近一些文件中（去年10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关于筹备十七大的决议草案）阐述的明确立场。

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共领导人制订的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相对立的路线，他们在各国进行的分裂活动，他们给予各党中的分裂集团以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他们对兄弟党领导人采用的侮辱性方法，对整个运动、对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中央委员会认为，同中国领导人的左倾和民族主义路线以及他们的破坏活动妥协，对国际运动、对中国人民本身、对我们党及其反对个人专权斗争所必要的广泛团结政策，都是危险的。

中央委员会主张在最短期限内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便在考虑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重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并采取一切能有助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决定。中央委员会迫切希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国共产党之间的严重分歧得以克服，中国党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紧密团结、对我们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独立以及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重新作出贡献。

我们号召继续散发两本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中，收集了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问题的文件（一本小册子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文件》，另一本小册子中包括1963年10月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工作报告）。同时，我们应当保证大量散发载有2月号《共产主义手册》社论的小册子，这篇社论的标题是《法国共产党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在筹备十七大的过程中，以及在讨论的论坛上，我们应当对1957年和1960年会议以及我们前几次代表大会的基本论点方面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予以极大重视，我们准备在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有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作出新的贡献。

与此同时，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还必须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是要反对主要危险——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任何想同分裂主义活动妥协的思想都必须排除。

有人要使我们争取结束个人专权和加速民主抉择时刻到来的斗争，争取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为了争取社会进步、自由、各国人民独立、和平和裁军的所有民主人士的团结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我们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的努力分离开来，那是不可能的。

（译自1964年3月28日法共《人道报》）

一九六五年 五月 廿九日